

总摇序

说起“文明”，似乎下意识地总想到“发明”两个字。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许多国人的心中，也似乎总是淹没在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辉煌之中。然而，“文明”这两个字，却负载着异常沉重的历史，充满着难以索解的悖论，在“文明”这两个字的背后，甚至还透着血腥。在 怨 颶事件前后，当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个带有人类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开始对“文明”问题有所思考，促使我把目光投向域外，投向西方的文明，投向所谓文明的西方，想要弄清楚到底何为“文明”，西方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文明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写过皇皇四大卷的《法国文明史》，他对“文明”这个词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按照基佐的这一定义，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和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

社会与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考察这样一个进程,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程哪怕“稍作正确的叙述”,拿基佐的话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世界“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此看来,任何人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注定都是片面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也注定是肤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某个侧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管窥一二。正是出于这一天真而善意的愿望,我们有目的地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某些历史阶段和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选择了西方历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别具一格的探索成果,以“西方文明进程”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也为广大读者思考文明问题展现独特的视角。

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撰写的“文明史”。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目光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考深刻。而进入我们选择视野的,则是人们在思考文明问题时往往忽视的一些侧面。从收入本译丛的六部书的书名看,除了《书籍的历史》与《西方媒介史》这两部书,其余四部读者似乎很难将它们与西方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透过《魔鬼的历史》,作者为我们解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历史上魔鬼与恶的化身,通过对魔鬼的概念的追索和魔鬼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知识活动的深层要素。而《镜子的历史》,则是人类和自己的形象的历史,镜子所折射出的是文明的多重含义。顺着《流浪的历史》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中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是仁慈与暴力的较量;在《洗浴的历史》中,作者则以大量史料

和文学作品中提取的生动的例子 ,描述了西方人“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进程” ,洗浴的历史于是透现出一部“社会文明发展史”。

从这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社会侧面 ,从历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历史的真实碎片中 ,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像本雅明一样 ,读出自己的一点感悟 ,窥见文明的几分真相 ,那残酷而并不令人绝望的真相。

许摇钧

圆年 月 日于南京

目 录

导论 摇媒介与舆论 轶

第一章 摇史前史和初生期 轶

- 从蒙昧时代开始
- 超越双重性
- 印刷术和“意外事件”
- 各种类别的期刊
- 自由 : 早期斗争
- 腐败 , 已经开始……
- 联络网和小集团
- 三种态度

第二章 摇员世纪 : 英国的荣誉 轶

- 英国的跃进
- 阻碍 : 司法追究、腐败、课税

- 下议院 :议会的公开
- 落后的奥地利和德国
- 法国 :哲学家与办报者的对立
- 费龙和兰盖
- 法国落后的原因
- 美国的地位

第三章摇法国大革命与报刊 轱园

- 三个基本主题
- “公众精神”的产生
- ~~员德恩~~—~~员德恩~~爆发
- 王宫漫步
- 德穆兰、阿贝尔、马拉
- 梦醒时分

第四章摇自由的延伸 轱园

- 《泰晤士报》的光辉
- 技术的进步 ,公民的进步
- 拿破仑的“典范”
- 日耳曼人的压制
- 法国的斗争
- 吉拉尔丹的历程
- 决斗 ,广告和连载小说

第五章摇黄金时代 轱园

- 自由 :胜利的推动力
- 通讯社的飞越发展
- 面对广大读者
- 特罗普曼事件
- 林林总总
- 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
- 法国 :1914年 10月 10日 法案
- 受贿的危害
- 诽谤的危害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审查制度 :愤怒的等级
- 审查制度的三种努力
- 宣传的革新
- 对其他报界的思考
- 幻想与无能
- 疯狂的夸大式宣传
- 怀疑与谣言

第七章 无线电广播的产生

- 技术上的奇迹
- 两种发展模式
- 在法国 :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
- 政治的影响
- 书面出版物的反击

——外派记者的传奇

——广告的模糊性

第八章 播广播的战争 轶闻

——绝对武器？

——戈培尔和斯大林

——盎格鲁撒克逊的信条

——法国的犹豫

——费尔多内传奇的影响

——溃退和奴役

——自由的电波

第九章 播广播十年以来的书面出版物：衰落还是转变？ 轶闻

——处于不利境况的法国：比较来看

——杂志的繁荣

——音像制品的竞争

——产品成本、国家帮助、隐蔽的款项

——工会的力量

——报亭、预订、搬运发行及阶梯效应

——不满意的读者群体？

第十章 播《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 轶闻

——《世界报》的诞生

——被克服的困难

- “光荣的三十天”期间的报纸
- 繁荣与衰弱
- 《华盛顿邮报》的兴起
- 一种双重伦理
- 与国家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 利润与贫穷

第十一章 广播 第二次青春 崛起

- 美国 宣布衰落？
- 欧洲 最后的美好时光？
- 法国 才华与桎梏
- ~~远~~年代 出乎意料的崛起
- “自由广播”的飞跃发展
- 国有部门的必需条件

第十二章 电视的政治解放 崛起

- 快乐的童年
- ~~员~~年后 真正的开端
- 政府 绝对武器的幻想
- 差异的参量
- 英国模式
- 意大利的状况
- 法国 一次长征

第十三章 摇双重部门的功效 轱源

- 听出不同
- 美国 利益至上
- 英国的荣誉
- 德国的稳定性
- 意大利的挥霍
- 在法国 :从垄断.....
- 竞争
- 砸碎的复兴

第十四章 摇国际筹码 轱怨

- 边界的末日？
- 真相或是宣传
- 华盛顿 原莫斯科的决斗
- 南北双方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电视节目 :美国的统治及欧洲的反击
- 防守与进攻

第十五章 摇互联网的闯入 :与以往完全不同？ 轱困

- 一种新媒介的诞生
- 衰落的幻觉
- 世界范围内的资料收集？
- 时间和空间 :卷土重来

——网上报纸：预算如何？

——控制的问题

结语：语摇媒介的历史与民主的未来 轱辘

——民族同一性

——透明度及机密

——新的论坛

后摇记 轱辘

译后记 轱辘

参考书目 轱辘

专有名词对照表 轱辘

先考原稿編先考書再

歌葉集編葉譯自註譯

閑譯樂書撰加吹操樂則譯

本書根据 葦原出版社 國語年版译出

第三版说明

虽然新版仅在第一版后不到四年后便又付梓了,我却以为它的面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中包括有关最近时期的一些重要增补。本书的计划及设计实际上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互联网和多媒体在世界上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所以在书中它们还仅是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为“袖珍”版印刷和多国语言的译介(希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土耳其语)已经做了各种细节的修改。另一些要在这里介绍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参考书目及适应各种资料的要求。但这次还另外写了一章新的内容作为“背景”,也为了介绍这个集体通讯领域的最初的事实,作为与先前的媒介的对比或补充。在我看来,感动、焦虑、即将到来的事物引起的愤怒、极端的激动,若是将这些重置于历史性的前景中,它们将会是十分温和的。

导论 媒介与舆论

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其任务是研究在时代进程中,一个社会如何对自身及其他社会加以表现,以及所有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人们是如何努力使这幅画面按照自己的意图而改变的。因此,它涉及有关媒介的各个方面,与大多数的人类活动相关,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一方面是书写媒介历史的人本身的文化所构建的信息,与受众对书写媒介历史的人的影响,构成了一种复杂的辩证法,而媒介史正是以这一辩证法直接涉及集体精神的演变;另一方面,媒介史还涉及政治生活,因为政治生活深受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书面新闻或视听新闻的影响,同时领导者所关注的“镜子”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也影响着这种政治生活。媒介史还直接涉及经济生活,因为报纸、广播、电视机构同时也是一些公司,它们的发展与自由直接依赖于市场规律;直接涉及的还有社会的平衡,因为记者、印刷工人、主持人、技师等职业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和传统,各个行业的行为都影响到社会的平衡;此外媒介史还涉及技术的变化,因为技术的变化深刻

地影响着信息传播的节奏、信息构成的方式,甚至影响对信息的界定等。

这样大量的例证在主题的精神吸引力及其公民性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如果没有预料到研究中的特殊困难而被这种本能的好奇所带来的快乐带得太远的话,就有些太过鲁莽了。

第一种困难是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分散是由研究中所应专注的事物的多样性和情况形势的多变性引起的:想想不计其数的各个领域、各个种类的报纸,还有几乎让人泄气的新闻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数目。我们总是被这种分散性所威胁,而从反面讲,如果我们想逃避这些,我们就会冒这样一个风险:会因非常数据化、非常笼统抽象的意见而忽略了存于复杂性中的事实真相。

第二种困难是由资料收集的不平衡性导致的:一方面,印刷并保存了大量的文件,另一方面却很少触及企业档案,而这些档案又可能描述了报社、广播站、电视台等的建立情况。传媒界人士很少能有历史学家的头脑,在这些媒介从业者的印象中,通常是奇闻逸事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确实可靠的年表和对整体事件的看法。在这种行业中,事件接连地出现,而每个人都趋向于在一瞬间体验,保留一点个人的文件,根本不以一种审慎而有条理的方式关心一下事件的历史(一些杰出的历史学记者除外)。加之在视听传媒中档案保存了咨询的问题——说那么多的话,展示那么多的画面!这些问题分外尖锐,而对于当今时代,从中可以引出一种冒险的观点,即夸大了文字的相对重要性,因为其踪迹更容易把握。

第三种困难更为直接地涉及精神层面:这种困难是由观念不清甚至是公众舆论的模糊性引起的,而媒介正是致力于公众舆论

这一领域,并在这一领域中产生影响。公众舆论是媒介史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但是非常难于理解,表面上看起来清晰,但是当我们以为掌握了它的时候,它却像指间的细沙一样溜走了。皮埃尔·拉博利是最早贴切地论及这一问题的人——在他论及维希时——我借用他所列出的一系列形容词来描述史学家们将平常事务所赋予的公众舆论的观念:难以把握的、易变的、不稳定的、反复无常的、模棱两可的、前后矛盾的、缺乏条理的、记忆缺失的……他在这段中还引用了罗兰·巴特的话:“枯燥乏味威胁着所有不断地表明其意图及方法的工作。”怎样才能从一开始就躲开关于这一点的思考呢?

以前,公众舆论的文献为了避免这种最初的苦恼,倾向于无关紧要的反省,以避免面对方法论的问题,即公众舆论与传媒之间的区别问题,实际上是倾向于将二者同化。我们知道,在索邦大学长期盛行一种论文类型:“面对缘月 彘日危机的《费加罗报》”“北方海岸媒体与六日战争”“《阿登省小回声报》中的列支敦士登”。这对命题的教授们来说是很方便的,但在综合内涵方面却缺乏兴奋点。

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进入这种舆论中呢?来看一下我们在当今时代的机遇: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意测试的时代,由它近 近年的长期进程来看,这个时代还是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 70年代美国出现了盖洛浦学院,法国出现了 院^①,等等。很明显,它们的出现更新了我们对公众舆论的认识,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因为民意测试虽然宝贵,却往往有削足适履之嫌。这些测试

^① 即法国民意测验所。——译注

简化了意识和期待的复杂性,并把它们强行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面,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危险:人们把所有不同的东西都加上了相同的标签。在提出的问题中,词汇不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相同的含义。感受和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我们添加的东西中含有人为的成分。这还不包括选择和信心的强度区别,这种强度的区别从历史角度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选举之前的调查中,这种现象是最没有变质的,即使在提问和投票的时刻之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总会有一种摄影记录——当然是被剪辑过的,但这种生硬的简化不会比选举本身更为简略。

在其他情况下,就存在着被扭曲的危险,如果我们想评估感受的深层变化,还需要寻找其他资料了。有时我们进行一些回顾性采访,但是在某些记忆资料极为易逝的领域里这项工作就很难运作了。对历史的后继认识实际上改变了当事人对其历史行为的观念,即对于一些人们向他们询问的历史时期进程所持的立场。这一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受到历史清晰性的两大敌人的威胁,即年代讹误与目的论的解释。目的论的解释,也就是把当今的观点强加于历史时代中的倾向以及重构过去的倾向。这种态度的存在是因为人们已经了解过去事物在当下的演变结果,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这种了解导致了对过去史实的歪曲,而且经常是出于善意。因此,在研究公众舆论的过程中,需要比别处更注重与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同期的原始资料。

我们并不是缺乏这些原始资料,反而是拥有的太多了。先不提报纸,除了报纸我们还可以列举出私人通信、笔记和隐私日记,以及所有被及时记录的个人的反应:国庆节或者为死者树立的纪念碑落成时,人们抑扬顿挫地讲述公民生活的例行演说,在墙上

的胡乱涂鸦。20世纪的只听不说的电话,首先是不存在的,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其次,它们都被按惯例撤销了;再次,它们也根本没有在官方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

除了这些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还应该有一种“辅助资料”,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当时的人对公众舆论的阐释。我们知道了警方报告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在一个民主国家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在各种大型的政治游行或是工会游行中派出代表,这些官员记录游行中所说的话,并向他们的上级汇报。还有行政长官报告,外交官在驻地发回的电报……让·雅克·贝克尔在1955年战争之初所写的一篇关于公众舆论的文章中又指出另外的明证:公共教育部曾经有这样的一项创举,他们要求法国所有小学教师编纂他所执教的小区或村庄的政治观点转变的编年史,这种遗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丰富。

遗憾的是资料的丰富并不表明所有的领域都被涵盖,也不是说这些领域是完全难懂的。首先是因为这些原始资料之间有些重复。我们在外交部档案馆中找到的电讯经常只是编辑室中传播的流言的反映,或是外交官们常去的一些沙龙中流传的信息,所有的沙龙中都有一种重复断言的趋势,以此作为消息确切的保证。

应该知道,在市民所体验到的事情和我们对此的了解之间通常存在着扭曲,这是切实存在的事实。过滤器是很多的。史学家自身便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并充当了感觉到的事实和事后人们的谈论之间的一层附加的帷幔。

来看这一种明证:1955年间战士们的信件。在这其中我们又掌握了一种特殊而同样重要的原始资料,在这一时期军事审查使新闻界尤其不能忠实于民众所经历的事实。最初,军队创

立信件审查制度是为了驱逐危险的和平主义者,这些人有传播失败主义的嫌疑。很快,统治集团就注意到,虽然邮政监控委员会读了所有的国际信件和近几周的国内信件,但这对于骚动的鼓动者和支持者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很清楚审查的存在,并在信件中避免一切不谨慎的直率说法;但这些信件的变化对于理解前线战士们的士气这方面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战士的斗志是所有战争的决定因素。这些信件是了解这些因素的主要途径和丰富资料吗?是的。但战士们写的确实是他们所想的吗?在邮政监控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马上可以得到验证,他们的诚恳程度根据收件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为了不使父母担心,给父母写的信人为地比给妻子的信更为乐观。此外,打开这些信并抄写副本的审查员们会不会引入另外一种扭曲形式呢?他们会不会偏重于少数的惊人的极端观点而不是一般的观点呢?而以现代文化武装的(或被这种文化束缚的)史学家本身,有没有明确地解释出他阅读过的内容呢?

在所有这些原始资料中,媒介是怎样定位的呢?媒介与公众舆论有着极为复杂的联系,以至于人们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联系。如果媒介是真的为了愉悦读者,迎合读者的喜好,它们就会搞错读者喜欢读或是喜欢听什么。另外,传媒界那种为使报纸畅销而吸引读者的愿望中也混杂了一种可变的程度,一种影响行为的希望;这导致了这种复杂的活动中各种力量或公开或隐秘的对媒介产生影响:政治势力、财政影响、隐蔽的钱款……

来看几百年怨月的慕尼黑危机。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断言,在众民主国家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联盟为代价,悲剧性地一致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让权后,绝大多数法国公众舆论都是“《慕尼黑协定》的支持者”。很长一段时期内,有人向我们透露,在所

有政界中只有共产党及少数孤立的个性强的人明确提出反对这些协议,很显然这些说法是以国会辩论为基础的。在对当时的报纸研究中,我们发现,除了几家报纸《人道报》为极“左”,亨利·德·克里利斯德的《时代报》属极右派外,所有的报纸都有这样的消息:舆论完全拒绝抵抗希特勒的政策,而且没有任何法国人说会为布拉格而死。

然而历史学家们最近发现在当时存在最初的民意测验,让·施特策尔建立了法国公众舆论学院。他的第一期杂志《测试》于1939年11月15日出版,其中有一份关于慕尼黑的民意测试。结果如何呢?有50%的法国人当然是在事发第二天支持有关慕尼黑的协议,但有20%反对,只有30%的人表示无所谓,我们还不知道,对于这30%的人,他们是非常支持、有点支持还是勉强支持。20%的人中大多数是共产党的选民,这个数字是1936年法国立法选举时法共听众的三倍。同样方法,我们发现在1939年11月15日,在同年11月反对布拉格的第二次政变后,只有10%的法国人拒绝“为但泽而死”——引自马赛尔·德阿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真相,这种真相与别人很长时期以来告诉我们的事实有很大差别。但同时,正如雷蒙·阿隆所说,在历史上,“千真万确是一种虚假的观点的,却是真正的现实”。政客们在读报时根据公众舆论的真实情况而得出的虚假观点并不是对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毫无影响的。达拉第在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上读报纸,上面用粗话骂着:“下台吧,总统先生!”在张伯伦旁边,在希特勒对面,这依然使他心情沉重。

至此,在这种镜子游戏中,在这种“画中有画”的结构中,为了判断媒介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能只考虑那些或非常分散(盎格鲁撒克逊原则)或暗地夹杂叙述(拉丁的假定提纲)的社论的分

量 而同时应考虑构成我们有时称之为“非政治中的政治”的广阔领域。

这当然包括专门报纸：妇女报、儿童报、文化报、体育报，这些报纸对于人口的“政治社会化”做出了贡献。

我引用皮埃尔·米尔扎的一些例证：在 1954 年罗马法国学校组织的一次关于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讨会中，详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考。前两个例证是关于两次大战间的法德关系。当布吕宁总理于 1930 年 7 月（希特勒执政的两年前）致力于创建一种“~~德语翻译~~经济”时，出现了极度紧张的情况，德、奥海关联盟完全反对 1934 年的条约。法国舆论界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在同时，巴黎有一场法德对阵的重要的足球比赛，两队遭遇时的气氛，沙文主义者般的举动，呐喊声，在更衣室采访运动员时他们的反应忠实地反映出了两国对峙的程度，这比在“国际新闻”专栏中的众多文章要好得多。

第二个例证是由《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一剧提供的。这部 1934 年始映的让·吉罗杜的著名的戏剧以“危难升级”为特性。它使巴黎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制裁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斗争。从中产生了一场动乱，一时间揭露出一种集体政治观念，这成为了政治报纸社论上内容的有益补充。

第三个例证是关于 1934 年法美关系。这时法国共产党反对美国介入欧洲，口号为“李奇微滚回去”（当时李奇微将军统领在欧洲的美军）。示威游行，标语横幅，所有墙上都写着口号。亲共作家罗歇·瓦扬排演了一部强烈反美的戏剧《福斯特上校认罪》。李奇微将军几天后到达，剧场周围发生了暴力冲突。

① 德语，“合并”之意。希特勒辖下的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史称 ~~德语翻译~~即德奥合并。——译注

这些对于对此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号召,适宜于使之抵制气馁情绪,小心谨慎地在各方面寻找他的蜜源——有时候是在很出乎意料的方面——当然这要在媒介从多方面介入之前。

我们没有就此离题。因为报纸上所提及的关于公众舆论的概念总是虚假地清晰。这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一种抽象的构造。没有任何时候存在确切的一种公众舆论的说法,而事实上使用这个短语的单数形式是约定俗成的。在具体事实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态度及反应,同地区、职业、社会状况、思想流派、精神类别一样多。这就需要总是根据性别或年龄等作社会学或地理学方面的区分。

这些区分在危机时期显得尤为必要。举例来说(这是经受了很多毋庸置疑的判断的),~~1918年~~1940年法国人逃难^①时掌握“公众舆论”比在稳定时期要困难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背井离乡,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用同样的方法“凝结”他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事件的阐释。加之审查制度的影响:怀有恶意的人有一种被治安检举的危险,一个弹壳落入传媒界,舆论界里消息就会四散开来。因为普通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反应的转化已经衰退或消失了。

因此,史学家怀疑某些社会学的论断更易于以一种公众意见以偏概全。我是以乔治·比尔多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此文用于百科全书中的条目解释。对于他来说,公众舆论只存在于一个用力划出的一致同意的框框里。他写道:“如果我们想保留公众

① 指德国入侵时。——译注

舆论的特性,适宜的方法是突出它的普遍性,总之,强调出它的使命是占据支配地位。”照他说来,我们只能在一种明确的、强有力的观念支持的多数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提及公众舆论。媒介史学家正相反,他们趋向于增加再区分,有时会认为总体来说公众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存在的。

此外,还应引入“强度”的概念,我曾提到过,民意测试根本不会恰当地体现出这个概念。我们根据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可得知,一个活跃的少数派的强烈的舆论通常在事物进程中显得比一个懒散的多数派的软弱回应更为有力。媒介也同样更为尖锐,更为坚定,他们有一群绝对明确的支持者。在 1850 年前法国报业黄金时期中有这样一些例证:属于保护斑尾林鸽的捕猎者们的某种报纸与《小巴黎人》的对峙,《小巴黎人》是一种大众日报,总倾向于增加鹰的数量,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根据公众反应猜想出的最大的共同目的(这与当今的法国电视一台相差无几)。在这两者间的各种舆论报纸中,富足、政治化、严肃而胆怯的右派资产阶级方面的《论辩报》及社会党人方面的《人道报》显而易见地有着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思考的另一个方面与舆论的发展节奏有关。舆论的时间安排按照报纸所想像的线性顺序发展是不可信的。公众舆论的每一时刻,或是某些公众舆论的每一时刻事实上都是基于依照各种节奏而变化的现时社会阶层定义的。媒介表面上处于一种更瞬时、更多变的地位,但是媒介工作者自身也受到更缓慢发展进程的影响。

还以 1850 年的战士们为例,通过这些战士,他们的通信人了解得很清楚,并且预想到了 1851 年的叛乱。身体的疲劳、尼韦尔将军进攻的失败、持续的严冬、极度的痛苦及供给不足使得军队

造反并且拒绝上前线。然而我们在 1914 年 1 月的战士们信中读到了什么呢？不仅是叛乱的直接原因，还可以了解到各种立场的逐渐形成；了解到战争中产生的最坚定的立场，这些坚定的立场美化了后方市民的生活特权，并使人想到服装业“车间女工”们的罢工……农民们的立场与工人们是一样的。工人被征集到后方军工厂工作，而他们罢工了，因为他们想多赚钱。而同时农民出身的士兵不断死在战壕中。对于国会议员，对于工业家，对于将军，对于所有的统治集团来说，他们的立场都是长期性的。

在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节奏，十年一次，还可能是百年一次。这些信件使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战士们那一代是怎样形成爱国意识的。这些法国战士在当时是 1870—1871 年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小学时代的印迹。他们是“小拉维斯”时代的孩子，拉维斯曾经在地狱般的生活中斗争了漫长的三年。关于这本低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不久前皮埃尔·诺拉曾研究过其强大的影响力，这本教科书是很多全国性的老一套思想的根源。英国又是怎样的呢？1914 年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内，英国人的团结产生了动摇，而同时人们又重新不由自主地想到圣女贞德和法赫德，有时很明晰地呈现出那些用来说明课文的插图，这些图像在人们心中剩下的印迹远比他们背下的课文深刻得多。德国人的画面呢？即使是最粗俗的战士，在他们学生时代的记忆中也存在着“从东方来的匈奴人”的残忍，“他们比阿提拉^①还残忍”。这正是人们因某个全国性记忆而团结一致的一个证据，这种记忆已经根深蒂固，战争中产生的立场及人们对一系列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深植于这块岩石中。

^① 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 435—451 年在位。——译注

这就是难以捉摸的舆论,而媒介应与其维持一种有效的联系。这种舆论非常复杂,我不奢求任何透彻性,也不奢求能回答所有曾提出的问题。总之,这本源于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讲授的十五节课的书,毫不拘束地保留了很多与这一初衷有关的特性。书中没有禁止出现省略、离题、“变焦镜头”、“停于画面”,说明深层趋势的固有的奇闻逸事,甚至是源自我个人在媒介界的亲身经历中所进行的思考。本书的目的不是成为最渊博的著作,在通往这个方向的路上我发现自己的欠缺。我仅建议集中主要注意力在西方世界——几个世纪来最近几十年的一种自由发展过程,为那些因重新发现战争色彩并为准备将来战争而忧虑的市民服务。

第一章 史前史和初生期

从蒙昧时代开始

在开始论述由印刷术的发明而产生的书面出版物之前,应该提及在所谓的“现代”之前的茫无际涯的年代里的信息传播。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在这一方面,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动物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总是出于本能,而人除了本能反应外还能够在理性的协助下作出决定。因此,人的反应必然建立在对外部世界尽可能准确的认知的基础上,而人的感觉不可能直接理解这个外部世界,因为总是有不断的变化介入这个世界,这些变化或产生于自然界中意想不到的动荡,或产生于外部群体的侵犯。

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地域范围是随着不同的文化时期而转变的。但它们本身的性质可能是不变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奥古斯都伯爵的名言:“博学方可先知而万能。”

自古以来人们就渴望知道准确、完整而即时的信息,在速度

方面,竞争尤其表现得明显。从开始的气象信息到今天的交易所活动信息,都是在拥有临时专门发布权时才会获得它们的全部价值。

这样我们便马上被引入一种辩证的矛盾中,我们在这一部分还将继续论述这种辩证矛盾,即渴望隐藏自己所有的信息和了解并公布别人掌握的信息之间的矛盾。由此简单的好奇心(相伴而生的还有什么呢?)和竞争精神马上就被利益追逐而接替,这时信息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带着欺骗对手,提供当今世界所谓的“反情报”这种双重愿望——“反情报”这种现象或者说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存在了,不仅存在于人们隐藏自己所知道的信息之时,而且还存在于人们试着用谎言把别人引入歧途之时。

我们从最原始的状态开始追溯,最初的传媒形式是一些公共标志,这些标志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代用于指示一些简单的可预见的事情。树上的一个槽口,一粒彩色的石子,一枝折断的树枝,在原始人眼中代表着敌人的靠近或是猎物从这里经过或将路过那里……在同一范围内我们可以列出各种视觉信号,比如朝烟暮火,还有听觉信号,比如非洲人所熟悉的达姆达姆鼓。再如德泽,在战胜克里特岛的食人怪物后忘记了张起白帆换下出发时所用的黑帆,而这些白帆是用来从远处告知其父厄热(赫拉克利德)胜利喜讯的——这个不合时宜的通讯故障导致他父亲投海自杀,那片海今天以其父的名字命名(爱琴海,爱琴海)。爱琴海,爱琴海。

还有公元 9 世纪,拜占庭帝国国王在拜占庭与阿拔丝的边境上设置了一系列信号灯,这样在天色还不是很暗的情况下敌人一旦跨过边境,他在首都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得知这一情况。

奇怪的是这种极为简单的行为今天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教皇选举即是如此。我们知道,在圣原皮埃尔广场如果白烟出现

就代表教皇选举会已经选定新的教皇。相反,如果是黑烟则表示红衣主教最后投票依然没有结果,他们继续商议。

1800年,我和圣原歌日旁边的法国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一起去圣原皮埃尔广场观看教皇让原保罗一世(他任教皇仅几周)的选举。烟冒出的颜色在我看来是不太明确的。与我一起去的法国外交官仔细看了一下,以他的职位的威信断言这是黑色的,那个晚上不会有结果,然后回家了。而我却在广场上,我比他更喜欢热闹一些。一刻钟之后,红衣主教出现在阳台上,公布了新教皇的名字。原来灰烟代表白色而不是黑色……

这一经过使我们想到这些信号是不明确的,而且有时候会导致不幸的结果。从我刚刚提及的那一时期开始,人类就不停地寻找更好的传达信号。

超越双重性

事实上,人们很快就试图以一种特定信息来分析意外情况,这种信息是以双重选择为基础在原始资料中加入更详尽的讯息而得来的。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只有一种途径:依靠以记忆为基础的话语。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长跑者的故事:希腊战胜波斯之后通信兵跑了250千米回到雅典,气喘吁吁地宣布本国胜利的消息之后,他便精疲力竭而死了。就好像他和他所传递的信息已经混为一体一样,这信息从他体内分离出来后,他也就象征性地消失了……

一种文化在没落之前具有一种处于效率最尖端的系统:如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前的印加帝国。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既没

有文字也不懂骑马,而印加的国王为了显示他的权利,总是需要一种准确而秘密的快速信息传递方式。所以他命人跨越整个国土建了一条笔直的石板路,从基多到库斯科,总长圆源园千米,并且翻山越岭的地方都建造了令人吃惊的台阶。总有人不停地在这条主轴线上跑,接踵而至,交替不断,平均每小时跑 员园千米。因为每个人都跑了 圆园多千米,所以开始劳累了,接下来的人就在这时候赶上他,在他旁边跑,他仔细地给新上来的人说要传送的消息的细节,并让他复述以知道他是否明白了消息的内容并且记了下来,直到下一个驿站。消息就这样在这个帝国口耳相传,而要跑完这 圆源园千米的长路却需 员天的时间。

文字的出现改变了这幅画面。尤其是它大致上与动物的驯养处于同一时期,这样便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马的速度几乎是人跑的速度的 圆倍,大约可达每小时 圆缘千米。在另外一些文明中,一种很快的骆驼——单峰驼,每天可在沙漠中走 愿千米。

最早的“官方邮局”大约可以追溯到阿喀美尼朝的波斯帝国。后来这种做法被不断地传往希腊王国,再到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而后到穆斯林世界。在一本名为“罗马的通讯”的书中,居伊·阿夏尔向我们展示了在共和国及从共和国到帝国,人们是怎样成功地由口头统治转为书面统治的,以及每年数以万计的私人信件又是怎样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程度的——流通速度越来越快,增加了很多更远的特殊目的地,并且在与那些同商路相伴而行的传闻和谣言的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保证在信件所到的广阔地区卓有成效地传播集体信息。

看到有组织、有效率的信息传播中止了 员年——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是更令人惊讶的:外族入侵后,罗马帝国便四分五裂了,君主们被迫从各自辖地撤退,同时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各种艰

难险阻。

直到 15 世纪、16 世纪甚至是 17 世纪,西方才又重新出现了官方邮局——可能还是为了特殊的高额报酬而开设的。路易十一在 1475 年建立了他的官方邮局,英国官方邮局建立于 1534 年,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官方邮局建立于 1548 年。

很早以前,教皇就开始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希望对整个西方有所了解,同时也因为他们统治着往来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修道士。而后从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之日起,尤其是在意大利,像今天一样,商人们也参与进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想知道各地商业发展情况的需要,而且这最好是在他们的竞争之前。

除了马和骆驼,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信鸽,信鸽在波斯早已开始使用,而在伊斯兰国家占领期间,信鸽的使用开始普及。十字军到达圣地时痛苦地发现,敌人占有着重要的优势。他们的活动由此受到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传递长的信息,即便写在非常薄的纸上;其次他们的信鸽总是被敌人的鹰捕获。信息就这样被阻隔了,而这也已经推动了密码的产生。这就是一段漫长而引人入胜的历史的开端,而破译密码的努力已向网络方面发展,甚至是发展向当今最为复杂的机器,而这些机器本身又遭到一些用于译码的机器的攻击。

这样,从 15 世纪开始,真正的全球化信息发展起来,而新大陆的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这种发展。信息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目的,正是这样,知识分子的欧洲诞生了,伊拉斯谟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在这种活动中,很早就有人介入其中:从投资方或是买方把信息夺走、公众势力自身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利用选择和审查

的方式提取信息 或者是各种各样由政治冲突或利益诱惑而导致信息泄密。

从古代文明开始就存在专用于信息流通的场所 :市场、广场、集会场或是寺庙。在希腊广场、罗马的集会上都贴有当日的新闻。《每日纪闻》^①是一份官方的报纸 ,贴在墙上以供罗马市民阅读。《元老院议员议事录》是公布元老院的决议的。塞内克向我们介绍 ,富有的罗马人专养一种收集信息的奴隶 ,派他们到城里去收集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目信息及各种传闻 ,这些传闻使富人们做成一笔绝好的投资生意 ,并能使他们及时地取得有利的政治地位。

这样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便形成了越来越密的信息传播网 ,“手抄信息”的飞速发展便是信息网的明证 ,而这些手抄信息正是我们今天报纸的雏形。从大商业中心 ,尤其是德意志和意大利传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形势的概述信息。这些信息被归于一处由抄写人迅速地誊出 15 世纪份、16 世纪份 ,或是 17 世纪份 ;这就是 15 世纪末开始威尼斯人所谓的“~~抄写本~~” ,而后 ,在荷兰被称为“~~抄写本~~”。安特卫普、法兰克福、里昂等市场繁荣的城市也竞相效仿。

印刷术和“意外事件”

继而便是 1474 年在斯特拉斯堡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我是指在西方 ,因为中国不在本书论及范围内 ,但同样也要指出 ,在几个世纪前 ,~~1051-1071 年~~ 之间统治中国的唐朝 ,就已经发行了一种官方报纸 ,叫作“邸报”。

^① 一译《罗马公报》。——译注

在西方,第一本印刷图书于1469年在里昂出版,印刷报纸的出现几乎是紧随其后。起初,这种报纸的出版是无规律的;这正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报纸发展初期最大的特点。在法国,这种“偶然出版物”是用小开本的纸印成的1—2页之间的小册子,并被摆在商店里,所以它们的定位应该介于宣传册和报纸之间。由马赛尔·雷纳尔编写的第一本《法国报刊通史》中叙述了很多在这方面有教益的细节。

这种“偶然的出版物”在意大利被称为“~~小钱~~”,是由“~~小钱~~”一词派生出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小钱”:用于买这种报纸的小额硬币的名字逐渐用于它们所购买的物品本身了。另外一个文字游戏“~~喜鹊~~”在意大利语中是“喜鹊”的意思,而在法语中意为“喧闹”。出现于法国的“小报”性质更为大众化。“小报”可以追溯到1699年。“小报”刊载了面向大众的消息,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这些消息给人想像和感觉都留以深刻的印象,如水灾、地震、充斥整个时代的奇异的幻影(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还可以想起很多),尤其是吸引大众的那些轰动一时的案件。从这时起,“小报”一词才用来表达“假消息”。莫里斯·勒维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些资料的文集,书中满是传闻和愤怒,并有这样的评论:“理性与非理性、智慧与荒唐、罪行与惩罚、梦想与现实……这种双重性存在于社会新闻的中心,也像存在于人们心中……在广泛传阅的‘小报’中,在追求轰动效应的报刊中,以及在《现实观察》这类节目中,人们所要找的并不是使人消沉的事实真相,而是既独特又普遍的现实影像,这些影像因为充满了虚构而充满了各种见解。”

“小报”、讽刺性短文、布告在宗教战争期间都得以飞跃发展,歌曲也是如此,人们在公共场所卖唱的歌曲是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自古以来报刊的三个主要方面：普通信息，它们是偶然的出版物；社会新闻，即谣言；致力于政治事件造成影响的报刊舆论，包括讽刺小品文、布告及歌曲。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末甚至 16 世纪初。这种延续是与文化传播同步进行的，而这种文化传播对欧洲集体政治倾向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各种类别的期刊

下一阶段是以周期性出版物出现为标志的。这种出版物的出现是由于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从而创立了一种定期的“会面”。

这首先涉及一种年度性，即“历书”（这个词出现于 1365 年，是由阿拉伯人引入的古叙利亚语，意为“明年”），最早的日历在 1485 年印刷于美因兹。

但真正的期刊的诞生仅能回溯到 16 世纪初。它的雏形出现于荷兰的安特卫普。从 1584 年 7 月开始，不定期地发行一种名为《新闻报》的散页印刷品。这件事出现在这个国家是不足为奇的。荷兰比其他的国家对外开放性更强，因此希望更好地了解世界。

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活动迅速发展，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柏林、汉堡、斯图加特、布拉格、科隆、阿姆斯特丹几乎同时出现了定期出版物。这好像是北欧对于显示出勃勃商机的地中海沿岸欧洲的一种回复。

在伦敦，第一份周刊诞生于 1665 年。在巴黎，是 1671 年，由著名的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创办的。这位祖籍在蒙彼里埃的医生是一个有创造性而勤劳的新教徒，他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想

像丰富。《报纸》出版于1787年,共100页,尺寸为16厘米×24厘米,印量1000—1500份。这份报纸是一页一页地撰写和印刷的。

在南方,佛罗伦萨的第一份周刊出版于1787年,罗马的于1788年,马德里的于1789年。在圣彼得堡,彼得大帝被西方所震慑,于1790年亲自创办了他的报纸。

从18世纪就已经显示出当今报刊所具的特点了。体裁的形式已经十分宽广,而这一新兴行业开始从它的老对手那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些对手包括政府干涉的愿望、行贿,以及一定数量的各类好意(我们今天俗称为“礼尚往来”)。

报纸普遍都是“早新闻”类型的,连续刊载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除了这类报纸外,另两类已经兴起的报纸显得更为突出:文化报以及多刊载社会新闻的娱乐报。

在法国,典型的文学刊物是《学者报》。这份报纸在柯尔培尔的庇护下创办于1789年,是一本以书讯为主的周刊,旨在介绍所有的名著,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法国这项发明不久被传入意大利,这份报纸遂被译成意大利语,德意志也效仿意大利,而1790年英国创办了《哲学议事录》,由伦敦皇家协会出版,这份报纸在英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学者报》在法国的作用。

至于娱乐报和社会新闻报,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奇怪的例子:在让·洛莱在隆格维尔小姐的庇护下创办的《历史的缪斯》,这本周刊在1790—1793年间发行,这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刊物,而全部的诗都是由让·洛莱一人创作的,在1793年间,他写了100万行诗。这样我们又接触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用诗学存储信息。

下面是这一特殊新闻体裁的一个样本,洛莱在此展示了他的工作方法:

我在巴黎四处游荡，
拜访诸多的名门显贵，
出席美味丰盛的宴会，
不是为了做客的快乐，
而是为了倾听的舒畅。
我甚至停驻在小街上，
只为收集更多的信息……

这和揭露丑闻的报纸差不多，我们今天称之为“花边新闻”。
下面的几行诗当时的记者们应该将之贴于桌子后面：

我的缪斯几乎无药可救
定是因为昨夜
我没有想着作诗
而是在纸牌中沉迷
甚至站着睡去
我不知道我的文章
该从哪开始……
“我的文章”……这个词意味深长！

更著名、更重要的一份报纸是《文雅信使》。这份由多诺·德
维泽创办于1788年的报纸，有着政治与文化双重职责，它被欧洲各
国效仿，在外省甚至荷兰都设有分部。

《文雅信使》长于无稽之谈，这表明它的体裁是不固定的：在
1789年整整一年间里，它用一个关于“松木塔中的游蛇”的故事吊
着读者的胃口，那是一条齿间含着一颗奇异的红宝石的蛇，多次

出现在农民面前,使之目瞪口呆:这便是我们今天的尼斯湖怪和“飞碟”的雏形。

自由:早期斗争

这种新生的咿呀学语的出版物开始了它最初的争取自由的斗争。

首先要面对的是政府。政府部门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忧虑,并且根据惯常的反应来反对它。出于恐惧,政府部门采用各种方法对之干涉和严厉惩罚,致使报纸渐趋衰亡;而后,在第二阶段,出现了一种利用报纸为他们自身目的服务的愿望。

在这一领域,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一直率先地复制、模仿、妒忌。1534年,皇家出版法庭制定了第一部审查法典。当时人们还认为信息出版权隶属于国王。“特权”一词的原义便来自于国王授予印刷厂厂主的印书特许权。

出版自由的历史,简言之就是国家机密与公开的信息之间逐渐分离的过程。

17世纪英国的政治史异常地动荡不安。先是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倒台,被斩首示众,后是克伦威尔执政时期,然后是查理二世复辟。这种动荡有助于变动的加速:有英国革命在其间隙中自由地延伸。

《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于1644年向议会提出一项吁请,不久议会便出台了一份有关逐渐延伸的政治自由的文件,名为“阿

留帕几底卡”^①。这个题目涉及传说中位于雅典阿瑞斯山上的刑事法庭,该法庭曾赦免了俄瑞斯忒斯的弑母罪。这份文件的副标题为“论出版自由”。这位诗人为书的自由出版而斗争,其实同样也是为期刊的自由出版而斗争。“杀死一个人,即毁灭了一个理性生物,但是扼杀一本书,便是毁灭了理性本身。”他指出,古雅典和古罗马共和国没有销毁书籍(这些书籍美化了历史)。作为一个标准的反教皇主义者,他认为罗马教廷、特兰托主教会议和宗教裁判所迫害着出版自由。人们利用预先审查制度以避免邪恶的产生,但是“善与恶在生活的沃土中不是各自生长的,它们相伴而生,枝叶错综缠绕”。

这种推理显得很狡猾:为了令人满意,执行审查的人必须既清廉又可靠,然而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因此最好是不去做,因为在审查中自我欺骗,必然会抑制天资和才干。我们在保卫和发扬出版自由的摘要中可以发现,后来这种自由是如何发展的。

出版自由在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起伏消长的变动。在动荡和内战期间,自由得以延伸,而在政权又到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便又萎缩了。

查理二世于1664年创办的《伦敦公报》便控制在他手里。直到17世纪末,组织一种严格的预防审查的1689年《执照法案》才被废除,约翰·洛克为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辩护。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欧洲大陆,17世纪几乎只有官方性质的报纸。(1789年勒诺多挑剔的保护人黎塞留强加于《报纸》一篇

^① 题名取自古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斯公元前366年所写的演讲稿《对阿留波阁法院的演讲》,呼吁雅典人恢复民主制。雅典市民的法庭和雅典娜在阿留波阁宣布俄瑞斯忒斯为阿伽门农报仇而弑母是正确的。——译注

文章致使整期报纸在最后一刻又重新排版。)而勒诺多所得的报酬便是享有各种特殊津贴。

但是由于各国之间的相互补偿现象,绝对的控制已经是不可能了。1793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维克多·雨果在一份著名的宣言中说,“为了比利时的利益,法国的印刷厂被关闭了”,18世纪君主政体十分强大的国家的审查制度使荷兰从中获益。小量的印刷不如印大部头的书,虽然各国海关都高度警戒,印满字的纸还是可以在各国间流传。

勒诺多骄傲地说,外国的干涉对于他的报纸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鉴于这是一种商品,商店从不会保护它,它有着激流一样的本性,越遇阻力越是汹涌”。

这样,出版自由在拥有杰出的印刷厂厂主的荷兰找到了避难所。路易十四的大使蓬波纳在1704年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远不止是发行报纸,而是涉及马车和船的维护。”事实上,荷兰政府在对待本国出版活动时并不是比其他国家表现出对出版自由更多的情。但是荷兰的政权十分分散,那里每一个城市都容许报纸诋毁邻近的城市。尤其是“马车和船”——荷兰在信息贸易中明显获利,而沉重的货物的流通可以由印好的报纸来完成,此外,这些报纸是用外语编写的,大多数时候是法语,有时候是德语,统治国家的政府知道本国大部分市民都看不懂这些。

1793年《南特赦令》的废除,使成千上万的法国新教徒被迫逃亡,其中很多人定居荷兰,他们给荷兰的报界提供了优秀的作者。从那时起这些报纸在整个欧洲便通行无阻了。

热代翁·弗卢若阿,一位逃亡的新教徒,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写道(像很多人一样,我在此引用报刊史先驱乔治·魏尔的话):“陛下的检查禁书的官员们:你们越是坚持阻止优秀的书籍

和报纸进入法国,越是在这方面严于职守,你们就越是激起法国人读书看报引进报纸的兴趣。不管有什么危险,也无论多大开销,他们贪婪地读着,因为这正是人的天性:无视所被允许做的事情而追逐所被禁止做的事情。”这种关于审查制度和好奇心的辩证法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另外,王公们本身虽然十分关注本国出版物的审查,却不停地设法弄到外国的报纸,为了读上面的信息和娱乐。圣西门给我们讲述了路易十四是如何经常地读到荷兰的报纸,以及他如何在一份报纸的笑话中读到朝臣们所隐瞒的关于他的儿子梅纳公爵的一个军事错误,这使他恼羞成怒,“这个王子外表那么温和,对最敏感的事件也能把持住自己最微妙的冲动,只是在这一次战败了”。当时一个正在偷吃饼干的仆人惊动了他,他用手杖打仆人的背,竟然把手杖折断了……这是报纸的一项新功能:在宫廷的沉默中保护王公们,并使他们知道他了解周围的人对他隐瞒的臣民们对他的指责,以备不时之需。

腐败,已经开始……

这种新生出版物努力的第二步,是赢得一种在金钱腐败方面的更大自由。从报业发展初期,就有人揭发报业中的用钱买来的小说家和拍卖的记者,这些人为了私利而同意说谎。我们现在又看到了这种现象!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报业已经严重腐败。从18世纪起就有人控诉为了扩大报纸销量而说谎的记者,他们有时候是出于懒惰(讲述想像出来的事实总比讲述核实后的真相容易得多),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被收买。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本·琼森 1604年在伦敦上



映了一部受阿里斯托芬戏剧启发的名为“裁缝之魔”的滑稽剧，翻译过来就是《新闻商店》。这部剧第一次以记者这一社会人物为攻击对象，这一形象完全是反面的：他绝对毫无顾忌，利用读者的轻信盲从乱写一气。

确实如此，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腐败的好处，在他们的武器库里，他们把强制权上附上了贪污一项。在下一个世纪，我们会看见这种现象以一种令人忧虑的方式继续发展。

在19世纪，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危险：在编写的内容和商业广告之间本来绝对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乔装的广告一直是一种威胁。

英国报刊广告依然作为先锋，发明了报纸中的“广告牌”，从中寻求更多的相对于读者和政府来说的独立性。

首先出现的是商业广告。自然地，最初的广告是印刷厂厂主们自己的，宣传他们的最新出版物——一种自我推销。接下来很快地就刊登了想夸耀产品吸引顾客的商店广告，紧接着是另一些类型的广告：米歇尔妈妈寻找走失的猫，寻求温柔的伴侣——在那时已经出现了！在此引用蒙田《随笔》（第一卷，第17章）中的一段话显得有点奇怪，他在这段话中说明他的父亲也是广告这一观念的发明人之一，他建议：“应该在城里指定一些地点，有各种所需的人可以到那里，让为此而设的官员（办事员或职员亦可）登记，如：欲售珠宝，欲买珠宝，征去巴黎同行者（法国网，今年夏天：‘求帆船航海的同行者’）；寻有某种优点的仆人；求教师；欲聘这样或那样的工人，每个人都各据所需而登记。”这确实已经十分现代了……

同时，在有些人的心里，一种忧虑渐渐滋长，即客观的叙述不会被一种事实所弄乱，例如因私利而被收买的人的干预。勒诺

多的《报纸》是引人注目的一例,因为它的组织者于1786年在法国第一个在报纸页边上设置了一个“办公通讯录”,这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免费广告的雏形。

实际上,我们根据很多迹象可以猜测当时的记者们面对隐蔽的款项的诱惑并不是胆小的。路易·特纳尔在《法国报刊通史》中引用的一份合同便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这份合同是《文雅信使》的创始人多诺·德维泽和托马·高乃依签订的,后者是皮埃尔·高乃依的兄弟,也曾有过很多部悲剧作品。这份合同定于1786年,合同规定:“平分报纸销售的利润及将得到的礼物、金钱、动产、珠宝和年金。”事情再明了不过了。

联络网和小集团

还需说明另一种自由形式:相对于一个小集团所特有的、用于压制判断自由和批评自由的好意来说的自由——这种忧虑也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以前引用过的《学者报》的历史很值得一提。这份报纸由巴黎议会参议员德尼·德·萨洛于1786年创办,并很快取得成功。萨洛是冉森派教徒,拥护法国教会自由,并专注于保卫议会反对王权。他创办这份报纸的时候说道,他会不拘一格地评论出现在巴黎甚至是整个欧洲的主要知识化都市中的科学和文学著作:事实上他有时刊登一些尖锐的评论激怒了很多作者,导致了强烈的反对,特别是来自总是受其抨击的耶稣教派。

应该说在法国,大臣,可能还有工商业者之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特点,由此构成了他们写作、出书,涉入文学界以扬名的愿望。莫里哀戏剧《恨世者》中的奥特龙便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



而阿尔塞斯特在他的交谈者给他读十四行诗的时候表现出认真是对的：“上帝，我不适于决定这件事，请宽恕我……”当他后来禁不住诚恳地反对时，只能失望了。这就像德尼·德·萨洛和他的过于直率的《学者报》。

柯尔贝尔于是决定舍弃这位创始人，让一个更随和的合作者、修道院院长加卢瓦顶替他的位子。人们好奇地读了这位随和的修道院院长的《悔过书》，在此文中他阐明了为什么说他的前任那样的正直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承认把评判所有人作品的权力归于自己是对公众自由的侵犯，也是在文学国度里实行一种专制。而且我们会坚决克制自己，不去运用我们的评论，专心读书以便能够作出比至今为止人们所阐述过的更为确切的汇报。”他还表示他将尤其严肃对待触及宗教问题的人……

从那时起，像往常所出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清算现象。在法国，政府缩减思想作品评判自由的愿望促使不久以后在荷兰出现了另一种承袭德尼·德·萨洛传统的刊物。哲学家皮埃尔·培尔于1701—1702年间在那里出版了一份名为《文学共和国新闻》的报纸，这份报纸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他概要地阐明他的意图：一项很好的报纸策划，力求达到“既不奴颜婢膝地阿谀奉承，也不像审查制度那样放肆鲁莽”，这份报纸是希望为文学服务而不是奉承文学。因为培尔的刊物在第三年年末中止出版，欧洲的文学界和科学界都为之感到惋惜。应指出，小说比政治出版物更容易跨过国境也更容易欺骗海关的警戒。在每个时期，当政治领域所受限制加重时，自由便在文学出版物中寻找避风的港湾。

三种态度

正如我们所知,从 19 世纪开始,报界便受到一种总的思考的引导,关于它们所传递的事实、它们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的作用的思考。我们能不能、是否应该、怎样才能够——恰当准确详尽地——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阐述呢?面对这一直存在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三种可能的(并且不相互矛盾的)态度:必要的朴实谦逊、反复的担心忧虑和不管怎样都要具备的坚强的信念。

首先是谦逊。当时的记者们很快便意识到这种职业的性质和快节奏从没给他们以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那样的自由。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可以在远离工作室的宁静中工作,区分真伪,把复杂的事件直接放入长期的连续性中。再引用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在他的《报纸》中的话:“我非常不解为什么富有的审查官们没发现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一部作品可以在一天 24 小时内引来定购邮件,并使我一周都忙于装订、校对和印刷这些图书。”在当时的压力下,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这种感觉同时也像一种毒品。

此外,他又说道:“历史是叙述发生过的事,而报纸只是登载正在流传的消息。”事实上,这离朴实谦逊已经有点远了。即使在一时的热情中,我们也没有对此失去希望:报纸可以区分可能和荒诞……

此外,勒诺多又说:“历史总是坚持讲述事实,而如果报纸阻止说谎,它也就做够了。”这个纲领有点模糊不清:因为如果不讲述事实怎样才能阻止说谎呢?

在这里我们被引到第二种强烈的感觉中——忧虑感深入很

多当时的记者的职业信仰中：不是害怕欺骗人民，而是怕和他们说得太多了。英国查理二世时期，一位曾用铁腕支撑报纸的记者在1679年写道：“报纸使得民众以一种非常放肆的态度对待上级的法令和草案。”争辩永无止息。是统治一个明理的民族容易，还是统治一个无知的、用传说和杂闻就可以哄骗的民族容易呢？实际上，很多当时的领导人带着或多或少的自信都选择了两者中的后者。

然而，从17世纪开始，还有一种自信存在于自由报刊所登载的事实效力中，这种自信又加强了一种诚信的契约。及时地追寻事实真相是无法克制的愿望。这就像是勒诺多所说的“一种商家无法保护的商品”（即禁止之意）；换句话说，即是冲破所有阻碍。

在这种行业中严密精确一直就是一个难题。这就是我们可以在最后引用《历史的缪斯》的作者及辟谣的发明人洛莱的话来美化这一章的原因。就是下面四行诗：

在我最新的消息中，
我提及布鲁泽尔先生的死
我今天可以宣布我的错误，
他既没有故去也没有死亡。

第二章 18世纪 :英国的荣誉

18世纪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启蒙运动及哲学精神的发展有着直接而复杂的联系。这是报纸、“信使”以及各种期刊的第一次飞跃发展时期,也是读报成为欧洲杰出人物的习惯和必需的时期。

皮埃尔·培尔在1756年写道:“名副其实的报刊和图书数目成倍增长,致使此时应该为其书写历史了。”他已经要求为出版业撰写历史了!但是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第四种权利”这一表达法。它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反对者、英国政论家伯克首创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他曾著有至今仍负盛名的《沉思集》。在考虑到这个世纪的进程时,我们便会为一种对比而震惊:在构成报业定居地的不列颠群岛,报业已经取得自由和必需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即使是最发达的地区依然落在其后。英国由此在各角度来讲,无论在道德信仰,还是政治经济方面,都为所有欧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这些国家正为逐渐取得同样利益而奋斗。

英国的跃进

英国的特殊性是从 1789 年,即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约三十年后,废除《执照法案》,即取消“事先的许可”制度开始表现出来的。诚然,这项决议没有废除所有可能的惩治,但是仍然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进步。这是一个值得称颂的伟大时刻,由此在英国诞生了西方第一份日报:发行于 1785—1786 年间的《每日新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展呢?我们可以列出三个主要原因,也是三个有利因素,而这些是法国或日耳曼国家所不具备的。第一,激烈的政治斗争,辉格党和托利党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有着别处所不具备的读者大众,无论在规模上还是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文化层次上都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第三,杰出人才辈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整个欧洲的榜样。

在政治上,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一致表现出对人民的不信任,并在可能的制度民主化前保持极度的缄默,但当他们是在野党的时候(英国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实现两党交替执政的国家),又都倾向于保卫和发扬言论自由。这样,各家报纸时而依靠这一方,时而依靠那一方,成功地扩大了它们所希望得到的印刷自由。而另一方面,作为回应,说教性报纸飞跃发展,与斗争性报纸相对抗,而斗争性报纸对于执政者来说通常具有一种强烈的挑衅性。

两位辉格党记者,也是两位先驱者理查德·斯梯尔和约瑟夫·艾迪生把这种新生的出版物推向了辉煌的顶点,他们于 1741 年创办了一份著名的期刊《闲谈者》。《闲谈者》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的场所,带有一点自嘲的色调,这恐怕是为了构成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可能出现的过于鲁莽的行动会招致诸多指责。

1851年,继《闲谈者》后出现了《旁观者》。这份日报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非凡的发行量(1844年10份)。斯梯尔和艾迪生设想创立一个伦敦俱乐部,在那里各界知名人士可以交流他们对政治、艺术、文学等方面实事的感受和评述:一个富裕的外省贵族罗杰·德·科弗利爵士,作为英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典型法律界人士、巨商、退休官员——所有这些身份都围绕着一个严肃冷漠的人物形象,像今天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参加宴会时为了能开车回去而滴酒不沾。是这位“旁观者”带着他的平静把报纸命名为《旁观者》,他在俱乐部成员的骚动面前显示出了“旁观者”的关注、持续以及稳定。他知道,审慎而不露声色地观察他人,能给这些人强加一种“闲谈”之外的严肃。

这一文学方式表明,在英国,尤其是在伦敦所发现的读者的独特性正是有益于这份报纸传播的另外一个原因。这批读者大众是由18世纪政治动荡所造就的,并成长于英国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的经济飞跃中。英国的文盲数量比欧洲内陆少得多,我们现在认为是18世纪带来了扫盲运动,而当时英国的文盲要比我们想像的少得多。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是民众都有一种使旅人感到惊讶的习惯,人们聚在咖啡馆大声朗读报纸并加以评论:他们正处于一个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的结合点。

此时“阅览室”发展起来了。人们花很少的钱便读到很多没钱去买的报刊。孟德斯鸠在英国旅行期间曾吃惊地看到了一个铺瓦工也拿着报纸:这在法国是无法想像的。英国人对论战的狂热爱好是非常普遍的,这种爱好使得他们的好奇心更为强烈。

这类出版物的第三个有利因素是存在持有独特见解的人,他们服务于此也利用报纸为自己服务。文学声誉与报纸声誉交映生辉。声誉依赖于图书的出版也同时依赖于报纸上的文章;而在

法国，很长时间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我已经提到过理查德·斯梯尔和约瑟夫·艾迪生。一个敏感而性情温和，另一个严肃精明，他善于不以自己的信仰做交易，同时也坚信大人物们给他的幕后支持。艾迪生以一篇热情洋溢的对德·马尔波罗公爵的颂词涉入文坛，对于我们来说，颂词中所用的“坏波罗”一名是更为熟悉的。德·马尔波罗公爵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出征并凯旋，他是出于对艾迪生的鲁莽和仁慈的体谅而给他保护。

但是最为著名的两个人是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前者为《鲁滨孙漂流记》（1719年）的作者，后者著有《格利弗游记》（1726年）。这两本书有着一种离奇的命运。它们很激进，在当时有着十分高的政治价值，后来它们由于被迫缩减、删改、压缩而变得渐渐失去锋芒，直至变成儿童读物。

斯威夫特是一位忠实的托利党成员，保守派报界名流，他于1709年创办了《考查者》报。这位“格利弗”的作者把他的兴致和力量都置于一种痛苦的悲观主义中，并把这种痛苦的悲观主义色彩罩在全人类尤其是政客的身上。在几位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对英国的严词，这说明仅对他们来说，这一国家的自由已经到了某种程度。在书的第二部分中（离开小人国厘厘普特之后，格利弗到达巨人国），勃罗白丁拉格的国王谈及英国人时写道：“这是自然界所能忍受的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危险的恶劣害虫。”斯威夫特运用一种讽刺手法，旨在假装赞同别人对此指责的做法，而后又把它们渐渐推向荒谬的极点。我们见识过他的冷漠。例如他以这种冷漠推进《一个温和的建议》的情节发展：他使英格兰的富裕地主供养贫穷的爱尔兰孩子，依据是一种论证，即一种残酷的逻辑：它展示了一种所有人都会发现的利益，这些小

孩的父母没有任何东西喂养他们,而富裕的地主们也将没有任何东西来把他们养大,等等。

还有一位署名为“朱尼斯”的记者。在 1821—1823 年三年间,他以在《公益广告》上发表的保卫自由、反对托利党的“通信”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些通信虽然只有 1 页,但是它们的力度、重要性和效力都使当时人为之震惊,并且为整个英国的报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谁是朱尼斯:他是那些成功地长期以各种笔名保护自己匿名性的记者们的先驱。

阻碍:司法追究、腐败、课税

上述是解释英国报业发展的三个动因。而这种发展也多次由于受到严重的阻碍而陷入混乱。同样强调这些阻碍,是因为这些阻碍不久后成为了别国的范本:司法追究、腐败、课税。

一场司法权方面的争论贯穿了整个世纪,这种司法权应该负责裁定报刊的不法行为。因为在各国的这一领域中,民间审查委员会总是比职业法官更为宽容。1812 年,位于英国司法系统之首的“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确定了一条原则,在所有称之为“诽谤”的诉讼案中陪审团只能起有限作用,即核实是否是此被告人发表了被控告的原文,而接下来由不太宽容的法官来断定他是否构成诽谤并进行惩处。

事实上,英国的出版史就是由骇人听闻的判决构成的。每一次王权都可以如此给人一种印象,即它成功地将浮子浸入水中,但是每一次浮子都以一种更大的力量浮上来。所有的镇压势力都没能阻止这种进步,甚至都没能使它产生曲折。然而惩罚是很

重的监禁、罚金，甚至是示众柱刑，丹尼尔·笛福1704年就受过这种加辱刑。

法国最著名的犯人示众柱在巴黎的批发市场，它是一种建于一座小塔下的装置，装有一个慢慢自转的铁圈系统，犯人被迫将头深入圈内并将两手放在一个孔中。这种器具是为了向人们展示被他们所蔑视的无耻下流之事。然而，在伦敦，通常人们不是唾弃辱骂这个不幸的人，反而为他喝彩、称颂、赞扬他。这就是1704年丹尼尔·笛福的幸运故事，英国出版业政治观点方面的一个重要历史纪念日。

另一种政府性的侵犯在于焚毁期刊（这一举动在18世纪初又重现，尤其是在纳粹时期。这可以以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华氏96度》中所阐释的一条可怖的规定为依据）。最著名的事件是焚毁《北不列颠人》^①第96期。这是一份由记者威尔克斯担保出版的刊物。此人是辉格党首相威廉·皮特的挚友（在18世纪末人们发现此人即威廉·皮特之父）。1766年皮特被推翻，本身也是众议员的威尔克斯为此进行了强烈的辩护。1769年12月，托利党首相诺斯勋爵获下议院批准通告封禁相关期号，并授权司法部门追究威尔克斯。

这样情节便发展得十分有趣了。威尔克斯是国会议员，因此，他的同僚必须取消他的议员豁免权，以使他作为一名记者，而不是作为民选代表被处置。象征性很强的时刻：所有第96期的《北不列颠人》都被带到露天场所郑重地烧毁。人群聚集起来，阻止刽子手们执刑，并成功地将威尔克斯护送至议会。此事影响非常显著，以至国会再也不敢公开烧毁报纸了。当然，威尔克斯被

^① 一译《苏格兰杂志》。——译注

迫流亡法国 源年(在那里,他也对法国大革命前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 源年后,即 源年,他获悉国会判决他的决议已在议院记录中被删除。

这场持续一个世纪的战斗终于在 源年达成了一项《诽谤法案》,此项法案与 源年前《执照法案》的废除有着同等的历史重要性。“曼斯菲尔德体系”由此告终。而后,陪审团有权判决诽谤,这也是英国出版业在 源世纪能取得飞速而卓越发展的原因之一。

第二种要克服的阻碍是腐败。在创造出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也创造出写作买卖:在乔治三世时期, 源—源年间任总理 源余年的辉格党人沃尔波尔挥霍了大量钱财,他倒台后一项调查表明,在他执政的最后 源年,仅在保证对他有利的文章方面就花费了 缘万英镑。

第三种要克服的阻碍是课税。政府努力地通过税务机关曲线弥补其在司法权方面的退让。 源年创立的印花税在 源年、源年、源年逐年加重。我们由此回到已经开始的争论中:平民读报是否恰当?大众阶层了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细节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稳定?面对狂热地废除“知识税”的做法,大多数政客的答案是否定的。

艾迪生写道:“我的让众人谈及自己的愿望,使得我把哲学从学习室、图书馆、学校转移到了俱乐部、沙龙里,转移到咖啡馆的茶桌上。”可以列举出自 源年以来伦敦 源份报纸的 源万份的总发行量,这个可观的数目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

下议院:议会的公开

几十年来,在下议院会议是否公开这个重大问题上一直聚结

着对抗的态度。

如果说今天有一种概念似乎是与民主概念有着内在联系,那便是民选代表间各执己见的辩论公开性概念了。然而英国用了整个 18 世纪去赢得这种公开性。起初,国会粗暴地想要保守他们的决议和选举的秘密。因为对于所有人在演说和选举中所持的观点的太细致的分析,可能会泄漏国会议员的受贿及拍卖选票的行径……

长期以来,议会都是不公开的,报刊界所得的汇报又是极为概要的。演说者们自己传达他们所要表述的内容,很自然地带有一种美化自己言论的倾向,去除批评和可能的错误的倾向。因此报纸决定把议会的公开变成一匹战马,用以满足读者们的强烈的好奇心并重新赢得读者。

下面是有关一个持续半世纪之久的矛盾的几个很说明问题的情节。

1744 年:一位名为米斯特的记者,以一种极端批判的笔调报道了一位下议院议员向他提供的议会辩论的消息,他由此被施以示众柱刑,罚款以及监禁的全套刑罚……

1744 年:在此事之后,议会又以对违禁者施以重罚相威胁,重申禁止对会议的报道。

1747 年:另一位名为爱德华·凯夫的记者,报道了很多辩论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他从他所摘录的众多议员的话中得来的。受到惩罚之后他决定再也不报道有关下议院辩论的内容了,转而叙述“小人国上议院”所发生的事(此时已是《格利弗游记》出版几年后)。而且他给主要人物选择了很明显就可以看出的化名:沃尔波尔(宰辅)变成了沃勒尔普(宰辅)等。众所周知,这种讽刺手法广为流传开来。

最后一次镇压的努力始于 1789 年。乔治三世在当时想建立一种个人专制独裁，他曾写信给北岩爵士：“必须结束报纸报道议会辩论这一古怪而非法的行径。”应指出，两年来，记者威廉·伍德福尔在他主编的《早晨纪事和伦敦顾问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他是怎样做的呢？当然，他列席这些辩论，但是没有记下任何东西的权力。然而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得他能够在回家后整理出要点，他叙述得十分忠实，以至于气愤的国会议员也无法因严重错误而对他加以指责。

乔治三世最后的企图终遭失败。一名因报道议会辩论而入狱的记者在伦敦市市长勋爵的干预下获释，大批民众为他组成了一个胜利的随行队伍。战斗胜利了。

这就是英国的模式。斗争的力度及取得的成果同 18 世纪欧洲内陆形成了对比——当时，预先审查制度还广泛地统治着内陆地区。

落后的奥地利和德国

对于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公国来说，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德意志各公国诸侯都增加了限制出版的敕令。1789 年，撒克逊原魏玛公爵以不愿其子民成为“爱争辩的人”为由拒绝一种刊物的出版。撒克逊原选帝侯，即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抱怨报纸是“谎言和无意义的饶舌”。位于抑制所有微弱的言论欲望的前沿的亲王，我们可以列举出普鲁士的“下土国王”，腓特烈原纪尧姆一世（1740—1797 年间在位）在公民生活中推行一种完全军事化的观念。他决定在他的王国除了两种报纸外不印刷任何其他报纸，这种报纸将由他指定的官员付印：一种登载国王敕令的官方报纸和

另一种文学报纸，将以一种他指定的笔调论及他所指定的图书。结果是可以想像的：这两种乏味而令人生厌的出版物只在整个德意志和奥地利取得了微小的成绩，而发行量更是微乎其微。

更有趣一例是腓特烈二世，此人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暴君，是哲学家们的朋友。他对报刊所持的观点较之其父而言是不那么粗鲁的。他认为“下土国王”太过胆小怕事，而他可以更好地利用报纸，并灵活地运用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反信息”。

在普鲁士和英国与由法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众多德意志公国组成的联军作战的期间，腓特烈二世有步骤地利用报纸向敌方提供了大量假情报。例如，~~1758~~1757年，他平静地刊发了一份对他的宣传有利的伪造教皇敕书。战后的~~1764~~1763年，他听说在他的首都柏林虚假地传闻说将会有一场新的不得人心的战争爆发。他断定这条传闻会流向别处，他于是招来他的御用记者，命他们报道波茨坦遭受了一场冰雹风暴，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因此，柏林人忘记了他们先前的忧虑而去寻找这场臆造的灾难的细节了，而这一场灾难同那条衔红宝石的游蛇一样是虚构的。而国王很高兴这样巧妙地愚弄了他的子民。

法国：哲学家与办报者的对立

法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但在总体上是落后于英国的，虽然~~1780—1789~~1780—1789年间夹用英语单词曾一度盛行。这种落后是因为缺少英国当时的那种议会及两党轮流执政制度而造成的。但尤其应指出的是在法国政治文化界名流的眼中，书籍和期刊的区别远甚于英国人眼中这两者的区别。通常是书籍阐明和传播哲学家们的观点，而不是报刊。哲学家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想

到办一份报纸或是杂志,而是编定一本百科全书。他们谈及“出版自由”时,所指的是书籍和各类的小册子的出版自由,而非报纸的出版自由。而同样,他们也通常是很敌视报纸的,因为从反面来说,长期以来,最出色的记者也是在与哲学家们的激烈争论中扬名的。的确,他们曾为争取更多的自由而建立起一个联盟,但这种扩大了的自由却被用于报界人士和哲学家们之间的激烈斗争中。费龙和伏尔泰之间的争论尤为著名。乔治·魏尔在他的书中转载了大量哲学家对期刊的抨击。下面是借用最著名的几个人物的例证: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和孟德斯鸠。

伏尔泰痛恨报纸,他只接受为承袭勒诺多的《报纸》或《学者报》这种传统的官方报纸写赞词。提及法国的官方报纸,他在《百科全书》“报纸”一条中写道:“从未被谗言污染,而且向来书写合乎规则。外国报纸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的。伦敦的报纸,除了宫廷的报纸以外,都写满了观念自由所容许的不正派之事。”不久后他宣称:“报纸已成为社会的一种祸害和一种不可容忍的劫掠。”这便是长期从事写作的作家们面对他们所蔑视的报界小群体时所表现出的蔑视程度。他指责报纸既不正派又轻浮:报纸永远达不到审慎的书籍那样的严肃程度。

《百科全书》中狄德罗的措词是同样的含义:“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就说话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在“记者”一条中,狄德罗控诉道:“法国现在有大量报纸。有人发现写一本书的分析要比写一篇好文章容易得多,于是很多思想贫乏的人转而为此。”他这样旨在表明哲学家与蹩脚的记者之间的一种等级制度。

而卢梭, 他的思想更为抑郁, 因而他的批评更为尖刻。1759年, 他刚获悉一个在日内瓦的朋友创办了一份报纸时, 给那个朋友写信: “先生们, 你们这样便成为了期刊作者。我向你们保证这一计划不会令我欢欣, 同样也不会令你们欢欣。我很遗憾地看到可以建造纪念碑的人却满足于搬运材料, 建筑师却变成了普通工人。一本期刊是什么? 一种昙花一现的作品, 既没有价值也没有用处, 有知识的人都忽略去读它或是蔑视对它的阅读。它只能供妇女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自负的傻瓜们去阅读, 它的命运不过是早晨在梳妆台引人注目而晚上又沉寂在衣柜里了。”

最后是孟德斯鸠, 在《波斯人信札》中借郁斯贝克之口说: “有一种我们在波斯没有见过的书, 在这里却很流行, 叫‘报纸’。懒人读这些感觉很得意。”

我们用修道院长加里亚尼对德皮奈夫人说的话作为总结: “上帝保护建立在敕令基础上的出版自由!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一个民族变得更粗鲁, 更能破坏鉴赏力, 更能使表现力退化了。”

鉴于在相互攻击中累积下来的愤怒, 哲学家们在大多数记者面前所表现出的敌对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费龙和兰盖

有些人物是很著名的。其中首推埃利·原让·费龙。他是修道院院长德方丹的儿子。德方丹曾于1759年创办《巴纳斯派小说家》而后又创立《现代写作观察》, 这份报纸使得哲学家们甚为不悦。费龙富有创造性, 性情热情放纵。他在成功发刊于1759—1760年间的《文学纪事》中逆哲学群体之意而行之, 直截了当地说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传统的护卫者。

带着一种明显的对悖论的兴趣及反对革新者态度,他护卫着种种弊端。(埃德加·富尔认为社会是建立在大量小弊端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弊端会导致一些分散的满足感并以建立其间某种联系而结束。)"革新者们是不对的,应该保护这种弊端,"费龙解释道,"这种弊端长期以来与事物的进程混杂在一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深入而广泛地植根其间,要触及它们就不可能不引起大的动荡。"

在很多敌视革命的保守者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观念。里瓦罗尔这样认为:通常来说,最好容许那些虽然确实该批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情况存在,而不是消除它,因为消除它会付出代价,所形成的动荡会导致情况比以前更糟。伏尔泰对费龙回以恨意,他把他描述成"一只从德方丹修道院长尸体上爬出的虫子"。他的著名的四行诗:

某天在山谷中,
一条蛇咬伤了费龙。
你可知结果怎样?
蛇因此而丧生。

彻底的言论自由捍卫者伏尔泰就是这样于1763年借助警察警告费龙要慎重,并在必要时把他关入比赛特(巴士底狱)。然后他继续他的行动,在他1764年上映的一部名为《苏格兰人》的戏剧中,一个角色取名费隆(弗隆),明显是影射费龙(弗隆)。

自1764年起出任"书业督导"^①的马勒泽布曾在宫廷城市之

^① 即《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费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译注

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间为他所崇敬的作家们扩大了写作自由的空间, 由此为启蒙思想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让人觉得很很不平等的是他对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宽容和体谅。例如他禁止费龙在他的报纸上对《苏格兰人》进行反驳。

在下一代人中, 有一个人物是记者处境的最佳代表, 他既是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位作家: 西蒙·兰盖。他的生活可以拍成一部有声有色的电影。

这个人其实是很粗鲁的。他的父亲是冉森派教徒、博韦中学的副校长(这所中学是某些中等学校的杰出代表, 这些学校由迂夫子和粗鲁的乡下人组办, 却培养出法国大革命重要参与者)。他很穷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在这一类人中的有抱负的年轻人, 他只有一条出路: 迅速地找一个达官显贵并为之效劳。他于是便开始给众多贵族当秘书, 特别是双桥公爵, 这位公爵还曾几次把他派往波兰。

在里昂, 他发明了一种由动物油脂和冷制品制成的新型香皂, 并建立了一家工厂, 赚了很多钱而后又挥霍掉。后来他在工业界混不下去了, 便当了一名办事非常有效的律师。他曾为德·拉·巴尔骑士辩护, 也曾接手很多著名的诉讼案件, 直到他刻薄的态度触怒了律师团体而被这一行业除名。

也就是在那时为了另谋生路, 他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他投身于政治新闻界。不是在巴黎, 而是在伦敦, 因为从这个邻国开始, 人们可以更为自由地广泛议论和评判政府当局。他于1792年在伦敦创办了《政治、国民及文学年鉴》, 然后运往布鲁塞尔, 再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运往法国并在那里获得巨大成功。

他是四海为家的人, 会讲好几国语言。他不停地从一国迁往另一国, 出于好奇心也出于对自身自由的保护。他在巴黎触怒了

一些人,这些人使用下等警察的一种诡计引诱他并俘获了他。他被关在巴士底狱两年。他的得意门生雅克·马莱·杜潘,出于愤怒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编年史》。通常在保卫个人自由方面表现得非常敏感的哲学家们却丝毫没有因他被关进牢笼而感到愤怒。格里姆甚至就此次追捕写道:“众多的律师、法兰西学院、国会、大批在兰盖先生笔下受辱的老实人都不难在此次灾祸中得以安慰。”

他出狱后重新出版了报纸,去奥地利寻找一种更自由的氛围,在维也纳他受到约瑟夫二世的热情款待,这使他认为约瑟夫二世的才华令其他君主汗颜。兰盖有些厚颜无耻了——因为他从未停过笔——帮助那些布拉邦的起义者去反对他的保护者,这对约瑟夫二世非常不利。他不再宠幸此人并开始追捕他。

大革命期间兰盖身在法国,成为科尔得利俱乐部^①成员,却未能当选议员。他与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都有往来,最终“因曾极力奉承维也纳和伦敦的暴君”而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对于这个激情有余而论战不足的冒险家来说,这样的结局似乎是合理的:充满传闻、充满狂热、充满矛盾的一生。作为哲学家们野蛮的敌人,兰盖与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他最终有一种默契感——这与哲学家正好相反。

法国落后的原因

哲学家们对报刊的仇恨说明了法国期刊自由发展进程缓慢的部分原因。但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推开了这一问题。为什么报

^① 法国大革命期间马拉等人在科尔得利修道院建立的政治组织。——译注

刊没有更为活跃和更为受到重视呢？

还应重提一下传统报纸为特权所承担的重负，这种重负在 18 世纪已经提到过并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报纸》，每周出版两次；《学者报》，在书评方面比从前更为谨慎，更为平滑和刻板，而《信使报》则成了《法兰西信使》。所有的这些报纸仍然十分有利可图，即便是需要向政府缴纳享受特权的费用。直到 1788 年（在伦敦《每日新闻》出版 25 年之后），法国的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才出现，为了不在国内政治方面出麻烦，这份报纸像蛇一样狡猾，而且曾多次延期出版。

这些传统报纸继续压抑着有前途的独立行动者和报界轻骑兵的发展。此外，法国落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缺乏双方对抗以及代表们组成的行会尚无实权。不仅是在司法术语上讲的出版自由在世纪初的十年里没有得以改善，反而压制并呈现加重的趋势。1789 年一则敕令规定禁止写关于财政部的报道。1792 年另一份文件禁止涉及宗教问题，这给一份重要的报纸《特雷武纪事》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这本于 1781—1784 年间出版的冉森教派刊物在思想运动方面起一定作用，并带有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自由的精神。它以一种比从前的冉森教派出版物更为隐秘的方式发展，并成功地在整个 18 世纪存活下来。《教会新闻》（1788—1792）这份报纸在山洞里秘密印刷并经由一系列秘密手续分发出去，这证明了 18 世纪法国冉森教派联络网的生机与活力。

审查制度的发展是很说明问题的。1789 年遵照“书业督导”的命令，在法国共建有审查处 18 个，1792 年为 15 个。

企业家夏尔·原约瑟夫·庞库克，一个有创造力的新闻界人士，祖籍荷兰。当他以一个经验丰富的投机商的精明于 1788 年买进了《信使报》，而又于 1792 年买进《报纸》时，他十分注重稳固政

府对他的优惠政策,并向政府保证他不会忘记认真地支付他享受特权的费用。这两份报纸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因接受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的贿金而处境甚佳。韦尔热纳期望由此为有利于“起义军”的干涉做舆论准备。

这样便阐明了为什么在法国,一种除了被限制的报刊外的消息风道的存在时间比其在英国的存在时间要长。这种消息风道延续了传统并使“偶然出版物”或“手抄新闻”得以继续繁荣,制造谣言的场所供养着撰稿人,以使他们收集信息继而整理成型并由抄写员誊写,相当于今天的“秘密信件”,人们花高价得到承诺或错觉,以便在其他消息从大报刊漏网之前做以安排。我们已渐渐远离私人信件的文明,我们知道(例如赛维涅夫人)这些信件是要被一个收信人所属的小群体轮番读过的,它们也充当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正如在西塞罗时代。

美国的地位

在结语中,还应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对方兴未艾的出版自由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吉拉丹未来的领导者布里索在革命前夕的1793年11月创立了一份名为《法兰西爱国者》的报纸,马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当时在他的内容简介中写过这样揭露性的文字:“应该找出一种除宣传手册以外的手段教育法国人,这种手段可以不停地以较低的价格和一种不使他们厌烦的方式达到教育的目的。这种手段便是政治报纸或是一种公报。这是人口众多并希望摆脱愚昧和被奴役状态的民族的唯一教育方式……没有这些报纸(这很重要)美国革命……永远都不会发生。”

布里索的个人路线是很说明问题的。深信(他的清醒也有局

限性)法国近几年不会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他于1785年初前往美国,为了在那儿碰碰运气并创办一份报纸。当他得知召集全国三级会议时,匆忙乘船回到巴黎,他认为在那里——这一次预言更准确些——他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此期间,一连数月,他得以亲自在美国观察到报刊在解放运动中的分量。

在殖民统治期间,美国的报纸是不足为提的,因为它们受到严格的管制,也因为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间的流通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报纸潜在的读者群体范围狭窄而不能使其有一种足够的繁荣以吸引重要的人才。

1785年,英属美国殖民地出现了第一种近乎常规的报纸。而后,在独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报刊的兴盛期,这些报刊在独立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波士顿公报》在英军到达后撤回内陆,却依然享有盛名。1786年12月1日,《弗吉尼亚州权利宣言》宣布——这一先驱性文件值得敬重:“出版自由是保卫自由最有力的防御。”1786年12月1日的《独立宣言》把这种出版自由纳入个人不得转让的权利之中。最终,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后禁止国会今后通过任何限制此项自由的法令。

两个名字在这段历史中凸现出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及托马斯·潘恩。

“老好人富兰克林”,1706—1790年间在世,是波士顿一位印刷厂厂主的儿子。他很小的时候便到伦敦求学,回国后他于1768年24岁时在费城创立了《宾夕法尼亚公报》。他并不仅仅发明了避雷针——我们怎样称赞他都不为过的原因是——他同时也是美国出版自由的创立者之一。这是他所获得名望的基础之一,这种名望使他得以在独立战争之后作为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大使出使巴黎。

托马斯·潘恩同样值得受人敬仰。在巴黎奥代翁大街 179 号，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鲜明的牌子注明他的故居。英国和美国争相以这一人物为荣，法国也在大革命期间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

他生于英国，1774 年携富兰克林的介绍信渡过大西洋。到达波士顿后，他主编《宾夕法尼亚杂志》18 个月。他的灵活、有创造性而生动的文笔使他很快便赢得了声誉。美国各种报纸的编辑为此争论不休。他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呼吁共和，呼吁解放黑人，呼吁扩大妇女权力。因此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把他招入参谋部并下令警卫队大声朗读他的文章。

这两个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潘恩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间的媒介。1790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去世时，制宪会议投票通过为其举行三天的国葬。托马斯·潘恩也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当选者。当然，他似乎并不会讲法语或是带着一种口音致使没有人能听懂。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翻译来译出他激昂的话语，即便说服力因此稍有破坏，他同样被认为是一个重要人物，被视为因对大革命的杰出贡献而成为法国公民的外国人的杰出代表。

在“美国模式”对法国的影响下，1791 年出现了一份名为《欧洲邮报》的报纸，并专门撰写美国的事件。这份报纸在布洛涅印刷，布里索以此为武器利用两国人对这份报纸用另一种语言对其敌对派进行批评的赞赏而确立了它的自由。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约 1793—1794 年间，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及哲学家们与办报人的对立已逐渐消失。在 18 世纪的最后 15 年里，法兰西学院开始首次接受记者，这标志着歧视已经消失。法官兼出版商塔尔热于 1793 年加入法兰西学院。尼韦奈公爵召见了他并对他说：“今后记者这一职业应由最有才智的人来担任了。”在他的《布里索回忆录》中，他提到他摆脱犹豫投身于

受人鄙视的这个行业 ,是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蔑视在几年间变成了某种尊重。他中学毕业时自语道 :“培尔也曾做过家庭教师 ,波斯代尔是中学的泥水匠学徒 ,卢梭是一位侯爵夫人的仆人 ,而我是一个办报纸的人。”而不久他便明确要求得到他在报界的影响和地位 :“我很高兴能支配一份报纸 ,它可以传播我衷心喜好的一些原则。”

这种演变为 1789年 8月 26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决定性条文做了准备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 ,因而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和出版的自由 ,但这一自由限定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言论、著作、出版自由 ,大革命期间的记者们不会失去这些自由 ,并且这种结果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与报刊

法国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名画之一便是大卫所绘的马拉被夏洛蒂·科黛所刺。头裹缠巾的国会议员在画中的形象是在他的木鞋形浴盆里洗着澡——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必须每天多次洗澡。他面前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放着几页纸，是他正在写着的文章。他的右臂以一种悲剧性的姿势垂了下来。鹅毛笔落在了地上，旁边是一把刀，是它使得这位记者陷入了最后的沉默……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是以高卢为中心的。在欧洲历史上，法国大革命这一重要时刻，如果不考虑报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显得难以理解了。如果不给报刊以准确的定位，革命就会是非常难以捉摸的。这涉及革命的进程、革命的步调，还有由当时人和后来人所构成的革命的代表。在法国历史上，甚至是欧洲历史上（英国的几个特例除外），这还是第一次，大多数政治参与者都成为了记者。有些报界人物成为了历史运动的领导人。除马拉之外还有卡米耶·德穆兰、米拉波，甚至还有我们提到过的吉伦特派领袖（当时人们称之为“布里索派”）布里索。

如果我们只是探求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是仅满足于复原报纸

的生动的专栏内容,我们便会把革命时期的报刊变成一种狭隘的历史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报纸在百姓向公民转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话,我们便失去了基本的观点。

当时最成功的一份期刊《法国革命》把下面的句子作为座右铭:“对我们来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我们跪倒在地,站起来吧!”这完全是一条纲领!

三个基本主题

如果说统治阶级和哲学家们对“办报人”的不信任感和鄙视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消失了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便体现出了主要的变化,它确立了三种重要的思想观点,体现出这一时期记者们所有的活动。

第一种观点是:秘密通常是可憎的,是特权的保护物,是专制君主政体在其周围建起的壁垒以掩饰他们所维持的不公正秩序。秘密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因此,新制度第一个愿望便是容许和要求政治事务的透明度。只说从今以后统治权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是不够的,还应该使一切在市民的专注和严厉的目光监督之下公开进行。

我们知道,英国在几度严峻的对抗后才赢得议会辩论的公开。即便是在诸方面都成为先驱的美国,也是直到1789年上议院才对记者开放。不过,从一开始,制宪会议便提出人民有权得到在选民会上所提到的一切,因为在1789年1月,人们便记住了巴黎第一任市长培尔的话:“政治生活公开是人民的保障。”

第二种观点是:大革命一直就对一种统治模式怀有敬意,即在希腊和罗马城邦中存在的直接民主这一古老模式。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革命总是试图模仿发生在它之前的革命。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以讽刺的笔调揭示了关于 1789 年革命的内容,而 1793 年 7 月之后,雷蒙·阿隆以此作为他对大学生运动进行批评的原因之一。1793 年,希腊尤其是罗马的先例使人心神不宁。革命参与者所受的文化熏陶基本上都是古典的,他们头脑中有一个这些知识构成的参考资料的仓库,由此充实着他们的雄辩力、他们的论战和他们的雄心壮志。因此他们试图重新创造直接的民主,不惜以允许公众在议会论坛叫骂喧哗为代价。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叫喊声的压力以及讨论的从容所造成的如此的骚乱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当时似乎是很正常的。观众们仿佛是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即代表所有不能实际出席的人。

在法国大革命 1789 周年之际,有人展览了一种奇怪的仪器的草图,这种仪器用于在人群中传播声音,而且是借助一种音质好的大反射器来实现的,这便是麦克风的雏形。人们对这种怪东西可能产生的技术效果却不及对另一件事感兴趣:当时这种仪器的发明者——至今仍是佚名的,是在一本宣传册中构思出这项发明的。这本小册子把这项发明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工具来介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与人民直接交流的方法。又是那种超越中间状态的乌托邦式的想法。

我们更能理解在那样一种氛围中,人们希望报纸与它的市民读者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读者来信”在那些报纸中的数量要比在我们今天的报纸中的数量多得多,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很明显,重要的是组织记者与读者群体之间的来往交流。(还应该补充另外一种更为实际的动因: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给在外省或是在国外的通讯员提供费用,而读者们便补充了这一空白,成了兼职记者。)在这种职能方面,报纸几乎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当然在

大革命期间,戏剧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1793年年末,玛丽原约瑟夫·谢尼埃的戏剧《查理九世》使人们的感情萦绕在舞台周围。这部戏剧讲述了圣巴托罗缪时期^①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充满了对当时的问题和对抗的明显的影射。歌曲也包括在内,在法国大革命1794周年之际,有人对此做过系统性的评论,歌曲的丰富和多样性是令人吃惊的,其中歌曲的旋律较之歌曲所涉及的政治内容来说要少得多,并且有着很多的重复。

但是到最后,只有报刊能够坚持下来并一直充当着中介者的角色。勒德雷尔,本身是一名记者,法兰西第一帝国期间成为了一位显贵,我们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一段他在共和国五年雾月18日(1797年12月18日)所写的恰当的分析,发表在《公共经济报》上。在这段分析中,他认为这次令人震惊的革新是报刊业的一个巨大发展。他指出,人们已经发现,报纸很早以来就是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有效联系的纽带,只有报纸能使大众统治完全行使,并且保证它不是一个圈套。勒德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报纸发行的规律性,在所有公共场所都有报贩传发报纸,也因为报纸阅读的简易性和价格的低廉。

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报刊使事件发展进程加快,而这种情绪上的仓促使当时的人们为之震惊,而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种仓促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人们不再说“加快历史发展”,19世纪的时候还是会这样说的。但是革命参与者们却体验到一种永恒的紧迫感,一种与过去的制度

^① 法国天主势力同新教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在1562—1565年(一说1563—1568年)间进行了一场长期战争,此次战争虽然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则是法国的一场内战。——译注

相较的政治变化速度。他们体验到每一刻利害关系都会受到置疑,每完成一步都意味着在自由与束缚、成功与失败间作出选择。

在这种影响下应运而生的第一个伟大时刻便是攻占巴士底狱。整个法国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要性,并能马上把它作为象征事件的做法是使人震惊的。但是在这之前一年,格勒诺布尔抛瓦事件之后,人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完全衡量出其影响力度(特权报刊没有就此作出任何报道)。苑月 员源日在巴黎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已经有很多的自由日报存在了。最早报道此事的是安托万 原路易·戈尔萨的《凡尔赛 原巴黎邮报》苑月 员缘日清晨出版的那期报纸上。这位记者工作了一整夜,却依然只掌握了很少的信息,但是他确信这一夜突发的事件是很重要的。他写道:“我们永远都记得昨天这个日子。它也许为最伟大最幸福的革命开辟了道路。”一些报纸,例如《箴言报》《报纸》,很早以前便形成了一种谨慎的习惯,出于它们受管制或被雇佣的一种谨慎,只是在更晚些时候才论及这些。其重要的理由是:为使历史事件被正确的理解,必要的期限是可以改变的。认定 苑月 员源日是导火线这一判断,其迅速性对于所有关于一种辩证法的思考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辩证法存在于事实与报刊所给出的影像以及最终这种影像本身对集体记忆的影响之间。

所有一切总是依据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强烈紧张状态组织起来的。而报刊对统一事件的描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赋予这些事件以形式和意义,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来安排它们的节奏,并使这种意外的、激烈的、广泛的、凶猛的、充满激情和离奇的漩涡变得清晰明了,同时报刊在团体的凝结过程中起到直接作用,而这种团体以一种有力的离心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报刊给乱党以身份及存在的理由,在戏剧化的年代里,这些乱党

通过争夺政权织就了政治生活的纬纱。

现实地说,没有接近报纸的人是被排斥在局外的。这便是为什么农民们在1793年夏天持续的大恐慌^①时刻觉得不安——那是一个抢劫城堡的时期:这是一种传闻作用的结果,这种传闻是农民们的武器,而报刊对他们也保持沉默——即便有时报界也会在第一时间对同一传闻做出反应。大恐慌主要是由农民的反抗造成,但是虽然农民是国民的主体,他们却被报纸遗忘了——或者是因为他们离信息中心很远,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这种对比非常鲜明,而且重要的是,把自身定义为乱党的一些群体也同样拥有自己的期刊。是报纸使公众产生分歧,体现出公开的对抗,而且是报纸最终承认这些分歧和对抗,而这些分歧使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以及革命者内部之间对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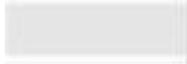
“公众精神”的产生

这样,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公众精神”和“公众舆论”之间的概念区分就变得明晰了。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弗朗索瓦·菲雷和莫纳·欧左夫编撰了一本《法国大革命评论字典》。在这本字典中,莫纳·欧左夫专为“公众舆论”写了一篇激励性的文章。她指出,在这一领域,革命前的文章都同时体现出一种深层的一致和一种十足的混乱。“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它已变成了“历史能动性的主要象征,历史发展的动力”。渐渐地,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一说法。(对于哲学家们来说,这与很久以前他们体现出的一种对报刊的蔑视是可以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现象,主要是一种心理作用,农民们害怕贵族反扑,首先攻打贵族庄园、烧毁地契等,引起了法国农村的混乱。——译注

并存的。他们曾认为，舆论应该形成于书籍中。)卢梭在 1754 年写道：“在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与其他世纪区分开的各种特征中，是一种有系统的、彻底的精神在二十年来引导着公众舆论，至今这些舆论还在人们感情的支配下间或地无规则地闪现，这些情绪不断地相互撞击，使得公众从一方转向另一方，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在卢梭的眼中，现代特色就是此后形成的一种舆论的凝结核。这种舆论已经不再混乱，不再是一种分散而矛盾的反应，而在此情况下有了一种意义。莫纳·欧左夫指出，虽然这种原则可以把所有不稳定的舆论集中为一种，但是在哲学家的眼中这便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争议：跟往常一样，人们为反对某事团结起来要比赞成某事团结起来容易得多。

但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混乱，一种忧虑，一种疑惑。这种新的公众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一个民族多样性自发产生的结果吗？或者说是否有人（又会是谁？）有责任使这些舆论凝结在一起并赋予它们一致性的力量呢？如果我们让它自根基处自发生长，风险会不会很大——它会变得难于控制，即使是杰出人物的理性也不可能控制住它。这些杰出人物曾在君权神授的争论中树立了他们的威信，但却并没有就此接受他们自身和那些没有文化甚至还言语不清的民众之间的一种理论上的平等。因此，我们在作家或是记者们身上就可以看见一种隐藏的欲望代替了这种不明确的公众舆论，这种欲望会导致混乱，可能会由个人生活放荡而引起腐化堕落，还可以看到一种被强加于其上的一致性调整过的公众舆论。在此期间，人们试图引入一场革命，随着法国国内纷争的流血冲突的发展，这场革命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一概念与公众精神是不同的。公众精神强调一种有组织并已获许可的一致性，用莫纳·欧左夫的话说，就是一种“团体中的完



全结合”：自发性、多样性，甚至自由都有被扼杀的危险。

这就是取舍。有时人们乐于接受舆论的混杂形式，并把这种舆论当作反对专断的主要屏障。有时人们幻想把个体并入到公民资格中来，令人吃惊的是圣朱斯特，一位公众精神方面的理论家，最终也喜欢用“公众意识”这一术语。公众舆论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表达法，而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责任，即判断以及合法监督。这场辩论在大革命后持续了很久，贯穿了整个18世纪甚至延续了更长时间。

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把革命时期的媒介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粗暴地赢得了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在理论上还是受限的，但是却几乎没有束缚。第二个时期，这种自由在理论上是不受限的，但是事实上却越来越受限制，断头刑运用得非常广泛。

舆论—舆论爆发

从一开始我们便目睹了一种繁荣、一种迸发，这种繁荣和迸发在法国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是解放时期也没有）。最初的代表事件是1789年7月14日国王参议院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国王陛下邀请全国的学者和所有有文化的人向掌玺大臣陈述至今为止所有关于客观内容的信息和陈情书。”换句话说，是因为所有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法国的国王才让他的子民为民族代表的集体思想提供支持。当然，审查制度并没有正式废除。但显然是很快就没有任何一本在三级会议精神准备范围内的书被禁止发行。

这是舆论环境甚至是舆论传播的一次非常强烈的改变。同时，各种期刊和小册子数目也不断地增加，但其周期是不规则的。从1789年7月到1793年7月，增加到每月百余种，大多数是反对

君主制的。最著名的是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呈文《什么是第三等级》。美国史学家杰里米·贝特曼是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专家之一,他估算出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前一年大约有 150 万册。同样百家争鸣的报纸又重新出现了。伏尔内(一位著名记者的笔名,取此名是因为对伏尔泰的崇拜,伏尔内出于伏尔泰——伏尔泰·沃尔内)的《人民卫士》从 1789 年秋开始每十天出版一次。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发刊词发表于 1790 年 1 月,恰好在 1 月 20 日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之前。

还应列举出米拉波的一本关于出版自由方面的宣传册。这本宣传册是根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改编的。在 17 多年前的英国,最初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中弥尔顿的这篇文章是很具重要性的。米拉波指出,出版自由给英国带来了“令人吃惊的繁荣,令人羡慕的财富,还有一种可以支撑的一切力量,纵使它想控制一切,这种力量也能支持……”米拉波甚至从中看出了不列颠群岛兴盛的原因。他问道:“如果没有出版自由,人们选出的议员怎样才能了解人民的真正愿望的?”一切就这样追随了英国的足迹。“为了决定一切就必须了解一切,当整个欧洲都听命于你们,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倾听,你们怎样才能知道一切呢?如果一个渊博的人,可能是最渊博的,但同时又十分腼腆,因为怕被连累而不敢发表言论,这时你们又怎样才能知道一切呢?”因此,米拉波在对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的陈词中总结道:“但愿你们的第一部法律此后可以促进出版自由的发展,这是一种最不可侵犯的自由,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

当我们带着这种观点去查考来自法国各地的陈情书时,会发现来自于农村的陈情书没有提及报刊出版自由,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城市陈情书有 1/3 强烈要求这种自由。教士在这一方面

是最为审慎的。教堂内开始出现一种忧虑——一些天启的真理会不会被这种自由猛烈地抨击,而读教的学说是否会广为传播。相反的,第三等级和贵族的陈情书却一致要求出版自由。在革命风暴前夕,一种不可抵挡的潮流遍及全国。

当然,大多数论及细节的陈情书都承认英国模式中建立一种制止读教、诽谤或下流的言论的制度是合法的。但只能在事后处罚。

革命前几个月,审查制度并没有正式取消,但事实上这种制度已经逐渐被遗弃。王权最后一次努力是终止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的出版,这份报纸在当时非常成功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于缘月停刊,但攻占巴士底狱后,苑月 圆日又复刊。至于米拉波,朝廷也试图找他的麻烦,缘月 缘日他创办了《三级会议》,每天以自己的方式点评议会论战……行政法院在彻底失败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秘密决议终止这份报纸的出版。米拉波很快就不动声色地将这份报纸变成了《米拉波伯爵与委托人的通信》,后又变为《普罗旺斯邮报》(他是该地区的议员)。他在这份报纸上质问道:谁会阻止他向那些选举他为代表的人汇报情况呢?内阁放弃了镇压。

这便是爆发期。缘年,在巴黎出现的期刊数目根据创始人的变动而在 缘—缘种之间变化。而在 缘—缘年这 缘年间,在法语依然是宫廷语言和国际贸易用语的欧洲,法语期刊总数只有 缘种。仅在巴黎一个城市,缘年末日报的统计数目就达到了 缘种之多。其他的报纸是周刊、双周刊或三周刊。发行量是鲜为人知的,但有些期刊的发行量已高达 缘万份。

所出现的日报继承了先前学院式的审慎态度。同样是庞库克,这位不久前曾买下《公报》以及《信使报》的报业大企业家的先

辈,创办了谨慎庄重的《论辩报》,这份报纸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 1789 年 1 月还创办了《普通箴言报》,实质上是专用于汇报革命议会的论战的。两者都经历了革命风暴。这样,一种融新闻、评论、抨击为一体的混合物便应运而生,而正是这些构成了革命时期的报刊特点。

王宫漫步

正如杰里米·阿波普金在他的书中所提出的建议,为了复原色彩和色调,我们还能想出什么比一次王宫漫步更好的办法呢?它不是今天的花园,典雅而略显忧郁,几乎不用比勒式的柱子做装饰,里面的邮票和装饰品商店像是在拱廊里昏昏欲睡。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世界,咖啡馆、饭店、赌场云集,那里的老主顾被挑逗他们的不检点的女人撞在身上,或是被拽着他们的袖子向他们兜售意式果汁冰糕的糖果贩们挤倒。1789 年 7 月 14 日的那种刺激并不是一直都有——卡米耶·德穆兰曾把树叶插在帽子上引领着民众攻向巴士底狱。但总是会有些事情发生的。如果你有兴趣看看报界的记者的话,就别错过左边的加沃咖啡馆。他们乐于在晚上匆忙赶去撰写他们的“文章”之前在这个地方相聚,喝杯啤酒,交换着城里的最新传闻。我们来到沃弗勒利夫人的阅览室。奥尔良公爵是她的保护人,并有效地照看着他这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您得花 2 个苏进入阅览室,那么您就可以在桌上自由地查阅大量报纸。您可以查阅到(当时是 1789 年初)10 种日报和 7 种期刊。您还可以带着好奇心去阅读五六种国外的法语报纸,其中《莱登公报》和很多种外省报纸是用邮车花了 1 圆 1 圆天时间从佩皮尼扬运来,而从特鲁瓦、兰斯、勒芒运来则需要 1 圆天。

在那里您犹赴无餐之宴,唯一的食物便是思想。您会为了与其他同样狂热的市民争夺一张桌子而挥拳动肘。

在那里,沃弗勒利夫人没有偏见。她提供所有类型的报纸,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从《人民之友》到《国王之友》,大多数报纸版面不是很大,依然像小册子一样,愿开本。仅有少数报纸(庞库克那些报纸)采用“英式”尺寸,像《泰晤士报》一样用对开本。版面的排列形式还没有太多变化。新闻一个接一个,以长形阵势排开。最畅销的报纸勉强用木制刻板图案装饰,这些图案经常重复,而且是用来区分报纸而不是所述事件的插图。您的手指上沾满了油墨而两三个小时后您离开,会因这些矛盾的观点的多样性和自由展开的笔调的多样性而头脑迟钝了。而您对那些在拱廊下依然向您叫卖报纸的人会感到厌烦了。从那时起您就会无法抗拒去加沃咖啡馆看那些办报纸的这种乐趣了。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可以举出卡米耶·德穆兰,英俊却有些口吃——他写的比说的好——有时路西尔也和他合作写。您还可以看到马拉。您还可以看到布里索。但您却看不到埃利泽·卢斯塔洛了,他也许是最杰出的,但在前几个月的狂热中,他完全地因工作而体衰力竭,死于1794年10月。

这一行业非常亨通。

首先,还应再提及行会已经被取消,所有阻碍人们成为印刷厂厂主的限制都已消失。只需1000英镑就可以装备所有的所需机器,这个数目接近于薪金最高的像卢斯塔洛这样名流的收益,每年可达10万英镑。几乎没有需要很大开销的记者:对于所有首都漏掉的信息,人们很乐于买外省或是外国的报纸,用剪刀剪下来并粘上。报纸通讯社还不存在,到19世纪才出现。所有报纸之间互相起到了通讯社的作用,并且是无偿的。

结果 :不久 愿园多位印刷厂厂主在巴黎开始工作(在旧体制末期只有猿位) ,这其中 怨缘至少印一种期刊。如果在离开加沃咖啡馆时 您想结束在同一地区的这天而去看一看印刷厂厂主们大批聚集的地方 在王宫周围 通往圣·热纳维耶芙山的街上 您可以推开几扇门 看看正在制作的您明天将会在沃弗勒利夫人那里读到的报纸。

为了给收益定位 就需要做一番比较。让·雅克·卢梭凭借他的《爱弥儿》——员愿世纪的畅销书 总共所得不过 远园园英镑。伏尔泰和卢梭都得到了合理的报酬 但比卢斯塔洛的 园缘万英镑还要少得多。卡米耶·德穆兰凭借他的《法国布拉班革命报》 一年可以赚 员万英镑。此外 除了报纸销售而得的正式收益外 很多人由于受贿所得的钱而变富了。

最后 我们来试图估计一下读者群体的规模。当然 这受到文盲状态的限制 但这种局限性已被广泛地大声朗读而掩盖 :在沃弗勒利那里大家为了不打扰邻人而保持安静的生活 而在加沃咖啡馆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读者的数目是多少呢?据杰里米·阅读普金所说 在巴黎卖出近 猿万份报纸 在 员愿园—员愿源年革命风暴期间还会更多。而另一方面 根据邮局数字统计 员愿猿年每天有 愿万份报纸离开首都被运往外省或国外。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纪初的秘密发行量 当时 缘万份 员园万份 员缘万份的发行量就已经可以运作了。而后 猿万份是很平常的发行量 而 员万份的就可以生活得非常富足了。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欧洲报业中心) 员愿园年 仅售出 源缘万份日报。在巴黎 执政府期间销量严重下降 猿猿万份。直到 员愿远年才达到 员愿万份的发行量 几乎是大革命期间最鼎盛的时期巴黎销量的一半。

德穆兰、阿贝尔、马拉

本章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轰轰烈烈的时期中记者中的主要人物。布里索和米拉波我们已经提到过,现在来谈一谈卡米耶·德穆兰、阿贝尔和马拉。

卡米耶·德穆兰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深刻意识到他的职业的新的社会重要性:“记者今天执行着一种公共功能,他们揭露,他们评判,他们赦免,他们裁决。”^[1]1789年,他 20 岁。他是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大帝中学的同学。他是一个平庸的演说家,演说技巧拙劣,但却是一个写作流畅身手敏捷的作家,几乎马上便以《法国及布拉班革命报》获得成功(这一标题意在表示对比利时尤其是对列日省的敬意,是第一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 1790 年 1 月开始出版。德穆兰性格并不强硬,最终在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之间致命的冲突中与丹东一起被推上断头台。但他的文笔多么出色啊!

阿贝尔的成名作是《杜歌老爹》。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这本书不但通过内容,还通过形式本身来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在大革命之前,街区的剧院就已经上演《杜歌老爹》。这出戏的语言有造作之处,但即便是这种造作也很快被观众们化入日常生活中。

阿贝尔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是阿朗松一个金银匠的堕落的儿子。他做过很多零散的行当(尤其是瓦里耶特剧院的中途外出的检票员),靠近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和雷蒂夫·德拉布雷多纳的“巴黎画卷”,离凡尔赛宫较远。他创立周刊《杜歌老爹》时便发现了自己作为记者的天才,这本刊物很快就取得明显的成功,如果把事后重印的特刊计算在内的话,它的发行量可达 10 万册。

杜歇老爹的“大怒”和“大喜”是以一种粗暴甚至是下流的语汇来展现的，这对于外省的社交惯例近乎冒犯，但却使巴黎人感到欢娱，其中包括资产阶级——为了向他们自己证明他们不是假正经的人。

最后是马拉。莫纳·欧左夫在她的评论字典中对他有详尽的分析。作为图腾式人物，他的传奇经历对整个时期都有教益。这是一个贫民出身的刽子手兼烈士的典型。这位名人的病态、丑陋，脸上带着皮肤病损伤过的痕迹，与“伸张正义者”——单纯而圣洁的持刀美人夏洛蒂·科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拉的形象在历史传统和公众记忆中比任何一个其他革命人物都会全面得多：从最纯正的爱国美德的绝妙化身，无私、英勇、充满热忱的人到一个值得千刀万剐的尖刻的偏执狂。

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他的皮肤病中有些恶魔般的东西——据传说他的皮肤病是在革命期间染上的，那时他为了躲避刺客的追捕而躲在下水道里。一种阴影的力量……人们对于他所传递的信息本身的兴趣还不及对外界强加于他的一切的兴趣浓厚。还存在很多不同的马拉。有让·饶勒斯笔下的马拉，尤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笔下的马拉——他们把他奉为社会主义的先驱：他是第一个赋予无产者以阶级意识的人。让·马森所做的马拉传记中视他为左派的先驱，他对所有的当选的国会议员的授权都怀有极度的不信任，并一直呼吁没有任何中介的公众政治观念。对于另外一些人，在所有反革命的文学中，他又变成了最恐怖的独裁者的先驱，变成了“满手血腥的人”。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作品，马拉便以一个爱打抱不平的记者的代表形象出现：一种反复的疯狂的独白向读者们呼喊：“阻止叛徒们！”“到他们的住所去追查他们的叛变迹象！”“揭穿他们！”

痛斥他们！砍他们的头！”他的报纸《人民之友》是长篇累牍的抨击。笔调是极端悲观主义，固执地拒绝美化过去。革命的日子总是不等同于它们本应成为的样子。对于未来，《人民之友》总是做最坏的打算，预言狂怒和不幸：人民自己可能反抗，但他们有这种愿望吗？记者同时是证人，□望的船员和夜警：他们不停地判断、裁决。当时的报纸经常有目的地被称作“哨兵”，例如伏尔内的《眼睛》等。应该从沉睡中唤醒麻木的法国人，他们或是被虚荣的浮华引入歧途（“世俗的虚荣”，正如马拉所说。他运用很多《圣经》中的隐喻、比较和启示，至少像古罗马的陈词滥调一样多），或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沉睡。应该抓住衣领来唤醒一直被愚蠢和麻木威胁的法国人。马拉检举了“提供鸦片者”佩蒂翁，他还揭发了布里索，揭发了罗兰，他检举吉伦特派为“哄骗者”。马拉既是监视者又是启发者，唯一一个能成功地使叛徒逃跑的人，“这些叛徒”，他写道，“对爱国作家所写的著名文章是毫无畏惧的”。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革命者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记者杰里米·边沁的一项草案获得成功。他的作品曾被译为法语并获成功，他发明了敞式监狱，一种监狱的设计草案，这种监狱各个部分都处于一种中心监控下，整个建筑中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支配者绝对清晰的监控。一直就是同样的这种困扰：成功地冲破那些由无知、幻想、懒惰引起的愚昧。

我们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在整个出版史直至今天都可能出现的论题的呢？是根据反对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抽象的思想这样一种世界性的阴谋，在革命中我们会发现恶的力量，阴暗的力量。这一主题两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这是由我们经常发现的知识界的腐化造成的：阴谋家们的效率很高，他们能够消除自己的阴谋的蛛丝马迹，然而这种阴谋的迹象缺失并没有使他们

安心,反而泄漏了这阴谋本身和它可怕的结果。这样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广泛的告密的困扰。拉乌尔·吉拉尔代的《神话和传说》一书中对此做了恰当的评述。

梦醒时分

如果我们不发掘出一位反革命记者的话,这幅画面就会不完整了。时势造就出了优秀的反革命记者。里伐瓦尔,1791—1841年,曾主编《政治及国家报》和1835年12月创刊的《使徒行传报》。这份报纸以一种少有的精湛的文笔,一种和革命派一样的强烈程度来反对革命。它提供了一份引人注目的蛮横无理的言论的目录。在让·莱塞为里瓦伐尔所做的传记中,我抄录下一些例证,首先举出这句警告的话:“在100个谈论我们的人中,99个人在说坏话,而第100个在说我们的好话,却是一个坏人。”里瓦伐尔是从上流社会开始创业的。他出身卑微,是意大利客栈老板的儿子,大革命前几年到达巴黎,而大革命把他由一个肤浅的人变成了一个积极的论战者,不断积累抨击当时要人的言词。例如关于米拉波他写道:“这个人很早就意识到最少的美德也会在荣誉之路阻止他,而直至今日,他也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美德。”或者如这样:“要得到钱财,他只需造孽即可,而造孽于他却没有任何损失。”关于另一位革命者,他写道:“有一只鸟的大脑却长出了一颗牛头……”

1848年2月26日君主政体倒台后,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后继措施的情况下,绝对自由陷于一种国内纠纷中。乱党们被砍头的时候,作为他们的代表和喉舌的记者也同时被砍头,而国外战争的影响给一切罪行提供了借口。叛徒遍布各地,英国的黄金、普

鲁士的黄金、外来政党，一直威胁着政治和革命的真实性。即使人们已经宣布出版自由不可侵犯，但又不停地对这种自由加大限制。1793年5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一项禁止进行恢复君主政体工作的法令，这样一下就废除了辉煌一时的保皇派报纸。1793年8月10日后，吉伦特派报纸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也停刊了。

在其他谴责的原因中，山岳派控诉报界垄断了机密的实质内容。吉伦特派政府在议会中占有很多席位。所谓的“公众精神”处曾捐赠150万册书，而实际上这些书被内务部部长罗兰和他的吉伦特派朋友瓜分了。此外无论在热月党国民公会时期还是不断地发生改变（“左派”或“右派”）的督政府时期，言论自由都未能恢复，严厉的审查制度只在整个法国都盛行的无政府状态才得以减轻。

这足以使记者们怀有一种怀旧的感情，怀念1793—1795年间他们所经历的真正的难以置信的自由时期，在拿破仑以一种强制绝对服从的方式处理一切的时候，这种怀念便更为强烈了。但历史永远不会完全地回到过去，而对于在19世纪渐渐地减轻了思想和著作压制的人来说，革命时期将成为一种持久的参照。

第四章自由的延伸

19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版自由的实现并非是步调一致的。这种自由的到来有着双重的动因。一方面,民主的进步和普选制度(男性普选制……)的逐渐建立,需要通过报纸来报道所有选民必需的信息;另一方面,在新闻系统性、报纸印刷和发行等方面的技术进步,19世纪的这种进步比18世纪更为惊人。

《泰晤士报》的光辉

为了避免过于抽象,做一篇报纸的专题论文再好不过了。这份报纸应该是很早就在整个欧洲作为一项重要的参照崭露头角,同时又是一种典范、一个传奇、一种象征——这便是《泰晤士报》。回溯《泰晤士报》在19世纪所走过的路程,便能够展现出这一时期的媒介历史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

1843年11月,一位名叫约翰·沃尔特的苏格兰人希望改变他的经营范围。他曾是一位煤炭商人,通过在保险业的投机获利——这一行业是由英属殖民地的飞跃发展带动起来的。他决

定向报界发展。他最先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类别,我们称之为“被媒介抓住的企业家”:一些在贸易或工业中证明了自己能力的商人,到中年后便产生了一种愿望,在享受上流社会的快乐的同时想证明他们在信息世界也能游刃有余。在最近一段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至今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弗朗索瓦·德·旺代尔、雷蒙·帕特诺特、马塞尔·达索,甚至是弗朗西斯·布依格)。

沃尔特创办了一份报纸,首先是用于刊登广告,这份报纸即《每日环球记录报》,1905年11月1日更名为《泰晤士报》。起初,他想使用别人向他提供的一项奇妙的发明专利,这项专利是一种被称为“语言记录法”的手段,可以避免传统印刷中的所有缺陷。但进展并不顺利。不过这并不重要:这份报纸已经创立,并将有持久的生命力。

沃尔特一开始就宣布了他的纲领:“这份报纸既不会局限于哪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中,也不会固定地为哪一个政党服务。”这份新的报纸上刊载大量轰动的事件,而《泰晤士报》对法国大革命“跟踪报道”使得它1905年的销量直达100万份。出于羞愧,最好还是很快地掠过19世纪的最后几年,因为这不是这份报纸最光辉的年代。总之,它是完全腐化了的:它被卖给了政府,而政府可以以津贴形式酬报它的殷勤;它还被卖给了任何想买它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晤士报》所编定的《泰晤士报正史》中并没有隐瞒这些不甚光彩的开端,甚至还追溯了当时人们区分的两类赃款。隐瞒费(泽克列泽尔社案):支付一定量的钱以避免对您有损的文章见诸报端。反驳费(精也里格社案):支付一定量的钱刊登一些反对性的文章,针对令您不快的人——这是一种腐败的两个不同版本。

但不久《泰晤士报》就会选择一条既道德又高效的路。它发明了一种“良性循环”，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它：给著名的、杰出的撰稿人以高薪，通过他们赢得众多读者，由此提高广告的价格，并保证这份报纸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取得这种独立性后它又可以赢得新的忠实的读者，这些读者又可以汇集更多的广告，这些广告又可以……《泰晤士报》新闻的优点是以著名的事件为象征的。正因如此，在执政府时期，沃尔特派一只非常轻便的小船到芒什省去向法国渔民购买内陆的报纸，并先于他们的竞争对手转载报纸上的内容。《泰晤士报》最先设立了驻外通讯员这一职务，并开始给那些在远处向它提供有趣信息的人提供高额的稿酬。

这时我们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用后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来说，就是“广告之于商业正如蒸汽机之于机器”。在法国，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为抵抗政权压制，更好地武装起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1793年《泰晤士报》首先强烈地谴责了德·拉米罗埃勋爵和本维尔勋爵，作为报复，后者决定政府部门不再购买这份报纸。《泰晤士报》失去了一个大主顾。然而《泰晤士报》并没有抱怨，而是将此事公之于众，同时吸引了大批私人订阅者，充分补偿了由政府退订造成的损失。

沃尔特的另一项杰作是生了一个比他更有天赋的儿子。父亲不过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而约翰·沃尔特二世却是一个出色的报纸经理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与法国不同，他们很快就对两项工作加以区分：一项是所有者和组织者的工作，即报纸管理人和承办人；另一项是内容的编辑工作，后者显然是由前者管理并从属于前者。约翰·沃尔特二世从一个德国人柯尼希那里购买了一项发明——蒸汽印刷机。这种机器以一种滚筒系统代替了人的

手工劳动,从而能够很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困难在于很多工人反对引进这种机器,因为怕这种机器会使他们失业及失去行会利益。这是出版史上,包括当今时代在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约翰·沃尔特命人在深夜秘密安置了他的机器,而某个早晨,在所有人——包括工人们的惊异中,我们发现《泰晤士报》在蒸汽中印刷,并在头版明显位置印有一篇胜利性的文章:“我们今天的这期报纸,向公众展示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一项最伟大的改进的实践结果。”这时的印速为每小时 500 份,到约翰·沃尔特晚年,即几十年后,这个数目增至每小时 2000 份:又是一场革命。

卢德主义者则是他的反对者。卢德·内德是一名头脑略为简单的工人,1811年,他在莱斯特郡毁坏了一些新机器,这些机器是用于快速制作男式及女式长筒袜的。卢德运动引起了 1811年、1812年及 1813年的罢工。工人们捣毁机器,阻止技术进步,因为这种进步会剥夺他们的生路。但沃尔特凭着他一项明智举措绕开了障碍。确实,为了消除敌视,他在采用新机器的同时提高了工资。他在英国的报纸制造中最先引入了蒸汽印刷机,由此很巧妙地增强了自身优势。在同一时期,他采用了法国人洛里厄发明的印刷用墨。这种油墨的优点是不像先前的油墨那样多地沾污手指,并且使印刷更为流畅高效。

约翰·沃尔特二世非常善于用人。他启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两位非常杰出的主编:巴恩斯和德莱恩,他们的形象在舰队街的记忆中依然被视为典范。巴恩斯行为放荡嗜酒如命,他不喝酒从来就写不出佳作来。在早晨三四点之间喝过酒后奋笔疾书妙笔生花;他于 1804年死于工作中。继巴恩斯之后,约翰·沃尔特二世又选择了年轻的德莱恩,德莱恩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出身上流社会,担任主编一职时只有 20 岁。他到沙龙和候见室去搜

寻最珍贵的信息,他很少写东西——那是很乏味的,但是他却以一种冷酷的权威来审阅别人的稿件。凭借粗野的巴恩斯和纨绔子弟德莱恩·约翰·沃尔特两度取得了成功。这两者以他们的才华参与到报纸的独立运动中来。1843年,达勒姆勋爵从加拿大回国后发表了一份关于英属殖民地的批判性很强的报告。政府建议发表这份报告的删改版。《泰晤士报》设法获得了完整版并将它公之于众。这种观念表现得十分现代化:一家大的信息报纸刊载一份通过间接渠道获取的官方文件是合法的,纵使这违背了当局的意愿。

拿破仑三世没有弄懂《泰晤士报》的特别之处。他对英国知之甚少。他没有理解这到底是怎样一份报纸。他于1830年发动政变之后派行贿者去买通这份报纸,使之为其美言,但惨遭失败。《泰晤士报》使他明白它不吃这一套。

《泰晤士报》历史上最英勇的时期是1854—1856年英法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泰晤士报》与它的同行者一起取得了完全取消广告税这一斗争的胜利,1856年又得以取消印花税,这项税收使他们自18世纪就拖着的沉重的脚镣。此时它已觉得无所不能了。《泰晤士报》向克里米亚派驻了一位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此人目光敏锐尖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指挥中所有的缺陷。医疗部门情况极差,武器装备保养不善,路面战术方面错误近于可悲。英国舆论界呼声高涨以至于助推了政府的倒台。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政权都处于一种相同的形势,却宣称局势运转不佳是因为报刊不合时宜地对军方进行抨击。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反映事实的“镜子”,而不是事实本身。陆军部部长在一次公共演说中甚至希望那个叫威廉·罗素的不爱国的家伙被火冒三丈的士兵们私刑处死。外交部部长也附和他的同僚,写道:

“三场胜仗也无法修复那些文章给英国造成的危害。”严重失职的控告！这使我们想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米歇尔·德伯雷将军当众羞辱“反法派”。

这时英国的政府首脑洛德·约翰·罗索(只是与被控告的记者同名)称《泰晤士报》为“卑鄙的专制”,并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说:“这份报纸在国家最机密事物层次上所占有信息的程度是对我们的侮辱,使我们丢脸,却又不可思议。”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第一个顶峰时期,发行量达 缘万份。画面就此定格。这是一份扎实的、严肃的、说教性很强的报纸,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并拥有着不容置疑的自由。布尔沃·里顿在议会论坛上说:“如果我要向未来传递 员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志的话,我不会选择我们的码头、我们的铁路,也不会选择公共建筑或是我们宏伟的国会大厦。我只用普通的一期《泰晤士报》就足以证明了。”

技术的进步 公民的进步

在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人关注《泰晤士报》,这是一种对英国的典范、对一场争取自由的普遍性运动的迟到的支持。

技术进步的不可抵挡的推动力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员年—员年间人们应用的一项重要发明——带有滚筒装置的蒸汽印刷机,一直使用到近期仍能提高印速的轮转印刷机;这种机器 员年—员年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应用,并由一位杰出的商人马里诺尼引入法国(工场原址在阿萨街,即现在巴黎第二大学和法国印刷学院所在地)。

同时印刷术在排版方面也有所进展,彻底抛弃了印刷工人手

工排制报纸文字行列铅版的方法 ;即使工人们操作熟练、训练有素 ,这项工作也依然十分缓慢。而后 ,“坏子”使得整页复制和整体移动成为可能。在插图方面也有所进步 ,并对大众化报纸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随着木版画的发展而产生的。这种刻版的初步实验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杜歌老爹》的时代) ,并已经达到了简洁、精巧、雅致的程度。石版画 ,即在石头上的雕刻 ,产生于 1794 年。这样便促使有插图的报纸以低廉的价格取得成功。这类报纸中有 1795 年在英国诞生的《便士杂志》(Penny Magazine) ,报如其名 ,只售一便士 ,德国也以《芬尼杂志》(Pfennigblatt) 为名仿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笨拙报》的成功。18 世纪中叶起 ,这份著名的讽刺性报纸培养了一批漫画家 ,这些幽默与英国的政治观点紧密相关。

从那时起 ,漫画便成为了报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大革命期间它就有所发展 ,但这种报刊通常是色情、暴力的。而在 19 世纪漫画才有了今天的形式 ,这便是把握一个情感或是心理侧面 ,以一种力度和诙谐加以概括。在法国 ,1793 年菲利普利用七月革命后赢得的自由创办了《漫画》。同样是菲利普于 1794 年与多米耶合伙创办了《喧闹》。这份报纸成为动摇专制制度的一种恐怖武器。菲利普刊载了一幅著名的插图 ,在这幅插图中 ,路易·菲利普的头由于接连的变化直至成为一只梨 :多么显著的破坏效果 !

在新闻的搜集和传播方面同样有重要进步。这主要归功于大革命期间开始应用的沙佩光学电报。在天气不是很阴的情况下 ,电报信号台可以使信息由一座山丘传向另一座山丘。这一系统是政府的特权 ,很长时间以来 ,报刊只能间接利用它。报界曾雇用专家解密 ,但枉费心机 ,没有成功。另一方面 ,特殊信件却多

了起来(以《泰晤士报》为例),信鸽经历了最后一个光荣时期,但在与它不共戴天的对手——电报的竞争中,它却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机会。电报是1844年莫尔斯在美国发明的。加莱(在法国)和杜弗斯(在比利时)间第一条电报线缆是1850年铺设的。1851年,欧洲和美国之间铺设了第一条电缆。同年每分钟输入员4500个单词的誉写器诞生,1854年后输入速度可达每分钟5000个单词。这样,在地理时间角度讲,西方世界惊人地缩小了。同时新闻通讯社开始出现,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美国美联社。

1850年开始,报纸的发行也因铁路的开通得到改善。铁路使得最偏远的省区能很快地读到首都的报纸。

拿破仑的“典范”

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由也进一步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在各个国家是很不平衡的,进步中偶尔也有倒退。但这一世纪性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一运动与民族与民族推动力相伴发展并有利于这种推动力的发展。正是这种推动力支配着这个世纪的历史。

对于那些不顾一切地墨守成规并压制思想传播的领导者来说,拿破仑一世所遗留下来的范例依然势力强大。这位皇帝没有因自由主义而烦恼。首席执政官很快便清楚地表明一切都已结束,从今而后报业严格地从属于他一人。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后他讲道:“如果我松开了报业的缰绳,我掌权就不会超过三个月。”在整个第一帝国时期,限制越来越严格。政府创立了印刷厂厂主和书商许可证,并随时有权收回。1804年,审查制度归并于报界,并紧密地依附于依然可能构成一块自由空间的非政治领域。这时,

拿破仑在给他的内务部部长富歇的信中说：“镇压一下报纸。让《论辩报》和《公开报》的编辑们明白，我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一无是处，我会把这两份报纸和其他报纸一起取缔，一个也不留……革命时代结束了，法国再也没有任何政党。我不能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任何违背我们利益的事。”一切不言而喻。

为了更为有效地镇压，拿破仑毫不犹豫地亲自动手。他一直就对报纸很感兴趣。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作为督政府的将军，就已出版过《意大利军队邮报》，亲自长篇大论地写文章；在埃及时他又创办《埃及邮报》。我们曾提到过的由庞库克在大革命时期创办的《箴言报》，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后变成了政府的官方报纸，成了一种新的刊物，刊载所有的政府法令，以及宣称自由却一点也不自由的评论文章。整个第一帝国期间，拿破仑不停地强加提纲以定制文章，即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文章。很自然地，第一帝国的领导们及主子的奉承者们对报刊表示出一种同样的不信任。富歇在倒台后对一位朋友说起他对记者们的“放肆”和“饶舌”的反感：“他们用一词就可以攻击一位部长，而这位部长则需要一页纸来自我保护；他们在论坛上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人们感情激动，要止住他们却要花很多时间。做部长的时候还有别的事得做呢！”

结果可以在《箴言报》的一系列著名的连续性标题中归结出来。当时正是“百日王朝”时期，第一次复辟后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重返巴黎。路易十八在杜伊勒里宫安定下来后，《箴言报》变成了十分忠实的保皇派。随着拿破仑的军队向首都推进，《箴言报》标题的演变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第一天：“吃人肉的人出穴了”；第二天：“科西嘉吃小孩的妖魔突然抵达胡安湾”；第三天：“老虎到达盖普”；第四天：“魔鬼在格勒诺布尔过夜”；第五天：“暴君经过

里昂”第六天：“篡权者离首都还有 150 千米”第七天：“波拿巴取得长足进展，但还没有进入巴黎”第八天：“拿破仑明天将抵我城门之下”第九天：“皇帝到达枫丹白露”第十天：“皇帝陛下在他忠诚的子民簇拥下进入了杜伊勒里城堡”。

日耳曼人的压制

当然，这种压制性很强的制度扩展至拿破仑统治下的整个欧洲，并被他的后继者们审慎地维持，尤其是德意志联邦政府以及梅特涅。梅特涅自维也纳开始担任哈布斯堡的政府首脑，在 1805—1815 年间统治奥匈帝国及整个欧洲。他曾经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担任驻法大使，并在法国目睹这种制度如何运行。他当时写道：“报纸之于拿破仑一世相当于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他还说过：“鄙视舆论和鄙视道德一样危险。”

第一次爆发是在 1808—1813 年间。在远离普鲁士的莱茵河岸省区总是最快抓住机会扩展自由空间。在拿破仑第一次失败后，著名的《莱茵信使报》为了它所相信的解放后德国报纸应起的作用而掀起了一场运动，并解释道：“一个发展进程中的民族需要报纸公开地研究使精神振奋的东西，去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去英勇无畏地捍卫他们的信念。对于民众隐隐约约地、无意识地说出来的话，它们能够使之在民众面前变得清楚明白，并且把这些在民众面前明确地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报纸应该是群众的喉舌、王公的耳目。”一个很好的纲领，结果很快产生了：《莱茵河报》1813 年被查封。

1848 年，在推翻那不勒斯两西西里王朝的革命中，同样的运动在意大利兴起。和法国 1789 年的经历相似，意大利也出现了一

大批报纸,而在王权复辟后又马上被镇压。一位著名的人物西尔韦奥·佩利科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他在意大利半岛积极参加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后,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在他的《我的狱中生活》中讲述了这段生活。此书成为出版社的一项巨大成功。

1848年,自由的希望又重新出现。莱茵河畔的《德意志论坛》继承了《箴言报》的传统,几天内便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在当年年底,镇压的铁手再次落下的时候,第一届联邦议会又巩固了它在1849年采用的那些严格的规章。

两年后,即1850年,德意志联邦议会投票通过了“六项协议”。这些条款在德国的出版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它实际上是禁止出版任何报刊。在《德意志论坛》和另几种刊物被镇压后,报界又陷入了一种严重的麻木状态中。有几个特例却证明了所取得的一切并没有失去:科塔,一位富有才华和能力的记者于1854年在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市创办了《奥格斯堡评论》,这份报纸在普鲁士影响和奥地利的影晌间巧妙地充当着一种中间者的角色。在路易一世统治时期,这份报纸利用巴伐利亚人的爱国心去赢得一种相对的自由。

1849—1850年间,情况有所好转,而后出现了1848年革命这一光辉时刻,“人民的春天”使整个欧洲掠过一丝希望的气息,各处又重新出现了自由的报纸。正是在这几年间《沃斯公报》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报纸之一,直到纳粹时期它都保持着良好的声誉。这份报纸是由印刷厂厂主克里斯蒂安·福斯于1849年在柏林创办的,在19世纪它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在1854年它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1857年达20万份,创下了日耳曼诸国的记录。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开明而很有学识,他在1857年即

位后便减轻了审查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卡尔·马克思初次作为记者给《莱茵报》的专栏撰稿。这份报纸是自由资产阶级在科隆创办的。同一时期,在意大利半岛民族主义抬头,与秘密发行的报刊相伴发展起来:这其中著名的有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这是一份秘密发行的报纸,并逃避着皇帝和地方统治者的追击。获准发行的报纸中有《复兴》,这份报纸在皮蒙特萨代尼王国的热那亚和都灵发行,并受到未来的国家统一中的英雄年轻的加富尔的关照。

1848年的自由之风不仅吹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取消了保证金制度,并决定由审查委员会处理报界的不法行为),也吹到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地区,然而在这之后桎梏又再次复原,记者们被枪决。但是一些自由的地区,或是压迫最轻的地方希望依然是存在的。有利的经验已经被利用,结果依然不可逆转。

法国的斗争

在法国也是同样,报纸的历史与世纪的动荡紧密相关。在1830—1848年三年间,法国颁布了15条关于这方面的法令条例。每一次革命中报刊都既是参与者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筹码。

这正是1848年七月革命前的一段痉挛时期,波利尼亚克政府的条例对查理十世来说是致命的。其中一条是关于报刊的,对它的动机陈述如下:“期刊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混乱和暴力工具。”因此,必须使它就范,然而这种做法却受挫了。

在1848年革命期间,当时一份重要的报纸——由梯也尔、米涅、阿尔芒、卡雷尔创办的《国民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路易·菲利普的部长、银行家拉菲特为这份报纸提供了资助。革

命胜利后,新的宪章认可了废除事先审查制度的成果。除在战争情况下,审查制度没有再出现过。然而依然存在一种为政权服务的武器,即保证金:创办一份报纸必须拥有一笔巨额资金,如果它没有按正常的轨道运行的话,这笔资金就将被没收。路易·菲利普统治 15 年间,追捕了很多持反对意见的记者,无论他们是正统派还是共和派。

1830 年 6 月,反对当前制度的“改革宴会运动”,也有一份越来越大胆的报纸作为支持。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垮台也为报纸再次提供了一定的自由,但 18 年之后,使人不忍回顾的镇压又卷土重来了。

很明显,国王和他的属下们对邦雅曼·贡斯当的合理想法并没有做出比他们的先辈更多的思考。邦雅曼·贡斯当在他 1791 年的一本名为《小册子的自由》的书中提道:“将报纸置于另一种由法定责任产生的依赖关系中,所有文章的作者都应承担这份责任,政府……自觉地依从于事实,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负责。反对这种责任是没有用的,想必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有这样的责任感。政府可以阻止一切,它所准许的一切都会受到指责。报纸有一种夸大而有害的影响力。人们把报纸当作主人的意旨的象征,就好像我们有幸和他相对,并试图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从第一句最婉转的影射的话开始,所有的疑虑就此产生了。人们似乎看见政府就在记者的背后,不管这种猜想多么不正确,一位普通的作者的一句冒险的话就像是一种宣言,或者说是一种对权威的探索——这也许同样是完全不恰当的。在一种缺陷中又加入了另一种。……如果(报纸)所包含的含糊而不适当的内容是惊恐的原因,那么它所包含的对政府有用的、合理的、有益的内容似乎就处于被支配地位,并失去了作用。”

第二帝国在这一方面完好地继承了第一帝国。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报纸是“百头蛇”:砍掉一颗也是白费,新头总会再长出来。经常砍断这些头也不会使它改变。在他的制度下建立了一种体系,即“警告体系”。这种体系因其渐进性而显得十分巧妙。第一种警告没有什么具体结果。第二种警告中,如果相关报纸没有一种谨慎的自我审查的话,它就会被中止出版几天或几周。第三种警告便会使它招致取缔了。这是一种信任记者本身的方式,为了尊重“智慧”。

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方法非常有效。然后,渐渐地“小拿破仑”就得作出必要的牺牲了。独裁帝国让位于自由帝国,后又给议会帝国让位,每一步都扩展了自由空间。警告体系于1848年被废止,事先许可证废止于1850年。最终,1850年10月成立的埃米尔·奥列维耶政府最后确立了一种真正的出版自由。

吉拉尔丹的历程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的传记在1854—1856年间报纸摆脱束缚的历史上享有盛誉,他是当时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报界企业家之一。他对公众的兴趣有着极为可信的见解。他是个精力旺盛雷厉风行的人,他的一生中充满了斗争和牢狱之灾,但他总是能重新活跃起来。

他的出现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障碍,但也许是一种刺激物。他在1854年出版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埃米尔》中对此做出了解释。这是他唯一一本至今有人偶尔会读的书。第二年,王朝复辟的末期,34岁的他投身于期刊界,创办了一本周刊,并诚挚地称之为《飞鹰》。这份周刊创造出了报刊评论摘要,他转载了一周中

较好的报纸中的较好的片断,而且因为版税还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他不必支付稿酬。吉拉尔丹用他的剪刀和糨糊构建了一份成功的期刊。

他的另一个新想法是建议创办专门给女性看的报纸。这是女性报刊飞跃发展的开端。埃弗利娜·叙勒罗曾在一本书中对女性报纸做过研究,她在书中明确指出《时尚》的重要性,这份杂志以优雅的评判者自居,并由驿车一直送往最遥远的地方,给德·雷纳尔夫人讲述在首都发生的事,人们的穿戴或是低声谈论的话题。

下面是第三项发明:1848年,七月革命后,吉拉尔丹创办了《有益知识》。这是实用刊物的雏形。这些刊物的类型有《修修补补》《我的园艺》《刷墙》……它每月提供 100 页的资料,并有大量有益的提示,尤其是关于农业进步方面。这本刊物很快就赢得了 15 万个订户,其中大部分是外省人。

吉拉尔丹在报纸的专栏中阐述了一份计划,即创办一份比竞争对手便宜一倍的报纸。他希望一年的定价只收 1 法郎而不是 2 法郎。1849 年创办的《新闻报》虽然有孪生的《世纪报》的竞争,依然很快显示出了一种良好的态势,聚集了 10 万个订户。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和富裕的农民。

《新闻报》并不是蛊惑人心的。这份报纸中没有任何《杜歇老爹》曾试图做的东西,也没有试图去模仿一种大众化的说话方式,它是想提供一些“巴黎的空气”以便呼吸。吉拉尔丹有一位出色的撰稿人,即他的妻子、苏菲·盖伊^①的女儿德尔菲娜,此人曾主持过一个沙龙,并且很有思想。她在 1849—1850 年间以“维孔特

① 法国女作家,贵妇。——译注

·德洛奈”为笔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致巴黎人的信”，其才华和雅致得到众人的一致好评。

新事物通常都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吉拉尔丹的同行，包括一些共和党人，虽然与他是同僚，但他们依然认为他卖一份太便宜的报纸并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而贬低自己是有损名誉的（永恒的争论！）。正是这种对峙引起了 1844 年 7 月埃米尔·德·吉拉尔丹与阿尔芒·卡雷尔之间的著名决斗。阿尔芒·卡雷尔在 30 岁就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记者了。他为了把《国民报》引向共和党而与梯也尔及米涅决裂。然而当《新闻报》出版后，遭到的批评更多地却是来自共和党。阿尔芒·卡雷尔在《国民报》上援引了一份名为《常识》的报纸上的一些对吉拉尔丹有攻击性的文字。吉拉尔丹在一篇辩驳文章中表达了他的愤慨，认为卡雷尔使他受辱。一个天色灰白的早晨，两个人在樊尚森林会面。两颗子弹同时发出，二人跌倒在地。吉拉尔丹被击中膝盖，这使他久经痛苦，其中包括 1838 年他在卡维尼雅克监狱中潮湿的稻草上时所将忍受的一切。而卡雷尔被击中了腹部，两天后死亡。这一事件震惊了当时的政治舆论：我在这里引用一下路易·勃朗在《十年历史》中的叙述。

新闻界掀起了一场重要的革命。投机商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是这场革命的发起人之一。降低大报的售价，以廉价的诱惑来增加读者数量，以增加的广告收入来弥补定价降低所带来的损失，广告已变得尤为重要了。这便是埃米尔·德·吉拉尔丹的计划。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法官的职位或是圣职变成一种不正当的交易，可以建议把已完成的一部分内容在报纸上夸大成大量骗人的意见、平庸或是厚颜无耻

的忠告 ,所有这些 ,借助于哲学、历史、艺术、文学迷惑着人的精神。新闻界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要变成投机的传声筒了。毫无疑问 ,从这方面来讲 ,这一新手段是应受谴责的。

另一方面 ,这种新手段使得大量公民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来 ,而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曾因报纸的高价而远离于此。如果不承认这一优点显然是不公平的。但这些利益在愤怒中总是绝对的和专有的。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开始攻击别人的时候反过来被人攻击 ,这些人凭借几份报纸以一种应受责备的过分尖刻的方式攻击他 ,这些出乎意料的竞争威胁着发展或生存。

决斗、广告和连载小说

我们看到 ,直到 1848 年 ,决斗一直是文学风俗和报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 ,战争的残杀使它变得过时了。这种决斗只能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才能十分激烈——正如 1848—1851 年间。在牺牲者中著名的有伽罗瓦 ,决斗之前的那个晚上 ,他整夜地写着方程式 ,以免忘记。安德烈·培尔统计 ,仅在 1851—1853 年这段时间内 ,巴黎就有 150 场决斗。在巴拿马 ,反犹太主义、德雷福斯事件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克列孟梭决斗过很多次 ,或用枪或用剑 ,当然是和德鲁莱德、德夏内尔以及爱德华·德吕蒙决斗。

总之决斗是一种社会和解方式 ,一段时期内在诽谤事件方面 ,这是除法庭解决外一种很必要的解决办法。应用这种在个人勇气和体力上更为侥幸的方式 ,决斗也构成了一种使报界集体生

活更为灵活的方式。这一点维耶努瓦·阿蒂尔·施尼茨勒的戏剧《记者们》以一种讽刺的手法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再回到吉拉尔丹。他在法国报界企业家中,第一个取得了《泰晤士报》在英国所取得的一切:通过广告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从《世纪报》和《新闻报》这两份报纸来看,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源像~~~~缘像~~。这已经接近了当代的数目。由于这种现代化的缺陷,随后报纸行情便不太景气,这种危机使得广告的数量缩减。由此而产生了另一种创意,目的是“吞掉”这些困难:把报纸的版面租给中介人,这些人购买一定时期内的报纸空间,在获利后又负责把它们卖给工业家或商人。这种体系对于报纸保证它的广告收益这方面来说是很值得考虑的,并且对于那些善于经营它们栏目的“谣言作坊”来说,这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另一种新生事物是一种天才创造:连载小说。新闻报纸就这样合并了一种大众化潮流,把~~员~~世纪的文学性书籍和传播性文学结合起来。恐怖的谋杀案、拦路强盗的事迹、不可思议的幻象……首先,这种报纸充满了社会新闻(~~员~~年拉法热夫人被判“投毒杀人罪”是其中的典型),但通常缺乏合适的非常残忍的案例。这样连载小说便产生了,一种接连发生的故事,刊登在报纸的“底楼”,即第一版的下半部。

当时法国很多著名小说家,考虑到自己可以获得大笔稿酬,也不介意看到自己的小说被分割成每日一段的形式。巴尔扎克很多部作品都是这样发表的,其他作家如乔治·桑、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其代表作为《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蒙梭罗夫人》《玛戈王后》)。这种体裁需要一定的手段,尤其是节奏感,因为必须在每一节的末尾吸引读者不断产生好奇心(就像今天的美国电视剧)。这方面的大师是欧仁·苏,《巴黎的秘密》和《流浪

的犹太人》的作者。《巴黎的秘密》确保了《论辩报》的畅销,而《流浪的犹太人》也保证了韦龙博士的《宪政报》的销量。韦龙是花 10 万法郎将这部小说买下的(当时一份订单每年 1 万法郎)。这样报纸便能赢得一批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都比预想的读者多。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 1839 年开始任布尔日议员,1848 年革命后任卡瓦尼亚克议员、六月革命中的将军,后又被捕。他接近路易·拿破仑,试图成为他的顾问,后因政变感到气愤出走比利时,回国后在 19 世纪 50 年代发展并不顺利,这段时间他未能出版他的报纸,1849 年代始又达到顶峰,重新出版了已停刊的《新闻报》,后又出版了《自由》并使其得到飞跃发展(发行量 10 万份),也是在这份报纸上他创办了第一个体育专栏(名为“体育世界”)。

他的晚年便不那么辉煌了。第一帝国倾覆后,吉拉尔丹支持梯也尔政府攻击国防部,最终甚至加入左派,后因在 1848 年 2 月 26 日危机期间他被选入共和党阵营,不久后去世。

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命运历程,有一个事实尤其具有代表性:他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既没有什么文学才华,也没有坚强的信念可以使他能够写出一部传世之作,使之至今仍被传阅。但是他是一位当时政治观念的卓越见证者和凝聚者,并且深谙这种政治观点中所包含的进展和转变。蒲鲁东在 1848 年措词严厉地提及他:“我们越深入地研究,越是发现这个人糊涂的、江湖骗子式的头脑,他毫无主见,时而奉承,时而反对。”与之相反,埃米尔·奥列维耶,1848 年归附拿破仑三世的自由主义总理却很欣赏他:“这样的人有时会犯错误,但他们不会不知所措。直到最后,他们会使人承认他们是一种权威。”

一种权威……这一方面证明了拿破仑三世的立场。他讨厌吉

拉尔丹 觉得他是有毒的。吉拉尔丹对他的政府攻击过火的时候，他便下令把吉拉尔丹投入监狱，并在 1849 年 1 月 10 日拒绝吉拉尔丹成为政府成员。但同时他也惧怕吉拉尔丹。他的秘密报纸中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瓦利耶很吃惊地观察到，当 1848 年吉拉尔丹在比亚里兹痛失爱女时，王后对这位痛心的父亲施以“千般恩慈千般情感的表示”，舍瓦利耶写道：“有人怀疑如果一位为国家尽心竭力的大臣的女儿死去，王后是不是会这样做。”吉拉尔丹所见证的报道，明显地代表着一种权力，人们力求引诱它、满足它，有时还会削减它，而它在以后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摇黄金时代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是西方世界书面报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一战期间,报纸还没有其他新的传媒方式作为竞争对手,它的基础也得到了有力的拓展。报刊读者的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使两个由言论自由的胜利而引出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受贿,报刊幕后影响威胁着事实真相;另一方面,诽谤,市民们的名誉经常被报刊不公正地践踏,而报刊却经常逃避各种制裁。

自由:胜利的推动力

这一时期可以由所有西方国家的共同特征来描述。先来看司法方面的资料:在西方世界,几乎各处都已经取得了出版自由,只是由于 1871—1874 年间德国、意大利和布尔什维克党独裁者的原因这种自由才又被剥夺过。在英国,1869 年课税和保证金被取消后,这种自由才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美国是很快就赢得了这种自由。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胜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后,1874 年法律

统一了报刊制度——预先审查制度完全消失,并且在很多地区,正如我们所知,民众审查委员会比专业法官更为宽容。即使俾斯麦继续执行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的压制措施,对所有谋杀君主的情况采取强制的镇压,我们却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压迫。在法国,1880年苑月 圆日的法律之后,人们便享受一种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自由的制度。

技术的改善在各处都对同一方面产生了影响,而并没有产生如先前进展中那样强烈的动荡。在制作方面,出现了铸排机,尤其是整行铸排机,可以用一种类似于打字机较之复杂的键盘“浏览”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间的另一项进步是用电报线来传送印版:爱德华·培林发明了培林式传真电报机,由于这项发明,报纸可以刊登在任何地方拍摄的照片。另一方面,机器的改善,报刊的页数增加了。在法国,报纸为 源至 远页,在英国或美国,有时已经可达 圆页。

第三项进步是信息市场的扩展。这一时期,信息成为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使物质利益在一种新鲜的重要事件上发挥作用;这种商品有着同覆盆子和草莓一样的新鲜特性,很快就会过时。在 1890年 员月 员日出版的《巴黎杂志》中,记者路易·拉扎勒斯列举出一位不知名的报社经理,他对报纸持有一种严格的经济观念:远吨商品,在 圆小时内准备,猿小时内操作完成,缘小时内发送到 圆万人手中,也就是一天内卖完,因为它们的价值是每 员圆千克 猿法郎,而到了第二天最多只值 远法郎了。这样,很多报业企业家便产生了一种对收益的担忧,这种担忧无疑比他们在政治上或医学伦理上的忧虑得多。即使这样,我们也会看到,投资的比重仍然给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物留有一定的空间,因为出版一些小型报纸的成本并不高。

通讯社的飞跃发展

信息市场的发展首先是以新闻通讯社的建立和扩展为标志的。在这一方面,米夏埃尔·帕尔默在他的一本名为《从小型报纸到大型通讯社——现代新闻业的诞生》(1954年)的书中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增加的读者群好奇心的增强,信息产业成为一种世界化的产业,许多报业机构由于安置、供养以及传递信息的费用而无法维持在远处的通讯员,这样,19世纪中期产生的新闻通讯社就取得了一种中心地位。这方面的前辈和先驱夏尔·哈瓦斯当时萌生了建立通讯网并出售信息的念头。在第二共和国至第二帝国期间,新闻通讯社的飞跃发展建立在两个主要基础上。首先是交易所:一队队信鸽每天飞快地从伦敦证券交易所带回股票行情;其次是战争:这一时期历经了很多轰动一时的冲突,哈瓦斯向克里米亚、意大利、墨西哥、美国等地派驻了很多积极活跃的记者。

这位深思熟虑的企业家创造了信息功能与广告功能的结合,他建立了“通讯社总公司”,向商业广告出租报纸和版面。另一个巧妙的想法是提出让报纸以一部分广告空间为它们所买的信息付费。这种以货易货的交易对报界老板的财政是极有好处的,使他们免于从钱柜里拿出现金。哈瓦斯则负责把这些空间转卖给工业家或是商人刊登广告,并从中赚取费用。这种结合一直应用到1914年,战争和解放运动才将信息功能分开,今天信息功能已移交法新社,而哈瓦斯依然维持着广告功能。

在德国,沃尔夫新闻社占据着支配地位。令人吃惊的是德国

和英国两家大的新闻社都是由夏尔·哈瓦斯以前的雇员建立的。1859年伯纳德·沃尔夫在柏林建立了他的新闻社,而朱丽叶·路透于1851年在伦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建立了路透社。路透社一开始就得益于在商业财政方面的世界级重要城市运作,不久这座城市便形成了最密集的国际电缆网络。

这三家欧洲新闻社几乎稳定了在各自国家的垄断。1858年诞生的美联社则与此不同,因为在同一城市相互竞争的报纸拒绝在同一家通讯社预定信息,这样就促进了其他更小但很活跃的新闻社的产生。

由于收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新闻社的预算是沉重的:由此它们很快地趋向于通过一项协定,以避免过度的竞争。它们通过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国际信息而共享市场。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协议由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路透社于1858年签订,1860年美联社也加入了这一协定。

政府不久便衡量出那些将充斥数以万计的出版物的信息渠道的重要性,它们成为此后的重要赌注。但他们不久就发现,正如拿破仑谈及法兰西银行所说,应该对通讯社加以控制,但不能控制得太紧。加以控制是为了能够在内强调指出政权的观点,在外为外交服务,但是不能控制得太紧,因为失信很快就会触及这些企业,而同时这些企业又失去了其影响力——平衡状态总是暂时的。

沃尔夫通讯社是最受压制的:从1859年始,普鲁士政府对它的控制就非常严格。俾斯麦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主人,但他也能非常巧妙地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使沃尔夫通讯社显得不是太过唯命是从。

面对广大读者

报业预算呈指数倍上升,首先可以由客户群的不断扩大来解释。

由于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盲的减少,更为广泛的读者开始阅读书面出版物。从另一方面讲,报纸更接近于大众化的读者。做得最顺的企业家们是那些懂得在降低报纸制作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他们产品中的知识野心的人们。

我们已经提及过法国的先驱者包括在七月王朝专制统治下出现的吉拉尔丹的《新闻报》或杜塔克的《世纪报》。在美国,1833年和1834年先后创立的《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售价只有1员美分。在英国出现了只卖1便士的报纸,例如1834年的《伦敦晚报》,甚至还有半便士的,例如1835年的《晚报》,或是1836年的《明星报》。

这种很受欢迎的报纸断然远离了文学样式,而文学样式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这一时期按期号零售变得比预订更为重要,这样便导致了收益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于负责人来说,不停地致力于在耸人听闻的新闻中竞相抬价便成了一种必要。

文学连载首先产生于法国,在这段时期内继续经历着非常成功的繁荣阶段。正是凭借文学连载,一种典型的报纸——《小日报》,于1834年开始出版。它的创办者是报界大企业家莫伊兹·米劳德。这份报纸售价每份为1缘生丁,并由此建立了它飞跃发展的基础。关于现代报刊,米劳德有一条学究式的格言:“应该有勇气去做傻瓜!”连载小说很愚蠢吗?无论如何,它需要多种能力,依据旧框框来构思,熟悉的片断中反映出当时的想像出来的

事物。而后,这些小说的作者不再是七月王朝专制统治下居于主导地位的光辉作家们(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甚至是欧仁·苏)。一种专业化趋势随着一些人物的出现而产生了——埃米尔·加博里欧和庞松·迪泰拉耶,不朽的罗冈波尔的创建者。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方多马·德·阿兰和梭维斯特是他的直系后代。至于加博里欧,他设想了一位名叫勒科克的警察,这是所有梅克耶^①和赫丘里波^②的雏形。

在法国,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分为两种类别,不久这种连载方式又被其他国家所效仿。第一类是历险小说。这种小说中充满了近于超自然的离奇的情节,包括魔法、阴谋、失踪等。一群孤儿离家出走,很晚才得以发迹,并且是在异常悲剧化的境遇中有着重重烟雾围绕的善与恶的冲突。第二类是以侦探情节为主的小说。它是建立在侦查基础上一步步揭穿最可恶或是最古怪的罪行的谜底。某天庞松·迪泰拉耶做了极为鲁莽的一件事——就像一些厌倦了自己创作的主人公的作家们最终又毁灭他一样,庞松·迪泰拉耶也使罗冈波尔被杀。“不能这样!”米劳德对他说,“你让他复活的话,我付高价给你!”(不久后,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罗冈波尔的复活使《小日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销售顶峰。至于加博里欧,继他在其他报纸上取得成功后,米劳德对他说:“您的体系最适合人类的愚蠢:在法国有缘万读者轻信于你。”在第二帝国最后时期,米劳德向他约定了《勒科克先生》这部稿子,并且买下了巴黎的大广告牌,

① 比利时法语侦探小说作家西默农(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小说《梅克耶探长》的主人公。——译注

② 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即柯南道尔)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

张贴大型广告来做宣传。这在报界可是第一次。

此外,加博里欧作为小说家同时,也是一名记者。他想使人们更加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他经常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出发,去构思一个以新闻事实为基础的情节。1880—1881年后他在《小日报》上发表第一部小说《衰落》,其情节的展开就是这样完全以法兰西溃败为基础的。这几年出现的侦探小说这一体裁与以小说形式写就的社会新闻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

特罗普曼事件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初期震惊了法国政治思想的一个事件——特罗普曼事件。不久前,米歇尔·佩罗在《历史》一书中再现了这一事件的特点和影响。1882年12月一个寒冷的秋夜,在巴黎北部庞丹城门附近,一位名叫朗格卢瓦的农民准备耕地,忽然他注意到地面上有一处隆起,这使他很吃惊。他挖开来看,发现了一只小孩手。于是他继续挖。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挖出了两具尸体: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很快就查明了这些人的身份。这是金克的家人,他们原籍阿尔萨斯,为了和父亲团聚,从鲁贝来到巴黎。金克是个通过自己劳动致富的小工人,想办一家机械厂。那么凶手是谁呢?人们首先想到他的小儿子古斯塔夫,可能是他杀死了他的母亲,或者还有他的父亲,因为金克已经失踪。但是人们很快在附近的一块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最终,金克的尸体也在一片树林里被找了出来,就像当时专栏作者说的那样,同样的“冰冷”。两具尸体,公众一片愕然……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英俊而可疑的年轻人身上,此人名叫特罗普曼,是这

家人的一个朋友。他逃离法国期间,在一种“荒诞”的情况下又被发现。他被证实在此案中并不只是一个神秘的同谋者中无关紧要的角色,特罗普曼最终认罪,并承认是单独作案。他于 1954 年 1 月 1 日被处决。

然而,我们来看一下《小日报》是怎样对待这件事情的。它起初专用两整页来介绍这项“经典”罪行,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而后是 1 页,再后来是 2 页,十分有利可图。从 1954 年 1 月 1 日起,《小日报》原先接近 1 万份的销量一跃至 10 万份,1 月 1 日已达 10 万份。第 1 具尸体的发现使销量升至 10 万份,第 8 具尸体发现时已是 10 万份了。执行断头刑的那天创下了卓越的记录,即 1954 年 1 月 1 日,销量为 10 万份!人们低声议论说为了更接近凶犯,《小日报》派遣一名记者作为刽子手的助手,这位记者在最后一刻都未曾眨过眼睛。米劳德非常兴奋,甚至可以大声地说:“如果我们的机器能足够快地向商人供货,我们不知道发行量可达怎样的数目。”

几周来,《小日报》筹划了一个由愤慨的民众组成的大型组织。庞丹的那片血染的田地成了数以万计的巴黎人的星期日朝圣地。人们全家一起到那里,手里拿着《小日报》,上面标示着尸体堆确切的位置的简易示意图。整个报道过程都围绕一种老套的构思:情景、人物、对话——带有一种说教性很强的观点,善与恶的对峙。善的方面:这个积极向上的家庭,为增加法国人口而生了众多孩子。(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报界曾提及死去的丈夫被妻子欺骗,但很快这种假设便被推翻了:这与示意图不符。)在那些依靠艰辛劳动和严于律己而摆脱贫困的人中,整个不得志的小资产阶级阶层都能从中反省——直到一个绝对悲剧性的结果……另一方面,恶的方面是由特罗普曼所体现的。他的父亲酗

酒成性,他的母亲又十分溺爱他。人们在他的行李中找到了一面随身携带的小镜子:他有一头金黄的长发,梳理得十分整齐,这很显然意味着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可能是一个炼丹术士,有人在他身上找到了神秘的曲颈瓶。

有些心怀妒意的同行们甚至确信一种传奇中的传奇,即《小日报》为了谋取高额利润而亲手策划了这一谋杀事件!就像今天有人指控某些电台记者设计出逼真的形式来重拍那些他们的摄像机没有很好地捕捉到的内战的镜头。

在这段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特罗普曼事件”。一段时间以来,社会新闻成为历史文献中一个充满好奇的主题。因为通过对公众的反应及当时各种各样的评论——包括政治、道德伦理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评论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段特定时期内社会状况的许多信息。1903年后,在“慈善市场火灾事件”中,米歇尔·维诺克热情地致力于同样的活动。

林林总总

从那时起涌现了大量的人才,从最高贵的到最平庸的,这些人撰写了一个又一个专栏。托马斯·弗朗兹曾在一本名为《法国新闻事业的诞生》的书中再现了当时的盛况,但仅仅展示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应从数字角度衡量报纸的种类及发行量的扩展。19世纪初,1800年左右,巴黎的报亭中有1500种日报。一战前夕,所有报纸总日销量大约为1500万份,这是1800年的150倍。在这1500万份发行量中,1500份报纸遥遥领先(《小日报》《小巴黎报》《晨报》和《新闻报》)。当时的报刊中除了少数非常受欢迎的报

纸外,还涌现出很多发行量很少的报纸。

莫伊兹·米劳德的《小日报》继我们所见的创刊时的巨大成功后,于1855年发行量超过150万份,接着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到1859年发行量低于正常水准。改变始自世纪末,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这份报纸强烈支持反德雷福斯派,这样便违背了一条黄金原则:一份报纸若想获得成功,在政治上应该保持一种当中立的表象,如果它太活跃地参与到国内斗争中来,就有失去一般主顾的危险。这一点《小日报》并没有注意到。而与其相反,1857年诞生的《小巴黎人报》却很清楚这一点。弗朗辛·阿莫里在他的一篇关于这份报纸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它在政治方面毫不犹豫地选择一直保持温和、谨慎的态度,完全的中间路线。它磨平了所有可能引起紧张状态的棱角。它的老板让·迪皮伊在当时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功。他曾经做过跑腿的童仆,后来做过1849年的上比利牛斯省参议员,并多次担任部长之职。他使他的报纸在1870年战争前夕创下了发行量的最高记录:150万份。创立于1853年的《晨报》,在同一时期也接近于百万份,这份报纸是莫里斯·比诺原瓦里亚的成就和产业。此人精明能干性格怪僻。他死于1895年,他生命的后半源年是一种多余,因为这期间他把这份报纸引向了歧途。他十分专制并且很富有想像力,他坚信“散多尔”(Santal)是医治百病的良方,以至于这种药剂产品在《晨报》创刊后非常畅销……最后,1860年创刊的勒泰利耶的《新闻报》在1860年也跻身榜首。不久,第五个竞争者《巴黎回声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份报纸带有明显的右派色彩。

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舆论报刊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1854年巴黎的15种日报中,13种达150万份发行量,15种至少达100万份)。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印制一份双面报纸甚至是四页的

报纸的成本还不是很贵。人们没有必要向通讯社预定信息,一篇社论——这是基础,一篇国会辩论的报告,股市行情,可能还会有著作权期满的一篇连载小说,这样便大功告成了。重要的是这样会影响政治斗争。这一时期的国会议员们几乎都有做记者的经验,并且力求有一份自己的报纸。

我们来列出一份清单。极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 1848 年 1 月让·饶勒斯创办的《人道报》,这时继《人民呼声》和《小共和国》之后的社会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圣日内瓦)的一份报纸,这是一份重新统一的报纸(1848 年)。

在激进派一方,克列孟梭的一系列报纸很值得一提。巴拿马事件曾使他的国会生涯中断十余年,但是这一事件后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写作才华。他以一种惊人的毅力重新活跃起来,继续出版《正义报》,而后 1848 年,他又重新创办了一份报纸,《震旦报》。这份报纸在 1848 年 1 月 1 日刊登了埃米尔·左拉的著名的《我控诉》。他利用德雷福斯事件,在他付出很多劳苦的报界中又重新找回了生存手段,此外他还找回了一种影响力,这使得他在不久后的 1848 年得以加入政府,这对于他来说有些迟了。1848 年初他甚至单独编辑了一份周刊:《集团》。最终,他于 1848 年创办了《自由人》,由于战争状态中的审查制度,后又更名为《被束缚的人》。

中间派占主要地位的是《论辩报》。这份报纸是最早的报纸之一,创始于大革命时期。起先的所有者是贝尔坦,现在是几位资本家的共有产业,尤其是糖业资本家勒博迪,洛林的钢铁企业家温德。它 1848 年的发行量还是 10 万份。这份报纸思想正统,笔调谨慎,从来没有一个比别家报纸极端的词,以至于它的经理艾蒂安·德·纳莱什几乎每天晚上写信向他正在乘游艇航行的

朋友勒博迪倾诉衷肠。在这些信中,他很快乐地讲述所有那些他不能刊登的城市中的传闻。

还应该强调一下第二帝国时期由内夫策创办的《时报》。这份报纸以《泰晤士报》为模版,1844年一位大企业家安德里安·埃布拉尔使之振兴发展。《时报》的发行量只有几百万份至一千万份,但在国内外公众评论中它是作为外交部机关报定位的。安德烈·塔尔迪厄编写“~~透视镜~~”(即当时人对社论的叫法)。“蜡烛”是在《世界报》上存在很久的左派专栏,在整个欧洲都被认为是一种权威。据说安德里安·埃布拉尔喜欢对他的记者们重复:“别无所事事!”换句话说,用一种润饰过的语言即:“您的影响力将同您的重要性成比例。”尽管如此,我们不久后还是面对依然索然无味的菜肴。

维尔梅桑的《费加罗报》成为一份共和党报纸,并且大胆冒失地支持德雷福斯派。考虑到《费加罗报》的资产阶级读者及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这种冒失与《小日报》刚好是反向的。由此导致了一次失败。但1884年一个善于周旋的人加斯东·卡尔梅特主管这份报纸后,情况又有所好转,并且在一战前又使报纸在社会新闻栏和评论方面恢复了重要影响力。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1891年12月,1891年他被亨利埃特·卡约谋杀。因为他在反对她的丈夫,即财政部部长的一场运动中使用了私人信件。

在右派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强烈反犹太主义的《自由言论报》,这份报纸因爱德华的写作才华而著名;保尔·德·卡萨尼亚克的《权威报》,此人同样是国会议员,传统的波拿巴主义者,尤其著名的是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报》,虽然从未达到很大的发行量,但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同一阵营中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半政治半宗教性质的报纸圣母升天修道会的《十字架报》,它依

赖于各省《十字架报》的强大联络网(这是法国很少的几例“~~精英部~~
~~精英部~~精英部”之一——用美国的叫法)。这份报纸强烈地加入到反德雷
福斯主义的阵营中,极端的天主教反犹太主义。皮埃尔·索兰在
他的一本专述这方面的书中列出了一些引语,这些引语使他十分
惊异于他们种族主义的粗暴程度。今天的《十字架报》已远不是
当初的样子了,并在一个世纪后巧妙地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会上
对它的恐怖的前情毫无隐瞒。《十字架报》的发行量达 50 万份。
弗朗索瓦·莫里雅克经常提及在他长大的波尔多这份报纸对资
产阶级政治观点的影响。

还应指出第一份体育报纸诞生于法国。由亨利·德格朗热
在 1894 年创办,起初名为《自行车报》,后更名为《机动车报》。这
份报纸是《队报》的原型,并从 20 世纪初开始通过组织环法自行
车赛来确保它的成功,它的创刊号可以追溯到 1894 年。

回顾外省报刊着实有些令人厌倦。但应该强调一下西南部
的重要性。那里的报纸对国内论战的兴致十分强烈。萨罗兄弟
主编的《图卢兹电讯报》对作为政府党的激进主义的历史有着很
重要的影响力。几乎在法国每一个专区政府所在市都出现了一
种或每周或双周或三周发行的报纸,这种报纸 1895 年发行量达四
百万份。这份报纸通常是很暴力,但有时也有很好的文学内容,
人们在其中利用拉丁引语相互对抗。

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

在另一些发达国家里,报业也同样取得了飞跃发展。

德国通过法律方式在整个帝国统一了出版制度。它的地区
性报纸力量要比法国特征明显,地区性报纸的发行量很大,并且

通常质量上乘。大众化的报纸在那里出现得较晚(但后来迎头赶上了)。

在英国,日报的发展要比法国缓慢。两国人口数量相近,英国的日发行量是远~~远~~400万份,而法国是~~远~~400万份。但若算上礼拜日发行的~~员~~400万份,英国明显偏低则得到了补偿。此间一位人物显现出来,即发财后于~~员~~1854年成为北岩爵士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他于~~员~~1855年创立了《每日邮报》,售价仅为半便士。他引入了更轻松的题目,更广泛的主题以及女性专栏和预测竞赛等,由此改变了大众报纸的面貌。这份报纸诞生两年后便达~~源~~400万份发行量,~~员~~1857年销量已达百万份。他不知廉耻地坚持民族沙文主义,即民族主义的侵略主义,长期敌视法国,甚至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嘲笑英法协约。由于《每日邮报》的成功,北岩得以从约翰·沃尔特的孙子那里买到了《泰晤士报》,此时的《泰晤士报》已是完全衰落了。他将这份报纸的售价由~~猿~~便士降至~~员~~便士,而未改变它的整体布局,这促使了《泰晤士报》惊人的复兴:~~员~~1859年月销售量达到~~员~~100万份。

在美国,现代化的开端是由南北战争开始的。这场战争造成了一次极大的跃进。~~员~~1862年,它~~圆~~1000种报纸的日总发行量为~~圆~~1000万份。两个重要的人物在这一时期突现出来:首先是约瑟夫·普利策(~~员~~1832—~~员~~1882)——人们至今仍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遗产建立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奖和新闻奖,并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他于~~员~~1858年运用了所有大众报纸的手段创办了《纽约世界报》,~~员~~1858年它的发行量达~~愿~~100万份。另一人物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员~~1839—~~员~~1909),他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的原型。他于~~员~~1858年创办了《纽约日报》成为《纽约世界报》的直接对手,~~员~~1858年销量为~~苑~~100万份。这些国家级报纸必须克服

一种弊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东海岸以外几乎很少有人读它们,因为联邦政权的性质本身和“共同体”的平衡状态使得地方报纸更受青睐。确实,报纸的连锁体系(辛迪加)使得主要的信息页和社论都是相同的,这种系统一致地提供一种统一性报道。一个新的特点是我们称为“连环画”,而美国人叫作幽默(滑稽)的一种样式在报纸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种样式的雏形是“黄孩子(赠送赠品)”这一人物形象,诞生于1895年,并且他所起到的作用和欧洲的连载小说类似,为了扩大一份售价员美分的报纸销量,当时人们用美国俚语称之为“黄报”。

法国:1881年7月14日法案

这时的法国报界产生了两个问题,这是由报纸的飞跃发展导致的直接结果。与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所产生的两种重要影响相伴而生的是腐败和诽谤。

在法国,1881年7月14日法令的出台还是耽搁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它还在栅栏上哀求,因为其中有一条法规是使布告服从规章。但这条法规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应该明白这项世界上最为自由的法案是如何在第三共和国的气氛中被采用的。第三共和国建立于甘必大的共和党与麦克马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第四年后。它建立于一个旧传统与特定局面相交的时期。

第三帝国的创始人接受过启蒙思想的灌输,并且经历过与压制自由的第二帝国的斗争的洗礼。他们认为,在1789年7月14日人权宣言的基本方针中,出版自由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能够确保一个民族公民的培养,并且适合于保证公民适度而审慎地行使

他们的权利。向参议院做关于这项法律的报告的欧仁·佩尔唐使用这样的话来阐释：“廉价的报纸是共和国对普选制的一种默许的承诺。蒸汽和电力的作用使得报纸可以在全国各地同时阐明这一允诺，并能够把全法国的人集中起来，就像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使每个人每一天都能了解所有事件的机密，知晓所有问题的情况。”这些话将革命者们引向过去和未来，是他们借助报纸重建古希腊罗马的集会场和广场，并同时预见到未来的收音机和电视。

为了阐明这种自由主义，我们还应考虑到 1848 年的特殊局势。在 7 月 26 日危机后，1848 年 4 月当选的议会中一个混杂的联盟正朝统一方向发展。政府中的共和党人同托克维尔一样，坚信遏制报纸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其数量、让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同时加入到他们中来。这些人虽然原则上是敌视出版自由的，但他们也很乐于利用这种自由去推翻他们憎恶的制度。至于社会党人，他们深信这种自由必然会放荡堕落，颠覆他们所希望更换的资本主义制度。1848 年后，让·饶勒斯于 1896 年 4 月又在《蓝色杂志》中写道：“报刊借助于一项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而发挥了它的作用。报刊促进了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腐败世界的解体。它们是利用被定罪的制度的极度无意识状态做到这一点的。它们有种绝好的破坏功效，这是它们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它们还有其他什么可以炫耀。”

这项取代了先前 1848 项法律条文中 1848 项条目的法律的内容是什么呢？出版自由和发行自由以极少的行政程序在这项法律中被确定为绝对自由。

报纸的不法行为以一种严密方式被明确表达出来：直接教唆犯罪或做坏事；号召军人造反；诽谤外国统治者；侮辱共和国总

统。至于对一些特殊人物的诽谤,这方面的规定对记者是很有保护性的。首先,只有发行人本身是应负责任的,而他是被随意指定的,因此他很可能是个傀儡。此外,大多数不法行为由重罪法庭受理,即到了审查委员会那里,只有诽谤罪由轻罪法庭受理,即由通常更为严厉的专职法官受理。19世纪8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暴力活动之后,这种几乎绝对的自由又被重新提起公诉,然而当时在很多严格的观念中所引入的缓和语气的措词不久也被废除了。由此产生了两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即腐败和诽谤。

受贿的危害

谈到腐败,法国是所有论及的国家中最不体面的国家之一。在让·季洛杜的戏剧《夏约的疯女人》中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失常却聪明异常的女人使当时社会上所有的行贿者都被吸引到一个大洞中,她使得他们相信那里面会有石油。然而她最困难的事情是使“广告报业联合会”掉入她的陷阱中。

理事:“我们向您提出这份广告合同,亲爱的夫人。”

疯子:“很好,现在进来看一下吧。”

理事:“哦,夫人,我们不会去看的。广告不关心事实情况。无论您的判断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不辱使命、以同样的热忱去描绘它是广告的荣幸。”

疯子:“那样的话我就不签字了。”

“听您的”理事说,“我们去看。但是我很惋惜。您让我们去考察广告的实际内容,也同时打破了我们对于真实与虚假一视同仁的传统。”

“对真实与虚假一视同仁”，为了能秘密地贪污。不幸的是，这是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报业的一个常见特点。为了阐明这一点，一种因素非常重要，即聚拢资金的系统。当时并不像现在一样存在一个紧密的制度化的投资机构网，可以吸收和筹备资金并最终保护资金。所有的银行家，无论是老实的还是可疑的都直接求助于小存款者。或者，如一位政经报刊的一位人物、财政经济通讯社的创始人罗伯特·博拉克所说：“没有什么比一位小存款者更敏感的了。”一个小人物就把他吓倒了。换句话说，对于金融家和证券商们来说，在他们向公众发行一种票券时，就要平息报界的宣传，这是形成最坏局面的源头。

这种腐化的制度在巴拿马丑闻期间被骤然揭露。大量议员因被收买而投票通过对处境困难的加纳尔公司大额借款的授权，这项贷款可以使之基本上有能力自己改变财政状况。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起诉讼案揭示了腐败的报界所起的作用。这家破产公司领导人之一费迪南的儿子夏尔·德·莱塞普明确地解释道，他曾以商业广告为借口经常付款给报纸，使它们讲这家公司的好话，或是使它们不讲坏话。他说道：“我不是腐败的开创者。是报社的人先来见我并对我说：‘如果您不给我钱，我就会报道说您的公司周转不灵。’我只有付钱。”

在数以百计的这类事件中，俄国的借款事件非常著名。一战前几年在俄国驻巴黎大使馆有一位行贿者，名叫阿蒂尔·拉法洛维奇，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负责贿赂法国的报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贿赂那些“挨饿乞讨的记者们”。¹⁹⁰⁶年革命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查获了拉法洛维奇的通信，并把它们转交给在法国的共产党，由他们于¹⁹⁰⁶年在《人道报》上刊发。¹⁹⁰⁶年

这些书信被结成书信集,以拉法洛维奇的一条电文命名:“法国报界可憎的受贿行为。”

所有这些小额资金有关的丑闻在证券界和政治界共同作用下动摇着第三共和国的统治,这些丑闻使我们看到在民主中心的这种毒害不仅构成了“财政”报纸的恶习,也使综合报纸的专栏有所沾染。通过 1859 年的罗谢特事件和 1870 年代的玛尔特·阿诺事件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事件在弗朗西斯·吉罗的电影《女银行家》中以一种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弗朗西斯被罗密·施奈德的魅力所吸引,给剧中女冒险家以很大的戏份,描述她被当地建立得最完美的银行制度击垮,而又去破坏这种联合。实际上,玛尔特·阿诺是这些诈骗者中的明星,和在她之前的罗谢特以及在她之后的斯塔维斯基一样把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一种奇妙的积累体系上。他们借助于自己创办或是收买的报纸(例如玛尔特·阿诺的《法郎公报》)卖给轻信的人们无价值的东西,赚取他们的钱财并分给前面所提到的事件中的股东们巨额股息。而当这种纸牌搭的房子倾覆的时候,金融家也就重新跌落在地了。最使人吃惊的是在罗谢特事件和玛尔特·阿诺事件的最后,仍有被欺骗上当的存款人说:“事实上,罗谢特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玛尔特·阿诺是一个出色的女人,他们是被嫉妒者打败的。”

此外,看到财政广告逐步集中化也很让人不安。1850 年左右,一位名叫莱昂·雷尼耶的人几乎垄断了这方面的专栏。1855 年 1 月 20 日,饶勒斯就此向参议院提出警告:“政府财政公报过去是分散的,几乎每份报纸都可以自主刊登,也许每份报纸都没有说出真相。但由于每份报纸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报道,这样便形成了一种真相。现在却形成了一个财政公报的垄断企业,一个唯一的、集中的组织,对于所有发生的事件给出同样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一种巨

大的影响力必然以报刊形式施加于舆论上，这种报刊通过各部分的所有机构在同时传递着同样的说法，诋毁或是颂扬同样的企业，推动着舆论，使之如在同一条路线上行进的军队。”

与这些暗处的势力相比，政府所支配的专款，即“秘密款项”的影响力就甚小了。这些款项的数额很小，并且按惯例都会被大量的记者所瓜分，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最严重的是财政专栏的腐败体系也传染给了整个报界。我们称之为“广告分发者”的小圈子，即在编辑形式下掩盖的财政广告，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有害的角色。一位银行家，即金融机构的主管人想发行一种票券却担心会在贿赂报界方面损失一定数量的钱，他并不知道每一个对话者有着怎样的“分量”，他很可能会对那些没有危害能力的人给予太多，而对其他人又给得不够，同时使之不满地解释道有关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就应该依靠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也从中提取佣金，并且有些情况下也会“捞一把”，这是界内的行话，意即除了他们应得的佣金外把另一部分钱也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样就聚集了一大群臭味相投的下层蹩脚记者，他们更多地依靠他们没有发表的东西过活，而不是靠发表了的东西。

我们承认，盎格鲁撒克逊地区一直有着比我们更为严格的道义学，他们对报纸的编辑内容和商业广告加以明确的区分。当然，大广告客户利益干扰的可能一直存在，而报纸不想冒险去找他们的麻烦。但在第三共和国期间，腐败现象是粗暴的、赤裸裸的、庸俗的。

外国的政治也受到了波及，因为我们知道，在巴黎的使馆中必然有大量的报纸出售。事实上人们很难买到那些基本上论及国家重要问题的文章。但涉及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国家时，就可以

更自由地翻云覆雨,而脏款大量地涌到了。1919年缔结凡尔赛合约和其他停战协定的时期,对于那些处于被拍卖状态的报纸来说,是一个繁荣时期。有关国家的使馆竞相贿赂这些报纸。我们对于希腊这一情况十分了解,史学家迪米特里·基迪斯基曾立足于希腊的外交档案进行研究。与土耳其争夺地中海列岛的国家政府私下竞相出高价以保证在权威报纸的专栏中对它们美言,这其中也包括《时报》在内!1919年以来,著名的古希腊研究者维克多·贝拉尔从阿美尼亚回国,他曾在那里调查1919—1920年间的大屠杀,这场屠杀的恐怖程度几乎不逊于1919—1920年间的那一场,虽然人们很少提及它。他回国后断言土耳其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曾以高价使法国报纸对这一野蛮行径保持缄默。没有人去揭穿他。

确实,这种败坏局面的形成不仅仅是记者们诚实与否的问题。腐败最终影响到了民主运行本身,这也是第三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莱昂·布鲁姆在他的《人类的阶梯》一书中所提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误的。

诽谤的危害

这种以极大的代价取得的自由导致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要保护个人免受诽谤的攻击。与前几章相反的是,在本章中我们不能说法国所处的环境比英国或美洲的美国更恶劣。在美国,在关系私人生活方面的攻击至今依然是以一种比旧时欧洲所经历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形式展开。

有些作家听天由命,阿道夫·梯也尔一天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更喜欢被那些被视作盗贼的老实人统治,而不是被那些被

视作老实人的盗贼来统治。”也罢。但是尽管如此，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行来说，使报纸出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寻找真相而不停地咬噬政界人物的肠胃的做法是很危险的。确实，民主需要仔细观察政治人物的公开举动，但对于观淫癖还是应给予限制的。1867年当一部分报纸指责总统指定的高等法院法官罗贝尔·亨特时，他们甚至去收买了法官家里的一名雇员以了解他的录像带柜里是否有色情录像……十年之后，由克林顿总统和白宫一名年轻的实习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引起的传媒界和司法界的喧动使欧洲甚为震惊。尤其是狄更斯，在他的《美国随笔》和他的小说《马丁·朱泽尔维特》中提及美国报界对家庭丑闻的狂热兴趣，并对此表示惋惜。

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成功主要都是建立在这类报纸之上，从中我们会发现那些伪道德主义的龌龊实践。特别是维护夫妻之间的忠实已成为了厚颜无耻的调查的借口。在世纪初的美国，由于出版的自由发展，对政界人物侮辱的强烈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我们可以来看赫斯特对1857—1860年间任总统的麦金利大发雷霆。麦金利被一名扰乱分子刺杀的时候，赫斯特内心局促不安，因为是他的反对总统的报纸引起了谋杀；短暂的内疚后不久，他又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了。人们认为他说过一句可怕的话，用于他的编辑工作中：“向来只接受事实，就会使你失去一个绝好的故事。”当时最重要的美国记者的传记向我们展示出大部分记者为了出人头地是怎样力求向一位政界人物讨要报酬的——这个词是个年代讹误。因为在美洲，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都很腐败，所以这里却有文章可做。但这种辩证法对于民主来说是有害的。

甘必大对此表示忧虑，1884年，在他死前不久，即1881年法

律通过之后,他曾坚决要求(我在这里引用乔治·魏尔的例子)司法对诽谤罪严格处置,并保护“私人生活的墙”。“处罚”,他说道,“像英国法官那样处罚。如果这个国家真正地开始了出版自由进程,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如果这种自由被执政者们以同样的热情去保护,现实正相反,是私人生活领域中,个人名誉遭遇了经济上的压制,严正的报纸和一种真正的惩罚,而不是遭受监禁之灾和皮肉之苦。”(不幸的是,对英国的敬意已经过时了。)

在人民战线时期,萨朗格罗事件将把这一问题展现在世人面前。萨朗格罗是里尔市市长,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内务部部长。极右派报纸指控他在战争期间临阵脱逃,这些毁坏名誉的攻击使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身亡。在第三共和国期间,人们最后一次想到要严肃报刊法令。但这项在莱昂·布鲁姆指使下制定的草案在国会预审中陷入了困境。

如果想对这一对比性时期做个总结,没有什么比举出这两个正反面人物形象更好的了:鲁莱塔比尔和乔治·迪鲁瓦。

鲁莱塔比尔,加斯东·勒鲁在《黄室奇案》、《黑衣女人的芳香》以及《鲁莱塔比尔在沙俄》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英勇无畏无可指责的记者,他把事实真相至于一切之上,并不顾一切风险,为一种现代化的民主服务。阿贝尔·隆德尔也是如此,他是鲁莱塔比尔的弟子。

至于乔治·迪鲁瓦,他是诡计多端的阴险角色的代表:莫泊桑笔下的俊友,他从事一种卑鄙无耻的勾当,利用夫妻间的私生活、卑鄙和背叛而取得了臭名昭著的成功。他所走的路是当时最悲观的人的路。(但是他们错了!)我们引用 1906 年巴尔扎克总结《巴黎报业的专题论文》时的话——这是当时最辉煌、最有效的抨击文章:“如果报刊还不存在的话,不应该去发明它!”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后有人说：“真理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出版完全自由的民主体制中，事实上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对抗，即事关民族生存的国家利益与讲真话的权力之间的对抗。其实，用一种不太容易被直接感知的方式来讲，这不亚于不久前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道德及公民方面的争论。一方面，真理和正义的权利为个人辩护；另一方面，是一个合法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人认为是非正义在指责一个无辜者有罪。自1898—1905年间真理所受的轻视正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司法所受的轻视一样。

这便是这种紧张状态的始末。应对政府的两种行为加以区分：一种是审查制度，即政府在各家报纸可能反映的事实面前行自我保护；另一种是宣传手段，企图在国内外触及民众的精神层面和内心领域。即使这两种行为在实践上有些相混淆，我们依然能够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所有战时政府都有着双重顾虑，有时这种忧虑是相对抗的：一种是镇压作为危险消息供应者的报纸，另一种是发展这种报纸以作为宣传的喉舌。

审查制度总是在政治人物之间引起一种犹豫：怎样做才是在

原则上和效率上都适当并且合法呢？很快，人们便发现过度的审查会导致与人们追求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审查制度：愤怒的等级

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是最为自由的。美国在 1862 年才参战，建立了一种为时已晚的狭隘的审查制度，在控制报纸之前控制了电报电缆和信息传播。实际上美国参战时间甚短，还不足以真正在这一方面产生问题。

英国有着最古老最坚固的自由传统，正如在 17 世纪初的布尔战争时一样，记者们认为政府机构不必强加任何限定性的措施，可以相信编辑们的爱国天性，他们自己能够区分对同胞们说什么合法的，而什么是为了国家利益所应隐瞒的。总之，“有权力了解，有勇气沉默”——18 世纪 70 年代初，《快报》由此加工成一句口号重新提出。只是这一次赌注太大，以至于英政府很快就设置了一种审查制度。但它选择了一种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强制的做法，并以逐次逼近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制订了一项和解协议。

英国创立了新闻出版署以控制电报。但英国的特殊之处是拒绝对报纸的预先审查。政府给它们一定数量的指令，唯一的威胁是如果它们违反了这些指令，就会被查封。审查制度的负责人斯坦利·巴克马斯特在 1854 年 1 月说：“我绝对没有任何权力强迫报社向我提交它们的出版物。”甚至查封也没有真正地执行过，查封只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正如我们在谈及核战略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威胁通常只是使英国报纸在政府所希望它们遵守的准则范围内活动。不过，大多数报纸出于一种商业上和爱国感情方面谨慎的考虑，当它们有所疑虑时便自动地把它们的文章付印样

提交给新闻出版署,以了解政府是否反对这些文章发表。

在英国,战争前几年里唯一一次轰动一时的危机是由北岩勋爵引起的。此人是《每日邮报》的负责人,曾使《泰晤士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野心勃勃,非常专横并且有些狂妄自大——这类人通常会犯错误。他深信自己扮演了一个历史角色,因而在1915年末指控阿斯奎斯政府在战争中指挥优柔寡断,并力图引出一位可供替换的领导人。有一段时间他想迫使基秦那来担任领导,此人是苏丹战争中的英雄,英国军队的荣耀,北岩公爵还用此人的名字发起了一场报界运动。由此导致了与外交部关系破裂。这是长期以来《泰晤士报》第一次没能与外交部和睦相处。这一事件使政府和舰队街都甚为震惊。但不久二者又重归于好了,在战后的1918年10月,北岩站到了阵线的另一边,亲自主管官方宣传工作。

在法国,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报纸失控而产生的危险比在英国要严重得多。因为英国受到大海和它的海军的保护,并且英国掌握自由传统的历史更为悠久。1915年人们没有为战争时期而改变先前的法律,1916年关于戒严方面的法律允许军方当局对危险的报纸进行查禁。1916年10月,缘日法律“用于镇压战争期间报界泄密的行为”,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权威。这成为一批立法决策的一部分,这些立法决策是在战争初期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由参议院一致通过的。

神圣联盟在战争初期处于支配地位,在神圣同盟的意图的支配下,控制系统的组织过程应该没有太多矛盾。巴黎建立了一个隶属于陆军部的新闻出版署,下设三个部门:日报部、期刊部、电报部,并且利用一种双重审查系统,即军方审查及民事审查,巴黎审查及外省审查同步进行。军区司令和省长们受委托监视他们

辖区的报纸是否越轨。这种体系非常严厉,因为建立了一种军方对报纸付印样的控制,比英国更为吹毛求疵。法国政府辩白道,法国的记者更为难于管教,并且在法国存在持悲观论调的报纸,而在英国是没有的。

我们知道,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自由传统很少,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另一方面,报纸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在协约国那样的紧密。在几经探索之后,柏林政府设置了战时新闻出版署,直接隶属于最高指挥部。这一机构口气非常专横:我们对待记者就像对待官员一样。它并不阻止报界借助于最高指挥部和国内政府之间的争执而恢复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这些争执记录了一战期间德国的历史,夏尔·戴高乐在他的第一本书《敌军中的混乱》(1940)中对此作出了恰当的分析。

审查制度的三种努力

在此我们论及一个超越这一重要时期的问题:一个民主国家在何种外部危机的情况下可以决定限制媒介的言论自由?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战争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军民道德,最后是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评价,这其中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并不均衡。

对于与前线有关的人来说,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种说法,即掩藏一定量的信息是必要的。例如关于军队调动和部署,关于陆面战术的信息。1914年战争之初,在法国,我们有大量这样的例子,1914年麦克马洪向色当进军这一信息被法国记者泄露给了德国将军,这也是法国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恐怖的极端是对政府当局的政治评价。这一点上我

他们可以很清楚应该揭露出所有政府的一种意愿,即认为对政府提起诉讼就是侵害人民的斗志和士兵的士气。然而,在民主方面,民主和政府是有区分的,因此这种过于谨慎的保护从公民角度来讲是没有根据的,从实践角度讲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一种建设性批评的优势。1915年11月,出于对英国民主传统的忠实,审查制度的首脑斯坦利·巴克马斯特爵士对下议院表示,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过分保护政府当局。然而他马上又补充道:“在批评已经具有一种能够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性质的情况下,审查制度就应阻止这些批评了。”这正是棘手的地方。因为最微不足道的批评在这方面都可能表现得很危险,所以也就随时可能被压制。另一方面,反对派领导人博纳·劳对这种说法表示非常愤慨。这位首相应该承认,他并没有始终追随他的合作者。

同样地,在法国,战争初期委员会主席勒内·维维亚尼宣称:“通过有步骤地对国会的攻击,从而在暗中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路易·吕西安·克洛茨,即后来克列孟梭的财政部部长,当时是巴黎军区司令加列尼身边的审查制度负责人,此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法国政府第一次溃败撤退到波尔多之后,他收到政府电报,要求执行政治审查。但立刻就有很多政界人物——他们根本不是部长!——举起义旗反对这一想法。英国的北岩勋爵在他1915年负责审查制度之前是这样的。法国的克列孟梭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战前不久创立的报纸《自由人》中把反对审查制度的斗争作为最常谈论的话题,以至于他的抨击性文章经常在书报检查时被用墨水删涂……因为所有的审查者都认为对审查制度本身的批评是所有的批评中最不能容忍的……在几次这样的小冲突之后,克列孟梭把他的报纸更名为《被束缚的人》,这并没能阻止1915年11月政府坚持审查制度;虽然如此,

我们也该承认,为了公正起见,政府明确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协作者乔治·芒代尔说,应该允许那些对个人的攻击和对领导人及政府的政治攻击通过审查,应该指责的只能是那些触及战争指挥或外交活动的抨击性文章。但其分界依然难以分清楚。

在英国,保守派议员比弗布鲁克公爵成功创办了《星期日快报》并买进《每日快报》,由此开始建立一个他构想的能在战后发展的报业帝国。他于1912年10月开始行动,反对他认为是懦弱无能的阿斯奎斯政府,并协助劳合·乔治取而代之,他全力投入地支持劳合·乔治——实际上,劳合·乔治也就是战争胜利后的首相。看到比弗布鲁克和北岩采取同样的行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北岩是比弗布鲁克的重要对手,在他之前发表了反对阿斯奎斯的热烈抨击性演说;在1915年初,他接受了信息部部长之职。

在所有参战国中,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扩展了言论自由,并揭示出行政部门自满的危险。当时一位资深作家古斯塔夫·泰里宣称:“审查制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不错的东西,它使得我们最终读到了瑞士报纸。”而著名的记者阿尔弗雷德·卡皮在战争初期的1914年12月16日模仿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中著名的独白而写道:“只要我们不谈权威人士,不谈政府不谈政治,不谈信贷公司,不谈伤员,不谈德国人的残忍,不谈邮政部门,我们便可以在两三种审查的监督之下自由地发表一切了。”

最强烈的抗议是针对审查制度中明显的无知和愚蠢的情况。应该说审查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与记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模式,记者总是通过巧妙的影射而企图逃脱审查制度的控制,审查制度则踏着它沉重的木鞋到来——并且还经常是修养有限。情况随战争的发展有所改善,因为在伤员中可以招聘到比战争初期那些人更为敏锐的记者。

很多争论围绕英国报纸的战地记者展开。英国报纸在克里米亚战争、布尔战争和苏丹战争期间就不顾参谋部反对而发展形成一种向前线派驻记者的传统(愤怒—愤怒)。然而,在一战初期,英国政府不顾这种传统,反对派遣战地记者,并委托专门军官远距离控制来自前线的消息——这些信息已被参谋部仔细审查过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抗议、反对意见和愤怒:愤怒年年未开始,英国政府改变初衷,允许委派记者。这一角色显得非常暧昧。我们可以在很多关于二战的美国战争片中发现这样的人物形象,一位记者仅以摄像机为武器到达前线,开始非常不受士兵们的欢迎,而后他的勇气与团结精神赢得了战士们的赞赏。通常剧情会规定他在胜利的突击队即将返回基地时被杀……

千真万确,开始战士们是多疑的。拉迪亚德·吉卜林^①在结束一次对法国战壕的采访时带着几分自嘲地意识到,战士们用略微无礼的眼光看着那些“用他们的血来写稿子”的作家们,但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在战争第二阶段,战地记者都逐渐被战士们接受了。特别是因为他们使报社及政界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前线日常生活过于粉饰的描写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因为战士们读到这种田园诗式的文章会怒气横生影响斗志。法国在这一点上也是比英国落后的,直到愤怒年夏,潘勒韦政府时才同意派遣一定数量的战地记者。这些记者也是要冒风险的:例如《小巴黎人》的特派记者塞尔日·巴塞死于前线,而这份报纸也必然针对他的牺牲大做文章。

^① 英国作家和诗人,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译注

宣传的革新

审查制度废除后,宣传发展起来。这时,人们不再是保护者和胆小怕事的人,而是表现出攻击性,并且非常具有想像力。如果报纸依然是必须的宣传武器,那么还应指出一些别出心裁的革新:例如传单——一种基本传媒方式。在罗杰·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一书中,1915年夏末,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雅克不抱任何希望地驾机在德国前线上空投掷传单,因此被杀害。1916年,法国创立了空中宣传部,由翻译官托内拉和阿尔萨斯画家汉西主管。汉西曾给很多儿童读物画过插图,也由此培养了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摩泽尔地区的怀旧情绪。1917年12月,德国曾在南希上空投掷宣传单,汉西也采用德国人这种做法,并取得最高指挥部的信任,对德进行反击。战争后期,这两人已成为反敌宣传斗争中心的领导了。他们的办法多种多样,有时候甚至很怪异:他们甚至往进攻性炸弹里装上折叠好的传单,甚至装上假香肠。(这是一种老套的说法,据说德国人一见到香肠就会忘记一切而冲向它!)在英国,战争末期北岩勋爵也做出了类似的创举。在战争最后一个夏天,英国飞机每天向敌军战线后方投掷100万份传单。这些传单上的文章中想像展开得十分自由。例如人们寄出伪造的德军犯人的信件,信中说法国战俘营十分幸福,以至于一个美国飞行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德国逃兵在法国受到的种种田园牧歌式的款待,使我自己都产生了逃跑的欲望。”人们还投下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参战时所做的演说词,因为这篇文章传到德国舆论界时是被截去了一段的。

很显然,这种做法的效果是不确定的。很多传单最终被填在

了壁炉里 ,填补了煤炭供应困难的空缺。但这种干预方式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甚至在海湾战争中依然被应用。

另外一种新生事物是战争期间出现的新闻记录影片。约瑟夫·达尼埃尔的论文《战争与电影》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影片的起源。起初 ,国家和军队没有任何的预见。将军们敌视这种在他们看来幼稚的消遣性的东西 ,在前线看电影对他们来说是荒谬的 ,甚至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在这儿是为了打仗 ,先生 ,我们不消遣!”贝当曾对军队电影部的创立者这样说道。让·路易·克罗兹和与他同样是预备役副官的朋友皮埃尔·马赛尔一起成功地使得统治集团建立这一组织 ,而我们应该向此二人致以双重的谢意 :首先感谢他们在当时使得我们更好地了解战争的情况 ,而后感谢他们事后向我们提供了历史文献取之不尽的原始资料。

在精神方面常常比霞飞和贝当年轻的加里亚尼支持克罗兹和马赛尔的事业 ,并推动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约瑟夫·达尼埃尔引用阿贝尔·冈斯的一篇文章——此人曾在电影部受挫 ,并于 1917 年 1 月 1 日写道:“我利用我卑微的地位准备了一份报告 ,并按 达利米耶、马尔维和潘勒韦(三个政府要人)的意思复制了三份。这份报告中完全是一项组织和管理一家电影公司的计划 ,使之能够在此时为苟延残喘的法国提供一种绝对微不足道的服务。德国两年以来就在加紧这方面的宣传 ,并且联邦银行支持电影这种与报刊占同等地位的战争武器的发展。我遭遇了一种对这种服务的误解 ,而我的手中是怎样的一颗炸弹啊!”

然而 ,在战争末期 ,电影部受到了领导人的重视 ,雇用上百名撰稿人 ,摄制出每周新闻纪录片和战争年鉴 ,在国内所有电影院的“主片”之前放映。不过观众还是增加了很多 ,像所有战争时期

一样,人们力图互相交换想法,减轻每天的忧虑。这些影片在舆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最有经验的人们知道,这些画面被严密监视着(比如说,我们在银幕上从来不会看到尸体)。

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出现了这些新生事物,也丝毫不能忽视书面出版物,它在宣传力量上,尤其是在对敌宣传和对中间派宣传方面依然是基本武器。

对其他报界的思考

在德国,埃尔茨贝格尔慨叹他的责任被分到了各个政府部门,又重新合并在一个机构,即外事中心机构。

在英国,比弗布鲁克和北岩这两位合作者兼对手之间的合并来得要迟。北岩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他向中立地区,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发送看似亲德的伪造文章,事实上是用以表明英国的情况更好些,并且英国人的斗志比德国报纸上所说的更高。这项举措是有些危险的,因为人们通常是很肤浅地读这些文章,信息并不一定会被传递出去。当然,也不一定引起一个相反的结果,但这种做法使得那些发明了这一精妙策略的人十分满意。

在法国,首先是一个新闻信息处在发挥作用,而后,1957年1月,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指导下,菲利普·贝特洛建立了报刊学院。菲利普·贝特洛的父亲是大学者、第三共和国初期统治集团首脑马赛兰·贝特洛,葬于先贤祠。菲利普·贝特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一个传奇性人物,此人性格时而柔顺,时而粗暴,并且一直就是凯道赛的一个神话。他把在公职和政治活动中一种无耻的效力混杂在一种对文人不加掩饰的敬意中。他带着

一种集中宣传力量面向国外的想法创办了报刊学院。它包括四个部门：对外关系部、军事部、国外报刊翻译研究部和宣传部。

在这里传播了很多天主教方面的作品，以反对亲德派对圣歇日行动的解释。教皇伯努瓦五世以一个“德国鬼子”（~~德寇~~ ~~鬼子~~ ~~感译~~）教皇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教皇是极其困难的。博德里亚的著作《德国战争与天主教》也传播开来。

不久，报刊学院已居于论战中心的地位，因为菲利普·贝特洛在此“埋伏”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凯道赛的官员、作家、艺术家们。其中有一场十分有趣的争论：对于战争期间是否所有人都应平等地付出血的代价，贝特洛反对其中暗含的信念，即应使天才们（或者是人才）免于这种在前线受死的风险——例如克洛代尔、季洛杜、莫朗、科克托这样的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保罗·莫朗的《一个大使馆随员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篇关于报刊学院的回忆性文章，其中描写那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在里兹饭店、汽车俱乐部或是其他流行的“沙龙”里论战，晚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嘴里叼着雪茄，一边说着生活并不是那么糟——比在战争的烂泥里好多了，并且坚信自己在巴黎所做的工作比平庸地摆弄刺刀有用得多而自我感觉良好。

幻想与无能

这种宣传的结果怎样呢？每个人都以一种略带受虐狂性质的方式相信，敌方的宣传更为有效。人们已被自己毒害，深信敌人通过大量的暗中渠道成功地毒化了公众的思想。“德国是一家

① 《上帝与匈奴人》。——译注

谎言的工厂！”索邦大学教授、著名的大革命方面的史学家阿方斯·欧拉尔《新闻报》上如是呼喊。事实上，我们很惊异于看到我们的宣传效果收效多么微小。这种感想得自于皮埃尔·纪廉关于法国对意大利宣战前对其进行的宣传的研究。

西班牙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伊比利亚半岛的报业在此期间因国家的中立状态而获巨大成功。这些财力不足的报纸全力从战争双方领导者那里接受钱财，并承诺自相矛盾的好意。报纸的内容几乎没有改变，但战争双方都认为已经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这种无用之功因为它所耗费的巨额资金而显得更为令人惊异了。在和平时期，我们已经提到法国报界在 1871 年《凡尔赛和约》时的腐败情况——这几乎只是一种名誉方面的冒险，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受着枪决的威胁，因而犹豫得更久了。

另一个方面，力量的集中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各个国家，政府都试图使服务于情报与行动的秘密部门多样化，担心所信赖的渠道单一，然而却由此产生了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从而隔断了秘密活动。人们竭力相互排挤，互相驳斥，平白无故花费了很多资财。

最后还有一点，即几乎难以采取直接行动，必须服从于专家，这样我们便更敏锐地发现先前提及的关于和平时期贿赂报纸的困难：对于一些可能的干预对象，不同报纸各自的受贿，必须求助于一些所谓能担当此任的中间人，假设这些中间人确实是有能力的，而他们可靠吗？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以自己所冒的风险巨大为由为他们所贪下的巨额资金辩护。

两个例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这一点。

战争初期，于 1870 年末被英国罢免的、阿拔斯二世奚尔密时

期的埃及总督成功地说服德国方面,如果他能够移民法国,他便有能力买通几乎全部的法国报纸。他提名了一个由饥饿的同谋们构成的联络网,而其影响却是虚构的——拿了很多钱却几乎没能笼络和毁坏一家法国通讯社。博洛,即所谓的博洛帕夏^①,曾收买了一份没有影响力的小报,阿尔默雷德(电影艺术家让·维戈的父亲)的《小红帽》。

在相反的一面,让·原克罗德·蒙唐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一个离奇的事件:《科隆日报》事件。1915年初,一位名叫弗里茨·多姆斯多夫的人通过法国驻海牙公使团(荷兰在战争中处于中立状态)向法国政府建议买下这份莱茵地区的日报。这是一份创办于1846年的报纸,它稳定、有影响力和威望。他承诺道:“我们可以使之成为法国方面论点的辩护者,只是它的开价很高。”大使不相信他,而武官对此十分热衷。有人去告知克列孟梭议院的主席。此人虽然性格多疑,却与他的办公室主任——判断力很强的乔治·芒代尔同时落入了圈套。他们派出了一位前部长马克·雷韦耶在海牙与多姆斯多夫会面。会面的气氛就像是一部二流的侦探影片。会面的地点是蒂尔堡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即耶稣圣心会的传教士,是多姆斯多夫的兄弟。焚香,长袍,禁区……在这片低沉的阴影中,他们决定采取一项绝妙的举动,多姆斯多夫神父温柔地为这一切祝福。法国支付了很多的钱。首先给多姆斯多夫150万法郎(这是一位驻外全权公使年薪的数目)以感谢他的效力,尤其是为收买《科隆日报》又支付了100万马克,一个可观的数目。而后人们在巴黎等待,带着渴望细看报纸的专栏。然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反法文章依然存在。迫于询问,多姆斯多夫

^① 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旧时土耳其对某些显赫人物的荣誉称号。——译注

从容地辩解道：“这完全正常！如果变化过于突然，就会引起德方要人的注意，整个行动计划都会破产……”是的，但是时间过去了几周，几个月，《科隆日报》一直没有改变笔调。1915年11月，多姆斯多夫感觉到关系密切的危险，因为战争结束了。他向法国使馆宣称：“我弄不清发生了什么，我得亲自去科隆调查一下。”他得到了一张护照，11月10日带着1.5万马克中剩余的部分以及他的1.5万法郎穿过法国国境线，然后……他“在浓密的缺失中消融”，永远地消失了。

这次意外事件是很切题的，因为它展示了负责人影响国外舆论的幻想程度和缠人的欲望，他们为这些舆论准备了大笔开销以及精力和金钱。一件事只需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就足够了。中介者们就能断言他们从中做了煽动，即便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随后的例子中，1914年11月，因敌视德国而著名的德尔卡赛被解职，他的解职实际上是由保加利亚加入反协约国战争引起的，而埃及总督的关系网在柏林自夸这是由他们所引起的，这是骗人的，但这不失为一个要钱的好机会。我们发现，与《科隆日报》对法国的立场一样，德国买下的德·梅尼尔的《召唤》（~~德文原名为~~在1914年复刊，并在胜利时为 ~~德文原名为~~的合并而作宣传！德国方面非常震惊……解释是老生常谈：“开始是被爱国者的信念征服，而后有效地转变方向……”荒谬！

法国驻瑞典大使是更为明智的。他在1915年左右向法国政府建议不要在试图影响瑞典报界方面花费太多。他写道：“斯德哥尔摩的三份报纸是明显的亲德导向。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报纸更倾向于我们。还有一种二流报纸，影响已经很小，渐渐变得消失了。只需在它被收买的嫌疑的时候给它津贴就可以了。”他恳切地总结道：“最好的宣传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知道,在战争期间,这种战略的幻想比结果要多得多。博洛帕夏,在结束他事业的死刑处决前的诉讼中宣称:“在埃及总督周围的一群瘦猫找到了一种在德国人背上找钱的办法。我始终不明白德国人怎么可以任人摆布。他们本可以去收买《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和古斯塔夫·埃尔韦的《社会战争》。这无异于用嘴叼月亮!”

疯狂的夸大式宣传

还应考虑到所有这些审查制度、幻想、混乱的努力都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似乎觉得这些被剥夺了可靠信息的社会团体不断地创造出收集信息的新方法,反对审查制度,抵御宣传的影响。首先是一种怀疑,而后是一种强烈的怀疑主义,植根于读者中。应该承认夸大式宣传并没有运行得很巧妙。例如莱昂·巴伊比在《不妥协者报》中解释说,德国人非常饥饿,以至于有一种特别可靠的办法可以从一个战壕到另一个战壕地大量杀死他们。晚上,你匍匐钻到战壕之间的空地上,在离德国战线尽可能近的地方放上一块诱人的果酱蛋糕,上面加上黄油就更好了——把蛋糕系在细绳上。黎明时分,你一看见敌人发现了蛋糕便轻轻拽绳子。饥饿折磨得他们很痛苦,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他的鼻孔抖动着,爬着出了战壕,跟着蛋糕走。他靠近,而当他离你只有两米距离时你就朝他两眼间开枪!

让·原雅克·贝克尔在他的专述战争期间的法国人的书中举出了很多其他的夸大式宣传的例子。下面列出一些,这些例子非常如实地复原了当时的气氛,并解释了后来,即1918年后报界的影响丧失的原因。

——1914年 8月，战争爆发时，后来的红衣主教博德里亚宣称：“我觉得这些事件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我为此已经等待了四年。法国恢复了生机，而且在我看来，它只能通过战争的净化而恢复生机。”

——被认为是具有自由精神并略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文人让·黎施潘在 1914年 9月 15日突然用这样的话粗鲁地指责德国人：“让你们的皇帝和他的下流子孙们占你们的便宜去吧！噢，可怜的鼯鼠们，让他们占便宜去吧，但你们至少应该想到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了，你们将会狂怒痛哭的。我们的士兵们也知道这些，他们捧腹大笑，这些出色的士兵们愉快地剥着你们的皮，噢，可怜的鼯鼠们！”

——谢尔菲斯将军，在《巴黎回声报》中赢得了荣誉。（这是退役将军们的辉煌时期，他们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而突然又发现了这些意想不到的论坛。）1914年 9月德国进攻时，他大声说道：“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德国鬼子再发动进攻更为有利的了。”他解释说，当别人进攻我们撤退时，会使我们有更多反击的力量和制服敌人的力量。

——1914年 10月 15日，《新闻报》认为一名凡尔登逃兵说了这样一段话：“进入博蒙后，我们那些曾装作逃跑样子的士兵在那里疯狂地娱乐。”报纸评论道：“事实是有些凡尔登的地下室相当舒适——请您注意，里面有地下室和中央供暖，在那儿并不会感到十分厌烦。”

——在俄国前线方面，广泛流传着哥萨克骑兵的“压路机”彻底击败德国人的传说。同盟国可能在东方战线获救。我们看 1914年 10月 15日的《晨报》：“哥萨克兵毫不费力地把匈牙利人依次串起来，虽然长枪木柄可能阻挡他们，可是而后他们又把这样

串成的一整串匈牙利人扔掉。”

——在萨洛尼卡战线上,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1916年间),《晨报》认定一名士兵说了如下一段话:“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我们一往无前,我们强悍的战士们用刺刀把土耳其人举了起来。”

——关于塞尔维亚战场,1915年10月,《新闻报》写道:“贝尔格莱德爆炸,我们却没有注意到。”

——德国炮兵队呢?1915年10月,《新闻报》上说:“德国人射得很低,而且技术极差。至于炮弹,它们都不会爆炸。”《晨报》刊登了一封所谓的前线来信,日期署为1915年10月,说:“他们的大炮和他们自身一样笨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他们的炮弹效力极差,所有的弹片只能造成青肿。”

——《小巴黎人》的引言(1915年10月)说:“现在我军嘲笑那些机关枪了,我们再也不留意这些东西了。”这时,在后方(前线可完全不这样!)人们歌唱一次重大的胜利,歌曲的曲调类似于“~~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皂葬~~”。

前线的蠢事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由于战士们对这种文学所表现的厌恶之情,它们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他们所有的通信都反应了他们的愤怒与厌恶。这一点阐明了亨利·巴比塞的《火线》成功的原因。这是一本少有的战争小说,战士们在其中又找到了他们的痛苦、勇气和慌乱不安的真实情况,找到了他们深陷狱中的真相。

由此也同样说明了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各种战壕中出现的
小报深受喜爱的原因。所有的军人都知道这些报纸,国家书籍馆

① 法语 东京人,东京的。——译注

② 法语 机关枪。——译注

保存了一份这些报纸的合集。1870—1871年后期，将军们以为允许这种传播其优势多于劣势。这时莫里斯·马雷夏尔和让娜·马雷夏尔的《鸭鸣报》创刊，后又停刊，继而又复刊。这份刊物正如我们所知，不久便获成功。这两个人没有卷入很多和平主义者的潮流中。报纸标题是对克列孟梭《被束缚的人》的恶作剧性的嘲讽。另一份为期很长的报纸是《小白炮》——小白炮是战壕里对迫击炮的一种俗称。这份报纸是让·加尔捷原布瓦西埃创办，在两次大战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托拉斯”的争论，“托拉斯”即将军与炮商的联盟。

怀疑与谣言

确实，这种夸大式宣传可以在第一时间增强后方的斗志。但是战争继续蔓延，这种手段很快就失去了影响。更有甚者，它还导致了危险。正是这时战争谣言四起。语法学家阿贝尔·多扎在战争胜利后以“战争中的传说、预言及迷信”为题为此编撰了一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汇编。另外一个编撰者吕西安·格罗博士找到了七卷的素材，题为“战争中的假消息”。我们可以在其中补充上弗洛伊德的朋友玛丽·波拿巴特的《战争神话》。这是一本珍贵的书，1929年出版，特别提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

我们首先看到大量的幻象。彼得大帝、圣·安托万·德帕杜、圣女贞德……几乎到处都重现。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另外一些：一方面，积极的、关于统一的传言有助于增强斗志；而另一方面，消极的传言削弱斗志并传播气馁情绪。

一方面的传闻是关于敌方的悲观的传闻。一个最著名的传闻是关于德国人在被占领区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野蛮行径的。

法国舆论界深信——当然这并不是真的——德国人在占领区有步骤地割掉孩子们的手指。确实,战争中存在罪恶,但数目是有限的,尤其是与第二次大战相比较而言。

另一方面,导致气馁情绪的传闻是关于首脑的变节,这是一种陈旧的观念——他们被敌人收买,还有残酷的压制。1918年的叛乱事件是很有教益的。如今我们知道了真相。与战后所流传的一种传说相反,人们没有损坏任何军方档案以掩盖一种不利的事实。我们现在知道——尤其是通过居伊·佩德龙西尼的著作,我们了解到叛乱是由于尼韦尔的血腥的徒劳进攻所导致的:与其说是由于军需供应越来越差,战士们累得拒绝了那些无益而血腥的战斗,不如说是极左派的一种革命冲动或是极右派的一种破坏性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传闻随叛乱的延伸而传播开来,并且被夸大其词,尤其是有关镇压方面的。事情过去约10年,还有很多人相信有10人中抽杀1人现象的存在:用忠诚的军队把革命者包围起来,从数行中抽出十分之一的人在众人面前枪毙。然而并不存在这种10人中抽杀1人的现象,如果我们非要这样说的话也只是10名左右的反叛者在简单的审判之后被处决。另一方面,有一定数量的假定的“煽动者”,约有1000人,被送往惩戒团,那里的死亡率比别处高得多。这种镇压确实存在,但与传闻所述是不成比例的。事实上,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措施后反叛也就平息了。尼韦尔的追随者贝当看来是考虑得十分周全的。他宣布在等待“美国人和大炮”时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并且很露骨地完成了一些活动,以显示他比其他重要领导人更具辨别“勇士”心理的能力。

传闻的异常成功,源于相信它们真实性的人们在没有迹象向他们证明的情况下,发现了邪恶的明显性和那些掩饰了无耻阴谋

的恶人们的特殊效力,而不是发现了一种对谨慎的鼓励。

我们还需要另一个例子吗?提前举出一个二战时期的例证,它展示了事实与传闻之间持续的一场近于疯狂的辩论。在1940年法国溃败后德国欲入侵英国之时,有传闻说英国人正在设置一种非常复杂的系统以便在海上扩散石油,这些石油会烧毁跨过火线到达英国领土的敌船。德国人对这一荒谬的传言并未产生怀疑。他们由此决定在锚地训练士兵以抵御火焰的风暴。“德军已至”这一真正的消息传播开来,所有人都坚信德国人确实试图进攻英国,英国使用了火幕系统,进攻者由此失败,希特勒的最高司令部隐瞒了很多士兵失踪的事实。

还应考虑传闻与报界的关系。在审查时期这两者往来不断。因为报纸本身很乐于传播这种传闻,尤其是涉及“桃色”新闻的时候,审查制度也很乐于让这些谣传通过审查。

一个很著名的例证是引自莫里斯·梅格雷的“安特卫普钟”事件。1940年德国人占领比利时。《科隆日报》(在被收买前!)上写道:“当安特卫普的失败为众人所知时,德国教堂的钟非常满意地敲打出欢快的声音。”《晨报》以一种学者的语言复述了《科隆日报》的信息:“根据《科隆日报》的报道,安特卫普的教士在堡垒被攻克后被迫敲钟。”第一次转变!伦敦《泰晤士报》看过巴黎《晨报》后写道:“根据《晨报》从科隆得到的信息,拒绝敲钟的比利时教士被革职。”恐怖增强了!我们来看意大利。《晚邮报》引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话(引用的次数越多,消息就越像真的),并补充道:“可怜的教士们将被判处苦役。”在链条的最后一节,《晨报》又引用《晚邮报》的话:“根据《晚邮报》从伦敦及科隆获得的消息,安特卫普的野蛮征服者们判处英勇的拒绝敲钟的教士们倒挂在钟上,就像他们处罚战士一样。”

总之在此期间,报纸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对于所有参战国的知识界的威望来说,所付代价是更为惨重的。我们看到在某些时期审查制度起到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代价多么昂贵!1918年后,在法国和德国这样思想放荡日益明显、夸大式宣传日趋无耻的国家,报界再也没有赢回它1914年那种威信。它挥霍了一笔信任的财富,而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是在这种衰落的情况下它将面临一个竞争力量的出现,即将反抗它的垄断的广播。

第七章摇无线电广播的产生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以无线电广播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的。在这之前文字信息完全居于统治地位,而今,无线电广播这一新的竞争对手在 1914 年之间改变了这种局面。

技术上的奇迹

我们来回顾一些技术资料,看看作为无线电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再引入语音的无线电广播是如何成为与一批不确定的听众交流的一种方式。

第一阶段是本义上的无线电报,它使无线电广播有了一个惯用名称 莫兹云^①。我们应该向爱尔兰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致敬,此人于 1861 年对照光波理论建立了电磁波的整体理论。1887 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赫兹发现并成功地证明了这种波的存在,后来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种波。1894 年,法国人爱德华

① 莫兹云,即莫兹云,莫兹云的简称。——译注

· 布朗利调整出第一台金属屑检波器,即一个装满铁屑的管子连入由检流器和一节电池组成的电路中。直到 1895 年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电台才创立,同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在波兰完成了最初的关于远距离通讯的有说服力的实验,利用莫尔斯密码,通过后来所谓的赫兹波可以传播 1 千米,而后达 100 千米。1895 年年末法国人欧仁·迪克勒泰连接了相距 100 千米的埃菲尔铁塔和先贤祠。1896 年,马可尼成功地实现了芒什海峡上的通讯,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马可尼先生通过无线电报穿越芒什海峡向布朗利先生致敬,这项令人满意的工作的成果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布朗利先生的卓越工作。”同样是马可尼于 1896 年建立了大西洋两岸最初的电磁波联系:他从波特休向康沃尔放出了一只巨大的风筝,在海面上空 100 米处为他充当天线,使该电波能够到达新大陆。在《蓝莲花》的第一页中,丁丁在印度王公、大邦主拉瓦吉普塔拉赫处安顿下来后,在一些干扰中收到了远处的莫尔斯密码信息,这一信息把他引向了非同寻常的奇遇中。1897 年后,他又重新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第二阶段是赫兹波能够传送人声。美国人李·德·福雷斯特发明了三极管,即一种能在入口管处复制人声的扩音器,他把它应用于电话中。他很奇怪地发现,那些描绘这项技术未来的人(不断提前的未来历史是一片富含惊奇的沃土)预言 1900 年将主要应用于电话领域。黄金时代的画面中展示了出色的资本家把电话放在耳朵旁,正在聆听远处卡鲁索演唱的威尔第所作的歌曲。主要的构思是人们进行点与点之间的交流。电话从总体上来说抑制了想像力。

第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语音通讯是在 1896 年在埃菲尔铁塔到维勒瑞夫间实现的。在美国,同样是李·德·福雷斯特把卡鲁索

的歌声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传送到 1000 千米以外。军人是最初注意到这项发明的益处的,尤其是在与海上船只联系方面。埃菲尔铁塔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1889 年左右,即这座铁塔用于 1889 年展出的 10 年后,它已被视为废铁,而如今它被拯救了,因为它是所有可能充当天线的物品中最合适的一个。这种作用是它的建造者根本没有预想到的:它成为了最宝贵的军方发射台。

在大战期间,有很多技术进步在形势的刺激下也得以实现,尤其是海上,无线电完全占据了它的空间。殖民帝国离宗主国更近了。

直到第三阶段,即 1900 年代初期,广播节目才传向各种各样无从辨明的接收器。奇怪的是这一演变从一种凝练的时间方式上看,使人回想起报刊的发展。我们想起报刊发展之初,信息是在点与点之间流通,政府和商人都力图保留对邮件使用的垄断,而第二时期只有少数大胆的革新者想到使上述信息在更大的读者群体间传播。这在传播史上也是同样的。

1895 年始,一位年轻的法国工程师建议一家比利时电台向陌生的接收者发送信息。此人拥有一个注定命运非凡的名字——雷蒙·布拉亚尔,他效力于 1894 年创办的法国无线电报公司。但真正的开端是在今后的战争中。为了使向陌生接收者发送信息成为可能,政府必须至少部分地放弃战争期间基本上属于军方的这种工具。那时形成了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群体,他们热衷于这种新的交流方式,修弄着他们的方铅矿石收录机,创造出了最初的适宜于广播发展的环境。在无线电的演变过程中,从总体上来说形式的发展总是先于内容的:人们先是摆弄着这些“通讯管”,然后才知道利用它来传播什么。仅在第二次进展中,收音机的制造商才力图发展广播电台以促进他们的产品销售。

为了追溯两次大战期间广播发展的历史,应首先说明公众和个人依据哪种变化不定的平衡状态来讨论这种新生的传媒方式;而后考虑政府,或者更广泛地说,政治界,他们对这种充满诱惑力又使他们恐惧的交流方式的到来是做何反应。他们希望从他们的利益角度控制它,又因它能让他们感到恐惧而希望把它隔离在狭小范围内,最终应该明白书面出版物是如何将就这个新对手,而广播的新生力量又是如何在对抗与妥协中勉勉强强显示出来的。

两种发展模式

起初,由于国家垄断着无线电广播,国有广播在很长时期内都领先于私人广播产业。但是这种垄断能维持下去吗?两个典型范例很快就凸现出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信条被确定下来的美国,在自上而下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又受到了束缚。与之相对的英国、德国,尤其是意大利确立了一种依然由国家影响力来控制的制度。在这两者之间,法国别出心裁、有创造性地(也有人说是没有把握、犹豫不决地)在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

美国是先驱。从1922年起,广播电台就定时为不确定的听众广播节目。1924年存在国家广播电台,1925年德国,1926年英国,1927年法国。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美国人定时收听,美国无线电广播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甚至是伍迪·艾伦那部主要涉及战后时期的电影《岁月流声》^①,也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期无线电广播

^① 一译《无线电时代》。——译注

的重要地位。)

1915年,美国有 1 万台收音机,1925年 10 万台,1935年 100 万台,1945年 1000 万台,1955年 10000 万台,1965年 100000 万台,1975年 1000000 万台。这种飞跃发展之初受益于一种普遍的放任自流。直到 1935年,国家都没有任何干预。没有许可的必要,也没有向发射台征税,大有一种边远西部的气氛。但不久人们便接受了这一明显事实:电波是一种珍贵的物质,因此不能让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情况下独占它。1935年 12 月 1 日的《广播法案》决定,从此以后建立发射站许可证必不可少,这一法案同时创立了联邦广播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总统提名的五位成员组成,负责仲裁广播活动,监控发射台的功率,分发许可证以控制从中可能产生的新的商业道德观念。

这一最初的选择具体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显示出来的是过多的广告分量,这把广播节目引向了一种平庸的公众欣赏力层次。在美国,不是广告与预定的节目联系在一起,而是这些节目从一开始就被设想成为是为广告服务的。1935年,由很多家庭联盟发起的一项关于无线电传播中“广告”过度的调查不了了之了。广告界已经取得了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如果严正地攻击它就会惹出麻烦了。而不久后,在美国电视发展史上这一点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起初缺乏管理,广播连锁站得以飞速发展。这些连锁站向分散在各地的广播电台转播它们自己的节目,在德国和美国,这一系统被称之为“窗口”。1940年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拥有上百个广播电台,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约有 100 个。

无线电广播在听众之中赢得的影响力验证了慕尼黑危机一个月后著名的奥逊·威尔斯“星球大战”事件。美国觉得相对于

我们这些古老的民族来说,其自身对欧洲事务的牵涉很少,然而它却在稳定的国际关系形势下在公众中制造一种不安的情绪。1938年10月1日,年仅16岁的奥逊·威尔斯在媒介史上引起了轰动——这先于他在电影史中树立的更辉煌的威望。他是一位著名的戏剧演员,为了提高月收入,他每周在“悦乐”播出一部广播“戏剧”,这个节目有400多万忠实听众。有一天,他接受(是低声抱怨着接受,因为这主意在他看来不怎么样)改编一部不久前一位几乎与他同名的作家出版的一部小说。赫·乔·威尔斯,是一位英国作家,著有《时间机器》及一些幻想故事。这次是一本名为《星球大战》的书,书中设想火星人的到来。因为奥逊·威尔斯不太喜欢这部作品,他力图使之看起来更像一次真正的广播节目,中间插播一段耸人听闻的火星人的到来。他以为所有人都会明白这是虚构的。但一切都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威尔斯邀请了一位冒充是内务部部长的人,恳请大家不要慌乱,与此同时他“承认”此后最有效的办法是向上帝祈祷。这种情况下,恐慌散播开来。成群结队的车离开了纽约。紧接着一连串的诉讼指控“悦乐”很多在逃亡中丢掉鞋子的女士都成功地得到了赔偿。奥逊·威尔斯的《星球大战》使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广播的力量。如果说威尔斯是狂怒的,那么威尔斯则是狂喜。他一夜成名,而且不久后,“冈贝尔汤”品牌提出付给他钱以用他的名字来为产品命名。

第二个范例来自德国和英国。和美国相反,国家在战争期间控制了无线电广播,并决定不放弃对它的控制。由此导致短期内发展上有一定程度的滞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特性。

德国,第一批公共传播许可证在1933年才发放,并只保证了

一小部分公司的利益。魏玛共和国在短时间的犹豫之后，魏玛共和国集中了帝国广播公司(德意志)内不存在的各家地方公司，不久后组建了德国电波电台(“德意志电波”)，负责全国的教育广播节目(不久后变成了负责对外广播节目)。邮政部部长负责开发技术和监督管理。德国确立了第一条对接收台按月征税的原则。其中一部分税收由邮政部门保留以确保这一网络得以运行。很快，广告便被禁止了——这一方面他们的逻辑与美国刚好相反。广播节目的质量很不错，尤其是有极好的音乐转播，几乎不去迎合大众口味。魏玛共和国共有 100 万台收音机(即每 100 位居民有 1 台)，魏玛共和国有 100 万台，这个数目使得德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政府对广播的操纵为希特勒的宣传准备了工具。

在意大利，组织情况非常相似。在 1924 年创立的第一家广播电台混合公司(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中，国家还是多数派。1924 年米兰广播电台诞生。1925 年罗马广播电台诞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墨索里尼政府控制了局面。享受了 1925 年所有广播节目播放的特许权，并模仿德国建立了对接收台的定期收费制度。广告是允许的，但有所限制，不过并没有受到监视。墨索里尼政府控制着局面。

英国在这方面比较独特，政府与广播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距离。几经探索后，国家结束了私人创立的电台最初的混乱状态。1926 年 1 月开始，邮政部部长内维尔·张伯伦强迫它们合并起来，这样便组成了英国广播公司。它的资金有 1/3 多属于 10 家大的无线电器材制品公司，其余部分分属于 100 多个小生产商。起初，国家凭借一种密切的控制同意授权一些私有部门经营无线电广播，当然这些私有部门是集中在国家的创制权之下

的。但很快它又开始担心这一新生力量。赛克斯委员会(英国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历史是由一系列享有盛名的委员会凸现出来的)提出,无线电应该更紧密依赖于国家。他们向美国派观察员,英国人的严谨使他们担心平庸的节目中过多的广告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此外,此委员会在引入美国正在完善的听众措施制度时表现得很保守——正如赛克斯委员会在1925年报告中非常真诚地提道:“要给公众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必须的东西……”另一份报告,克劳福德委员会的报告于1926年11月1日取得一项成果,即用1926年的时间建立由皇家宪章承认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此代替英国广播公司(BBC),并保留相同的起首字母。国家买下了它的产业,为了使之成为一项政治上的成功;同在德国一样,英国也确立了公用事业收费以及禁止广告的原则。但是最大的差异是,英国的自由传统使之创立了一种制度,无线电得以很好地逃脱了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没有的。由立法委提名的一个“总裁”委员会确立了,无线电的总负责人直接隶属其下——这种职能是由1904岁的工程师约翰·里斯创立的,此人以他强烈的个性突出了这一职能(他还在战争期间成为丘吉尔的情报部部长)。1929年英国自愿拥有收音机在收听其国家广播电台,这使英国以绝对数字仅居于美国和德国之后排在第三位,并在人口百分比方面排在丹麦之后位居第二,其比例为1929居民中有1929位收听者。

在法国: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

至于法国,它在上述两种范例路线中间显示出了它的独创

性。这两个范例即绝对自由主义与国家的密切控制——这种控制在英国以一种我们刚刚提到的方式被减轻了。在 19 世纪年代,当人们考察法国广播史的时候,还是觉得应该将其分为明显对立的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两个部门同时发展,另一个时期是由国家的垄断来定义的,这一时期勉强地由于邻国电台的存在而得以喘息,而这些电台也是受到严密监视的。但是自从 1894 年 1 月 1 日法令颁布以后,1894—1904 年这段时期就更像是这两段充满着公共广播和私人广播间竞争的时期中的一个特例。

和其他地方一样,法国广播起初也是军用的。最早的发射台之一是埃菲尔铁塔发射台,它隶属于军队,这个发射台从 1894 年 1 月起开始转播莫里斯·普里瓦委托的节目。此人是右派和中间派国家联盟多数党的追随者,这一政党是“天蓝议会”的执政党。但是这家电台很快就衰落了;它实际上自 1895 年始就被取缔了,仅限于传播一些教学方面的广播节目。至于 1895 年 1 月 1 日创办的广播电台,它是法国无线电广播公司的产物,它的创立是为了刺激接收机的销售,不久又成为巴黎广播电台,于 1895 年被国家收购,这是少数跨越了区分公共和私人电台的栅栏的电台之一。最后一例是 1895 年 1 月 1 日创办的高等邮电电讯电台学校,后成为邮电电讯广播电台,1895 年 1 月 1 日它又创建了法兰西广播新闻电台;与它的那些用长波的对手不同,它是用中波传送节目的(它的发射站起初是由美国西方电子公司提供的,在当时的美国,人们只应用中波)。

最初,整个立法都是模棱两可的。1895 年 1 月 1 日雷蒙·普恩加勒政府颁布的财政法规把垄断由电报业延伸到了广播,但相反的,1895 年 1 月 1 日的一项法令又“为促进电子产业发展”而允许私人广播的存在。1895 年 1 月 1 日,从理论上比右派更为对国家垄断有利的左翼联盟执政,他们比右派更不信任资本家的利

益(左右两派的对立已经持续,但很快又因其他因素而缓和了),而他们在实践中却允许创办私人电台。1909年巴黎广播站就是这样创立的,而其他一些电台也利用这一合法的渠道在许多外省城市创立——里昂、阿让、费康、图卢兹、波尔多、蒙彼里埃,这其中有各种制造商广播站作为补充:维图斯广播电台和莱维广播电台(名字取自制造商吕西安·莱维)。邮电电讯电台也在外省设立了无线电中继站。

在这种情况下,1910年将至之时,局面是相当混乱的。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冲突不断,尤其是在频率分配方面,并且在国有部门内部,喜欢国有电台广播的听众们(有时候为了收听某个国有电台的节目而离开餐桌……)与邮政部门的官员们之间的紧张状态也日趋严重。

1910年10月,左翼联盟倒台、普恩加莱重新执政后,一项有法律效应的政府命令试图对这种局面稍加整顿。人们创立了一个无线电广播部,由一个将把自身印迹写入历史的人——马塞尔·佩朗工程师来领导。他一面重申着垄断,却又决定将其推迟,并维持着“不确定的”私人电台。这种状态几乎确定下来了。当时存在几家私人电台(其中源家在巴黎,怨家在外省)及源家国家电台。

这两种部门一旦确定,它们之间那道曾被预见的鸿沟也随即产生了,接下来的时期便是以巴黎广播电台被收购为标志,这一电台后来成为国家电台。1911年公用事业收费制度确立,这比英国和德国晚了10年。然而广告逐渐在国家电台中消失了。这是“私人电台私人花钱,公共电台公家花钱”这一原则的应用。

① 英语:无人之境。——译注

乔治·芒代尔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人是维克多政府中克列孟梭的办公室主任,而1935年11月他在弗朗丹内阁中任邮政部长直至1936年12月人民阵线政权上台。芒代尔为人果断而专横,他使形势明朗化并使两部门的对立理论化;他进一步肯定在国家电台中取消广告,这一点他的前任让·米斯特莱已经提及。芒代尔使得公用事业定期收费如期的“收回”,创立了广播最高委员会,为节目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的光彩。他受到作为法兰西喜剧院成员的妻子的影响,支持她的决议,每周广播一部古典戏剧。

发射台及广播节目质量的明显改善促使接收机数目增加,并部分弥补了在这一领域较邻国落后的方面,这些也应归功于乔治·芒代尔部长。1935年,收音机的数目为140万台,1936年12月100万台,1937年120万台。但直到1937年11月,一种允许私人电台存在的体系才被采用。

政治的影响

从一国到另一国,另一个区分的准则是政府在这种新媒介所体现的政治力量面前的运作方式。这时,同几世纪前的书面出版物及后来的电视的比较又是必不可少。

很自然地,注意力从一开始就投向政治人物关心的消息方面,这些政治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听别的东西。比如关于利害关系方面的消息,比如关于挑战的消息;很快就出现了一种迷惑与仇恨交加的感情,这种感情将长期影响这一领域的国会议员及部长们的举止行为。

勒内·维维亚尼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说既流畅又生

动完全代表了第三帝国这一个广阔时期的雄辩术。然而,他却承认被麦克风吓着了。“那个像瞎了的眼睛的东西,”他说,“让我觉得像一种刑具!”我们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稻草与谷粒》一书中可以发现,1939年他最初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也有完全相同的感觉,而后他便适应下来了……

面对行政力量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做到了很好的自我保护,并由此显示了它的尊严。从1926年10月10日到10月15日的大罢工便是一个根本性事件:所有英国传媒界的罢工,引起了信息的绝对空白。财政大臣与温斯顿·丘吉尔一样,想要利用广播来反对罢工者,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自身的罢工者。英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里斯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激烈的对抗,长远的影响啊!然而里斯占了上风,鲍德温首相支持他反对丘吉尔。这个国家非常自由,以至于1925年普选时广播方面的斗争也组织得非常公平。

英国广播公司的信息总体上来说被认为是公正的,而这样的代价是:这些信息即便不算是令人生厌,也是过于没有生气了。1926年,国会更新了十年来的宪章并否决了政府提出的一项提议,即让一位更为圆滑的部长负责监督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内容。尽管代表着集权制度升级的挑战依然存在,但是1920年代所确立的制度仍运行得很好。

在美国,广播的政治作用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体现了出来。在两个竞争者罗斯福和胡佛中,前者的声音更具“放射性”。罗斯福竞选成功后发明了“围炉叙话”这一形式,以一种亲切的语气和公众讲话,即如后来戴高乐所说“超越中间人之外”,他由此赢得了民心,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

在法国,第一例明确的审查(在勒内·迪瓦尔的一本书中有所提及)始于1938年10月15日。在里昂广播电台,即后来的巴黎广

播电台宣布了莱奥·波尔代斯的“广播新闻”的诞生,但在最后一刻被国家邮政部副部长禁止了,他不信任这项革新,不确定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最好是什么也不许说!继续存在的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推动者莫里斯·普里瓦 1904 年重申了这项禁令。左翼联盟统治时期情况更糟,在爱德华·赫里欧政府负责邮政部门的皮埃尔·罗伯特甚至要求巴黎广播电台把所有要广播的文章提前 1 小时交给他!接着,渐渐有些最富想像力的政界人物开始认识到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是愚蠢的,这样会转回头来对他们不利,他们开始感到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工具而不是取缔它。

正是这样,联盟的财政部部长艾蒂安·克莱芒代尔在高等邮电电讯电台(学校)上夸耀他在 1904 年底借用的词语:第一次!

然而,习惯是慢慢养成的。1905 年 1 月,退伍军人部部长路易·马兰来到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广播新闻节目中捍卫他的政策,这种情形让人感到意外。在勒内·杜瓦尔引用的一份广播听众报《天线》中,提及了人们看见一位部长在话筒前讲话表现出的极度震惊。“没有随行队伍,没有炫耀,路易·马兰先生穿着一件大众化的西服上装,头戴软帽进入大皇宫录音室,他的漫谈对于所有那些他承担保护的人,即残废军人和领取战争抚恤金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呼吁。”第二天,同一份报纸观察到路易·马兰先生在讲坛上的演说技巧更优于他在话筒前的表现……

1905 年立法选举期间,卸任的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塔尔迪厄毫无廉耻地决定使广播专为他一人服务。这引起了左派政党的强烈反对,尤其是莱昂·布鲁姆,他写道:“无线电传声这一无与伦比的传播方式被反动势力厚颜无耻地独占了!”这又是一场将持续很久的对抗。“塔尔迪厄先生”,布鲁姆在 1905 年 1 月 15 日的《人民报》中写道,“以一种闻所未闻的专横方式确立了对广播

和电影的垄断,这种方式在除法国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引起一种不能忍受的丑闻。例如,在比利时,广播站逐渐由各政党分别使用相同的一段时间,并定期地交替。在法国,部长一人控制国家广播电台,而在蒲里乙(拉丁区一家跳舞场的名字,从舞场中出来的委员会主席曾在那里公布他的竞选计划)的演说则由警方强加给了私人电台。没有属于我们的广播电台,我们被禁止使用‘无线电’。在法国,无线电属于政府和反动派。”

1939年10月远日的前两天,在沿街游行的威胁面前,内务部长欧仁·弗罗非常镇静地建立了一种审查制度——在和平时期!——审查巴黎广播电台中“法国广播新闻”的记者和埃菲尔铁塔电台中“广播新闻”的记者,因此新闻都变得分外温和了……

乔治·芒代尔时期虽然对左派怀有恐惧,但依然执行相对自由主义(在他锐利的表象之下,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主主义者)。这一时期过后,人民阵线时期到来了。罗贝尔·雅尔迪耶,虽担任邮政部部长之职却不是部长的最佳人选,而在他的理论上的权威下,我们注意到一种使社会主义者控制电台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有些笨拙。马索,他们的左翼领导人,负责控制国家邮政部。人民阵线不顾领导者们事先正当的反对,依然不努力去建立独立和平衡的信息准则,他们错过了一次机会。

在爱德华·达拉第政府时期,从1938年春天起,立法手段便开始加强。外部威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8年10月,在慕尼黑事件的影响下,邮政部部长于勒·朱利安重新对广播新闻加强控制,其中包括对私人电台的控制,并在各处建立了审查制度。1939年10月,法国广播新闻的专栏作者,后来抵抗运动的英雄皮埃尔·布鲁索莱特,因其过于明显的左派倾向而受到了排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无论如何,与集权制下无线电传播的粗

暴使用相比较,这些排斥异己、斤斤计较的平庸诡计都不值得一提了。

确实,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不同语言广播的地方节目依然受到中央集权的严密控制。确实,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经常利用电台广播,并设立了每周三次的一个法西斯专栏,还完整地重播他没完没了的演讲。法西斯政权总体上来说对与电影有关的事情非常敏感,它知道利用电影建立一个顺应人心的、安定的意大利的形象,其中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被根除,这样,总体上来说,就不必利用它直接去赞扬法西斯政治。对于广播却相反,墨索里尼对此是更为野蛮的,他不停地利用广播吹捧他的制度的优点。

最后是在德国,纳粹分子自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夺权之日前,就逐渐通过听众联盟的渠道使广播转向了。接着,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亲自控制了广播,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他的举动。

书面出版物的反击

对于最初的这一时期,最终还应考虑到广播与书面出版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报刊业在它的衰弱时期遭遇了这一新竞争对手的重击。虽然报刊业表面上看来仍光彩夺目,但它的总体形势却不如往昔那样辉煌了。两次大战期间的报刊史是1914年前报刊史的延续,但有消极的变化。当然,我们注意到,随着胶版印刷和照相凹版术的发展而产生了多种技术进步。照相凹版术的发展使得彩色照片的飞速发展成为可能,这有利于大众杂志的发展。但是,大体上物价的提高总是超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也是直到今天报业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法国。与其他

日常消费品相比,日报的价格上涨了。技术的进步加大了投资力度,也增加了印刷工人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他们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可以阻止一个行业的运转。这一行业由于公众参与的不稳定性和它自身的多变性而对任何罢工的威胁都十分敏感。

由香水制造商弗朗索瓦·科蒂领导的一场运动的历史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场运动旨在反对当时一些重要的通俗报纸。这些报纸包括与《巴黎回声报》组成联盟的《晨报》《新闻报》《小日报》,这些报纸在19世纪90年代卖到每期10生丁。科蒂创办的10生丁的《人民之友》在货价上处于不利地位。他设置了自己的发行系统,开始时占了上风,但最终却失败了。

正是这样,除了在美国和英国的一定范围内,1890—1895年间所显示出的读者数量的扩大中止了。然而由于1893年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一种快速集中的结果,报纸的开价却已经下降了。总之自由的空间缩小了,即便在那些依然保持民主政体的国家。

这些只能导致地方主义和国家自我中心主义更为突出。这段时间世界历史风云变化、动荡不安,而相关国家的舆论似乎反常地很少转向国外。它们更倾向于自我反省。正是这样,我们前文中提到,前一段时期在交换信息和服务方面达成一致的哈瓦斯、沃尔夫、美联社等报刊通讯社,在1893年才勉强地延长了它们与那些未经受住经济危机打击的通讯社的合约。此外,其他的通讯社也开始与最初这些展开竞争,例如在美联社便受到合众社的威胁。后者成立于1890年,1895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很多国家,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新闻质量严密性的降级。在公众中“夸大式宣传”的破坏作用,战后,尤其是在法国,又完全地卷土重来了。我们同样发现论战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敲诈性的报纸有所扩展,而私人生活的秘密越来越难以得到很好

的保护。这方面我们所提到过的罗歇·萨朗格罗的自杀事件引起了群情关注。在报业竞争激烈的英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制造轰动事件的程度,这使得它接近了美国的报业,我们曾注意到长期以来美国报业的诽谤性和污蔑性达到了何种程度。罗贝尔·德·茹弗内尔在他1959年一本著名的《同志共和国》中提道:“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比记者更具诋毁能力,更能拍马奉承。”这句话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历来是很合理的。

这样看来,这一领域感到(或是自认为)被广播所威胁,状态不佳。它的反抗因此是施展不开而且是被重重围困的。

在美国,1937年美国编辑记者协会(1937年)的一份报告全力揭露出了广播电台为广播新闻而展开的竞争——这是在1936年10月,1937年1月及1938年1月就新闻简报数量与信息广告交流等内容达成妥协之前。在英国,1930年第一批广播新闻出现之后,书面出版物获准,信息不能在1930年之前被电台广播,意即在日报销售之后方可广播,因为书面出版物是领导人周围有效的压力集团。

法国的情况是相同的。1930年代巴黎报业工会与私人电台联合会相对峙,1930年之前所有的新闻播报都被禁止了。书面出版物赢得了公众力量,直到战争前夕,私人电台的广告还是有限的,而广告税却从1930年增长到1935年。1935年春天,达拉第^①同意将国家电台的新闻播报减到对同一份七分钟的新闻简讯三次重播。当然,慕尼黑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对即时新闻的渴望不久便打开了闸门,但政府曾向这样的请求做过一瞬的让步。这一事实便足以说

^① 达拉第,法国激进党的领袖,三度出任总理,执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代表法国签订《慕尼黑协议》。——译注

明问题。这使我们想起 19 世纪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的著名寓言：他设想蜡烛商人们向国家请求得到保护，抵制“日光的竞争”，因此所有百姓都被迫关上百叶窗，阻止一切外部光线的进入。人们处于完全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诞中，这恰当地揭示出了书面出版物的不安局面。

有时，另一种更为大胆更为积极的反抗使报刊得以参与到电台中来。美国是很突出的例子，报业集团与广播站达成很多项协议。在法国也是一样，自 19 世纪年代开始，同样的现象出现在私有部门。《小巴黎人》控制了巴黎电台，《不妥协者》与马塞尔·布勒斯坦原布朗谢的城市广播电台有着紧密联系，《新闻报》与维图斯广播电台关系密切等等。

在报刊为抵抗所做的努力中，它是脚踩两只船的：既显示出差异性又展开竞争。

考虑到广播新闻的即时性以及它给人们思想中留下的混乱感觉，重要的是首先应突出思想性报刊的作用。而几十年来对领导圈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月刊和双月刊（《两个世界杂志》或是《巴黎杂志》）正处于衰落时期，在这几年间周刊取得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种地位。在美国，19 世纪年创刊的《时代周刊》不久便有两个效仿它的竞争者：《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二战后，《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

在法国，政治周刊也开始产生影响。它们在外表上与当今的周刊不同，在纸张规格、设计、排版等方面更接近于日报。这样，在右派方面，《老实人》，在 19 世纪原年刚刚问世时销量为 1 万份，19 世纪年 1.5 万份，19 世纪年攀升至 2 万份；此外还有奥拉斯·德·卡尔布恰的《格兰瓜尔》，19 世纪年创刊时销量为 1.5 万份，19 世纪年达 2 万份；为了不只列出 19 世纪年代期间 1 个有助于鼓励公

众舆论及促进同盟升级的报纸的名称,我们还应列举出《我无处不在》,它最终在德国占领时期疯狂地附和敌人。在左派,虽然竞争者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它们依然没能在这一时期形成同样的影响(《星期五》、《玛利亚纳》只在1934年分别达到了16万份和18万份的发行量)或者是因为它们有着稍重的说教意味,或者是同一方面的读者群体依然更为忠实于日报。一份周刊,虽然发行量很小,但影响力很大:乔治·鲍里斯的《光明》,左派仅有的机关刊物之一,致力于以一种从技术角度讲比较明确的方式来探讨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渐渐赢得了一定的读者。这一时期也是《鸭鸣报》的第一个飞速发展时期。

在利用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技术进步的色彩杂志中,法国的先驱之一是《看》。它的名字展示出在这本刊物里首先安排的是照片,正如在美国1926年大企业家亨利·卢斯创办的《生活》杂志,这份杂志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就在战争前夕,由让·普鲁沃斯特于1938年重振的一份勉强维持着的刊物:《竞赛画报》,不久便开始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这种期刊专业化发展的运动在其他地方也崭露头角:我们可以看到专业化报刊的发展:妇女报刊(美容报、编织报、时尚报),实用信息杂志,体育报刊……

为了回应广播的挑战,报刊这样显示出了它的差异性,而它更为积极的一面是与此同时并没有放弃竞争。它试图回击广播中及时播报的新闻,向它提出的快捷性和情感因素的双重挑战。当广播推出最初的直播报道后,日报也致力于加快自身的节奏。有时这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新闻报》的一期非常著名,林白^①飞行

^① 美国飞行员,于1931年单人成功地从纽约飞抵巴黎,成为航空史上的盛事。——译注

前不久,《新闻报》在 1914 年 1 月 1 日用头版五栏报道了飞行员南热塞和科利力图从反方向架飞机横跨太平洋抵达纽约,他们在纽约受到了热情的人群的欢迎。唉!这一由“挤兑”同行的愿望出发而做出的乐观预测不久便遭到了残酷的事实的重创:不久,人们获悉南热塞和科利的飞机在大西洋某处失事坠入了海中。《新闻报》由此信誉扫地,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追踪这种“独家新闻”了。

在法国方面,应该特殊强调一下普鲁沃斯特的《巴黎晚报》,这是这段时期唯一真正的变革。让·普鲁沃斯特是一位纺织工业家,出身于北方一个大家族,他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作为报业老板的才能。他使于 1874 年买进的《巴黎晚报》的销量由 10 万份攀升至战争前夕的 100 多万份。页面“拼图”式的布局与那些甚至最著名的报纸依然惯于使用的栏目形式截然不同。而为了回应广播的挑战,让·普鲁沃斯特投身于长篇报道飞速发展的前列,这种报道是那个年代的闪光点。

外派记者的传奇

重要的是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在读者面前重现那些震撼世界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当然,我们在战前就看到过“特派记者”这一形象的出现。例如法国著名的有朱尔·于雷,或是鲁莱塔比尔的父亲加斯东·勒鲁。但 1914—1918 年间的战争加速了这场运动,并肯定了“外派记者”这一享有盛誉的社会角色,阿尔贝·隆德尔已然是其象征性人物(关于他的记忆由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奖而被延续下来)。与爱德华·埃尔塞或是约瑟夫·克塞尔相比较而言,阿尔贝·隆德尔是非常典型的。1914 年前,他是《晨报》的国会生活专家,是战争使他崭露头角。他关于德国人轰

炸雷米教堂的报道使他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出色：他感情朴实，描写到位，语言精确，表达生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完整地保存着它的力度。渐渐地，他甚至在军人中间也树立了威望。他在阿韦斯遇见这样一位将军，不无幽默地注视着他说：“先生，我知道，干你们这行的人总是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报纸。”

阿尔贝·隆德尔是那些永远待不住的“环球旅行者”的代表，他们总是准备着提着纸制手提箱出发，世界上哪个国家有新闻召唤他们，他们便奔向哪里。人们跟在他微颤的山羊胡子后面追随他，在东方有达达尼尔海峡探险，有菲尤米的达努齐渥，有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在苏维埃俄国，在日本，在中国，在印度支那，在印度……皮埃尔·阿苏利纳在他所著的隆德尔的传记中引用了另一个外派记者亨利·贝罗的一段描述，此人最终堕落到通敌叛国的地步，1915年勉强逃过枪决，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就是这一领域的一颗明星。贝罗描述道：“驻外报道可能是最难被理解的职业之一……人们只是在任意选择刊登稿件，并不看资历。做报道这一行便意味着要看到社会的反面，混入人群之中，看穿要人的动机，触动贫贱者的伤处，观察世间悲喜剧的内幕，在水晶城市中散步，看见商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工人们在他们所处的城郊，教士们在他们的神父住宅，政治家们在他们的走廊里，杀人犯们在断头台上，外交家们为虚无的晕眩所苦，要人们在荣誉前感到悲惨。”这篇文章有点夸张，但它阐述了两次大战间的记者们在人世旅程中所付出的根本的努力。

他们有时会做出让步，随着年事渐长，某种奇妙的疲乏使他们的目光变得迟钝，而阿尔贝·隆德尔依然无法抗拒两种诱惑。一种是介入到他所观察的局势中以对其产生影响，1914年希腊国

王康斯坦丁与维尼泽洛斯战争期间他要求参军。另一种是自以为消息灵通,足以胜任出于爱国目的的情报任务。在他晚年,这个“受雇闲逛”的人变成了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这一时期阿尔贝·隆德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宴的苦役犯的报道,促进了共和国这种功能残忍可耻的制度的瓦解。接着他致力于报道疯人院,拐卖妇女,贩卖黑人,最后他到中国进行了一次不明不白的旅行,一个月间杳无音信。回国后,1914年他在乔治·菲力帕尔动乱中死于阿登的外海,境遇相当悲惨,这给他传奇永恒命运的浪漫色彩中增添了必不可少的最后的神秘光晕。

广告的模糊性

上述是广播对报刊的几个有利影响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报业的一些不良习惯传染给了广播,尤其是隐秘的广告。法国最著名的是1913年的一个事例,这其中我们又发现了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主编莫里斯·普里瓦,此人诡计多端,善于幕后操作,长于处世,雷厉风行。要禁止他推出广播新闻吗?他以另一个标题继续广播。要禁止他播送那些在负责这一部门的正直的官员马塞尔·佩朗眼中是“最伤风败俗的交易”的广告吗?好吧,他同样在编写形式的掩盖下以小段引入广告,这一点直追报刊界最恶劣的行径。他最终于1914年把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广告租给了一个商人,此人对他讲,希望利用广告促进他众多企业的发展:例如廉价饭店“小酒壶”,听众们很惊异于听到吹捧这个饭店的内容。这个名为亚历山大·斯塔文斯基的人不久便出了名。合约是保密的(正如文件本身规定的那样)。继“小酒壶”之后,电台又吹捧了很多处于低谷的企业,马塞新地产公司,甚至

还有一家名为“朱朗松”的甜烧酒工厂。而交易所专栏里充斥着由不明的股份出资广播的不可靠的内部信息。正是这样,邦卡雷尔公司,一家不可靠的电影出租公司受到了大肆的吹捧,以使它的股份在悲惨地暴跌之前得以在市场上继续维持。斯塔维斯基在1934年第一次被捕时,警方向政府指出了他的下流行径,普里瓦的协议也被国家终止。

让我们以一段不是非常体现阴暗面的话作结:我们注意到传播界在1930年代道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点与书面报刊相反,它建立了明显的商业广告与虚伪的隐藏性的编辑广告的明确区分。这对私人电台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这一点来看,马赛尔·布勒斯坦原布朗谢的故事是值得一提的。他本人在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我的电台》的书中讲过这段历史,1950年又以《自由的电台》为名重印了此书。他是一位先驱者。1933年年末,当他还没有想过广播这回事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有一张艾菲尔铁塔广播电台的“广告许可证”。他对布勒斯坦原布朗谢说:“给我找个想播送一条信息的人。”布勒斯坦原布朗谢十分惊讶却觉得很刺激,他成功地把广告许可证转卖给了一位名叫布伦瑞克的皮货商,这位顾客给了他一件卷毛羔羊皮大衣作为交换。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在私人电台发展广告业务的构思,这些电台基本上都是状况十分拮据的。他乘上他的旅行飞机,在各个机场向全国各地的私人电台上门推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天地啊!他成功地与很多电台签订了大量的租让合约,这些电台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不必亲自去安排广告了。他发明了以一段乐曲作为衬乐的“无线电传声信息”、“布伦瑞克,做皮货生意的皮货商”,“安德鲁,技艺精湛的鞋匠”,“莱维坦的机器常年保修”,“到此为止了!哪里门庭若

市？萨波尼特洗衣店服务优质！”等等。

起初这一举动非常成功。不久这一系统便开始受到了挑战。首先是价格提高了。私人电台的负责人很快希望提高他们事先未预料到的这些利润：我们很快就看到广播事业的一个快速转变，这一转变预示了 1940 年代所谓的“自由”电台将经历的一个改变。马赛尔·布勒斯坦原布朗谢以一种饶有兴趣的方式讲述了里昂广播电台的所有者商人皮埃尔·拉瓦尔如何把广告租让给他又如何忽然间要求合约加价，那个价目是国有电台的老板也无法接受的。再提到一点，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乔治·芒代尔取消了国有电台的所有广告，而布勒斯坦原布朗谢与这些电台有着合约关系。就是这时他跨越了下一时期，亲自建立了一份广播电台产业，蕴高广播电台（吕西安·莱维广播电台），后又变为城市广播电台，这家电台在 1934 年 1 月到 1935 年 1 月间取得了巨大成功，有着众多的创新，尤其是广播很多公共节目，这些节目由不同的品牌赞助，其中著名的有深受欢迎的让·诺安。

第八章摇广播的战争

这一章始自 1939 年德国上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在这个临近波兰边境的安宁的小城，城中除了几家地方电台外还有一家无线电广播站，从布莱斯劳转播柏林的节目。晚上 7 点，夏末的天气沉闷，看门人在他的旧藤条椅上打着盹儿。还是往常的那个主持人，在他的闷热的播音室里等待着接入时间的到来。忽然之间，两辆黑色的汽车在砾石四散声中刹住，停在电台大楼门前。从中跳出 3 个人，穿着波兰军装。他们一起拥入门厅，手握冲锋枪，打昏看门人，在广播通常开始的确切时刻用德语和波兰语宣读了一篇强烈反对德意志帝国的宣言。这些所谓的波兰人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秘密部门的警察，海德里希在希特勒手下负责情报工作。黄昏的时候他们离开布莱斯劳，到达格莱维茨，广播站附近的拉蒂伯森林，在那里穿上军装并从保险箱里拿出武器。他们的车上还装有一件不祥的东西——一个在监禁中死去的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给它也穿上了波兰军装。在离开广播大楼的时候他们把尸体留在门前的台阶上，以便更明显地表明这一重罪。海德里希要求一具“新鲜的尸体”。他还同样准备了在柏林电台转播这一伪

造的宣言,这将给这次突袭制造更多的传言,但是特遣队的技术人员被操纵杆的复杂性吓倒,不知道如何开动它们。这并不要紧!在柏林,宣传部部长戈培尔马上宣传说,这些“不受控制的波兰分子”已经完成了武力打击,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所描述的行动。第二天清晨,希特勒的军队进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这一纳粹宣传事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播将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主要作用的能力,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广播的作用无论在它的现实影响还是在传奇角度、在一种绝对影响的幻觉角度来讲都是值得研究的。

绝对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一种智力的、心理的以及政治的环境中,这使舆论倾向于一种观点,即无线电广播可能成为某种类似于全面武器的东西。无论怎样,得以有效地利用,无线广播就会抵得上多个兵团的兵力。

很多出版物印证了战前这种特殊氛围,其中最著名的是塞尔热·查霍蒂纳 员毅年出版的《政治宣传对民众的侵犯》。查霍蒂纳是一位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直到 员毅年,他一直在观察纳粹在舆论中的兴起,并把这段经历作为他的研究基础。我们如今读这本书的时候,它看起来仍是有些天真,它代表了一种过高估计群众操纵能力的趋势。这本书以在宣传领域和舆论领域应用巴甫洛夫关于狗的原则为基础,书中提出若干种刺激,由此引起公众自动反应。查霍蒂纳深受一位有些被遗忘的人的影响,此人在战前岁月中曾有很高的声望,他就是古斯塔夫·勒邦,曾著有一本著名的关于群众心理学方面的书。他试图在此书中表明“群众灵

魂”有一种独立的真实性,这与构成群众的个体灵魂不同,并且可能被与它自身反应同样粗鲁的办法所影响。在这种理念中,报刊,尤其是广播明显起着决定性作用。意大利小说家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 1934 年出版的作品《政变手腕》以一种先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指明以后掌握大众交际手段,尤其是广播,将是以后政变发动者们关心的一项主要的事宜。

下面是四个例子,阐明了军人及政客亦即公众舆论逐渐发现广播重要性的过程。

首先来看日本在中国的例子。在日本自 1928 年起开始占领的中国地区,日本人利用在公共场所应用扬声器这一新技术发展了广播的用途。应该指出的是自从军人逐渐控制了天皇制度以后,即便是起初非常分散的广播也由东京控制并管理了。

第二个例子 德奥合并。在 1938 年 3 月纳粹执政之前,德国魏玛政府在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虽然奥地利地势多山,这家电台仍能覆盖这个国家的主要地区。而后,戈培尔大量利用这家电台进行对奥广播,为使奥地利并入德国作准备。这应用了希特勒 1924 年在狱中所作的《我的奋斗》中的话:“我从少年时起就有一种重要的感受,唯有毁灭奥地利才能捍卫德语的特色。”是的,但对方是由一位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领导,此人非常难应付。这不是说他牛高马大——他非常矮小:人们叫他“毫厘梅特涅”,但此人有着充沛的精力、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纳粹德国极度的憎恨。他毫不犹豫地 在维也纳查封了所有有利于希特勒的报纸。巧合的是他本人也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是一个狂热的“业余广播爱好者”,他在广播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干扰。这样,广播之战中马上就加入了进攻与防守,利剑与盾牌这种常见的辩证法。所谓防守,在这种情况下旨在阻止人

们收听。陶尔斐斯让工程师们设置了第一项干扰,使得人们在奥地利难以收听慕尼黑电台,同时,他也进行反击。他在比桑堡高原建立了一家比慕尼黑电台更强大的发射台,功率为 500 瓦,这是当时技术所允许的最大值。这家电台以牙还牙,揭露了纳粹德国及其纳粹制度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性质。

这场世界史上的首次广播之战解释了以下史实:从柏林发动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企图于 1938 年 3 月 12 日在维也纳发动政变,它们谋杀了陶尔斐斯之后,又急遣了 15 人强占广播电台。这些人出其不意地闯进大楼,成功地控制话筒整整一个下午。一位当红记者被迫宣读了一篇宣布奥地利归并于德国的宣言书。但这场胜利最终落空了。电台主任打电话给比桑堡高原并命令其播放为转播困难而准备的应急节目。最终奥地利军队又夺回了这座大楼。在广播室里发现了 15 具尸体,一边 15 具,另一边 15 具。政变失败了,舒施尼格代替了陶尔斐斯。比桑堡的发射台以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针对纳粹德国进行广播,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即一直持续到德奥合并,这一次是希特勒取胜了。我们足以想像这场电磁波上的第一次对抗被整个西方世界的大使馆专心地注视着。

第三个例子:1935 年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这使国际联盟异常愤怒,并决定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封锁意大利半岛。这时意大利为了反制裁,同时在意大利半岛(罗马和巴厘)的黎波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建立了一些强有力的电台,用包括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 15 种语言进行广播,其目的是使英法的殖民帝国失去稳定性。突尼斯成为一个有特权的广播对象,因为它是意大利的一个重要殖民地。埃及也同样被牵扯进来,墨索里尼的电台用埃及阿拉伯语对其进行广播,这些电台的节目一直传送到印度。

西班牙战争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中的第四个激烈时刻。它促使无线电被大量应用。伊比利亚半岛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在1936年7月政变时期，只存在少量的力量微薄的私人电台，国家电台直至1939年才开始畏畏缩缩地运行。西班牙的私人电台成为一种困扰着西班牙的离心力量，例如卡塔伊尼亚电台便很害怕失去自己的自主权（这在今天也是千真万确的）。同天主教堂和各种私人利益集团一样，工会也拥有自己的电台——一种强大的分散势力处于支配地位。

佛朗哥政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每个阵营都致力于在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上抢走私人电台。这些电台逃脱共和党的军方权利已不再成为问题。佛朗哥在西属摩洛哥利用得土安电台面向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摩尔人用阿拉伯语进行广播。1938年起为了保卫国家党阵地，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每天在塞维利亚电台讲话。1938年11月，一家可在整个西班牙及佛朗哥势力占领的土地上被收听的强大电台建成。另一方面的共和党人没有同样有力的电台与之抗衡了。他们可能满足于用西班牙语、法语及阿拉伯语广播的巴伦西亚广播电台。

这就是广播大战的史前史。但无论这些情节多么重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也不过是些小冲突而已。

戈培尔和斯大林

首先，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我们曾多次提到的戈培尔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在总体和细节方面处处挂心，而且非常容易自满。他断言：“由于广播的作用，我们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他还恭敬地引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用语：“战争期

间,语言即是武器。”

他集中了所有的决议。首先,在国内,他轻易地推行了一项关于收音机的巧妙政策。在法国,1940年代时一些外国电台想到推广一些半导体收音机,这些收音机只能接收一个频道,即他们的电台频道。在他们之前有一个与戈培尔相关的先例,其影响颇具戏剧化。戈培尔鼓励制造商们向市场上推出一种大众化的接收机,即“~~戈培尔收音机~~”,只适于接听德国电台,这种接收机不久被人们戏称为“戈培尔的嘴脸”。在战争开始时,德国约有~~员四百万~~台收音机,在欧洲是最多的,是法国的两倍。

也是这一时期戈培尔鼓励纳粹军人提高他们的收音机的音量,并在广播宣传节目的时候打开他们的窗子。这种传播说教的方式是日本扬声器的一种德国变体。

在对外方面,建立在柏林的短波广播中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也是当时组织得最好的。我们的星球被分为五大区:远东、南亚、英属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人们用~~缘种~~语言进行广播,这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记录。伊斯兰教大穆夫提在广播上用阿拉伯语宣传反犹太人的圣战。

随着纳粹征服的土地在欧洲逐渐扩大,戈培尔利用了占领国的广播电台。他创建了一批专用的小队,这样他可以不用~~圆~~小时就使战败军队撤退时破坏的电台重新开始广播。非常强有力的希尔弗瑟姆电台在德军入侵荷兰的第二天就投入运行了。布拉格、布鲁塞尔、华沙、奥斯陆、哥本哈根,不久雅典和贝尔格莱德都这样重复采用了在柏林制定的计划。他们甚至还准备了小卡车移动电台,一旦成功入侵英国,它们便将被运到不列颠的领土上。

以上这些是从形式角度来讲。至于内容方面,戈培尔认为一种宣传如果过于清楚地表明他们的主题就会引起反作用。因此

他抛弃了大规模灌输的想法——除了在广播中完整地重播希特勒的长篇大论式演说。除了所谓本义上的新闻节目,他更力图利用“无为政治”来渗透公众舆论。他的合作者弗里希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人是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一个能抵制狂热者的温和主义者(这使他在纽伦堡法庭遭受攻击)。他劝说戈培尔最好不要偏执。事实上,在国内,这把戒尺在广播方面要比在书面报刊及优秀的摄影师担保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方面软得多。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为希特勒的宣传提供了跳板。为使轴心国的宣传协调一致,戈培尔向意大利派遣了技术顾问。这些有力的法西斯电台为德国势力提供了一个中继站,面向有着重要意属殖民地的北美尤其是拉丁美洲进行广播。

另一方面的苏联便不那么有能力了。当然,在1940年代末斯大林体制开始实现了针对德国的强有力的广播。他形成了一种特性,尤其是揭露德意志帝国领导人荒淫生活的事实或是虚构故事。自然,1945年1月德苏条约签订后这种宣传也戛然而止了。这段时期里,直到1941年12月纳粹军队入侵苏联,似乎没有人仔细考虑过问题所在。况且,在希特勒发动进攻之时,斯大林在各地都严阵以待。他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强迫被侵略者威胁地区的居民将其无线电接收机送交至最近的警察局——违者以死罪论处!这是一种畏缩甚至是内在的失败主义的标志,因为他们自认为不能够利用广播使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斗争的合法性。

不久后重新开始的苏联广播宣传有着两种新颖之处。一种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在进攻期间安装相当于过去的战鼓的扬声器,有力地对敌方前线进行广播。第二个特性包括对德军士兵的亲人进行广播,尤其是宣布战俘名单,这使得焦虑的德方家庭开始收听用德语广播的苏联电台。

盎格鲁撒克逊的信条

专政之后是民主。首先是 月 说电台——有怎样的地位就受到怎样的尊重。它根据英国 猿 年代面对纳粹的危害所采取的对 外政策作出反应：行动已晚却很有力度。但慕尼黑事件后，直到 员 年 猿 月纳粹军队全面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月 说电台的民主传统中才加入了所谓的“缓和”政策。

在这方面，一个人们称之为“哈哈勋爵”的人的故事十分精彩。这个生于英国的美国人本名威廉·乔伊斯，他于 员 年 猿 月在汉堡而后又到柏林，用英语在德国电台以一种控告性而有效的幽默形式进行广播。他在伦敦的收听率很高，在某些圈子中，收听“哈哈勋爵”的节目，传播他的机智的词句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时髦事。他巧妙地发展了有关英国（一个远不如当时法国平等的国家）社会不公及统治阶级利己主义等主题。他深谙英国政治生活，比如说，在整个“奇怪战争”期间，战士们也喜欢传播“哈哈勋爵”的精彩故事。关于这点，《每日邮报》在 员 年 猿 月写道：“在宣传的战场上，英国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德国电台不仅影响了英国国内的居民，甚至还影响到了武装力量。”这引起了德国 员 年 缘 月 员 日突如其来的进攻，转瞬之间，时局大变。丘吉尔执掌了政权，此时他在下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其中他仅向英国人承诺“鲜血，汗水以及泪水”……直到战争胜利。从那时起，“哈哈勋爵”的收听率直线下降，人们的爱国热情终于迸发出来。

如果说 月 说能很快地抵制先前的软弱性，那是因为它直接依赖于公众舆论。很短时间内，它便创立了对外宣传广播节目。 员 年，它只能用短波传送六种语言的节目，而它在德国的对手

可以广播多种语言。“奇怪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后来,月说迅速复兴起来。1940年初开始,月说用多种语言对外广播多种截然不同的、适应各种听众口味的新闻简报。此外它加速了中波的应用,用于对欧洲占领区的广播,中波很容易跨越芒什海峡。

应该指出的是,丘吉尔非常清楚广播的重要性。他很快便明白,用月说的话筒来迎接被占领国家流亡者的声音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尤其邀请那些撤退到伦敦的君主和政府总理做广播讲话。同样他也邀请了戴高乐将军。

广播在支持被占领国的士气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芬兰、挪威、丹麦,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紧接着,月说选择了一条原则,即真实性原则,包括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真实性。而在1942年战局转变之前,这些艰难时刻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种勇气,使得月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仍有着了一批特殊的听众,最终这条原则还是有益于月说电台的。有利的情况是,灵活性与道德性通过一种明显的方式相结合了。

我们并不惊讶于美国方面的努力来得更为迟缓。应该指出,战前并不存在负有国际使命的电台。罗斯福对宣传这一想法非常反感,虽然他能非常巧妙地运用话筒,并进行过“围炉叙话”。在他看来,这些只不过是很好民主教学法而已。但对外宣传,没问题!确实,私人电台的分散及缺乏政府对广播的控制使对外宣传困难重重——因为缺少工具。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后,局面一下子发生转变,罗斯福的思想也随之转变。美国作出了迅速而有力的反击。总统创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由他完全信任的多诺万将军负责。自1942年初又创立了一个战争情报局,由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领

导。这个情报局便是我们后来所知到的美国之音的雏形。一个有效的办法是 ,应该开始认真收听敌方宣传以直接做出反击。美国在这方面使用的办法比德国要多得多。重要的是马上对那种看来不合实际、转弯抹角的消息作出反应以及同谣言进行斗争。我们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了流言的危险作用 ,但这次美国人表现出他们的严肃性 ,有时还有点天真 ,但是最终非常有效地挫败了谣言的危害性影响。正是这样 ,他们创建了一个由享有特殊道德声望的人物组成的委员会 ,其中包括牧师、法院院长等 ,负责编写公报以揭穿谎言。

信息局的第一条信息是 1945年 4月 15日 用德语广播的这样一句话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谈论美国以及这场战争。无论消息是好是坏 ,我们会一直对您讲出真相。”这同英国的广播中的措词是一样的。另一方面 ,信息局很认真地进行与伦敦方面的合作 ,以反击柏林与罗马的联合。战争末期 ,月 15日 用中波对其节目进行转播的协议 ,由于两国语言的相同而显得十分容易执行了。

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亲自对欧洲进行广播 ,但它从未达到英国的那种影响力 ,它在欧洲的收听率通常很低。从诺曼底登录开始 ,与美国之音相比 ,讲英语的欧洲人更喜欢听美国军方广播 ,美国军方连锁广播。它的广播节目之前有一段著名的预告曲 ,由格兰·米勒乐队演奏的《月光小夜曲》。人们越是清晰地收听到这个电台 ,就越为美军的靠近感到高兴。

美国广播的主要力量是面向太平洋地区及拉丁美洲 ,这一地区对广播十分迷恋。一个大型发射台在旧金山建立 ,华盛顿与蒋介石时期的中国签约转播抵制日本宣传的中文节目。

法国的犹豫

法国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记忆,还因为它在广播领域所经历的对抗类型,这种对抗类型给广播的作用提出了疑问:广播真正的效力以及虚构的效力。广播的作用不仅在于信息或甚至是宣传方面:在当时,时局赋予了广播极度的垄断,这使得它引起了两大阵营中的舆论的集中。此外,我们知道,集体记忆认为广播非常具有重要性。对于在1939年前成年的几代人来说,很多鲜明的记忆都是听觉方面的。

广播的这种影响力还可以从书面出版物的信誉扫地方面来作出解释。这些书面出版物在南方奴颜婢膝地服从维希体系,而在北方则是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只需提及占领区的一件极小的轶闻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德国人夺取了让·普鲁沃斯特和皮埃尔·拉扎雷夫的《巴黎晚报》之后,任命一名电梯司机当经理,这一点引发了拉扎雷夫的这句评论:“在报业历史上还没有电梯服务生经历过这样快的提升。”在南方,很多大报撤退到里昂或维希,如《时报》《论辩报》《费加罗报》《法兰西行动》《晨报》,还有很多其他报刊……它们也失去了影响力,因为它们只是艰难地跨越了分界线;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足够数量的广告和读者,它们主要依靠维希政府的津贴,而这正束缚了它们的自由。

所有人都知道或是可以猜出,相比之下广播在多样性方面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除月报以外,还应指出瑞士广播电台的重要性:它的社论作者勒内·帕约,对事件总是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一定的观察距离,同时又对民主国家阵营怀有一种非常可理解的(并不断增加的)热情。他的节目在整个战争期间收听率都很高,

尤其是在瑞士东部地区。

在溃退之前,奇怪战争时期表明了法国应用广播这一手段的某种困难,尤其是它在没有选择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时——在那样的条件下谁又能够真正地忠实于事实呢?戈培尔在闪电战及1940年12月15日法国溃败后断言广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还提到“心理学的色当^①”。这一观点被很多作家重复过,尤其是在1946年12月的大历史学家阿萨·伯里格斯,他本人结合戈培尔在当时所作的分析,认为广播对法国的溃败起到了很大作用。与坦克和战略同等重要吗?这就要具体的分析了。

在国际政治方面,法国人才开始重视起广播。应指出,1940年12月15日,希特勒在莱茵河左岸实行新军事化是这一状况的转折点。阿尔贝委员会的主席萨罗当天在广播中就此事发表评论。他让听众们等待了15分钟,这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更糟的是反复播放一首看来与战争气氛很不相宜的一首幼稚的儿歌:“我是一个漂亮的娃娃,有着神奇的模样,喜欢吃糖果,还有果酱……”而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让斯特拉斯堡陷于德军炮火下!”我们知道,说过这句话他便以为尽了义务,而法国人却无动于衷。

1945年12月,对于在人民阵线逐渐被破坏之际执政的达拉第,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一人物由于溃退后的慕尼黑事件的关系而在课本及集体记忆中受到极度的贬低。但他的形象在1945年由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组织的关于1940—1945年这段时期的研讨会后得以改善。应该回想一下他在当时享有的声誉。尤其因为他的声音在广播中“传递”得很好,他的声音热情洋溢,有着南

^① 影射法国1940年战争中败与普鲁士,事实上该战争中戈培尔胜在宣传上。——译注

方口音的效力,他是在法国最早地把雄辩术应用于广播中的人。抛弃了论坛上的夸张,带着一种自然的真挚,一种没有浮夸的信心。

战争临近时,即1938年10月至1939年7月间,达拉第意识到了广播的重要程度。他于1938年10月创建了一个综合信息中心,用以引导隶属于议会主席的广播新闻。接着,通过1939年7月10日法令,他创立了唯一的国家无线电广播管理部门(由这项法令产生了国家集中制,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944年7月法令的实施,1944年的法令源于后来法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和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他任命法兰西公学院的一位物理教授莱昂·布里卢安为第一任主管。同时,他在布尔热附近歇尔省的阿路易发展了一个大型的巴黎电台长波发射站,并使之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发射中心——功率是源功率的两倍,另一方面,关于中波,他使波尔多和里摩日的发射站现代化。短波方面,他创立了巴黎世界广播电台,1939年7月开始投入运行。

实际上,在对外广播方面,法国的装备也是不错的。乔治·芒代尔在1938—1939年任邮政部部长期间,着手进行创立德语广播节目的活动,他委任了两个有才能的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取得德语教师职衔的皮埃尔·贝尔托和帕斯·科波(雅克·科波的儿子)。他们安排了一些优质的节目,逐渐又补充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英语、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及斯洛伐克语等语言的广播。不久,这个芒代尔成为达拉第政府的殖民部部长,创立或加强了所有黑非洲国家的广播发射台。

然而,虽然有着这种政治意愿及技术努力,结果却不是均衡的。

首先,责任过于分散。一位政治节目的主管埃米尔·洛雷

尔,只负责新闻节目,这样还需要一位文化节目的“总监”。这一职务应由一位知识分子担任,达拉第委任了乔治·杜亚美。此人是当时以《帕斯基埃家史》而出名的小说家,他不合情理地对于传播的新技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有一天说电影是“最无知的醉汉的消遣”,同时他也不怎么喜欢广播。因此在一系列冲突后他唯恐失去自己的威信,于1940年11月辞职。还有位于欧陆大厦的信息总署,这个机构由让·季洛杜负责,此人在对外新闻节目方面颇有政治威信,但同时他又以个人名义作为法国战争的官方社论记者而接近国内广播。当私人广播被强制恢复成广播新闻的样子时,这种权力分散就更为有害了。这些私人电台因战争、领导调动及广告的衰落而变得非常贫困了。

一场严重的争论贯穿了整个“奇怪战争”时期。有人认为广播文化性太强,太“唱高调”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之为“~~深奥~~原~~道~~”。甚至《时报》的文学评论员埃米尔·昂里奥,有一天也对乔治·杜亚美大声说道:“够了!高乃依的戏剧够了!宗教音乐太多了!”因为他收到了很多来自军人的抗议,他们不愿被迫听《西德》或《西拿》,他们更喜欢听《莫里斯·谢瓦利埃》(“这一切,能真正地塑造法国人!……”)或是雷·凡杜拉(“我们将要把我们的衣服挂到西格弗里德防线了”)。1940年春天,有了一些向通俗方向的转化。但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些评论,比如莱昂·布鲁姆,他认为引入了“过多粗俗的话”将会贬低法国人的政治观点。

最令人担忧的是法国的宣传缺乏活力。事实上,季洛杜的个性使这种缺陷加深了。阿纳托奥·德·蒙齐,一位有思想的慕尼黑部长,把季洛杜叫作“无线电广播的马里佛”。他在话筒前的矫揉造作显得过分雕琢,而且他还受到“传递”效果很差的噪音的影响。下面是有他风格的一例,日期为1940年11月10日:“此时,

敌对双方的军队已经休息入眠,马上就要怨点了。所有人都在沉睡,却不是同一个梦乡。死亡天使在铺展开的军队上方飞行,感到像是在一支更自在、更坚定、更安详的军队上方。他后悔自己不是生命天使,可以帮助这支军队的士兵们,他们的身下只是单薄的土地。但他是死亡天使,公正的死亡天使,已经准备好了在两个阵营间选择他要选的人。”乔治·皮杜尔的夫人叙兹·博雷尔在她的回忆录中讲到,她母亲有四个孩子在前线,听到这些不祥的话后泣不成声了……再举一个有关这种抒情性的例子,它可能使马其诺前线的许多人怔住——~~1918年~~1918年10月15日:“人们在战争的追逐中。为了把侵入者从家中赶走,人们开始战斗。这个侵入者已进入这里三年之久,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用餐,人们给孩子穿衣服送他们上学时他也在这儿,他不停地置身于丈夫和妻子之间,母亲和儿子之间,这个侵入者便是希特勒。人们去驱逐希特勒,在厨房里,在花园里,在卧室里,在深夜中。”

费尔多内传奇的影响

另一方面,让·路易·克雷米厄原布里亚克在名为《~~1918年~~1918年的法国人》的书中对费尔多内的传奇作出精彩分析,此书丰富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认知。德国对法国的广播,很明显是从斯图加特开始的。二局^①在斯图加特查明了法语节目撰稿人的身份,此人为一名蹩脚的记者,曾经用几年时间尝试创立一家法德新闻通讯社,似乎曾在《法兰西行动》工作过,他就是保尔·费尔多内。~~1918年~~1918年10月初,在一场反间谍运动中他的名字被当局作为资料

^① 法国军事情报部门旧称。——译注

提供给报界,而他也立刻出名了。传说中把费尔多内描绘成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第五纵队的指挥者和鼓动者。人们设想他在暗中操纵着法国的政治思想。战后,人们就会知道他的声音对于广播来说太没有“磁性”,而且他不过是众多负责编写小型恶毒传闻的撰稿人之一。但在当时,费尔多内和他巨大的影子几乎铺天盖地。流言四起!《巴黎晚报》甚至报道说斯图加特的居民被他的过分行为激怒——他们有必要那么愤怒吗?——某晚在一条昏暗的街上将其痛打一顿:完全是虚构,因为他当时在柏林工作。《鸭鸣报》造出了“费尔多内化”一词。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力图向愤怒的群众指明费尔多内是一个有着隐蔽影响的指挥者同时,有人还依据宣传通常导致的害人害己的结果,使法国人深信第五纵队的万能性,这种宣传有着严重的缺陷。让·原路易·克雷米厄原布里亚克从邮政监控档案中了解到,前线的战士们对费尔多内的重要性是何等的深信不疑。很多人断言他们经常听他的节目——而他从未在广播中讲过话(这并不能阻止政府干扰斯图加特的广播节目,至少是对巴黎地区及整个法国东部地区)。很类似的,在英国,舆论深信“哈哈勋爵”曾指名道姓地对一家工厂的领导说:“昨天你们涂过油漆的那堵墙不用再涂第二遍了,因为我们明天要轰炸你们。”这完全都是想像。

在法国,有人最终相信在部长会议的桌子下面有德国间谍。半个世纪后,让·原雅克·塞尔旺原施赖伯在他以《激情》为名出版的回忆录中还揭露了一个已证明的事实,即保罗·雷诺的正式情妇埃莱娜·德·波尔特是一名德国警察——这完全是虚构的,虽然她曾在失败主义方面起到过危害作用。流言传播开来……应该知道洞悉法国政治细节的优秀作家弗里德里希·西堡,曾著有

一本精妙的书《上帝是法国人吗》,此书在 1940 年代初取得成功。他同意为德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服务(比利时在“奇怪战争”中没有参战),并按时向柏林寄送法国报刊的评论及解释性文章,因为他可以很自由地获取这些报纸。这使得纳粹广播能给人一种深知底细的印象。因此戈培尔 1940 年 5 月 16 日停战后的日子里可以宣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对第四种武器致敬,这种武器即宣传。”还有:“我们的广播节目取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由于宣传利用它的绝对效力逐渐灌输了虚假和恐怖的思想,因而不被人们置于首要位置了。

溃退和奴役

随着 1940 年 5 月 16 日至 16 日的撤退,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法国社会结构被破坏——恐慌使 400 万逃亡者亡命途中。100 万名士兵撤退。报纸不能适时地发行,因此,在正午或黄昏的时候,很多惊惶失措的法国人围在收音机旁,脱离了他们平常舒适的政治论战背景,试图从广播中辨别事实真相。同时,戈培尔从他所占领的发射站接连发起他的宣传,而巴黎广播电台只从阿路易广播法语节目,而且只广播到 5 月 16 日。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戈培尔构想出的谎言并没有阻止法国军队 5 月 16 日至 16 日之间的暴动,斗争通常很英勇。不是戈培尔引起了自魏刚战线被突破以来而产生的恐慌,这种恐慌更应由战线破裂本身引起的。但确实是广播清楚地讲述了整个过程。5 月 16 日晚巴黎被占领后,保罗·雷诺发出了他最后的呼吁,这次让人感到是假的了。在纳尔维克时期还有人相信他说的“铁路已被切断”。在他断言还存在胜利可能的那一天,人们就不再相信

他了。收音机中所发出的不吉利的音调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是在雷诺倒台后不久,共和国主席阿贝尔·勒布伦任命为议会主席的贝当元帅在 1940 年 6 月 18 日和 19 日两次播出的著名消息:“我以一种紧张的心情对你们说,必须停止战斗。”“停止战斗。”因为停战协议还没有签订,所以这种说法是尤为危险的。法军在大部分地区受挫,但他们依然英勇奋战。贝当做得很对,他在第二天报纸上发表时候将原文改成了“应该‘试着’停止战斗”,但后果已经无法挽回。

1940 年 6 月 18 日,法国是在德国广播中得知停战的消息及停战协议的内容的。在协议原文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自 1940 年 6 月 18 日始,任何法国电台都不准进行广播,以至于直到 6 月 18 日出现了一段完全的“无声广播期”——这种可怕的沉默象征了国家的悲剧。当广播重新开始的时候,国内的情况便完全转变了。在此期间,戴高乐将军于 1940 年 6 月 18 日在 11 月 18 日电台作出了著名的历史性演说。

第三个时期是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无线电传声之战。分界线从歇尔省南部穿过,阿路易处于占领区内。1940 年 6 月 18 日创立的宣传部因此便控制了巴黎广播电台,巴黎广播电台的背景音乐由大交响乐团(此乐团是 1935 年由邮政部部长让·米斯特莱创立的法国广播乐团的继承者)及雷蒙·勒格朗的轻乐团提供。德国人在其中频繁地展开讨论了一系列有关犹太人、共济会员及“国际主义财阀政治”毁坏的民主国家的主题。他们还狂热地迎接附敌的极端主义分子,包括德阿派和多里奥派,这些人曾抨击维希政府在德法友谊发展过程中的软弱性。他们在此用“在我的金发女郎身旁”的曲调唱道:

在英国的花园里

吹牛花开了
世界上所有的说谎者
来到 月说
按电台的意愿
这是有益的
按电台的意愿
说谎是有益的……

在维希 ,贝当非常重视广播的应用。《文学新闻》的记者、“温泉之都”的优秀编年史学家莫里斯·马尔丹·德·加尔记载道：“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兴趣 ,那就是他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些信息以一些著名的语句凸现了维希的历史：“土地是不说谎的” ,或者还有“我痛恨那些给你们造成如此危害的谎言”。人们同样可以想到关于经过法国的“有害气流”的演讲。

除了那些收听率很高的消息外 ,贝当 1940年录制的最后一条消息从未被广播过——这一体系探索着组织广播的影响力。1940年 10月 ,在达尔朗的新政府中负责信息的保罗·马里翁确立了他的影响。在殖民地方面 ,为了避免其受到戴高乐主义的影响 ,由安德烈·德迈松负责的“法国之音”又重新开始广播 ,此人在他写的畅销书《我们称之为野人的走兽》时更有灵感。政治节目以外的普通的广播节目一直是由让·诺安 ,即雅布纳负责 ,这些节目用来赞美家庭、工作和努力。

自由的电波

与之相对的是伦敦。1940年 12月 15日是一个绝好的开场。

迫于当时的压力,人们没有冒险像往常一样把戴高乐的演说录制在唱片中,因此我们也就再也听不到了。从远月 员日起戴高乐在话筒前不仅表现出是为盟军战斗效力的法国军团的首领,还表现出是未来法国政治的化身。正像高乃依笔下的塞多留所说:“罗马不再在罗马,它在每个我在的地方。”

直到当时,月说只用中波广播 远种法语新闻简报,持续 员缘分钟,而且听众很少。在三周之内,月说依靠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系统,他的名字很值得称道:塞西利亚·里夫斯。从苑月 员日开始,月说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简报外还广播 猿分钟的法语节目。并且从 员源年 怨月开始,广播节目的结构已经确立,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改变。半小时的时间预留给“法国人对法国人讲话”节目,由化名为雅克·迪谢纳的米歇尔·圣原德尼,以及让·奥贝莱、安德烈·吉卢瓦、让·马尔丹、安德烈·拉巴尔特主持。皮埃尔·布尔当是另一位有实力的播音员,皮埃尔·达克不久也加入其中。每天有 缘分钟自由时间属于戴高乐及其拥护者,这段时间由著名的预告曲《荣誉与祖国》引出。

这些节目的效果很快便明显起来。首先,因为这些节目是由一项明确的决议,一种清楚的作战思想来推动的。这个创意得到了丘吉尔的亲口称赞,他来到话筒前,用法语发表著名演说:“法国人民,是我,丘吉尔,在和你们讲话……”结尾的几句话使得很多法国听众眼含热泪:“好吧,祝各位晚安,好好睡一觉,为了黎明养精蓄锐,因为黎明即将到来。它的到来将给勇敢者以光辉,将给忍受苦难的忠诚者以甜美,给烈士的坟墓以荣耀。法兰西万岁!”

第二个成功的原因应该归因于新闻中被事实证明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坏消息。还有越来越多的由逃过审查制度的法国信件及为了战斗而成功抵达英国的人们带来的确切消息。

此外,还因为有人才的存在。从远月 员日开始,记者莫里斯·舒曼便负责每日 缘分钟的广播节目。他在国土解放前发表了 员因多次简短演说,他的抒情性至今还在人们的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法国人对法国人讲话”节目比以前的广播少了浮夸的调子,应用了很多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奥贝莱想出的“巴黎电台骗人,巴黎电台骗人,巴黎电台属于德国人”这个节奏被多次咏唱。

表现出这一电台影响力的标志是 员缘年 怨月德国人命令犹太人把他们的接收机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在天主教资本家、具有抵抗精神的夏尔·里斯特的战时报纸《腐季》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很说明问题的情节: 员缘年 缘月,他妻子热尔梅娜在从凡尔赛到巴黎的火车上听到两个工人抱怨英国电台的收听效果很差。年长者对另一个人说:“我对伦敦电台这样被干扰感到十分厌烦,我的老板娘很恼火。再也不想让我听了。我就很生气,我发火了,我也再没有新闻了。”热尔梅娜看着他,小声对他说:“在波长 员缘 缘四米处接听,布尔热的干扰天线塔已经被炸毁,我们又可以重新听到广播了。”她的交谈者脸色一亮:“啊,好啊,谢谢您,夫人,我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了!”

最重要的也许是英国广播给自由法国运动本身带来了团结与动力。事实上,在法国人眼中,戴高乐运动没有像广播中所表述的那样完全地实现。令人惊奇的是,戴高乐被称为“话筒将军”,在德国的一幅招贴画上,我们看见他被一群犹太人围着,这些犹太人是依照德国宣传中试图强加的典型外貌描绘的,而戴高乐的脸却被一只巨大的黑色话筒所代替。广播使自由法国运动

随着事情的发展而自我创造了。

最终,广播逐渐成为一种有利于抵抗运动的直接行动武器,完全把它的效用观念赋予了抵抗运动,把所有在秘密状态下分散的努力结果统一到了眼前。第一项行动包括在 1943 年每天 15 点到 18 点之间使街上空无一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尤其是在西部。接着,从 1943 年 7 月到 9 月间起,著名的“灾”字运动——比利时人想到的一个主意,广播号召爱国者们在墙上写下这个字母。从 1943 年起,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广播号召法国的年轻人不去接受德国义务劳动,不去加入维希政府所鼓吹的换防部队——这也是游击队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42 年 11 月美军在北非登陆,一个动荡时期开始了。戴高乐想要在 11 月 14 日发表的演说被 11 月 16 日禁止。这是戴高乐将军的一次“阿梵丹山撤退”^①,他对美国的想法感到气愤,他们想使达尔朗执政,而后又是吉罗,以使其依赖于他们的权威。自由法国组织在 11 月 16 日沉默了,转而依赖于其他广播站,尤其是戴高乐于 1942 年 10 月法属赤道非洲归顺自由法国时创立的布拉柴维尔广播电台。1943 年 1 月一座大功率的短波电台在此建成,并在戴高乐即将战胜吉罗之时保证了自由法国的宣传。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电台变成了法国广播电台,体现了当时所有的不稳定性。戴高乐政权稳定以后,与 11 月 16 日和解,莫里斯·舒曼又重新在 11 月 16 日讲话。1943 年 1 月,英国人慷慨地接受了一项英法双边协议,即英法共同管理 11 月 16 日的法语节目,协议由戴高乐驻伦敦大使皮埃尔·维耶诺参与洽谈,由安德烈·吉卢瓦在广播中宣读。我们知道在那个春天,法国拥有接收机的法国家庭都在收听伦敦的节目。

^① 影射古罗马时期的一个事件,元老院议员因为负气而退至阿梵丹山,这种气愤使得他们在第一时间才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译注

从那时起，广播便处于战斗的中心了。我们知道空投中暗含意义信息的重要性。最著名的魏尔伦的诗句——“小提琴及秋天漫长的呜咽，一种单调的疲惫，使我心破碎^①”——这句诗预示着1945年远月远日的登陆。这时莫里斯·舒曼与菲利普·昂里奥话筒对着话筒的斗争达到了顶点。菲利普·昂里奥是维希政府信息部的秘书，从1943年起，每日在19:00分及20:00分两次在电台发表雄辩有力的演说，这些演说的有声档案还保存完好。菲利普·昂里奥的效力要比接替他渲染这种强迫性主题的让·埃罗尔德·帕基要强得多。“英国和迦太基一样将会被摧毁！”因此抵抗运动要处决菲利普·昂里奥。1945年远月远日晨，他在公寓中被突击队枪杀。

不是广播铸成了胜利，但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自由方面，为战士们的团结一致服务。当1945年加缪写出“同样精力的情况下，真实会战胜谎言”时，一种恒定的信心开始表现出来。

① 并非使用诗中的“流血”：罕见的明显的改动。——原注

第九章 摇摇欲坠年以来的书面出版物： 衰落还是转变？

摇摇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书面出版物，尤其是日报的衰落现象，我们可以围绕法国的情况进行思考。法国的读者曾对书面出版物表现出极度不满。应该弄清一个国际性比较的问题，以区分什么是属于信息市场结构性的发展变化范围——尤其是随着电视的出现而产生的变化——以及什么是属于民族的特性。

处于不利境况的法国：比较来看

这种衰落现象发展程度如何呢？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统计显示出的国家级综合性新闻日报（如果我们把专业性报纸体育报、赛马报、教育报等放在一边）的衰落使人感受颇深，这涉及出售的报纸种类或者所发行的份数。

一战前夕，我们曾看到巴黎的报亭中出售大约 200 种日报。1918—1919 年间，在占领时期的挫折之后，我们注意到数目的再次攀升：1919 年 193 种，1920 年 204 种。但很多种日报很快就消失

了。从 1876 年开始降到 1880 种,接着数字依然下降,因为如今变成仅十种左右了。《人道报》《解放报》《世界报》《十字报》《法兰西晚报》《费加罗报》《现代报》《论坛报》《回声报》……

发行方面的变化也是一样的。我们还记得黄金时期的数字——1870 年战争后全国性日报发行量攀升至 1800 万份,直到 1875 年的 1800 万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800 万份(以后从未达到的记录)。1876—1878 年间还是 1800 万份,而后便开始衰落了。1879 年 1800 万份,稍为好转之后 1880 年为 1800 万份,跌势一直在继续,而后降至 1885 年的 1800 万份,1890 年的 1800 万份,1895 年的 1800 万份;1900 年的 1800 万份;1905 年的 1800 万份;1910 年的 1800 万份。在地方性日报方面同样遭受了强烈的跌势:1875 年 1800 种;1880 年 1800 种;1885 年 1800 种;1890 年 1800 种;1895 年 1800 种;1900 年 1800 种;1905 年 1800 种;1910 年 1800 种。发行量的减少也同样是惊人的:1875 年日发行量稍多于 1800 万份;1880 年 1800 万份;1885 年 1800 万份;1890 年 1800 万份;1895 年 1800 万份;1900 年 1800 万份;1905 年 1800 万份;1910 年 1800 万份。此外我们还看到这种下降处于人口增长时期,在相关时期内法国人口数由 1800 万增至 1800 万;虽然这些人梦想着报纸的销量稳定,但比例方面还是下降了。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报纸都是亏损的,这与黄金时期相反,当时一份大众喜爱的报纸的成功可以保证大量的收入。连《世界报》也在 1800 年代初经历了困难时期。1800 年左右它又陷入了财政混乱期,到 19 世纪 1800 年代末才得以复兴。

现在法国仅存极少数具有“国际水准”的报纸,即以一种完全的方式向人们提供所发生的事件的信息的读物,不仅是附近的信息,还包括全球的信息。即便是《解放报》,它的成功与意大利的《共和国报》的飞跃发展及佛朗哥主义后产生的西班牙《国家报》的突飞猛进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解放报》是在本世纪最后 1800 年

年崭露头角并延续下来的极少数报纸之一，并且由“1945年”的一代政治思想支撑。

地方日报这方面总体上来说也不如1945年前那样富足了。很少的报纸希望认真地连续报道国际新闻（如《法兰西西部报》，法国发行量第一、值得注意的一份报纸。《阿尔萨斯最新消息》《西南报》《东部共和国报》及其他几份报纸）；但很多报纸差不多都满足于除本地区外，只利用法新社这唯一渠道刊登一两篇社论。

不过其他国家确实也经受了这种衰落，而在法国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1945年法国每百名居民中拥有份数的总额——还是就日报来说——不及美国的1/3，是德国、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英国、瑞士等国的一半，是瑞典或芬兰的1/2，是日本或挪威的1/3。只是在那些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西班牙（正在好转中）、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比我们的状况还差一些。

做一次世界范围的环顾，有利于我们详细说明。

在比利时方面，发展与法国很类似（而那里儿童读物的生命力却长期显著，它们是以布鲁塞尔和查内尔两个连环画流派的才华为基础的）。

与德国相比，英国的全国性出版物总是非常集中。这个国家比法国更多地忍受了离心力的折磨，这是一种强调民族统一的方式。1945—1949年间发行量增加了1/3，战后直到1957年这种增长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持续；正是接近这一年时，我们明显注意到一种中止，同时也注意到了衰退的开始：1957—1962年间日报发行量总体下降了1/3，星期日报（我们知道这种报纸在联合王国的影响力）下降了1/2。然而这种下降从百分比上来看明显低于法国，而且报纸在全国销量依然很高：1962年每天可以卖出1.5

拥有400万份全国性日报及200万份地区性报纸,总数为600万。英国比在法国存在更多的“真正的”综合新闻,尤其是如果我们把《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等带有金融特点的报纸计算在内,但事实上用于普通性新闻的报纸中著名的是《金融时报》或是一份苏格兰日报,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报》。英国的报刊种类比法国多得多。

在美国,日报的全球发行量只是缓慢减少(1950年达400万份,1955年300万份,1960年200万份)这与报纸种类的数量变化是完全相同的(1950年1500种,1955年1000种,1960年500种,按照人口比例,这至少是法国的3倍)。确实,发行量没有随人口增长而变化,这突出了一种相对衰落。1950—1960年间售出报纸份数由每千人100份减至每千人40份。

意大利是很值得注意的。日报在意大利总是处于弱势,19世纪年代初以前,意大利报纸种类和发行量一直处于一定程度的衰落状态。此时意大利每千人拥有报纸量仅为10份。但1950年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复兴,1955年每千人150份,斯卡尔伐里的《共和国报》的成功成为其生命力的象征。当然,后来曲线便倒置了(1960年下降至每千人100份),但很多其他的优质日报势头良好,《晚邮报》《新闻报》和《日报》,我们还可以加上罗马的《时代报》,这份报纸地区性强些,然而却有国际性质;还有那不勒斯的《南方报》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报》。我们还很惊奇地看到前共产党的机关报《团结报》,这份报纸享有一种真正的影响力,一种商业基础,一种使《人道报》妒忌的权威。尤其是自1955年起,它勇敢地斗争以避免平静地成为一种萎缩的感伤的机关报,但这种斗争没能取得实质性成功。

在德国,日报在1950年前一直处于进步阶段,而后稳定在一

个高水平阶段。全球发行量(按平均数)在1911年为1.2亿份,1915年为1.4亿份,1920年及1925年为1.6亿份,1930年是1.8亿份。同英国一样,在我们称之为“大路报纸”^①(指那些增刊多、内容广泛的报纸——英语叫作“阴沟小报”(指那些与“体面的报纸”(指那些高质量的报纸)之间有着明显的划分界线,“大路报纸”有七种,占据了70%的市场,“体面的报纸”主要通过送报来发行。

佛朗哥下台后,西班牙发展了一批优秀的报纸,如马德里的保守派报纸《每月报》,巴塞罗那的《先锋报》,此外还有两种报纸,《日报》和《国家报》。

小国丹麦自己拥有两种国家性日报,周日有双版或三版发行。

最后,有怎样的地位就受到怎样的尊重,我们来称赞一下日本。日本与法国相比是另一个极端的威胁。使我们悲伤的是日本的日报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绝无仅有的飞跃发展,发行量从1911年的1.2亿份一跃至1925年的1.6亿份,1930年达1.8亿份。东京的几份主要报纸占有优势的支配地位,分享了总发行量的70%,它们便是《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创造了报界的绝对记录,1930年其发行量超过1.5亿份,其中包括晚报版(1.2亿),早报版(1.2亿);《朝日新闻》为1.2亿份;《每日新闻》为1.2亿份,把这些数字除以1.2亿与人口相比较,这种对比对于法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不过,这种局势首先是令人震惊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直以来报纸在我们国家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报纸的飞跃发展通常是与经济 and 民主实践的发展处于平行状态——这一事实对于

^① 德国术语,指通过诽谤、桃色新闻取得成功的低俗报纸。——译注

德国以及现阶段的西班牙都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法国,没有这样的情况……

杂志的繁荣

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开始提及杂志的特殊生命力。这种特殊的生命力在我国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期间,它使当今法国杂志与芬兰并居于欧洲及西方世界的首位。20世纪 60年代,法国每周在每千人中售出 1.5 种杂志(多为周刊);这是英国、意大利或瑞士的 4 倍,比联邦德国及荷兰多 1.5 倍,比加拿大和美国多 1.5 倍。我们同时了解到《新闻周刊》在北非的重要性、稳定性及影响力;目前《时代周刊》每周出售 1.5 万份(包括国际版),《新闻周刊》每周售出 1.5 多万份。法国存在 1.5 多种杂志(不包括“免费杂志”及专业技术杂志),这一高数字证明了与政治日报的困难相较之下杂志的生命力。这种出版物能够使自身发展与读者需求相适应,同时它也利用了日报的衰落:对于很多市民来说,音像器材与周刊的结合已经替代了日报的阅读。

直到 1960 年左右,周刊还在思想与形式方面与战前的周刊非常相近。作为极右派存在的维希政府报纸如《里瓦罗尔》周刊或《法兰西景观》周刊及左派报纸的情况都是这样。左派报刊为自己利益推翻了它从前所忍受的有利于另一阵营的不平衡性。在 1960 年代,左派周刊在影响力及发行量方面都居于支配地位,主要有 1960 年 1 月由克罗德·布代尔、吉勒·马帝内和罗杰·斯特凡娜组成的集团所创立的《观察家》,后更名《法兰西观察家》,还有《快报》,这是一项很有影响的投机。《快报》由一名年轻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让·原雅克·塞尔旺·原施赖伯创立。他出身

于拥有《回声报》的记者之家。《快报》产生时的尺寸与《回声报》的周刊大小相同，不久它便取得了自主权，从1958年起成为政治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为皮埃尔·孟戴斯执政的准备活动作出了贡献并一直支持着他的政权。第一份《快报》对整整一代左派形成及其政治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的才华由于非常出色的弗朗索瓦兹·吉罗和德·皮埃尔·维昂松的加盟而愈为突出。“先原初原初原初①的首要才能是吸引和招募当时最享有盛誉的作者，从萨特到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离开《费加罗报》而来到这里，为了写一本充溢着年轻与勇气的“记录本”。

这些周刊在其初期阶段与非殖民地化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适应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后的新时期的能力，这一时期经济的突飞猛进，管理人员市场不断发展。这时（1958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派他的兄弟让·路易到美国学习如何制作《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类型的周刊。他带回与这些模式很相近的设计，并且引起了《快报》的转变，1959年它就有了我们今天依然能看到的这种外观。在编辑部里有些人害怕背叛最初的完美模式，害怕改变读者群体（有时他们会离开编辑部），虽然在这些人中引起了动荡不安，但《快报》的成功显示出来了，《快报》赢利了……

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变成了《新观察家》周刊。一组从《快报》来的人（以让·达尼尔和埃克托尔·德·加拉尔为中心）也同样采用了一种接近于《新闻周刊》的设计，同时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左派倾向。然而市场并没有饱和，20年代初《观

①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名字的首字母缩写。——译注

点》杂志的创立便足以证明。这份杂志同样是由叛离《快报》的人推动发展——就像分离出的蜂群又重筑了一个蜂巢,他们与让·原雅克·塞尔旺·原施赖伯的人员决裂。应该指出让·原雅克·塞尔旺·原施赖伯有着政治事业的野心,用他的报纸为他的目的服务,这并不是没有反作用的。

同样是 19 世纪年代,《鸭鸣报》典型的法国式“创立”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它在第四共和国期间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但是在戴高乐时期 1959 年间它却由一个暴发集团带动发展起来了(这使人想起安德烈·里博对圣西门的巧妙的仿作“法庭”的成功)。这样它又恢复了繁荣,并忠实于反军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传统,保持了不可模仿的嘲笑与探究混合的风格。也是在同一年时期,极右派方面,采用另一种笔调的周刊《一分钟》也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繁荣。

这些周刊有助于创建一个读者群体,并且“拉动”了很多专业出版物的发展——从修补到体育,从装饰到编织,与此同时,提供电视节目单的报纸也与电视接收机的总数平行发展。只有文学性报刊随着《艺术》及《费加罗文艺》周刊的先后消失而遭受了损失,而在英语国家,它们依然很重要,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及美国的《纽约书评》双周刊。

考虑到杂志的繁荣时期时,人们通常倾向于根据连通器现象分析,认为只是先前日报所拥有的读者的简单转移,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中的周末增刊的发展。是的,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完全代替了持续的日常阅读。一个事件是很有启示的,即《快报》日报的发展及其失败。1958 年 11 月 13 日大选前夕,让·原雅克·塞尔旺·原施赖伯和他的属下冒险进行此项投机:这种尝试只维持了几周,这证明了并不存在可能的替换,即便是

对于《快报》周刊的忠实读者们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法国国家性日报所遭遇的困难应该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

看起来是最直接原因并需要细致分析的问题,是其他媒介的竞争以及娱乐习惯和文化实践,接着是如何采取最佳的经济财政措施问题,最终仍不能逃避的是供应质量的问题,或是用一种更客观的术语来说,日报所提供的信息与潜在读者的要求之间的协调。

音像制品的竞争

我们先回到其他媒介的竞争这一问题上来。虽然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在缩短,但他们的休闲时间并没有无限地延长。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及相伴而来的磁带式录像机的飞速发展、广播台电视台及频道的增加,使观众从规定的时间中解脱出来(这还不包括出现在 20 年代末的互联网,我们将在后文中论及此项),这样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确实如此。但是其他国家的书面出版物却及时地把电视安排进它们的习惯中,更好地经受住了挑战。在法国,1950年只有 14 万台电视机,而联邦德国为 24 万台,英国为 15 万台。按比例来说,日本也在同一水平线上。然而正是这一时期法国的日报发行呈现出低迷状态,而后在 20 年代,发行量便大大下降。只对假定为固定的一些数据进行简单的相减来分析这种竞争就太过简单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到一定程度,读者群体得到的信息越多,他们希望拥有的信息也就越多。1950—1952 年间,法国广播电台设置了用于公众服务的地区电台,在所设立的省区,当地报纸出于对竞争的恐惧而以一种忧心忡忡的态

度迎接这些电台。但不久后,特别是在那些信息不灵通的地区(对克洛兹或佩利戈尔来说尤为明显),经验表明,书面出版物的销量增加了——这使得两方面的记者之间关系缓和很多。

照片占主要地位的综合新闻杂志在法国比在美国存在时间更长,这是不足为奇的。曾记载了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政治倾向的《巴黎竞赛画报》在让·原普鲁沃斯特死后似乎被查封,而在 19 世纪年代末由达尼尔·菲力巴奇复兴后,它又成为一份销路不错的杂志。这样看来,在法国,人们对电视的兴趣并没有取代他们对这些“有插图”的杂志的兴趣,而同时在美国大多数杂志都逐渐消亡了。这使人想到福兰对那位在他弥留之际仍说他将会好起来的医生的反驳:“总之,先生,我是治愈而亡!”美国的杂志是“治愈而亡”了。它们曾保持了很可观的销量,如 19 世纪消失的《柯里尔》双周刊、19 世纪消失的《展望》、也在同时期消失的《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它们的消失都是因为广告的衰落,因为这些广告逐渐被电视吸引过去了,而不是因为在电视出现前杂志所拥有的那些潜在读者减少了。

尽管如此,法国的日报在视听方面的竞争对手面前还是表现得畏首畏尾。和在两次大战间的时期一样,它们经常自我反省(我们想到日报曾对广播中报刊评论摘编的发展以及早间新闻简报发起过斗争)。马尔萨斯主义是其反省的第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是多媒体组织的数量微小。当然,有些报纸,例如《西南报》在 19 世纪—19 世纪年间地方私人电台飞速发展时期曾力图与其合作,以使其受益于报纸的潜力及新闻经验。但大部分报纸很快便放弃了——而同时在很多友好国家,地方报纸与私人电台间的“协调合作”情况不断增加。

在 19 世纪—19 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特征是由电视评

论的暂时性衰落引起的,幸运的是不久又恢复了生机。电视界当时非常失望,除了几个尽人皆知的特例节目外很少引起评论,至多是一些“编者按”。而评论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活跃,例如弗朗索瓦·莫里雅克很重视撰写一个他命名为“信口开河”的专栏,在其中提及他的选择的偶然性及一些休闲娱乐,正是这些娱乐使他留在城里吃晚餐。

因为这种萧条的情况十分反常,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归咎于总体上阅读的减少。的确,“文化实践”中各项有关我们的同胞的研究表明,杰出资本家的阅读比上代人及战前的一代人要少得多。但潜在的读者还在增加,而法国出版业也差不多经受住了不利时局的考验(尽管在海湾战争期间出现过令人担忧的“脱钩”)。

很显然,书面出版物与广播电视之间的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广告有关的。但因为广告在预算中所占比例比美国要少,这一小笔款项并不是十分使人痛苦,举个例子来说,《巴黎竞赛画报》正是因此而很顺利地生存了下来,而美国的《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却由于我们所提到过的那些原因而消亡了。总之,广告伴随着一份出版物的发展成败,而它却因此掩盖了其他有关法国报刊衰弱现象的解释。我们应该去寻找报刊衰落的其他原因,因为仅仅是广播和电视造成的竞争远不能阐明这一现象。

产品成本 国家帮助 隐蔽的款项

我们通过写出一组数据使它们的全部位置与经济动因相一致。人们往往轻视了这组数据的重要性,即便是记者本身也很少提及这样的数据:从 20 世纪初开始,日报每一期“产品”所提出的价格,按照恒定法郎来计算已经提高了很多(全国性报纸的提价

的法国外省报纸恰好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而各种新闻杂志同样也没有提高价格。也许正因为此，这类杂志在种类和读者数量上同时有所增加。

日报的高成本更让人震惊，解放后国家对日报的扶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纳税人为了他们所读的报纸的繁荣所付的费用越来越少了，这种慷慨可以回溯到解放时期，当时一种理由充分的信念居于主导地位，即优质的报纸费用昂贵。而为了从财政上秘密地保护这种繁荣，就得承认是集体为此作出了贡献，同时永远不能侵犯记者的自由。

1945年有 1.5 亿法郎被分配给报纸，其中只有 1 亿是直接援助，主要都是以间接形式分配的。对报刊附加的增值税税率（10%）是最低的税率之一。邮政费用也被定得很低。这其中还有更为隐秘的援助。正是这样，税法总则第 169 条允许报刊界以免税投资准备金的方式不去实际缴纳利润方面的税款。还有各种减税措施——记者们在所得税方面享受 10% 的减税（确实如此，在这几年已达到极限了）。还有国家对法新社的援助，它一半的预算都是由政府预订来保证，通常是理论上的预订。法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家付费，几乎就很难维持一家国际通讯社。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性日报为填满综合新闻的版面而非常依赖于新闻通讯社，而国家间接地协助地方性报纸减少了预算。正如我们所见，应该挖掘出国家带来的援助的多样性。

在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进行干预，批准邮政方面的便利条件及有限的课税。但通常这些援助可以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而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法国的干预则是与报纸发行量成比例的，甚至通过实际的利润免税来支持一些最成功的报纸。1945年，乔治·韦德尔在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考虑到这一点——许多

其他国家也许是更明智的——它们选择了与报纸的发展程度成反比的支援方式,这样便给新创立的刊物提供了特殊的支持。在日报业非常繁荣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便是这样。1926年,瑞典创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此委员会是出于一种忧虑而建立的,即不能过于支持那些最充裕的报纸的忧虑。并且,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邮政价目都为了那些更为贫穷的报纸的利益而作了调整,这些报纸的读者更加专业化,因而非常有限。法国在这方面虽然有着《十字架报》和《人道报》明显受益的规定,但仍是落伍的。韦德尔提议用一种对新创报刊的援助基金来代替第 猿 条税则时,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还应该更进一步指出一个客观的资料——大报老板们比小报老板们更具政治影响力。

在有关投资与成本的这一章中,我们最后遇到了秘密津贴的问题。领导阶层的一个缠人的忧虑,即是抵抗第三共和国的卑劣行径,这种忧虑产生于抵抗运动期间至战后。这些领导人曾幻想为一种纯净的报刊开辟道路,尤其是借助于财务流动的透明性来实现。由此产生了 1927 年 缘-怨月间颁布的种种法令,尤其是 1927 年 愿月出台的法令,禁止使用顶替人、傀儡以及产业秘密兼职,并强制每年公布实账。

道德方面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不是仅有立法从中起作用。“光荣的三十天”的繁荣结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集体投资者在交易所活动中的地位的确立损害了前面提到过的个体投机商及容易受骗的人的利益,这些集体投资者一遇到风吹草动便能够兴风作浪,我们必须全力避免他们在受惊的情况下,使任何有价值的发行归于失败。如今集体投资者明显地对敲诈报纸不那么敏感了。

另一方面,在书面出版物中,“广告”与报纸其他部分的区分

已经很明显了。商业广告更为明显地为吸引读者而设计,而在编辑形式掩盖下的广告已经逐渐衰退。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一份日报可能去触犯一位重要的广告出资者吗?阿尔费·索维在他的铁路与汽车之战中经常解释说,后者在不合理的报界受到优待,其原因之一就是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巨头们以撤回他们十分有利可图的广告相威胁,从而对报纸有着影响能力。一份报纸某天突然想起专用一长篇文章论述喝自来水的种种可能,而后接到一些矿泉水公司的极富外交辞令的电话,这些公司的“广告”在报纸的预算中占很大比重。

工会的力量

收入之后便是支出,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工会的力量。

我们还记得,1844年让·沃尔特二世是如何战胜工人们的破坏机器运动而使《泰晤士报》的印刷现代化的。注意!破坏机器运动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变得现代化了。每个人都知道书业工会的力量,19世纪印刷工人斗争的精彩历程使这种力量得以巩固。在法国,工会组织在报界中拥有的力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强大。与之相对的是通常非常软弱无力的“经济管理”,它或是暗中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或是在财政上不够强大,因而在罢工的情况下不能支持多久。结果是双重性的:一是引起了人事支出费用的增加,二是引起了对引进新机器的敌意,而这些机器引进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员工数量。1840年代《世界报》在它的伊夫利新印刷厂所遇到的困难与这一点有着直接关系。书业工会毫不犹豫地多次延长罢工时间,给日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罢工不只是短期,还有长期性的,这样便很可能引起部分读者极度的不满。

战后第一次大罢工是从 员源年 圆月 员猿日持续到 猿月 员源日。日报在报亭中消失了一个月之久,而这段时期正是冷战开始的时候。时局动荡不安,国内外事件丰富。我们发现很多读者在这漫长的几周里已经养成了不读日报而满足于听收音机的习惯。我们通常会很惊奇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读者似乎都彻底地在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失踪了。例如当属于杜卡家族的一份销量很大的“小报”《巴黎日报》自行停业时,业主们在与印刷工人的一次冲突后决定悄悄溜掉。另外一些通俗报纸(《法兰西晚报》、《巴黎人报》)曾有一刻为接受这份产业而感到高兴,然而不久他们便失望了:《巴黎日报》的忠实读者们似乎都渐渐地在自然界中消失了……

在法国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事件,这份报纸曾在 员源年 猿月至 员源年 愿月间与书业工会有过 愿个月的冲突。从 员源年 愿月起,书业工人坚决反对《解放了的巴黎人报》改动工资制度。这份报纸正需要一项发展日报中的地区版面的计划。这是埃米利安·阿莫里的想法。解放后,此人便已任这份报纸的业主。他绝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想要解雇 愿名工人。他遭到很有效的抵抗,像是破坏机器运动的延续:在巴黎大街上报纸被撕毁,甚至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也被罢工的人们占领!结果是十分残酷的:在此期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下跌了一半。

然而我们还需抵制一种倾向,即总是相信河对岸的草更绿。其他西方国家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冲突。比如美国受到了一系列长期罢工的震撼,在 员源年—员源年, 员源—员源年及 员源年——这一年从 愿月 愿日到 员月 远日这 怨天内纽约市内没有出现过报纸。在英国, 员源—员源年间《泰晤士报》周围也存在一场悲剧性的冲突,并引起 员源年 愿月 员日第 员源期出版后报纸出版的

延期。到 1893 年 1 月才继续出版——时间过于漫长以至于很多读者都离它而去了。直到澳大利亚人默多克将其收购后,《泰晤士报》才有了新的起飞。而英国报业从上次冲突后于 1897 年复苏,已取得进展。报业历史性的街区舰队街上众多报纸的起飞影响了世人,也象征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后,低廉的成本又带动了新的日报的创办。

整体上看,欧洲其他国家都要领先于法国,这表现在物质基础及优先权的更新,还表现在记者可以在计算机上对文章进行直接查封。简言之,这些国家在整个报纸制作的现代化角度都要领先于法国。在 19 世纪末期,像《世界报》这样的报纸的雇员数量还是要多于技术逻辑所需的人数。我们和日本还相差很远,在日本,社会制度使其能够冲破各种阻力,形成一种效率及结构布局,以使整个部门及其中各种协作行业发展繁荣。

所有这些经常在报界的问题中出现,所以足可以成为民族特异性的问题。法国缺乏懂得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妥协的工会,因而对报纸来说是尤其有害的。如果工会力量薄弱,它们便不敢或是不能将社会民主主义强加于它们的队伍中。如果它们力量强大,比如书业工会,理所应当或是从事实上拥有“~~精英特权~~”^①的权利,即只能把招聘名额预留给工会成员。他们趋向于扮演强盗的角色,驻扎在山口敲诈旅人。他们拥有一种极具危害性的权力,而其他与他们同样值得尊敬的工人却没有这种权力。消极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① 英语(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企业等。——译注

报亭、预订、搬运发行及阶梯效应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未售出的报刊。关于这个问题,在一种技术性的表象下,我们遇到了一些长期性的文化资料。“未售出的报刊”在法国是非常多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自由的代价,并且确实法国人一贯有兴趣在众多报纸间收集信息,而在法国也比在其他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偶然性读者。每个人都喜欢随着情绪,随着一时兴致及时事新闻的变化,今天买这份报纸而改天便不再买。只是这种行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性格挑剔的一种巧合象征,可是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还有巴黎新闻运输公司的垄断。这家公司由阿歇特操纵,诞生于解放后合作化解决方案失败的情况下。这种垄断有着多种对报纸施压的方法,例如让报社知道,如果它们过多发展它们的送报上门业务(只在几个地区有效地存在,例如阿尔萨斯及离巴黎地区很近的地方)或是邮政订阅活动,它们在报亭中便不会有很好的待遇。

令人吃惊的是,杂志的订阅销售比例明显高于日报。1980年,全国性日报的预定率只有15%,而未售出报纸的比率为20%,对于“普通类”周刊,这两种比率分别为10%和15%,专业杂志为25%和30%。新闻杂志在1970年代的发展得益于从美国引进的邮购系统。当人们知道在1950—1960年间德国的日报通过预定方式卖出了25%时,他们便开始衡量金融安全的差异了。在日本,15%的日报是在同一天内通过订阅或是送货上门的方式发行,在美国,比例为25%。

经济变化无常的最后一个侧面与集中的问题有关。这个定义是很含混不清的。集中会由于缺少竞争的刺激而导致质量的

下降,但它可以通过降低总体费用的方式以及阶梯结构给管理提供便利条件,因此保证了报界的更健康运转并使其内容更为广泛丰富。

有时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法国在两船间落水了。它没有能够建立起使人遵守的“反托拉斯”法令,1894年法令的不幸遭遇便证实了这一点——人们通常称之为“反埃尔桑法令”(用一种复杂的约束过程把一个集团的日报发行量限制在同类报纸的员数以内)——这项法律条文的缺点是似乎直接针对一个人,这必然导致反常的政治效应,由于它所涉及的企业家的周旋以及他周围的法学家们的素质,这项法令没有产生实质性效力。

在英国,世纪末存在五六家重要的报业集团,尤其是默多克、汤姆森、皮尔逊、朗文。阅读云的一项研究表明,1894年法国缘家出版公司(阿歌特出版社、赛普联通公司、埃尔桑出版公司、世界出版集团、菲力巴奇出版社)只占总销售额的1/5,而在英国,前四家出版社占期刊销售的1/3。甚至在西班牙,一个新闻事业的新秀国家里,我们也能看到员集团的稳定发展——它拥有《日报员》,还有一份著名的周刊《改革员》,以及汽车、体育等方面的杂志。

《世界报》在伊夫利的新印刷厂远远没能够全力运转,这也使它损失惨重。然而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常荣耀的原因,这份报纸的一些记者不久前曾指摘在该印刷厂编辑《这里是巴黎》周刊(不久成为深受欢迎的《星期日报》,完全达到了另一水平)的想法——英语国家的记者绝不会持有这种偏见!这也是一个广告方面的问题。因为越来越盛行的联合采购很自然地会得益于“多媒体”集团的存在。

不满意的读者群体？

相比之下，在关于法国报刊不足之处的思考中，最后还要论及的问题是报业产品与读者要求的一致性。在前一个时期，一个令人担忧的征兆已经给了人们警示。书面出版物的失信性越来越严重地显示了出来，《十字架报》以及《电视、广播和电影》周刊的民意测试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总体的问题——“事情是否如报纸所述的那样发展了呢？”~~1959年10月~~ ~~1959年10月~~ 犹豫的人回答是“是的，确实？”或是“是，差不多”。一年后，~~1960年10月~~ ~~1960年10月~~ 这个数字降至 ~~1960年~~。相反的，~~1960年~~ 被询问的人（~~1960年~~ 为 ~~1960年~~）的回答是否定的。~~1960年~~ 的人认为“与事实有很大不同”，~~1960年~~ 的人认为“事实并不像它对我们所讲的那样”。人们对电视的信任要多于对书面出版物的信任，而对广播是最为信任的，广播一直保持着杰出的信誉。

在其他减弱读者信任程度的因素中，犯错而不会受到处罚的想法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两个事例的对比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曾看到《新闻报》在 ~~1960年~~ 世纪 ~~1960年~~ 年代末报道南热塞和科利胜利到达纽约，而事实上他们的飞机却在大西洋坠毁，这一事件使其销量暴跌，但是德国的《明星画刊》及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把伪造的希特勒记事本当作真品来描述，却依然保持着平静的繁荣——他们事后从容不迫地请求读者原谅，并解释说，即便这些文章是伪造的，但仍有人相信这是真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是很有趣的。无论怎样，从这点上来说，这些赝品还是值得其忠实读者们关注的……另外一个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电视观众在图像及其明显的伪善和煽情能力面前，总是表现出一种天

真。这种天真似乎正处于逐渐消失的状态,这是公民进步的一件幸事。图像“阅读”(虽然有大量的定点实验,我们在这方面依然是落后的)的初步尝试在学校训练中的收效要比引起轰动的错误少得多,例如著名的谎报蒂米什拉大屠杀。

老实说,并不只是法国牵扯在其中。弗朗西斯·巴勒在他的教材《媒介与社会》中提供的图表展示了1945—1955年这10年间美国人对行政权及报刊的信任程度的发展曲线,其中的高低变化非常引人注目。在1945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由于麦卡锡向四周大量散布谎言,很反常地,我们观察到人们对媒介有一种相对的信任,其程度不久后有所减弱,而在水门事件时期又大为增强,至少在两三年期间这种信任超过了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行政权的信任程度。继而我们又观察到一种倒退,尤其是越南战争结束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后在卡特任总统后期又有所回升,里根被选为总统后又一次回落,并预示着一种减弱的倾向。这种倾向使美国媒介在1985年左右“莫尼卡门”风暴前夕置身于一种道德衰退的境地。

在法国,舆论中报界信誉发展的历史有着其固有的特征,维希时期的遗留存在着很深的影响。应该把解放后第一个1945年,即1945—1949年间的清晰性与1945年以来的读者对报界的逐渐不信任区分开来。

起初,在1945年,法国报刊遭受了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双重障碍。

首先,占领时期报纸的行为给它们的名望盖上了烙印。在南方,有些报纸严重通敌;在巴黎,报纸的卑劣行径损坏了自己的名声。另外一些撤退的报纸有气无力地、拘谨地支持着维希政府。在解放期间,戴高乐政府决定查封曾在占领期间继续长期出版的

报纸——在 1944 年 6 月，即南方地区被德军占领的几天后，大刀阔斧的行动开始了。正巧《费加罗报》比《时报》提前几天自行停业，政府根据情况在《费加罗报》和《时报》间划分界线，在皮埃尔·布里松的影响下，前者得以复刊——此人在黑暗的年代后期表现得很好，相反的，后者被政府查封。另一方面，对一些附敌记者的镇压要比对其他职业范围的镇压严酷得多。在公众眼中，对费尔多内这一代表人物的处决，对作为记者，被其在《我无处不在》里的文章所困的罗贝尔·布拉西的处决和对白里安的传记作者乔治·苏亚雷斯的处决，都不足以驱除有关“给人们带来极大危害的谎言”（转引自贝当的话）的记忆。

法国的这种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形成了对比——尤其是那些未被占领过、民主没有衰落过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或是那些在过去的独裁和新的民主之间的决裂彻底而明确的国家，如意大利或德国。在德国，大多数过去的报纸都已经消失，新的报纸从零起步，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名誉：《世界报》便是很好的一例，这份报纸 1945 年在英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创立于汉堡。

法国第二个特殊的障碍是报界的新人缺乏经验，很多英勇的抵抗运动成员临时充当记者，却总是没有时间进行职业学习——和炉膛拔风过快的缺陷一样，“实地培训”没能发挥太大作用。由此导致了即时的失败和而后的不幸。由于各种各样的管理错误，一些被抵抗运动成员用枪杆夺取的外省日报，在管理者渐渐变老的时候，管理方法便很不明确了。这是罗贝尔·埃尔桑在 1940 年代开始收购很多这类报纸时能够获取成功的重要原因。帕特里斯·夏侯的电影《朱迪斯·代尔伯夫》（1970）很好地展现了这一发展过程，其中西蒙娜·西尼奥雷代表了抵抗运动时期的传统。

第三个关于公众满意方面的重要论据是记者本身的素质：这

个概念过于主观，然而我们不能略去不提。当然，政界对报刊的连续性评论作出了贡献。而政界本身也并不是非常客观。因为在民主国家，政界人士和记者之间通常会出现紧张状况（同时也有相互勾结）。戴高乐将军的情况便很说明问题。他自己便是一个善于写作的人，与战前的报纸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停战后却对报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他与广播结盟——就像因突如其来的爱情而结婚一样，并至死都对书面出版物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即使不是蔑视。他经常嘲讽那些“胡乱涂写、搞阴谋诡计、四处誊抄”的书面出版物。

报界的义务论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在英语国家，人们经常讨论建立一个法庭以评判这一职业中的品行，认为关于诽谤的法律没有一处能够满足这个法庭的需要。在法国，记者们都敌视建立记者公会的想法，尤其是因为医生公会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他们一直记得这一组织是在维希政府统治下建立的。在英国，1952年出现了报刊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没有任何决定权，只能赢得它的指责与评论给它带来的声誉。它的成功是最为差强人意的，而它在阻止对私人生活最严重的伤害时所表现出的无力也是十分明显的。1955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形：报刊控诉委员会。

记者的独立性不只是通过一次偶然的受贿来定义的。还可能存在其他种类的难以捉摸的额外报酬。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但只是少数，认为报界人物永远都不应该接受勋章，因为勋章是由行政权授予的，因此会损害他们的自由的形象。

但“主要技能”给干部集团（即主编们的权威，1945年后一段时间里似乎有所减弱）及职员招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人继续顽固地坚持在工作中训练的想法：从在委员会“做销售记录”开始，就能很好地学习这种职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相反，这种

职业生活是非常耗费精力的,总会缺少文化修养,而这种修养不专心于其中是无法得来的,同时应该事先掌握一种本领。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争论),有很多的新闻学校,1893年就有14所大学中有“新闻系”。在法国,这些学校的发展是非常迟的,其中新闻培训中心(悦力)或里尔学校的声誉是非常近期兴起的。英国于1894年创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培训记者,这一组织被慢慢接受并组织带有实习及休假年的在职培训。

第十章 摇《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

为了从整体上阐明这些话题，把《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加以比较是很有教益的。这是两份重要的日报，二者都以把政治伦理和新闻道义相结合作为首要抱负，甚至是作为存在的理由，同时以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可靠性维护着道德标准的主体，这些标准有时是明确的，有时则是暗含的。这种责任感和可靠性支配着它们，使它们承担义务，并且在民族历史上某些庄严时刻引导它们采取明确的态度。

为什么是《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呢？首先是因为几年前让·路易·蒂奥洛已为此扫清了道路（他的观点的社会性要比历史性更强），他在一本使人振奋的书中初次想到了进行这一对比；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这两种享有声誉的报纸的研究要多于对它们的竞争者的研究；最后的原因是它们在各自己的国家里都有着一种特点，即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世界报》几乎是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这一特点，《华盛顿邮报》则是在近 100 年来以及从它在“水门事件”中战胜尼克松后开始具备的。

《世界报》的诞生

为了展开思考,我们引用《纽约时报》主编阿贝·罗森塔尔在1954年左右有人对他说《世界报》是“欧洲最好的报纸”时所反驳的话:“也许是,我更希望它是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某种事物,但总之不仅是一份报纸。”这句反驳引起了人们更仔细研究这份报纸的兴趣。

《世界报》诞生于1945年。它的诞生填补了一项空白。当然,那时报亭中还出售很多报纸,但这些报纸版面很小,因为缺少纸张,也没有《时报》曾有过的这种权威。《时报》在法国社会及政界中扮演一个中心角色,此外,它还是凯道赛的机关报。我们提到过,《时报》没有被批准复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形成了一组可供支配的编辑队伍,因为《时报》的撰稿人并不都是有过错的,而他们很乐于以自己的经验为一份继承性的报纸效力。这其中还要补充上临时政府的首脑戴高乐将军的意愿。巴黎解放后几个月,他开始为产生于抵抗运动时期的报纸的微小的国际影响力而担忧——虽然他可以考虑到埃马纽埃尔·德·阿斯捷的《解放报》、帕斯卡尔·皮亚和加缪的《法兰西射击手》,尤其是《战斗报》。《战斗报》在几周内便赢得了广泛的道德声誉,但他却没有提供新闻的办法,尤其是《时报》在战前所提供的国际新闻。戴高乐明确希望有“一份在国际政治方面持半官方态度又对国内政治保有完全自由的报纸。”这涉及复原《时报》最初的严肃性和稳定的声誉,同时又清除腐败的毒气,腐败曾经在1930年代毁坏了正直的人们眼中意大利街报纸的形象。

根据一项国家的协议,将军内阁及新闻部长皮埃尔·原亨利·

泰让选出了三个人委以此任,并以《时报》的不动产、印刷厂及编辑组为其资本。克里斯蒂昂·方克原布朗塔诺,原拉巴特图书馆馆长,此人拥有一批卓越的抵抗运动的报刊,是正统戴高乐主义的代表,但他几乎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这项任务。蒙彼利埃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勒内·库尔坦,曾在抵抗运动研究总委员会中很有影响,他确保了某种意大利街胡格诺派传统的延续并组建了编辑组中的右翼,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联系紧密,并公开表示亲美。

第三个人同第一个人一样很快地被挑选出来,他便是于伯尔·伯夫原梅里。他出身低微,是通过了一系列基督教等级社会培训的典范。他于 1941 年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法语学院教授法律,他在那里做过很多报纸——尤其是《时报》的通讯员,并且看到了报界道德的衰落。他通过戴高乐的任命赢得了最初的几份报刊,因为在“慕尼黑事件”期间,他对《时报》的立场感到气愤(《时报》刊登了一篇亲慕尼黑的文章,作者为政治科学自由学院的法律教授,即后来维希政府的掌玺大臣约瑟夫·巴泰勒米,此人用法律术语为法国抛弃捷克人辩护),把辞呈扔到了这份报纸的共同管理人雅克·沙特内的脸上。停战后,他任依泉学院负责人,这是一家干部学校,建立在格勒诺布尔附近。依泉学院首先是在维希政府的羽翼之下,在 1944 年 1 月拉瓦尔返回之时,它又归顺了抵抗运动。伯夫原梅里结束了佩里戈尔游击队的战争。

在《世界报》的组成队伍中,伯夫原梅里以基督教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出现。在 1945 年,他投身于这次冒险中。

为了避免脏款的诱惑,一种资金非常微薄的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制度制定出来了,其中原始股份在内部人员之间分配,而与商界没有关联。未经其他股份创立者的同意,这些股份是不得转让的。至少半个世纪,《世界报》因此得到了保护。

被克服的困难

《世界报》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伯夫·原梅里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来——很少有持续这么久的三头政治。方克·原布朗塔诺把一件雨衣挂在一个衣钩上，这件雨衣在那里慢慢变绿，被它的主人遗忘了。库尔坦上午来了，但他只局限于做经济版面。伯夫·原梅里在1959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裸体的人站在巨大的坦克前部，突然出现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是一个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受着退缩的愿望的折磨，就像中世纪的修道士在他们的修道院中反省，保护着被蛮族吞没的文明的幽微火种。他的学识，他的经验，在他的思想中印下了一种顽固的观念，即金钱具有相当的贿赂能力。他在某些晚上，像是麻风病发作一样指出他的记者们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想，但这些人内心是非常自豪的，他们对报纸依然忠诚，为参加了这次冒险而骄傲，为《世界报》产生的重大影响而感到高兴。

以前《时报》的队伍和伯夫·原梅里招聘的年轻的编辑们融合得很好，这些年轻的编辑们便是让·普朗谢、安德烈·方丹、雅克·福韦、皮埃尔·德鲁安这一代人。在几期之后（因为必须使用《时报》的印刷机），伯夫·原梅里想到一个好主意，把报纸的尺寸改为原来的1/4，即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尺寸，所有专业人员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只一年，到1960年年末，《世界报》读者达150万人，即战前《时报》的猿倍。

但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威胁已经出现了。《世界报》在经历了少年期的严重危机后才完全找到了它的基础。它遭受了右派和左派的两面夹击。最初的攻击来自共产党，指控《世界报》太过

忠实地继承了被让·饶勒斯称为“资产阶级报纸”的《时报》。一位共产党演说者在国民议会论坛中讲道：“总之，这份报纸就题目而言只是从时间顺序转为了空间顺序——从《时报》到《世界报》，而没有任何深层次的变化，就如同题目的哥特体字母一样。”确实，《世界报》初期的成功手段之一便是它继承了《时报》一定数量的读者。但是，正是从继承人的变动中，右派与共产党相呼应发起攻击。随着政治局势使得“无能的维希分子”抬头，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对1944年《时报》“因私人利益而被征用”以及对其产业被剥夺而感到愤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诉讼案，以对《时报》进行补偿告终，伯夫·原梅里为确保这种补偿，每一分钱都亲自经手。

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由政治局势导致的。《时报》创始人认为全民共和党注定依然是重要的支持戴高乐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却在戴高乐“退隐时期”开始与之决裂。同时，在1946年春，共产党在冷战开始的背景下退出政府，导致了第三种力量的产生。《世界报》因此便必须就这种未料到的第四共和国中的平衡状态表明立场。一方面是同在1946年产生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戴高乐主义战争反对政体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伯夫·原梅里当时认为是亲信的全民共和党（1947），第三种力量的支柱。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世界报》完全没有采取正统的立场。它并没有选择归顺法兰西人民联盟（1946），因为它怀疑戴高乐将军的事业中一些独裁的方面，但它同样也没有忠于在印度支那战争指挥中起着中心作用的全民共和党。《世界报》开始强烈指责这场“卑劣的战争”。它对这场战争的指责要比后来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勇士们的指责严厉得多。此外，在国际政治方面，它敌视在政府中占主导的“大西洋主义”，这种敌视态度有时由伯夫·原梅里亲自表达出来，更多是由一些“中立主义者”们表达出来，伯

夫 原梅里在他的专栏中为这些人保留着空间 :皮埃尔·埃马纽埃尔 强烈地反对美国(他后来又改变了观点)的诗人 ;莫里斯·迪韦尔热 ,很快便取得威信的波尔多大学年轻的法律教授 ;艾蒂安·吉尔松 ,法兰西学院的中世纪史教师 ,并曾执教于加拿大。总之,《世界报》坚持在苏美之间捍卫一条可能的第三种道路的观点(伯夫 原梅里对于他不甚了解的美国的看法是极为阴暗的)。凯道赛因此而愤怒焦虑了。尤其受欧洲煤钢联合体创始人罗贝尔·舒曼影响的各个相继执政的政府 ,担心外国使馆不会继续认为《世界报》有一种半官方性质的权威——而它也不再有了。这种“双重叛变”引出了一种来自于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攻势。

首先是在国内。一个正直的人、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拥护者及亲美主义者——勒内·库尔坦引发了解体的可能性。在 1955 年他就曾与伯夫 原梅里有过激烈的争吵 ,而后他们相互迁就着 ,伯夫 原梅里自视老板 ,而库尔坦难以忍受 ,他在法国一些主张温和的权威人士的支持下提出了异议。骚动、攻击、激情——此间全民共和党在门缝窥伺 ,希望能复得《世界报》并使之成为为它们效力的报纸(弗朗西斯克·盖伊的《震旦报》不能扮演这一角色)。

1956 年 苑月末 ,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伯夫疲于在失眠的夜里反复回想他的忧伤 ,忽然准备退缩 ,提出了辞职。他没有考虑到任何人。他的身居要位的忠实读者们(雅克·福韦 ,政治部主管 ;安德烈·方丹 ,对外部主管)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来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编辑们想到这份报纸也是他们的作品 ,却将被交给恶势力 ,并知道自己将会同大楼一起被卖掉 ,因而非常气愤 ,集体反对这一辞呈。莫里斯·迪韦尔热和另外一些人在重要的大学城发起了支持伯夫 原梅里的委员会。有人宣布一个读者协会诞生(这一协会在危机过后依然流产)。伯夫 原梅里

低声埋怨着，同意引起一场温和的暴力并同意回到《世界报》。当年年末，“人民共和运动”一方看到方克·原布朗塔诺回来找他的保护伞并支持伯夫·原梅里时，便知道自己已经失势了。戴高乐将军几经考虑，认为此人不管怎么不适用，仍比他认为曾背叛了他的全民共和党要有价值。是方克·原布朗塔诺的声援使情况转向对伯夫·原梅里有利……伯夫·原梅里根本不愿意人们对他提起是戴高乐在最后时刻的支持并挽救了他。而且，他之所以又回到《世界报》，首先是年轻记者们的动员，其次是各方面的友谊，这些友谊以使报纸独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外为名保护了伯夫·原梅里。

1958年这次根本性的危机促使了一项章程改革。为了使伯夫·原梅里能回到《世界报》，人们创立了一种体系，把杂牌股的股份授予了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编辑委员会”，报社中全体记者都加入其中。危机结束后，伯夫·原梅里想要脱离被他称作“苏维埃”的这个组织，但在他面前有一个集团拒绝抹杀编辑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不久后接连出现的继任危机中很有影响力。

此时，伯夫·原梅里正在加强力量抵抗外部攻击。他已经遭受很多这种攻击了。例如报界人士、幕后操纵者罗贝尔·博拉克向他提出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让他移交权力。他带着一种忧郁的骄傲计算了一下，那正是同他的体重等量的黄金的价值……

一个使伯夫·原梅里衰弱的困难事件出现在1958年缘月，是时《世界报》刊登了一份伪造的来自美国海军司令部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著名的“费克特勒报告”，费克特勒时为美国海军总司令。报告中谈到什么呢？——1954年前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西欧不过是软腹之地，对其不能有什么指望，不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外交角度来讲。因此应该抛弃它并撤至地中海流域，用阿拉伯为跳板对付苏联。很有可能在美国的海军参谋部散播着此类

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份费克特勒的报告是一份赝品。这是记者雅克·布洛克原莫朗日给《世界报》布下的陷阱,此人后来在他名为《青蛙与蝎子》的回忆录中大肆炫耀此事。伯夫原梅里所作出的一切否认都没能阻止《世界报》的名誉受损,而他必须非常卑躬屈膝地向他的读者和美国人致歉。

然而在这种衰弱的情势下,《世界报》又遭受了《巴黎时报》给它带来的甚至危及其生存的最后攻势。很多商人因《世界报》在对外政策方面所持立场而感到愤慨,同时又燃起了关于1959年征购的旧恨,因而联合起来创立了一份竞争性的报纸。这其中有法国埃索石油公司前任董事长罗贝尔·安德烈提供的石油,有橡胶(克莱蒙费朗的米其林公司),有沃姆尔银行(1959年吸收了一些前期维希派分子)的款项,最后还有来源于迪皮伊家族《小巴黎人》报的经费。此份报纸在解放时期被埃米利安·阿莫里集团所剥夺,但其中赔偿金仍可以自由使用。这样,一份在安托万·比内庇护下的《巴黎时报》诞生了。

《世界报》起初非常担忧,因为它仍感到不堪一击,而它发现了这一“产品”时便得以安心了。这一“产品”开始便有一种战略错误,不久便显示出是必然致命的——这一组人并没有真正地在与《世界报》对敌还是与《法兰西晚报》竞争中作出选择。创始者们任命富于才华的菲利普·博埃涅为主编,此人是《巴黎竞赛画报》成员让原普鲁沃斯特的手下,他投身于反《世界报》中,却渴望反《法兰西晚报》。由这一矛盾产生了版面与版面之间笔调上及态度上的严重不协调。第二个缺陷是资金的出租人对报业知之过少。他们不是布萨克、普鲁沃斯特,或者马塞尔·达索,不能像这些人在负责《法兰西日报》时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认为报业类似旺运时期的石油勘探,只需挖一个洞,建一个井架,

使利润流出来就可以了。事实上,一份报纸安顿下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至少需要两三年的亏损担保。博埃涅正是没能得到这种担保。(这一现象在 1876 年又重演,是时前中间派部长约瑟夫·丰塔内也致力于建立《世界报》的一个对手,《我告知》,这份报纸只维持了 3 个月,比《巴黎时报》多出 1 个月,他自己也在用以弥补初期不可避免的亏损方面的可支配财源上落空了。)《巴黎时报》的失败便由此产生。《法兰西晚报》推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即一场奖金丰富的竞赛,而《世界报》在阳台上观看了这场实力不当的对抗。在两个月后《巴黎时报》消亡之时,《世界报》只是暗中窃喜,它在同一时期的销量却如日中天。

“光荣的三十天”期间的报纸

《世界报》表现得截然不同。它的发行量 1873 年超过了 100 万份,1874 年超过了 140 万份,1875 年超过了 190 万份,1876 年超过了 240 万份。两种因素促成了它的成功。首先是“光荣的三十天”引起了公务员队伍的增长及广告的发展,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其次,大学生数量迅速增长,这一阶层是培养读者的沃土。法国大学生人数在 1873 年前为 20 万人,1875 年为 40 万人。在 1 月,大学生总数为 200 万人。19 世纪 70 年代,《世界报》25% 的读者是大学生,成为当时的主力及未来的保证。有些人认为在同一时期电视的迅速发展——我们曾提到过,电视观众由 100 万增至 1000 万——由于电视所提供的信息的本质,使得很多市民更要求助于报纸上的报道,这些报道能够向他们展示那些充斥视听的事件的前景。

再补充一种与局势更为相关的因素:国内政治活动的影响。

这正是孟戴斯主义时期,《世界报》及伯夫·原梅里自身都暂时收起了他惯于咕哝的怀疑主义,很少见地坚决地参与到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声援中来,至少是从初期的几个月到欧洲防务集团解体期间。阿尔及利亚战争、保卫人权、第四共和国颠覆、缘月 15 日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这一切对于《世界报》来说,如果没有维持读者的忠实性的话,就会显得太过沉重,尤其是太过悲剧化了。

还应该对一次会晤提起重视。《世界报》受益于一个其他报纸没有的基础,它在国外的销售(为总量的 1/3 左右,一个不平等的数字)及在外省的销售给它带来了 1/3 的读者,这是法国当时所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世界报》远不如《费加罗报》,或是像《快报》这样的周刊那样有着巴黎式的氛围。伯夫·原梅里很少招聘巴黎人——他所招聘的经常是来自“法国社会深处”的退休上校、公证人,或是律师们的后人,由此可能在笔调上有些平淡,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也有所内敛(如让·拉库蒂尔或是让·原克罗德·吉耶博)。这时《世界报》创办了一个名为“幽默”的专栏,好像是为了从其他专栏中脱离出来……我们在这份报纸中注意到一种统计学家们所谓的“刻画出事实的曲线”,即自觉地置身于将来时或过去时,把每日新闻置于持续的时间中。尽管如此,《世界报》仍是担心只平铺直叙事件的详情。在整个罗贝尔·戈蒂埃任主编时期,这种吹毛求疵的严格要求依然十分著名。悼念文章是十分精彩的,依照《时报》的传统,悼念文章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据说,安德烈·塔尔迪厄曾时常调整并补充自己的悼念文章)。

这一时期尤其以戴高乐和伯夫·原梅里的对话为标志。在戴高乐对报纸所怀有的所有不满中,《世界报》给他带来一种特别的悲伤,因为他认为他创立了《世界报》,又拯救了它,这份报纸却冒

犯了他。他对伯夫·原梅里说：“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当然，伯夫·原梅里在他的编辑部里并不是没有面对批评——伯夫·原梅里在 1958 年全民公决期间使《世界报》勉强地支持了戴高乐，这次全民公决确立了新宪法。但是接下来，他便不断地针砭时事，其中包括在 1954 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时，这一时期似乎是返回了《世界报》过去曾鼓吹过的“中立主义”的路线。戴高乐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是做出重要的干涉时，“天狼星”便严正地与之争辩，并在《世界报》头版用粗话训斥他。他们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特征，其中包括退缩的愿望。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相处融洽。戴高乐在私下里称伯夫·原梅里为“受挫先生”，有一天用这样的话质问他：“您就是梅菲斯特，一个总是否定的妖怪？！”在 1958 年夏伯夫·原梅里寄给他自《第四共和国的自我毁灭》中选出的文集时，戴高乐寄给他这样一封讽刺的信：

亲爱的先生：

我再三读过您自《第四共和国的自我毁灭》中选集的文章。从我从中看出了批评的广泛性及才华的多面性。

但毕竟无不能生有，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一切都会消逝，我们也是一样。

相信我吧，亲爱的先生，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尤其应该列举出一次非凡的会晤，也是在戴高乐重掌政权后的唯一一次接见，此间这位将军确实尽了全力以降服这一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报界人物——罗斯福与戴高尔正好相反，此人在收服记者方面，甚至是在应付最敌对的记者方面，都有一种相当让人折服的艺术。下面是伯夫·原梅里的叙述。

戴高乐 啊,《世界报》我看到了它的才华,它的成功,它的销量。人们传阅着这份报纸。我也读这份报纸,并且很乐于读它。可以从中懂得很多东西!这份报纸是非常愉悦人心的。

伯夫 原梅里(傲慢地):尊敬的将军,我们带着你所知的那些困难继续办这份报纸并不完全是我们的目的,但无论如何,法国的国王们有他们的小丑,有时只供他们消遣之用。

.....

如果有一天,《世界报》再不能供您消遣了,如果您认为它阻碍了您所谓的国家安全中必不可少的政策时,您只需对我们说出来,或你只需写信告诉我,我会自行处理的.....

也许是多亏了您,人们今天才能在阿尔及利亚读到《世界报》。但是在这份报纸之初,也曾以国家利益为由被征购,而我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一种公益服务的自由管理人。我重复您信中的话.....

戴高乐 好吧。这给您带来了荣誉!但无论如何,没有我,伯夫 原梅里先生,现在您就被绞死了!

1959年之后,即1959年,已经到了这个时期该终结的时候了。对比仍在继续。戴高乐 源月逝世,伯夫 原梅里卒于年末。1959年缘月两人都在国外,戴高乐在罗马,伯夫 原梅里在马达加斯加作报告。伯夫 原梅里回来的时候人们便会觉出一种转变;曾深陷学生运动的《世界报》作出了明显的转向,其标志是贝特朗·吉罗·德·兰的著名文章“醉舟”——忽然间对索邦大学及其占领者“运动”表现出很强批判性;从题目便可看出文章基调。

繁荣与衰弱

新的时代是以 员929 年末伯夫·原梅里选定主编雅克·福韦做继承人为标志的,此人是国内政治方面的专家。这是在《世界报》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斗争的继任。像过去的安托万或现在的墨西哥总统一样,人们让他自由选择,而编辑们服从他。尽管如此,伯夫几乎是马上就削弱了福韦,到福韦每天去的大楼,而在他的客人中间几乎就不维护他。

《世界报》的繁荣很快就显示出了不稳定性。员936 年超过了 缘6 万份的平均发行量,由于广告的强势增长,销量已近 70 万份。但同时总体费用也增长迅速,这使伯夫·原梅里非常心痛。《世界报》的记者们收益更多些。共同管理者雅克·索瓦容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做了很多投资,尤其是在圣·原德尼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印刷厂,因为《时报》的印刷厂已经过时了。但这一选择被认为是失败之举。

报纸变厚了,而伯夫·原梅里曾一直将其保持在 员2—13 页内。而后,这份报纸总计起来相当于一本每日发行的袖珍书。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种政治演变。正如让·拉库蒂尔在他的书《墨汁血》中出色地描绘的那样,不久前,《世界报》起到一种批评的作用,但是在 70 年代它却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大体上它是支持社会党的。雅克·福韦招聘了一些没有经历过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的记者,而他们却有着 员955 年 缘月事件后精神的烙印,关注着解放运动正在给文体及笔调中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世界报》某些关于柬埔寨及中国问题上的偏差遭到了人们的斥责。《世界报》深受中国吸引,但它却把一种对僧侣式的纯洁的皈依与一名第三

世界的战士混淆了起来。

1960年代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年代。其中有一种双重的挑战：在外部，社会党人执掌政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严肃性的出现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彩虹战士^①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在内部，由雅克·福韦的继任而产生的危机，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到了伯夫·厨梅里的年纪。《外交界》的主编朱勒·朱利安是反美的第三世界声援者，曾一度被任命，不久他又不得不放弃任命。安德烈·洛朗没能够使人信服，不久又让位于安德烈·方丹，此人使报纸形势有所好转——通过减少编制人数及降低工资，通过加强管理，通过卖掉意大利街的房产以把报纸迁往法尔吉埃街；通过促使成立由阿兰·曼克主管的《世界报》读者协会以及由成立罗杰·福鲁主管、圣·原戈班任经理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赚的钱来路正当，是令人尊敬的。

接下来的几年依然是变化不定的，在经济学家雅克·勒苏尔纳的指挥下，危机影响到广告，同时读者数量减少，这对于让·原玛丽·科隆巴尼组建的年轻的班子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让·原玛丽·科隆巴尼1969年主管《世界报》并成功改造了这份报纸。

《华盛顿邮报》的兴起

与之相应的应该是《华盛顿邮报》。这份报纸创立于1877年，1936年一位纽约银行家尤金·迈耶在拍卖会上买下它时，它

^① 法国一直在南太平洋的试验基地——穆鲁瓦岛进行核试验。1966年，法国准备再一次核试验时，遭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强烈抗议。该组织还准备到核试基地举行抗议活动，阻止核试验，前往核试基地的船只即为“彩虹战士”号。法国为阻止，而将其炸沉。事后败露，几名官员辞职，法国政府向绿色和平组织赔款。——译注

已经是濒临倒闭了。此人是一位证券经纪人,具有那些想在媒体投资,并想把精力贡献其中的成熟企业家的特点(他生于 1856 年)。他在其中注入了大量资金以革新制作系统及招募享有声誉的作者。他的女儿凯战后嫁给了菲利普·格雷厄姆,一位有修养的法学家、杰出的报界人物。出于其岳父的信任,此人在 19 世纪 80 年代掌管这份报纸,并且在晚报《明星报》倒闭之时买进了华盛顿最主要的晨报《时代先驱报》,而后使得《华盛顿邮报》有史以来第一次赢利。格雷厄姆坚持 1877 年初创制的路线:《华盛顿邮报》既是一份地方性报纸,刊载联邦地区出现的事件的详情,同时又是国内最强有力的首都报纸。

正如美国史学家戴维·哈伯斯塔姆写道,此时正是“需求卓越的人才,而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管理能力恰好显现出来”,此外还有在肯尼迪及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民主党人的友谊。而同时在另一方面是对尼克松固有的憎恨延续着这份报纸对共和党的敌视,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华盛顿邮报》创办之初,尼克松周围的人经常会满怀仇恨地指出这份报纸的特约漫画家布洛赫曾用他无情的铅笔对尼克松形象进行破坏。

一个新的转折点出现在 1970 年 1 月,长期忍受心理障碍折磨的菲利普·格雷厄姆自杀之后。这一时期《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宣称“巴西和《华盛顿邮报》很类似,二者都有着巨大的潜力……注定会继续保持这种潜力。”买主已经开始准备,凶恶贪婪的人围绕在报纸周遭。但菲利普的遗孀凯·格雷厄姆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这使人想起美国电影院中一些著名的电影。她肯定了自己的权力,选出了来自《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1970 年非常廉价地买入)的本·布拉德利任新主编。总之,她确立了一种未被预料到的权威,而当尼克松 1970 年入主白宫之时,先前那种

使报纸与总统疏远的敌视态度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卷土重来了。凯·格雷厄姆在约翰逊时期是惹人注目的对越主战派,而如今她却对其继任者的政策发起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1969年她最终决定冒险刊登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这并不是没有疑虑的,因为同年《华盛顿邮报》的股份刚刚被引入证券交易中,而华尔街根本不喜欢这样的喧闹。这样这为这份报纸创立盛名的时刻即将到来。1971—1972年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一种恒心和非凡的精力开始了对此事的调查,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项调查会使他们偏离他们所详述的那件微不足道的民主党所在地入室盗窃案那么远——直至最终导致尼克松事业告终的一场政治危机。1973年,凯让其子唐纳德接任其职,而她依然对这份报纸十分关注。由于这一退让,似乎菲利普·格雷厄姆最终通过她取得了胜利。

一种双重伦理

为了推动这两种报纸间的对比,我们可以从菲利普·格雷厄姆 1959年的一句话出发:“我想要独立和制度化。我死之前,希望看到《华盛顿邮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报》、伦敦的《泰晤士报》及《纽约时报》能处于同等地位。”

在《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初有一个共同点,实际上即是如格雷厄姆所述,缔造“一个建立在伦理准则基础上的机构”。很自然,这一切都是带着某种狂妄而发展的,作为使政界人士等待以开始一场记者招待会的记者,是难免不会受到惩罚的。这种精神状态对于两种报纸来说是十分一致的。在这一方面,迈耶在他收购《华盛顿邮报》之时为他的记者们确立的准则是很值得一提

的,其表述如下(条文引自让·朗珀蒂奥洛):“《华盛顿邮报》的首要任务是讲述事实。这份报纸承诺在它所能揭示其真相的范围内揭示出与美国及世界相关的重要事件的事实真相。《华盛顿邮报》尊重私人情理,它所刊登的一切应该老少宜读。这份报纸拒绝任何因特殊利益的联合。在考虑政治事件与政界人物时表现得合法、自由、客观。”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两种报纸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我们首先就会遇到杂文与评论之间的显著区别这一问题:这一区分在法国方面与美国报界相比总是显得非常有特点。《邮报》长期以来以其评注及观点的质量建立了权威。正是这样迈耶在战前聘用了沃尔特·李普曼,此人在整整一代人之间成为美国新闻界社论作者的引路人,是精确和权威的典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华盛顿邮报》发生了变化。这份报纸首先是评论性报纸,而后再逐渐有野心成为一份调查型报纸。迈耶已经是美国报界中最早注重民意测试的报界人物之一,并且自1951年始他便刊载了“盖洛浦民意测验”,但这份报纸呈现出本质上的变化还是在稍晚些时候。

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时期对《华盛顿邮报》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唯一一份不仅限于转载乔·麦卡锡的谴责的报纸。麦卡锡胡乱地把这些谴责加于一些人身上,这些人即是可能被他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初期影响非常敏感的人,他不惜使这些人名誉扫地,除非他们能够自我保护。至于《华盛顿邮报》,它决定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尽其所能,并由此促使这位参议员做出让步。《华盛顿邮报》促使电视台征得麦卡锡同意,以直播他在议院引导美国人怀疑共产主义的言论——这种直播着重表现了麦卡锡的火山喷发一样的性格,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期望的那样,直播使之

逐渐丧失了信誉。

毫无疑问 相比之下,《世界报》便显得落后了。它越是致力于详细地转述事实,致力于发展生动的报道,尤其是对国外的报道,就越是在“调查新闻”方面进展缓慢,它在这方面信赖其他法国的报纸,不惜在其后引用这些报纸上的话。很久以前《鸭鸣报》——一份“讽刺周刊”与全部所谓“严肃性”报纸之间的对话是很说明问题的。《世界报》直到 1960年代,尤其是 1970年代才发生转变(让·玛丽·科隆巴尼任主编期间)。在绿色和平组织事件中,《世界报》的演变是令人吃惊的。少数大胆的记者虽然犯过必然的错误,也有过困难,但在主管安德烈·方丹的支持下,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地强调一种在表象之下挖掘事实真相的意愿,这样《世界报》与《华盛顿邮报》变得更近了——但在它的猎物中还没有国家首脑,虽然它有时可能给人一种曾这样幻想过的印象……

与国家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这一点引出了对比中的第二个思考主题,即相对政府当局来说的独立程度。起初,《华盛顿邮报》的骄傲是每天早晨都能出现在各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因为这一原因,英国的报业巨头北岩爵士说,如果他成为美国一家报纸的业主,他就会收购《华盛顿邮报》。《世界报》之初,伯夫·原梅里的每周同凯道赛官员一起求见戴高乐的想法——而这一想法遭到了非常讽刺性的回绝——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样还有这样一个事实,1958年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时,基于起初的“由于公共利益对《时报》的征购”,伯夫·原梅里曾诚心诚意地恳请戴高乐再给他《世界报》的钥匙。

而且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便会发现《世界报》的管理,至少是在伯夫·厨梅里时期总体上与当局的距离,要比在华盛顿工作的《华盛顿邮报》领导者们与当局的距离远得多。在华盛顿这个显示出是世界中心的都市的外省气氛中,城里的晚宴,周末,会谈,高尔夫及网球在使报界与政界人士更为接近的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菲利普·格雷厄姆这个人来说,《华盛顿邮报》只是一份因它自身而存在的报纸,但它也同样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戴维·哈伯斯塔姆叙述了一个切题的情节。1964年,在最初的大规模种族动乱期间,华盛顿出现了一个有关市政府下设的游泳池的事件。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禁止黑人在其中洗澡一事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年轻记者本·布拉德利,后来水门事件期间的主编,“追踪报道”了这一事件,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并等待着刊在头版,但却发现他的“文章”被缩成了花边小短文。他冲进菲利普·格雷厄姆的办公室,一位白宫的合作者也在场。本·布拉德利口述了一切,而菲利普·格雷厄姆,仅以刊登这篇文章相威胁,便使这些游泳池马上关闭,并在下一年开放,且取消了种族禁令。这份报纸以同样的方式同意不刊登任何东西,而在私下里询问肯尼迪有关古巴登陆的企图(高松湾事件中)——《华盛顿邮报》是比它的同行们先知道此事的。

在这两个例子中,报纸的骄傲便是抵制政府,而在《华盛顿邮报》的传说中,我们发现相反的,麦克纳马拉,作为前任肯尼迪国防部秘书、世界银行主席、凯·格雷厄姆的老朋友,却并没能阻止《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系列有关他的行为的很具批评性的文章——友谊在事实真相面前作出了让步。

利润与贫穷

第三个比较的思考主题是与财政有关。钱是伯夫·原梅里的烦恼,有关他对钱的极端不信任的轶事有很多——而《华盛顿邮报》经常以一种非常美国式的精神断言赚钱对于它来说一直是一项最关心的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而是因为这是一条成功的准则。1957年,凯宣称:“我为现今的利润率及我们报纸的杰出性而甚感骄傲。一份运行良好的报纸可以而且能够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这一事件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证明了一家在交易所开价的公司,如果肯冒新闻方面的风险,便可以售出,即使这样有时会损失惨重。”她还说:“《华盛顿邮报》是一份家族产业。这使我看到周围其他家族企业时感到紧张,尤其是那些公司迅速衰落时。我力图启用那些积极而有能力的‘宅男’。”凯·格雷厄姆想要转交给她的儿子唐纳德一家财政状况甚佳的公司的抱负,使得她与巴耶·埃弗利娜夫人的《南方电讯报》及勒·穆瓦纳夫人的《西南报》的距离较之与伯夫·原梅里的《世界报》更近一些。《世界报》实际上是继续按一种不能真正带来利润的股份制度来组织的。

这种对待金钱的不同方式的标志之一可以从与工会的关系对照中表现出来。《世界报》极少试图去正面迎击法国总工会报业工会的行会主义。而《华盛顿邮报》却从正面采取了传统的办法。1955年的大罢工便揭示了这一点。《华盛顿邮报》致力于逐渐减少印刷工人的数量,用机器取而代之,并制出所谓“冷处理”排版。当然,能留下来的人同样也是最好争执的。因此,在1955年10月15日掀起了这场运动。但是一些被煽动起来的过激分子

痛打了守夜人，破坏了新的轮转印刷机，最终在损坏了其中一台机器的灭火器之后把它付之一炬，这是不该犯的错误。不久，凯·格雷厄姆与记者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首先是对工人表现出好感，但也不同意人们破坏“劳动工具”——这使得这位铁腕女经理在两局中都赌赢了。她消除了印刷工人的敌对态度，同时又保全了她的报纸的美国意义上的“自由”形象。

所有这些最终取决于任命负责人这一重大问题。可能在这一点上《世界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呈现出的对立是最为强烈的，一方面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产业主选择编辑部负责人，如果选择错误，对他们的惩罚便是资金贬值，还可能导报纸的破产。对于凯·格雷厄姆来说，毫无疑问，继承人自然是她的儿子。

这与《世界报》经理的任命过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世界报》的经理即使不是由编辑部任命，至少也要有他们必要的支持。我们看到这份报纸为继任斗争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起初是雅克·福韦，而后是安德烈·洛朗的失败，最后又是安德烈·方丹的退休；流失的时间，严重的分化，报社内部留下深刻印迹的心理上的对抗。这是编辑们真正的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还应知道是否在任何一家公司，甚至是《世界报》中，都希望出于效率目的，公司领导都应从受公司管理的人们中选择出来。换句话说，即是否在这些条件下作为候选人所需的素质与作为报纸管理人所需的素质是相同的。我们将等待历史来评判。

第十一章 广播：第二次青春

“在语言、绘画、舞台、文字、印刷术、摄影、电影之后，便是广播得以直接与人们的智慧、感觉和意愿相接触。广播通过它生动感人的节目，通过它自身的那种绝对的、即时的方式，成为了一种非常适应我们这个机械化、混杂而仓促的时代的信息方式。”这是1929年10月1日戴高乐将军在塞纳河畔的广播公司成立时所做演说中的一段表述，演说地点是当时还未以肯尼迪总统的名字命名的那个码头。

这位重新执政的“麦克风将军”表现出的这种敬意，在1940年代头几年中，似乎是有些反常，几乎像是悼念性的。其实，在有影响力的媒介这一角度来说，当时很多杰出人物都预见到了，广播在电视面前是会失败的。1940年代，在美国及法国，这种预言都已散布开来。电视声名显赫，似乎要把广播的声誉驱走。而在信息传播中（这在每次国内或是国际危机中都得以证实），广播保留着一种角色、一种用途及一些特殊的成功手段，所有这些就像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信誉。而人们却过于迅速地埋葬了它。

当然，在最初，广播从战争中胜利地解脱出来，人们曾认为它

会在新旧世界的政治舞台及家庭生活中支配很长一段时间，而它却被一个竞争力量所取代了。但是 20 年代初所展现出的一个时期却是令人惊奇的：由于技术原因，广播被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同时也是因为广播的自由使私人电台在 20 年代初广泛发展。

美国：宣布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看到这一现象在电视发展中也重复出现），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个年代差距。事实上是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制造了第一批调频发射机。1924 年起，美国有 150 家电台采用调频技术运行，1925 年为 200 家。美国与欧洲相比，提前了 10 年。同样是在美国，根据德国 西门子公司的一项发明，自 1925 年起，磁带录音机发展起来，替代了已经不适用的唱片，给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同时，接收仪器的电子管也有所完善，新的合金缩小了收音机的尺寸，然而新的接收机失去了 20 年代那种端坐在家庭餐厅或电影院中间的鼓肚状家具的威严。

1924 年美国的广播达到了一个不稳定的顶点：此时美国共有 100 万台接收机及 150 家商业电台，其中 100 家为了新闻或是某些节目而加入了各种网络。只是电视在美国的“起飞”要比在欧洲快得多。从 1925 年起，看电视已经完全成为公众习惯之一了。广播表现出一种感情，即带着一种悲伤的屈从——即使不是受虐狂般的那种——让出这个位子，它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它的命运，它把公众拱手让给了电视。

很快，*每月说悦子*、*每月说悦子* 这样的大广播公司开始与广播电台解

除协约,与它们的联网电台中断合同,减少用于“广播新闻”的人力物力。随着“~~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出现,更为简单的节目模式发展起来。这些主持人的作用是充实唱片与广告信息之间的空白时间。天线只为少数小的“本地”电台服务,这些电台由于地方商人的广告而勉强维持下去,而其价位在此期间也不停地下跌。需要指出的是,调频技术发展缓慢了,而调频技术曾代表着在 1950 年代广泛应用的一种现代化;这是美国广播生命力衰弱的象征。现在美国大多数电台仍用中波调幅进行传送,这在法国看来是完全过时的了。

美国存在三类广播电台。首先是人们称之为“~~精英~~”的电台,约占总数的 ~~10%~~,用一种可达 ~~5000~~ 瓦的功率传送;区域性电台占 ~~30%~~;还有地方性电台,规模很小,只在 ~~100~~ 英里至 ~~100~~ 英里之间运行,所及范围也只在方圆 ~~100~~ 英里左右。一种想法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接受,即按照广告客户的意愿,把听众划分为均匀的顾客群体。人们为广播节目及新闻的内容越来越明显的衰落感到惋惜。这样,描绘出未来几十年的特点的一种差别便体现出来了,这种差别即是在作为背景的广播与我们注意收听的广播之间的差别,以及在一个时期内组成公共场所中、家庭生活中或是一个大学生寝室里“有声背景”,与那些我们只能专心去听的节目(尤其是大学的广播)之间的差别。

欧洲:最后的美好时光?

1950 年代初,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拉丁语国家,电

① 英语,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即 ~~DJ~~ ——译注

② 英语,开敞信道(据《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科学出版社 ~~1980~~)。——译注

视还没有真正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工具和社会工具确立下来。在法国，~~1950~~年代末统计出的电视机数量为 ~~1500~~万台，~~1960~~年代末为 ~~1500~~万台。与美国相比，英国和法国差距不是十分明显，但是 ~~1950~~—~~1960~~年间对于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已然是无线电广播的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磁带录音机到达美国是在稍晚些时候，它曾给不同国家的专业人员的职业带来了新的自由，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开创了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时期——由于电台自身的结构，这两个国家对磁带录音机的使用要比在美国巧妙得多。

在英国，~~1950~~—~~1960~~年间，接收机的数量继续增加，从 ~~1500~~万台增至 ~~1500~~万台（平均每 ~~1~~人一台）。从整个世界角度看，市场已经饱和，或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似乎已经饱和了。~~1950~~年的约章起初签订 ~~1950~~年，从 ~~1950~~年 ~~1~~月起又续约 ~~1~~年，~~1950~~年 ~~1~~月 ~~1~~日再次续约，这次为 ~~1950~~年。这时在英国已经出现了私人商业电台，而广播依然处于支配地位，英国政府对其进行保护并禁止任何商业竞争。董事会制度一直生效，它负责任命 ~~1950~~年的总经理（因此必定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并对其进行保护）。

~~1950~~年提供三个广播频道。第一频道，“国内广播”，它更贴近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详细报道国会的工作，播放音乐会、戏剧、改编的通俗小说，这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大型综合频道，它在苏格兰及加勒比海地区都设有分部，并且还负有确保面向学校的广播节目的职责，这种节目在法国一直就发展得更好些。第二个频道是娱乐性的“轻松节目”，用轻音乐作背景乐（爵士乐、歌曲、摇滚），再晚些时候是流行音乐，还有简明新闻，尤其是服务性新闻。“第三套节目”用于播放戏剧、诗歌、音乐，丝毫不向蛊惑人心的宣传让步……（~~1950~~年创立了播放更为流行的音乐第四套节目，不久后成为一号广播电台。

在先前的集权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广播又是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联邦德国,最初是盟军支持了德国广播事业的复兴。1945年有人统计出,有150万台接收机,1946年为150万台。除了1945年重建的面向国外广播的德意志电波电台及主要面向民主德国广播的德国广播公司,主要都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上的。实际的权力是与各州的权力持平的。广播电台在各州根据一个网络系统组织起来,并播放本地节目。与法国正相反,仅以此为基础,在一个联邦机构——德意志广播联合会(ARD)的内部,人们组织了一种协作,但是这种协作是非常松散的。

在当时的意大利,情况没有什么不同。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创建于1954年10月,取代墨索里尼的广播公司。它的原则即是垄断原则,在邮电部部长的控制下,有两个中间团体原则上保护负责人及记者,帮助他们抵制压力,还有一个注意政治独立性的国会委员会(它的一种倾向是根据不同的政党的影响,反驳任命或是删节节目表)以及一个关注节目质量的文化委员会。战前我们注意到的这个国家的滞后依然部分存在:1945年只统计出100万台收音机,1950年是150万台。

欧洲的两个极端之间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是收音机配备非常好的国家,同样也是在那里,市民们更多地读报纸,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好相反,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法国:才华与桎梏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垄断的局面。从战前开始,自由和多样性就衰退了。法国也是一样,严格地实行了垄断。我

们曾提到过自“奇怪战争”之前开始，达拉第是如何建立集中制，又如何使之在 1940—1944 年间得以加强的。这时延续性占了上风，达拉第、维希政府、戴高乐。1940 年 6 月 18 日的一项政府法令征用了所有的私人电台，1944 年 7 月 16 日^①变成了 1944^②，即一个在附加预算基础上运行的公共政府部门。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所谓的“外围”电台，它们在法国没有播音室，但却从相邻的别国用长波对法国进行广播。法国广播公司^③创立于 1944 年解放之际，它的前身是维希政府期间创立的法国广播 国家拥有其资金的 100%，法国广播公司于 1944 年控制了蒙特卡罗电台。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广播公司还控制了欧洲一号电台 100% 的股份，这家电台与它在萨尔州的发射台一样，诞生于 1944 年。

还应列举出于 1944 年代初创立的卢森堡电台。这是一家植根于地方的复合型电台，却有着国际化的野心。它的英语节目在英国赢得了大批的听众，因为当时法国电台出于谨慎，在周日不播放任何轻松娱乐性的节目，而仅限于布道或是宗教音乐，卢森堡电台正是从这一缺口涌入的。在法国这方面也是一样，该电台能够提供一些通俗的节目，在法国北部和东部深受欢迎。1944 年 6 月，由于私人资本的介入，这些节目又得以复兴，同时哈瓦斯资本也出现在卢森堡电台中。

在国有电台方面，地方发射台在 1944 个无线电传声区得以重建，但与战前相比集中程度进一步增强了。地方发射台大概可以完全地接替巴黎了。当时存在两家广播电台：一个是有着著名的广播节目，尤其是音乐节目的全国广播网，也是在英国第一广播网

① 法国广播公司。——译注

②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译注

③ 法国广播投资公司。——译注

和第三广播网之间的一个中介者 ;另一个是更受欢迎的巴黎节目广播。索邦电台是 1925 年起才开始组建的 ,它以中波向首都广播 ,这满足了大学生们很久以来的愿望 ,在下面的欢呼中可以表露出来 :“江河是幸福的 ,因为它们可以在床上赶潮流 !”1926 年末 ,音乐占主导的巴黎国内广播电台诞生了。

1926 年末有 150 万台接收机 ,1928 年 200 万台——这一统计数据缩小了法国与其邻国的距离。广播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皮埃尔·舍费尔的影响下 ,广播艺术发展起来。此人是一名工程师 ,它的弟子们很乐于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创立了“尝试工作室” ,服务项目不久便与“尝试俱乐部”同样发展。“尝试俱乐部”由诗人让·塔迪厄领导 ,人们在其中充满激情地为改善“广播效果”而努力。同样是这一时期 ,录音技师这一行当兴旺起来。在法国广播电台 ,人们称之为“大耳朵”。在内容方面也有很多新生事物。在通俗领域 ,这家电台能够赢得一大批听众。这一时期说唱艺人的节目“蒙马特尔的格勒尼耶”很流行 ,其后是“盐盒子” ,在 1930 年代初戴高乐时期被取消了。这一时期达克·皮埃尔和弗朗西斯·布朗歇的节目“嘲笑派”取得成功 ,这也是让·诺安、亨利·斯帕德、安德烈·吉卢瓦等人的辉煌时代。米舍利娜·桑德雷尔的“五点钟约会”和法国女人们谈论谁是最特别的关心她们的人。在一个更有抱负、有知识的范围内 ,尝试俱乐部集中了一些有才华的撰稿人 ,如弗朗索瓦·比耶度、让·舒凯、罗兰·迪比亚尔 ,这家电台在广播发明方面、戏剧的演出方面以及滑稽性方面都表现出了很旺盛的生命力。大型文学采访也是这时开始的 ,如罗贝尔·马莱与保尔·莱奥托的对话 ,通过这次会面后者赢得了新的声誉 ,还有安德烈·纪德与让·昂鲁什的对

话。

这一时期在节目质量角度讲是非常辉煌的,但也应指出,在新闻方面便不那么值得称道了。因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的控制都很紧。有一个例外,便是美国,由于其广播的衰落,它越来越不能说明问题了,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推崇的例子即英国及其广播电台。即使这样,事情总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冲突产生了,尤其是产生于政府的一种忧虑,政府担心高卢、苏格兰、爱尔兰的民族离心力会发展起来。例如,1953年广播与安东尼·艾登政府间的冲突便是有力的证据,该政府试图阻止广播节目影射任何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至少在国会公开这种讨论的两周前不可以这样做。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加勒比海地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进行广播讲话。但是从1954年起,部长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广播是自己维持治安的。

在联邦德国,州与州之间根据其多数派是社民党还是基民盟,是左派还是保守派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例如在希特勒时期,社民党占主导的省份,广播是十分雄辩有力的,而基民盟统治的地区却相差甚远了。

最后来看意大利。这一基督教民主国家直到1954年才放弃了其在广播方面的独家经营公司,而后它得同意与左派分享控制权。

至于法国,它是被包括在那些集中化最强的国家里。在这些国家中,展开的斗争预示着那些将危及电视的冲突。

鉴于广播的声誉及它周围的神话色彩,尤其是战后以来广播在选举中的影响力,接连的法国政府都非常关心对广播的控制。一些强烈的危机便可以证明。最初的危机之一是在解放后不久,加斯东·德费尔任信息部秘书期间。1954年10月,戴高乐离位后

不到两周,德费尔便罢免了自1958年以来由戴高乐指定的广播负责人克罗德·布尔代。猿月 猿日,他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经理,弗拉迪米尔·波尔谢。此人在战前曾是巴黎邮电电台^①的戏剧节目负责人,同时他还创设了“广播新闻的政治经理”之职,并厚颜无耻地将其授予了一名记者,《人民报》的主编亨利·诺盖尔——一位社会党信息部部长平静地委任本党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任政府广播的要职。这位部长的信誉没有受到指控,但是此间的过程是再意外不过的了——直至人们以罢工相威胁以示抗议。诺盖尔却没有在原位上少呆,只不过是职衔略有不同。

共产党脱离政府及冷战的开始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第三势力政府通过使人想起社会制度左右面临的双重危难而证明了它在广播中的影响力。自从戴高乐于 1958年创立法国人民联盟以来,他便被禁止接近任何国家电台。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不再是 远月 猿日那个人,而是一个几乎叛逆的政党的首领。直到 1958年,人们再也没有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他只通过强迫手段在电台被接待过一次,那是在 1958年立法选举的选举运动范围内。任何一次他以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席身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没有被广播,无论是全部广播还是部分广播都未曾有过。就像一种普遍的钟摆效应,这种排斥对于当权的戴高乐派来说,也为其 1950年代一些相对应的行为提供了借口,而这些行为也完全是应受责备的。

1957年至 1958年间的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记录道：“皮埃尔·亨利·泰让(全民共和党的信息部部长)向部长会议抱怨一次大规模的巴黎报界罢工之后”，“……广播中,所有人都在

^① 法国的国家电台, 1958年12月1日。——译注

整天议论此事”。他还写道：“我们的对手比政府的支持者们呼声更高，它便是《鸭鸣报》。”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始于 1959 年 1 月 1 日。这一天，共和国总统在斯特拉斯堡做了一次有关欧洲的长篇演讲——一篇他很自然地认为很重要的演讲。出于一种平常的自恋，他一回来便匆忙赶往电台，却发现这篇演讲并没有全文播报他的演讲而只播了一篇很长的摘要。由此他抗议道：“主要部分被毁坏了，这是一个低能儿的作品，一个懒汉的作品或是一个破坏分子的作品。我马上打电话给科西阿斯科·原莫里泽（他的办公室主任），给我召见密特朗或弗拉迪米尔·波尔谢（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信息部部长，波尔谢是法国广播电台总经理），或是他们两个。”奥里奥尔让他们记得：“对没有才华、没有诚意的实习记者以及广播新闻中的新无政府主义者讲，国家元首的咨文或演讲应比任何消息都有绝对的优先权……我不接受这个摘要。这是一种破坏活动。这个文件具有极端重要性。应该全文播报甚至请一位部长来评述。我等着回复。”樊尚·奥里奥尔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政界人物，在 1940 年代便开始了政治生涯。当然，对于他来说，很显然广播是为政府服务的。直到再过至少 19 年后，公共广播和电视才认为没有责任必须播报报纸中有关政府首脑的宣言，甚至是不重要的宣言内容，或是关于他们的行程，甚至是附带的旅行等。

令人吃惊的是，樊尚·奥里奥尔任总统期间不停地担心坐落在格勒奈尔街的法国广播所在地可能遭受武力打击——或者来自法兰西人民联盟，或者来自共产党方面（这些始终是马拉帕尔泰综合征）。1959 年 1 月 1 日，他写道：“我已要求克耶（议会主席，激进派）清除电台中指导所有广播新闻的共产党人。”而事实上，1959 年 1 月，弗朗西斯·克雷米厄，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被

免去广播新闻主编之职。1935年11月1日,奥里奥尔在部长会议上讲到:“电台罢工是重要的事,因为法国工会会员技师们阻止了广播,那么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危急情况下——共和国遭受危难,或者是在战争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总工会会员技师们和共产党员中断了广播,就不可能把这些告知我们的民族,也不可能征召人民。”

带有各种倾向的记者们相对峙的“巴黎论坛”节目在当时是很少的真正向信息自由敞开的窗口之一。由此它也遭遇了很多挫折,经常地被中断、取消或延期原定节目。

这就是接近1930年代中期的情况,已经预示出的衰落前期。然而下面是出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腾飞。

1940年代:出乎意料的崛起

1940年代的重新推进中,一个主要的成功手段是1945年晶体管收音机的发明。这项发明归功于贝尔电话公司的三位美国学者。晶体管是一种半导体装置,它可以增强电流。这种系统自1945年开始被广泛利用,不久便同时使接收机的降价及其微型化成为可能,因此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便性和可动性。人们从拥有唯一的家庭接收机过度到了拥有多个“晶体管”——就像人们所说的借代修辞(然而这给统计带来了困难,因为广播的公用事业收费与一家仅一台收音机没有关系了,直到电视公用事业收费的出现使得广播的收费被取消)。

广播于是随着那些至今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的发展而体现出一些未被发掘的优点和一种出乎意料的影响力。这时期共和国面临着双重威胁,代表性的有1956年11月阿尔及尔的“街垒

事件”及 1958 年 5 月将军军事政变。戴高乐将军之所以能够在四天内使得“一小撮”将军及一伙叛变上校被解除武装,那是得益于著名的 5 月 13 日电台和电视台同时广播的干预:“现在政府受到嘲弄,共和国受到威胁,法国的复兴被损害,这些是谁做的呢?唉!唉!唉!正是被那些以服从为荣誉、为责任、为理由的人们所为……法国的男女老少们,看看现在的状况,法国将会走向何方?法国的男女老少们,请助我一臂之力!”如果说首都有众多居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戴高乐(然而我们要注意电视机的数目还没有超过 100 万台),阿尔及利亚部队则是通过“晶体管收音机”而得到的信息。戴高乐强烈地劝诱他们不服从反叛首领,这些晶体管收音机而后便使阿尔及利亚士兵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愉快起来。这样,广播便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再次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1958 年 5 月运动期间进一步被证实——此间它为大学生们的城市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成功手段。

在这些年里,收听习惯逐渐发生变化,同时电视和广播之间形成了一种分割状态。前者是晚上(电视还只是在白天结束时候开始播放),后者是在白天,还包括其在汽车中的垄断,而汽车的数目也同样迅速增长。直到 1960 年代才出现了电视对日间广播的一种威胁,而后者今天依然在法国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一个新的年龄阶层、购买力弱的未成年人能够接近广播,这必然影响到广播的内容。1958 年以来,月报态度发生变化及 1958 年在法国创立的欧洲一台的影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弗兰克·泰诺及达尼尔·菲力巴奇的节目“伙伴你好”诞生于 1958 年,并带来了“耶耶风格”的流行风。

广播的这种新生影响力使它重新确立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这并没有促使政府、戴高乐及其追随者放松控制。1960

年猿月,将军致信他的总理乔治·蓬皮杜:“一些外国电台设置在外国,因此逃避了我国的法律条例的控制,并享有特殊的税收制度,同时把它们的企业建立在我国听众以及它们没有对等交换而得来的便利条件基础之上,这些电台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坚决不能接受的例外……必须使这种存在状况终结……”换句话说,人们切断了欧洲一号电台、~~欧洲~~蒙特卡罗电台)及~~欧洲~~即当年改名的卢森堡电台)在巴黎的播音室与其在萨尔州、卢森堡或摩洛哥的发射台间的电缆。这种切断的唯一威胁是~~欧洲~~年缘月未促成了~~欧洲~~及欧洲一台的态度转变。

~~欧洲~~年,我们又注意到一个很有意义的情景。共和国的新任总统乔治·蓬皮杜任命多数党议员阿蒂尔·孔特为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即~~欧洲~~年改革建立)的第一任总经理。此人有一种南方的激情并且很有勇气。几个月之后,在政府很担心也看到阿蒂尔·孔特具有太大的影响力之时,冲突便显现出来了——孔特担任着法国广播电视局第一任领导,而又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深受人民欢迎。爱丽舍宫及马蒂翁宫^①,尤其是信息部部长菲利普·马洛对此表示忧虑,担心阿蒂尔·孔特的信仰和个性越来越倾向于右派。马洛认为阿蒂尔·孔特纵容法国总工会及共产党员,并对此表示愤慨。当然,正如我们将论述的,法国总工会对电视导演的影响力不是虚构的,但马洛很容易地向阴谋的传说及秘密力量做出了让步。下面的资料转自阿蒂尔·孔特后来的一本书(《自由的人》,~~欧洲~~年在他倒台后出版):“~~欧洲~~年缘月缘日,总经理丹雅尔先生一个引人注意的记载:作为我们谈话的后续,我今天接待了广播制作者中的工人力量总工会代表(在这个

① 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所在地;马蒂翁宫,法国总理府所在地。——译注

领域，工人力量总工会比在另一些活动部门更倾向于右派），他们向我证明了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景况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了，我通过这些人的知道此事，而他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左派分子（注意樊尚·奥里奥尔 1959年前使用的词汇的重复），现在他们成了真正的‘政治清洗运动’的对象。近期有些节目，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都是不可取的。其中包括皮埃尔·布泰利耶的分析各种不同流产技术及无害药物的节目。我还没有提到法兰西文化电台，一个一直为共产党及法国工人总工会保留的论坛，曾公开宣称广播公司经理萨勒贝尔先生和法兰西文化电台的负责人梅拉夫人是客观上的同盟者。”对于菲利普·马洛来说，毫无疑问：红色分子在那儿！马洛简直是麦卡锡的简化版。“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项改组没有马上介入的话，等待 1959年财源的微不足道的增长是无益的——这次改组是以将萨勒贝尔先生、梅拉夫人以及与他们政治上有关的撰稿人除名为开端的。”

资料很清楚：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例，一位部长利用财政武器以重新把握自由的一只手，而政府力量打算把另一只手交给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在这种衰落过程中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用象征性的词汇来说，即如果说马洛得以使孔德离开，孔德也在其倒台过程中把马洛拉了下来，他们像彼此纠缠的两个决斗者一样一同倒下了。

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情节是出现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及雅克·希拉克进驻马蒂翁宫之后，后者指控欧洲一号电台“讥讽”，这一指控导致其负责人莫里斯·西耶热尔离位（“讥讽”一词在报界依然很有名，而这一事件由西耶热尔本人在他的一本名字很诙谐的书《1960年，足够了》中讲述了出来——此书是他任电台首脑的职业过程）。

然而,如果说政治对新闻信息广播依然影响巨大,那么与之相对,在行内人士所谓的“节目”的这一方面——即广播中所有除新闻信息以外的部分——尤其是在欧洲一号电台的影响下,现代化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和月报一样,长期以来都是非常拘谨。1934年,特别是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诞生以来,在一位能干的广播人士罗兰·多尔丹的影响下,该电台得以成功地更新。我们还应提起法兰西文化电台及法兰西音乐电台的出现,它们是原来“国家节目”的继承者。1936年,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只达到10%的收听率,而卢森堡电台为15%,欧洲电台为10%,但是国内广播电台在1937—1938年,这年辉煌时间里赶上并超过了这两个对手。

在法国,最后一个时期,即20世纪最后15年,有两个问题居于主导地位。第一个问题:在激进民主主义集中运动趋向于集中首都及几大地方城市中有着非常广大收听群体的电台之时,作为一种“临近媒介”的广播,如何发展其所拥有的各种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如何在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间寻求平衡?依靠技术的进步——随着波段和调频、接听设备、立体声技术及不久后简化广播连锁站的卫星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生事物产生了,这便是所谓的“自由”电台。

在美国,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反向的。与法国所发生的一切相反,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我们注意到了在某些圈子中有一种反对“一切为了利益”原则的行动。美国的杰出人物们被一种忧虑困扰,担心商业动因有可能使广播成为最为广泛的大众的专有仆人。由此产生了非商业性的电台,由国家、各种机构及慷慨的资助者提供资金,并且有一种教育性的特点。1952年,10%的美国人可以收听到非商业广播电台。这些电台由两个广播网组成。

最重要的是公共广播电台(翠芬)，创立于 1924 年，1925 年开始应用卫星传播，每周广播 1 小时的节目，分配到所有“使用同一商标”的电台中去，具有代表性的是每天傍晚时播出的 15 分钟名为《考虑周详》的深度新闻节目。1925 年起，纽约、辛辛那提、旧金山、洛杉矶及明尼苏达州的非商业电台联合起来创立了第二个广播网，播送很多古典音乐，这便是美国公共电台(翠芬)，介于古典音乐台及法兰西音乐台之间。

这一进程使商业广播的水平有所提高，并且不时使之摆脱平庸状态。一些大公司又重新给电台带来了一些利益，这些电台也同样受益于卫星，卫星的发展加强了有“网眼”的网络系统。1925 年至 1926 年间，加入广播网的电台已由 1 增至 10。

“自由广播”的飞跃发展

欧洲方面由“自由电台”的出现支配着，“自由电台”的出现对于部分 1925 年代的人来说是一部史诗，有着“苦碱式战争”的或感人或荒谬的全部特点。司法上不能确定的事情有很多。在拉丁语国家中，1925 年 1 月这代人的思想中，通常新活动部门的出现必须经过一个司法空白期：“禁止禁止。”这是一个天真的人们热情促使狡猾的人大量涌入的时期。这一切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由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云悦)的存在，各波段依然严格组织起来并服从管理。

“自由电台”的始祖是 1924 年一家用荷兰语开始广播的电台，即位于荷兰海岸外海的贝罗尼卡广播电台。但真正的“自由电台”广播是在不久后在英国开始的。1925 年开始广播的加洛林广播电台是值得赞颂的，它的发射台安置在英国海岸外海一艘生

锈的货船上,经常有沉没的危险。这家电台曾在 1938 年至 1940 年间中断播出,而直到 1943 年 1 月 10 日才完全停止。因此它经历了整个大转变时期——1939 年。

在法国,外国电台使得广播系统有所放松。在英国却完全没有这些。与电视相反,1931 年直到 1938 年对广播控制都相当严格,直到 1939 年 1 月才放弃了对 14 家国家广播电台的垄断,商业电台逐渐建立起来。加洛林广播电台促进了整个时代音乐节目的播出,例如披头士音乐(其实这个乐队最初在法国西北海岸更为流行)。

“自由电台”这一表述是 1938—1939 年间源自意大利。在那几年里,达尼洛·多尔奇集团在西西里一个中型城市帕尔蒂尼科(1934 年人口)开始暗中广播,向公众揭示西西里的贝利亚居民成为牺牲品的不公正的事。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传说。但是自 1939 年起地方电台才真正发展起来。第一家诞生最早并延续下来的电台是安科纳的埃马纽埃尔广播电台、米兰国际广播电台及帕尔马广播电台。1939 年末至 1940 年初“自由电台”数目倍增,不久便达 14 家。正是在它们的压力下意大利立宪法庭(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是先进的)允许地方广播电台存在,这引起了电台数目的又一次过度增加:1940 年在意大利有 14 个国家,而那不勒斯便有 14 家!这完全是噪音,但最终每一家都在缺乏听众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极大的讲话的乐趣……

1940 年波伦亚事件象征着一个新时代。这一年这座大学城出现了大学生动乱,一名极左派战士弗朗切斯科·洛鲁索在与警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艾丽丝广播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政府当局发现了(他们已经忘记了 1938 年 1 月事件)一家这种类型的电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体现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骚乱震动了

波伦亚整整两天，艾丽丝广播电台领导了这些运动，从一个街垒到另一个街垒……

而后，这些年所有对意大利的不满都在这些新生电台中表达出来：女权论者、拒服兵役者、同性恋者、失业者、擅自占空房者等。但同时商业电台开始出现，并逐渐占优势地位。当这种电台不具政治色彩时，它的色彩便是淫秽的：卢玛广播电台创立的广播脱衣舞（法国 20 世纪 60 年代“快眼”莫洛托夫将与它相匹敌）；我们可以想到 裁云 的至死不渝的情人们拒绝着电视并大声嚷道：“在广播中的景象真是更美妙！”自 1958 年起，这些商业电台集中在国际独立广播协会的旗帜下。

比利时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1958 年起它模仿意大利，但也有些特殊之处。黑水广播电台（~~砸碎罪恶皇冠~~）创立于 1958 年，如果没错的话，这是第一家提供莫洛托夫鸡尾酒^①详细处方的电台。创立者们对现状十分不满，尤其体现在环保主义方面。而后很多电台开始在地位稳固之前走出秘密状态以变成正式电台。1959 年 1 月起，瓦隆允许了这些电台的存在，1960 年，在佛莱芒也允许其存在。这段历史几乎是遵循承袭了法国的历史。

1960 年，在美国的 2 亿人口中有 2000 家合法电台，而在拥有 5000 万人口的法国只有七八家是经许可经营的。国有电台方面，法国国内广播电台、法兰西文化广播电台、法兰西音乐广播电台而今属于法国广播电台，这家公司产生于 1958 年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分裂期间，同 云罗 一样，是 20 年代末让·加雷托皮埃尔·科杜创立的地方性专门电台（“有声背景”，由无线电操纵的温和的声音）；外围电台方面，卢森堡电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让 原

^① 莫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用玻璃瓶装汽油当成炸弹。即汽油弹。莫洛托夫，原苏联外交部部长。——译注

法兰的推动下采用了缩写名称 **欧洲一号电台**变成了“欧洲一台”……最后要提到的还有覆盖南部的蒙特卡罗电台以及在西南的安道尔电台。

很反常地,自由电台的开场却是在电视中展现的。在关于**1967年** 猿月市府选举的政治评论之时,一位年轻的生态学家领导人布里斯·拉隆德出现在电视上(因为他在巴黎赢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人们邀请了他),他忽然讲道:“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他拿出夹在膝间的一台收音机,放在面前说道,“仔细听,你们第一次收听到名为绿色电台的私人电台。”他宣布了一种新的自由的诞生。人们事后知道,事实上他在几米处的幕后有一个同谋者,拿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发射机。这没关系!这一时刻是创始性的。绿色广播电台而后成为了费内斯姆绿色广播电台,布里斯·拉隆德也变成了部长。

这一时期 **1967年至 1968年**间,人们带着一种阴谋家的神态到意大利的朝圣地,去看怎样修理廉价的发射机。工会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作用。正是这样,钢铁工业的衰落使法国总工会中产生了“洛林钢铁之心”或法国总工会“职业救助”。在某些地区,自治主义者也加入到这一活动中。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公开的政治性电台:带有吉斯卡尔主义倾向的蓝线广播电台及社会党的电台里波斯托广播电台,后者对社会党第一任秘书弗朗索瓦·密特朗进行了指控,因为他 **1968年** 远月 圆日在蓝线广播电台中发言。

在“自由电台”中,人们预计到很多执政的社会党人都会到这里来。新的通讯部部长乔治·菲尤把在运动期间的意愿谱成了曲子。从 **1968年** 猿月 怨日开始,一项规定垄断违法行为内容的法律直至今日仍被法国广播公司严格监督,这家负责发射台的公司也是 **1968年**从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中分离出来的。而后 **1970**

年 远月 圆日又颁布了一项更深入论及电视的条文,并在其中第一款中规定“视听交际是自由的”。同样是这项法律创立了视听通讯的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其职责包括分发广播许可证及安排调频波段。

这几年中两次有关频率及广告的大型辩论占突出地位。令先驱者们惊讶的是,人们发现频率是一种稀有的财产(虽然军队已经同意逐渐解除对其所拥有的 频段,甚至是 频段- 频段波段的控制,除了在边境地区外,各处几乎都已解除控制),因此需要重新组织分配。这便需要一个仲裁人和一名警察——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同时它又充当红娘的角色,因为它力求促进亲密关系的产生——虽然这些关系很少能够持久。

至于广告……是否应该允许地方私人电台播放广告呢?很多人认为广播应该是非常客观的,避开市场上编辑们的粗暴言语,而依靠听众的支持和自愿服务而存在下去。另一些人反驳说这一点是完全虚伪的,如果不同意播放广告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掩盖广告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广播发展之初,莫里斯·普里瓦时代中,所有胡乱删改的形式,所有的影响都被怀疑与隐蔽的钱款有关。“是的”,前者反驳道,“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播放广告,那么这些广告就会严重影响到广播节目,这样能吸引广告客户的‘大型电台’便会挤垮‘小型电台’,法国音乐台()便会毁掉阿利戈尔广播电台。”

阿尼克·克让和弗兰克·埃斯凯纳其在他们 年出版的《调频,自由电台的疯狂历史》一书中饶有兴致地讲述了这段历史。起初,原欧洲一台记者乔治·菲尤倾向于认为最好是允许播放广告,与此同时对其进行控制,总理皮埃尔·莫鲁瓦出于原则拒绝听从他的意见并因此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赞扬。在社会党

方面,他们经常引证这样一段回忆:1968年,一家商业电台在智利通过煽动卡车司机反对政府而促使萨尔瓦罗·阿连德下台……

书面出版物也是朝同一个方向推动的,不太情愿看见广告从它手中溜掉,毕竟它已经因电视而受损了。但是必须性马上便呈现出来了。政府预计提供给“自由电台”的微不足的援助(最高援助是给第一家电台 100万法郎)并不能够使它们生存下去。1969年 10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忽然之间改变想法,同意广播中播放广告,并在他访美期间突然宣布了此事。

应该重现当时的氛围——私立学校的支持者不满情绪高涨,直至引起 1969年 12月 10日在巴黎的游行。社会党担心并感到愤怒,因为右派政党可能会反对他们指控那些人为“破坏自由者”,这对于不久后在私人电台方面所做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1969年 10月 10日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决定中止 10家厚颜无耻地违反有关节目音响度条例而未受处罚的电台。当然,节目音响度被限制到 100分贝内,这未免荒谬,但 10分贝却几乎升到 120分贝……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成员、小说家保尔·吉马尔在此期间证明,一天早晨他在巴尼奥罗门旁的住所,看见了音乐台的声音振动着他的电动剃须刀。

法国音乐台(105.7)的经营者是一个大胆的、经常置身于一部法律出台之前的人(借自埃尔桑的词汇),他决定——如果没错的话,这是在媒介史上第一次——运用一个交际建议机构,在它的听众聚集的巴黎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年轻人们宣称他们根本不在乎其他电台,并大声为他们“最优秀的电台”进行辩护。歌手达丽达走在队伍最前列。最使人吃惊的是在社会党中,很多人把愿望当成现实地认为这是一家友好电台,几乎是富于战斗性的电台。拥有世俗权威的洛朗·费边政府受身在爱尔兰的共和国总

统指使禁止警察力量干涉电台。严重的后果是，自那以后，弄虚作假者可以尽情享受，而很多年后人们都不能依据共和国法律进行必需的秩序恢复。

国有部门的必需条件

与之相对的是国有部门。它们的立场依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应该把公共电台享受自由的国家与那些公共电台与电视台的关系紧密的国家加以区分——在比利时、西班牙及意大利，公共电台几乎一直都是处境不利。因为当需要节省开支之时，人们最常在电台这方面节省，电台主要关注政界人士，这不能引起多少兴趣。相反的，在法国，1959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作出的把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分成小公司的决定（这一决定我们在电视一章中还将论及）构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法国广播电台的定性将使其有效地展开它的活动——这一电台当时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产生，与电视公司处于平级。

至于比利时，它依然是统一的，但它比其他地方的电台有一种更强的广播传统。1954年，创立独立广播局的法律允许建立地方性商业电台，1959年后地方性商业电台总数为150家（与比利时的地方电台形成对比：1954年10家，1959年15家）。比利时的广播台有足够的时间退出联播而广播自己的节目。

比利时正相反，经历了公共服务性电台的衰落，在1954年间国有电台运行越来越糟，人们不停地缩小它的预算。法语公共电台联合体、欧洲和美洲，两个主要法语国家间的合作机关，见证了1954年代比利时与瑞士的鲜明对比。前者非常不幸，而后者却从容地制止了一切私人电台可能带来的竞争。当然，1959年左右，法国

(瑞士广播电视公司)作出了一点必要的牺牲,允许几家私人电台的存在,但这些电台受到严格控制——它们一切的联网都被禁止。在德国也是同样,商业电台的兴起是缓慢的——1950年代末它们的数量达 1000 家,但它们在东部及北部各州数目仍是略少。在西班牙,1960年代,出现了很多私人电台,但受控于组成多媒体集团的报纸——前文已就《日报 员》谈及此事。在意大利,电台总体上是平衡的,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提供 苑套节目,在 100 家地区性电台广播——相应的有 1000 家调频商业电台。

在法国,广播的总貌在 1960年代也是根据双重部门原则确定的。并不是没有发现过问题和进行探索,但法国广播电台接受了这种挑战。

它首先需要并得到了一份更好的调频保单。公共广播不能够违反法律、超出既定限制播放,却在“自由电台”泛滥之时看见它的听众们对收听时受到的干扰感到非常不满。

还需规定关于广告方面的规则。法国广播电台主要依靠公用事业定期收费作为收入,在它的广播中没有广告,除了“集体广告”或“补偿性广告”,从来没有品牌广告。(只有希科里·勒鲁很满意,因为市场上不存在其他同类品牌!)当然,财政部的“预算官员”通常倾向于宽容,以在公用事业定期收费中节约。但宣传部部长的任务是坚决抵制这些。起初,一点商业“广告”,这并不重要,但渐渐地有人可能会抹杀作为公共电台的理由——公共电台与私人电台的明确区分很大程度上在于有没有在听众看来是被“污染”电台的广告。广告虽然短期内可以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财政上的便利,但不久便是必然的衰落……

第三种挑战是权力的分散。雅克琳娜·博德里耶任法国广播电台经理期间,在 1960—1965 年吉斯卡尔 苑年任期内,她曾为

她的公司介入地方进行辩护。但 1939 年有关部门作出了一个令她不快的决定：区域性电台依然从属于法国地方三台。由于这一可预知的结果，在外省，公共电台情况很糟并且很不受重视。人们很少为其安排优秀撰稿人。更严重的是，公共电台追求区域性的听众群体，而非地方性的，因此不能利用它的优势，并且在收听率方面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功。在任职期末，雅克琳娜·博德里耶有一项功绩，那便是征得文化部及交流部部长让·原菲利普·勒卡同意，进行“邻近地区”的新电台实验。因此在 1939 年以来长时间的空缺后的 1940 年代，即在广播又重新获得曾被剥夺过的重要王牌——在法国“乡镇”谈论其自身这一时期，法国电台并没有失去机会。

通过实验的办法，人们在里尔创立了区域性范围的北方调频电台，在拉瓦尔创立了全省范围的马耶讷广播电台，最后创立了市区范围的默伦广播电台。而后，在 1945 年多数党变化之后，1946 年的法律恰当地把管理“从巴黎外迁”的电台的责任交给了法国广播电台。这样在 1946 年法国存在 100 家地方公共电台。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们在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以一种特殊的效力显现出来，前者中的典型是克勒兹法国广播电台，后者的代表是卢瓦尔海洋法国广播电台。在大城市中，结果是很不稳定的，但总体上还是取得了成功。法国广播电台由于它设置的众多不同电台（其中包括蓝色广播电台，一家老牌的公共电台）而非非常多样化，尽管这种多样性导致了离心力，法国广播电台依然使得其所有的广播台协调工作，而同时任何一个广播台都没有丧失其特点。这些地方电台经受了一次令人生畏的威胁，即 1954 年在共治时期国务部部长菲利普·德·维利耶这一部门，他本人是旺代省一家私人电台阿洛埃特广播电台的创始人，不久前曾对卢

瓦尔海洋法国广播电台的有力竞争而感到愤慨,并在政府中力图公报私仇,宣布与公共广播网开战。他失败了,他损害了自己对公司的爱护之情及想像力,后从突如其来的名誉下降中解脱出来。因此,在关于权力分散的《德费尔法令》的条文中显示出了在各地自由、平衡的新闻的重要性。

在雅克琳娜·博德里耶任法国广播电台主席期间提出了一句精彩的口号:“听听差别!”这正是公共部门的规则:首先要做那些私人部门其他电台不会去做的事情,那些利益动力绝不会提供的事,因此法兰西文化电台一直成功地抵制了使它与法兰西音乐电台合并的荒谬而有害的想法(更好的是在1984年至1985年间,这两家有着同样预算的广播可以用立体声广播播送)。而法国新闻台的成功,归功于在第一次共治期间被任命为主席的罗兰·富尔,它没能超越公共部门的范围,因为公共部门就足以用它的年轻的地方电台活跃的力量来灌溉法国新闻台。

最后再补充一点,法国广播电台能够保持其技术上的卓越并在无线电广播网的数码广播(即1991年,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最早发展方面起着先锋作用——最初的实验始于1980年,1985年开始了大众方向的商业化。

在公共和私人两个部门的平衡中,广播比电视提前了15年,并且为后者创立了一个实验领域,因此,它有时能够从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第十二章 电视的政治解放

实际上,电视首先是作为广播微不足道的附属物而产生的。直到地位迅速提高时,它才改变了这种状态,表现出自身的影响力、威望以及激情。

第一个时期,即脱离无线电广播的实验时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延长了。这次战争越是有利于广播,使之成为媒介之王,电视就越是身受其苦,因为电视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战争的束缚,工程师们的才华都流向了别处。战争爆发之时,电视技术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为参战国服务的程度。接着,在战后几年中,电视依然近似于广播的模式,同样有着我们曾提到过的两种对立的体系,有着商业方面的忧虑作为动力——这一点同于美国及一些受其影响的其他美洲国家。与西欧相反,这些国家中电视拥有大量的观众。随后,公共垄断逐渐处于被指责的状态,对节目多样性的担忧并不是主要原因,其症结在于市民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各州——即政府对新闻实施影响。

最终,在最后一个时期中,新闻的独立性问题已基本解决,也基本赢得了相对于当局的自由,有关节目内容的问题被提升到了

争论的首位。政府的影响是否可能被其他的力量,也就是私人款项来代替,人们越来越急切地想知道其中具有哪些优点和不足——这种替代现象在美国很久以前便已经出现。

快乐的童年

电视的史前史是值得注意的。很久以来人们便梦想把图像传向远方。我们在儒勒·凡尔纳的书中就已经发现了证据。这首先涉及固定图像的传递。正是这样,意大利人卡塞利在 1858 年发明了“传真电报机”,法国邮局利用它传递亲笔的短信息及用线条画。先前提及的传送照片的培林式信息电报机在战前的几年中便投入使用——实际上,它更应该算作是电话传真机的始祖——点与点的交换。

电视是随着光电现象的发现而产生的。光电现象,即一些物质把电能电子转化为光能电子的能力。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扫描:怎样使这些电子以非常快的速度被组织在它们经过的路线上,以便在银幕上创造出一个图像呢?人们就像像素的最佳数目问题讨论了很久。像素越多,成本就越高,但图像便越清晰。解决办法因国家而异。但这有时耽搁了电视的进步,因为潜在的顾客们可能会迟疑于购买那些他们以为很快便会过时的接收机。而国际合作也显得错综复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四个国家在质量、多样性、生命力及经验方面表现出众——这些探索几乎一直被引导着接近政权。

英国又一次领先了。贝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便开始实验由

苏格兰工程师约翰·洛吉发明的系统方法^①,这种方法使其能够在 1929 年 远月播放著名的赛马比赛——埃普索姆赛马大会。而后 1929 年 1 月 圆日开始,月说在亚历山大宫的录音录像室发送公共电视节目,并使用一种 源线^②的系统代替了贝尔德的 圆线^③的系统。1929 年 4 月,《大鼻子情圣》的改编剧得以放映。1929 年,伦敦地区拥有 圆万台接收机,每周可以接收 圆小时节目。最早的户外报道也已经实现。正是这样,1929 年 缘月乔治六世加冕被直接录制下来,并被这一全新的电视台现场直播。但这一切在 1930 年 怨月 1 日就完全终止了。

在美国当然是私有部门占主导。实力雄厚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砸姆) 1929 年在帝国大厦楼顶设置了一台发射机。公司的自由原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每家制造商都努力推动自己的制式,这便耽搁了接收机的销售:1929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之时,只有 缘万台接收机在私人手中运行。

在法国,两位杰出的工程师起着一定作用:勒内·巴泰勒米及亨利·德·弗朗斯——法式彩色电视机的发明人。1929 年 1 月,巴泰勒米推出了第一个试验性节目,从巴黎发送,每周一小时。乔治·芒代尔——1929 年 1 月弗朗丹政府中充满活力的邮政部部长对电视很感兴趣并使实验有了一种新的跃进。1929 年 源月,他在格勒奈尔街创立了第一个电视录像录音室,此处至今仍接待高清晰度节目的示范表演。1929 年 1 月,依然是在芒代尔权威之下,图像由 远线增至 1 线^④,不久又增至 源线^⑤。艾菲尔铁塔充当了天线。1929 年春,它每周从格勒奈尔街录像录音室转播 1 小时节目(有“摄制的广播”,有座谈……),巴黎地区有几

^① 这里指贝尔德制造的机械电视系统。——译注

百台接收机,通常是在公共场所。乔治曾宣布一项庞大的建立发射台的计划,但是战争中止了一切。

在德国,1935年广播管理局采用猫耳线的图像工作,1936年增至1500线。1936年柏林奥运会构成了一个创始性的时刻,这一事件使得这一新的媒介出现并为大众所关注。它不仅由莱尼·里芬施塔尔通过我们所知的绝妙的方法为电影院录制了下来,而且还被拍成电视,并且传送到五六个德国城市,其中在公共场所的接收机拥有150万名电视观众。同其他地方一样,战争中止了这方面的努力,要等到战后电视才得以重新起飞。

然而我们须指出一个奇怪的情况,自从蒂埃里·库布勒和埃马纽埃尔·勒米厄在一本书中对其进行研究后,我们更了解这一情况:电视在巴黎,1941—1945年被德国占领时期内曾在特殊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其意图是供在巴黎地区住院的德国伤员消遣之用。他们在医院里安置了猫耳台电视机,并征用了科尼亚克原热街上属于退伍老兵基金管理处的一所房子。直到1940年代初法国电视台依然设在那里……

占领者强制规定了德国的猫耳线,而非乔治·芒代尔的猫耳线。节目是双语的,每天以《阿维尼翁的桥》开始,以苏济·索利多尔演唱的“莉莉·玛莲”结束。这些节目只保留下来15秒钟,但书面档案显示这并不是宣传性电视节目,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占领当局为自己提供的一种奢侈享受。这些节目是在库尔特·欣茨曼积极指导下摄制的(不久前人们把这位100岁高龄的老人带回科尼亚克原热街,拍摄一个纪念性的节目)。他雇用了1500个人,并表现出在这一战争时期少有的放肆,不停地戏弄着盖世太保。正是这样,他为那些想逃避义务劳动的年轻演员们签发通融证明;人们后来找到了他为年轻的雅克·迪菲约而签发的那份

证明,此人在半个世纪后在让·马尔伯夫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了贝多芬的角色。第一天落成典礼上,被遣回巴黎的埃塞俄比亚驻布鲁塞尔领事的两个女儿表演的“鸚鵡舞”非常引人注目。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也到那里“为酬金而奔波”。我们还可以看见亨利·科歇,戴维斯杯中得胜的“火枪手之一”在那里讲了一天乒乓球课,著名的拳击运动员乔治·卡庞捷在那里模仿了一次格斗。其中还有很多杂技表演和音乐。这是一个古怪而可疑的世界,在盟军进入巴黎时便消失了。它的老板向东逃去——和他的总秘书乘着一辆车棚可去掉或折叠的雪铁龙,箱子里带着大量的档案。

这便是世界性戏剧史中的离奇侵入。要注意的是,不管怎样,法国由于这种经历而在战后的某种技术进步方面得到了好处。

猿缘年后:真正的开端

此外,战争造成了另一些后果:美国又重新走在了英国前面,因为它所受削弱的程度要小得多。

当然,美国是从基础起步的。猿缘年,它只拥有远家左右的发射台,猿万台接收机。各处的规格都是猿缘线,这是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强行规定的,我们在关于广播方面曾提到过它的作用。而这种统一性是一种珍贵的成功手段:猿苑年,统计出猿万台接收机,猿缘年有源园万台,猿缘年有猿缘园万台,猿远年猿缘园万台。

资金完全是由广告来保证的。人们知道,猿缘年电视广告收入不到猿万美元,而猿远年却超过了猿亿美元时,便可以衡量出电视与书面出版物分摊广告的平衡状态已经产生了多么强烈

的变化。使人厌烦的、无处不在的广告！在高峰期，依据持续时间来算，它的比例已达四成。从1955年起美国模式已经确立，并显示出其所有的主要特点，从那时起，它便与西欧电视形成了对比。

英国的进程不是那么迅速了。1956年12月，BBC恢复了其电视节目，采用逐行制式。而后继续发展，进程比美国要缓慢，但还是快于欧洲大陆。

1955年英国接收机数目为100万台，1956年为150万台，1957年为200万台，1958年为250万台，1959年为300万台，1960年为350万台。

电视能够利用重要的事件以带动其飞跃发展。特别是1953年乔治六世的葬礼（他因此在他的统治期间两次服务于处于绝境的电视），及1953年12月10日其女伊丽莎白二世壮观的加冕仪式。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观众的数量超过了广播听众的数量（它在“欧洲大陆”也同样利用了这一点）。第二个电视联播网首次诞生于1955年，它属于一家私人机构——独立电视局（ITV）。

德国由于战败，电视事业似乎是注定了发展缓慢——这一预言很快便被推翻了。差距仅仅两三年，占领当局实际上是在推动电视发展的。他们明智地认为，电视在自由和均衡的状态下可成为促进旧帝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的开端是1945年12月在英国控制区的汉堡。占领北德的英国人有一项非常周密的媒介政策（《世界报》也诞生于此）。继汉堡之后，柏林的电视事业于1948年10月开始发展，科隆是1949年10月。很快取得成功：1950年联邦德国拥有100万台接收机，1951年便有150万台。

莱茵河彼岸的法国发展比较缓慢，它在1940年代处于领先地位，而战后似乎在电视方面的进步比其他地区要少。电视很久以来就忍受着靠广播的附属预算生存的局面。它的基础设施发展

要比德国和英国缓慢。另一方面,1939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任信息部部长,他与他的办公室人员——1940年代成为电视业重要领导人的让·德·阿尔西在亨利·德·弗朗斯的影响下,选择了有线制式——技术上非常卓越的系统,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在初期使得国际传播变得更为困难,而它的优点是由于线数多而使图像质量异常清晰。1938年法国只有1000个领土接收到电视,1940年达10000个。1939年人们统计出德国接收机,1940年达100万台,这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的有益结果。1938年,英国接收机数量近100万台之时,拥有同样人口的法国却只是它的1/10。

1937年,法国每周有10小时节目。1938年电视新闻诞生,首先是三周一次,而后是每天一次,最后是每两天一次。194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之前在比优特·原肖蒙的高蒙录音录像室重新开始运行,从那以后它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工作手段。

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更为落后的。荷兰有规律的电视节目始于1938年,比利时及丹麦是1938年,奥地利及卢森堡是1938年,瑞典及西班牙是1938年,瑞士、芬兰、南斯拉夫是1938年,挪威是在1938年。东方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发展稍微迅速些,至少是在发射台方面,因为集体收看占主导——如我们所知,新闻是被严格控制的。莫斯科1938年起开始播送电视节目,列宁格勒是1938年,基辅是1938年。

我们来简单地了解一下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电视业在那里受政府严格控制——这些国家在当时有一种优势,即除离边境很近的地区外,不可能接收到来自铁幕另一端的节目,这样便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电视把它的角色让与了短波广播。

政府 绝对武器的幻想

总之,即便是在有着古老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政府也是非常不愿意放弃对电视业的控制。其关键是政界人物所共有的对电视的万能性的天真信念。他们设想这种新的工具可以左右选举,掌握了它,便等于确保了一种无法反对的力量。这种错误的信念来自政界人物与电视间所维持的心理上的联系:不只是他的演说被转播,他的自恋也被牵连进来,他的形象在别人眼中,在一种由永恒的诱惑所形成的作用中。由于电视的存在,政界人物开始幻想去影响那些不固定的、虚构的选民,那些不到公共场所的人,那些激进的社交网触及不到的人,呆在家里的人;去影响他们认为人数众多的可以随意操纵的被动群体。

自从人们把电视的决定性力量确定为事实之后,这种信念便因为一些虚假的事实而得以增强。因为有事件产生,而人们又把电视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似乎确实是它在事件发生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例证到处可见。例如,我们回想一下 1960 年美国大选期间著名的肯尼迪与尼克松辩论——这次辩论使电视具有不可抵挡的重要性这一想法在西欧政治参与者的思想中扎根。尼克松忍受着一侧膝盖的疼痛,化妆也很差——我们可以从他的胡子看出来,这使他在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的肯尼迪面前显出一副凶神恶煞般的表情(虽然在黑白电视上)。人们 1964 年后在波士顿肯尼迪基金会看到这些画面时,这种变化的感情依然完好无损。但是后来关于舆论发展的研究表明,事后肯尼迪挖掘自己的优势,而这次辩论即使能产生影响,也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很早便指出,事情要比政界人物想像

的要复杂得多,但长期以来后者就很少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列举出 1936 年勒内·雷蒙和克罗德·诺伊施万德在《法国政治学杂志》(双月刊)中发表的先驱性文章,及后来布吕梅、凯罗尔和图韦隆非常详尽的作品——《电视能够左右选举吗?》(1948)。当然,否认电视在选举活动中起到一定作用是荒谬的。但是应该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介绍法国舆论时所提及的一组问题对它的进度加以区分,尤其是应该指明电视在市民对于政治学说、“社会问题”的看法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固定立场形成过程所起的长期性作用。相反的,电视对于选举人在秘密写票室所做的选择只产生了一种次要的影响——这些选择是被巩固了,而不是发生变化了。每个人根据一个给定的表格寻找适宜于确定他的信念的理由,而这些信念本身也是产生自复杂的——通常是更早的影响的结果……

政界人士对“奇怪的天窗”(依据 19 世纪 30 年代《鸭鸣报》使之流行的一种表达法)的假定决定性作用的幻想,却因他们的一种强烈的意识而被加强了,这种意识使他们感到自身影响力被电视剥夺了。以前,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国会议员在他所在的地区下了火车,眼睛因为夜里的颠簸而变得疲乏了,但却因想到带回了首都的最新消息而感到高兴。以后,广播和电视便在他之前使人们直接看到当天的辩论。更不必说一个被证实了的观念——电视影响了政治形式,影响了表达方式及思想观点。正是这样,大多数以前的演说得不到观众的欣赏,想想从前哪些政治活动家可能会很上镜是很有趣的(同样也是不自然的……)。

某些法庭雄辩术不复存在。电视促使尖锐的棱角被磨平,通常是磨得过平了。在根据 1934—1935 年任法国电视三台总经理的经历而写的《王宫的季节》中,塞尔日·莫阿蒂消遣似的提及

两个政治人物的某场“现代”辩论。这两位领导人接受了他们的顾问建议,尽全力避免过于尖利,因为挑衅性在电视上“效果”不好。他描写二者流露出对彼此过分温柔的谨慎,直至最后两个人因交错的感情相拥而泣。这一漫画式的场面体现了这种危害。

差异的参量

这幅公共画面的背景中,从一国到另一国,在行政权对电视的控制方面,其差异的参量是怎样的?首先衡量政府在社会中的相对影响力、中央集权程度的大小、从过去继承的道德影响力——新教国家新闻自由的习惯要比拉丁语国家更为历史久远。

应该注意到负责人委任的方式,这种方式导致了他们不平等的抵抗能力——这是最能揭示电视顺从程度的标志,这方面引起了很多论战的关注。第一种系统是在部长会议上直接任命,与撤职相应;第二种,由一个“~~议会或议会~~团体任命,这一团体由尽可能独立的人物组成,并负责组成一个行政权压力与电视之间的“减压室”;最后是第三种,通过一个理事会选举产生,问题在于要知道这个理事会是怎样构成的,根据何种原则,通过何种政治权威,有着怎样的财政能力。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标准是各国对电视新闻的影响力是通过财政来调控的——大多数政府从掌握财务开始便试图通过财政的舆论进行限制(公用事业收费比率的规定,各种捐赠预算)——电视所拥有的独立性或多或少地出于自愿而作出的让步。

美国(从1961年,即肯尼迪遇刺之年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民都是单一地或几乎是单一地通过电视了解信息)由于私有部门

占主导,似乎避免了这种风险。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缘年代在电视网财政方面依然薄弱之时,财政选择还是有影响力的。在冷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部部长福斯特·杜勒斯和他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兄弟阿兰·杜勒斯——我们今天知道,他们曾操纵 粤月说、悦月说及 粤月说这几大广播网。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及其对反对派共产党的大清洗期间,这些广播并没有十分装腔作势便服从了政府,政府要求它们列出怀疑被“红色病毒”感染了的专职或兼职撰稿人的名单,直至把这些人清除。随后,大的广播电视网在财政稳定性方面取得的进步使政府通过金钱施压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电视在有关越南战争的舆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后来水门事件的“连续剧”便证明了广播电视网与权力机关距离的产生——不论是与白宫还是与国会,都同样产生了距离。

与此同时出现了对其他力量的可能的依赖性问题,即隐蔽的款项的力量。人们可以迅速对广告客户的影响采取措施,这些人出于本性使播出的节目集中到大众的最小的共同目标上,这有利于形成一种共同信仰的最小素材。一个经常被强调——尤其是被阿尔费·索维强调的例子:人们曾看到,汽车产业所买下的广告的影响致使美国铁路悲惨地衰落,因为铁路的集体效用没有足够的媒介方面的保证。

正是出于这种逻辑考虑,美国允许电视播放政治广告。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这种广告的成本太高,很自然地导致为选举运动提供资金的商界的影響力增加。(这样说是为了不提及这一系统所导致的辩证水平的下降——某位秃头的参议院候选人挥舞着电吹风喊道:“和我那位长着很长甚至乱蓬蓬的头发的对手相反,我不需要这种器具,而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关心你们!”可笑到极点

了!)法国差一点没逃避过这种危险,因为在 1981—1987年,第一次共治时期及雅克·希拉克政府期间,共和联盟想要允许电视播放广告,是法国民主同盟社民党(悦)的中间派有勇气反对它并联合起来反对左派,使这项计划破产。在意大利,直到 1988年,马西莫·达莱马议会才公布一项禁止选举时期的这种行为的法律草案——这是在看到贝卢斯科尼在前一年春天欧洲选举期间,在他的三套节目(悦)和(悦)中广播了员多个广告短片以赞颂他自己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之后公布的。

在欧洲,政府影响力处处都要比在美国大。第一种机构旨在实行“比例代表制”,即根据各个党派来分配席位。比利时便是这种情况,此外它还按照共同的籍贯来考虑,要考虑其成员是瓦隆人还是佛莱芒人。这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异色方格饰的样子:在这里安排一位佛莱芒社会党人,在那里一位天主教瓦隆人……能力标准通常处于次要地位,队伍的凝聚力也没有因此受益。舆论中大可以有某种民主公正的印象,但因为总会与一种比例代表制共同出现,表面上严格忠于舆论多样性的优势在效率方面却造成了很多缺陷。

通常这些理事会是我们称之为“活跃力量”的代表,有时是单一的政党,更多时候是不同的协会。荷兰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荷兰广播电视公司是按以下方式安排的:选的时间在苑个电视协会之间分配,这些协会自身也由政治组织或是宗教派别操纵(员个天主教协会,猿个新教协会,猿个社会党协会及圆个“中间”派协会)。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天线分段”,这便影响了节目安排中的一种恰当的平衡性:防止了政府的控制,但多半没有能够防止节目的平淡和近于噪音的效果。

德国的情况同样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德国同样会发现比

例代表制的形式,但这种代表制是建立在地区政治平衡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广播方面我们便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这种系统是在一州范围内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地区设立一个广播委员会,类似于 圆至 苑名成员的小型议会,起到一个中介团体的作用,从中选出一个由 苑至 员人组成的委员会。电视委员会从理论上讲并不是广播委员会的一个相似的简化,并且大多数州都形成了一种习惯,即在其中任命有能力而非十分具有政治色彩的人。最终,在金字塔的顶端,总督才被选为真正的老板。正是从这些地区升级至联邦水平,并在 员缘年组成了德国电视一台,即广播组织的共同体,其主席是在各州总督之间轮流选出,并只拥有一种限定了的权力。这样一种组织机构图表似乎是保证了电视业很稳定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差异还是经常会出现,尤其是在内政方面,其基调是依据操纵各州、社民党或基民盟的多数派而变化的。

瑞士的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其理事会成员一半由政府任命,一半是由牵涉广播系统的团体任命。

在其他地方,人们可能会被一种由职员选举的制度所吸引,这种原则在 怨年代初为东欧一些自由电视台所采用。匈牙利便是如此。想法似乎是民主的,但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候选人及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老板是否要证明同样的素质能力。

英国模式

人们对英国模式是更有兴趣的。英国首先创立了中间减压室体系,员缘年的克劳福德委员会曾宣布,广播应该为民族服务,

而不是为政府服务。还有月说第一任经理里思提出的作为座右铭的三个词：“提供信息、教育、消遣。”理论上讲，内务部部长对于所有广播节目都有否决权，但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怨至 员人的“董事”委员会，其中包括一名苏格兰代表，一名威尔士代表及一名北爱尔兰代表，他们是由女王在内阁提议下任命的，任期五年。他们实际上是终身制的，而且他们的任命是分期进行的，以错开普选造成的反响。只有主席全职负责，其他成员一个月集中两次。这个董事会负责任命月说的经理及其他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并负责监督和保证其公正。

员缘年，在温斯顿·丘吉尔最后的保守派政府时期，独立电视局（现称独立电视委员会，即 员说）成立之时，这一组织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独立电视局是一个负责指挥私有部门的机构，从中产生了电视二台，即一个地方电视网，而后于 员缘年产生了电视四台，员缘年成立了电视五台。人们选择了类似的体系，并有一点降级，其委员会的 员名成员不是由女王任命，而是由内务部部长任命。这一传统以一种非常民主的方式得以确立，即每一任政府都任命与反对派更亲近而非与执政的多数党更为亲近的人物。员缘年丘吉尔的工党政府是这样做的，这也是撒切尔夫人后来做到的，她任命了一位前工党部长汤普森勋爵为独立广播公司主席。

各种各样的监督提供了另一种自由的保证。英国没有信息部，不像在法国那样信息部存在已久。在英国，内务部负责任命，外交部负责世界性事务，工业部负责基础技术，教育部负责专业节目。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看得理想化。月说的历史上实际上

有着很多激烈的冲突。1956年末苏伊士危机期间,安东尼·艾登首相强烈抱怨《月报》报道英法远征埃及时的批判式方法,这是自1953年丘吉尔的尝试之后唐宁街^①第一次试图影响广播中播出的信息。但是他的继任者,同是保守党的麦克米伦矫正了这种情况。虽然他对《月报》的行为也表现出极为愤怒,但他断言一位国务活动家如果力求影响广播便会“丧失信誉”。在丘吉尔时期,1956年代末又出现了新的紧张状态,但尤其是在更近一段时期,撒切尔夫人的1979年间,她看到了冲突的增多,并不是没有一些对《月报》独立的形象的改变,而应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展。

爱尔兰是一个爆炸性的主题。1978年,撒切尔夫人的一位亲信撰稿人被北爱尔兰独立主义者——北爱尔兰共和军暗杀,时事栏目《今晚》采访了一位特遣队员,凶杀引发了各种情绪,而这次采访引起了“铁夫人”的愤怒的抗议。不久后,著名的时事栏目《全景》拍摄了北爱尔兰共和军在小村于斯勒的游行活动。由此引起又一次的愤怒,以至于《月报》似乎要同意今后这一方面实行自我审查制度。它在处理爱尔兰事件之时并没有享受到如美国电视在越南问题方面享有的同等自由。

另一个极端的时刻是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及由此引出的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战争。《月报》总体上看来非常谨慎(犹豫不赞成的英国人实际上没有接近电视),但它大体上成功地从职业角度保持了严格的立场观点。正是这样,它拒绝使用“敌人”,而提及“阿根廷军队”和“英国军队”,因此惹恼了撒切尔夫人。另一方面,《月报》继续给对方发言权,尤其是将发言权给了阿根廷的

^① 原文为英语,唐宁街即英国内阁所在地。——译注

国防部部长及一艘被英国击沉的船的船长。正是这时 月说广播的经理挑起保守党政府的愤怒,并宣称:“一个普利茅斯的寡妇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寡妇没什么不同。”右派大众报刊甚为恼火,《每日快报》质问道:“你们会容忍有人在 1984 年在英国电台采访戈林吗?”这个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并不简单,但总之 月说以一种很成熟的办法应对了它的听众(同样的问题在 1991—1992 年西方电视台采访萨达姆·侯赛因时也曾被提出)。

据 月说杰出的行家认为,是时 月说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过程中。从那以后,首相撒切尔夫人不再满足于批评这个或那个专门节目,而是更广泛地宣布一种危险的思想状态,有人听说她那一派的议员宣称:月说只提供“令人生厌的对现实的破坏性拙劣模仿”。

这样,从 1983 年起,我们进入了一种英国政府与 月说之间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时期。每一次 月说都很难占上风。因为政权长期没有交替,而撒切尔夫人打破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任命对方人员加入董事会的传统,新任命的人员明显是右派人士而多数党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失去平衡。1985 年 月说董事会主席去世时,撒切尔夫人选择了一个她的亲信取而代之,即非常保守的原《泰晤士报》经理马默杜克·赫西。

一场新的有关爱尔兰的冲突爆发了。当时在布莱顿一家宾馆出现反对保守党议会的谋杀,月说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介绍了两岸的爱尔兰极端主义者。管理委员会同意取消那个受到责备的节目,该节目事先由撒切尔夫人的代表进行技术检查(这是与先前所有原则相反的)。为保卫自己的自由,月说的记者们第一次掀起了持续 24 小时的罢工。节目最终带有一些删节地播出了——为了同时给董事会及首相保留颜面。但是这一机构开始

显出了不平衡的迹象。

人们不久便获悉,对于 月说所有责任职务,领导部门很快便负责对候选人进行反间谍调查以知道他们是否在政治上可靠。当然,理论上讲是旨在驱逐潜在的叛徒,但人们很容易便因内政因素而逃脱了。这一时期——出现了财政武器——撒切尔夫人拒绝提高 英镑的公用事业收费,同时董事会新任主席马默杜克·赫西接受了总经理阿拉斯代尔的辞呈(1987年 1月)——后者两脚都落空了,因为他首先作出了太多的让步,而最终失去了信誉。这一针对总经理的胜利是前所未有的,并使得 月说及其长期以来著名的独立性前途未卜。

意大利的状况

相反的,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却取得了某种进步。在意大利便是如此。战后,意大利是从一种由基督教民主国家过分控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国家是由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领导,此人逐渐攫取了在广播方面享有垄断地位的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1954年)。意大利电视协议诞生于 1964年,而被史学家定义为“坚如磐石的垄断”的时期一直持续到 1970年代。

1964年的创始性文本中提出 10%的资金 英镑属于工业转产协会,其本身也是控制在当局者手中,并任命管理委员会 4人中的人,另 2人则是直接由政府任命。因此,这一机构被很好地封闭起来了。当然,还存在一个由议会任命的猿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政治独立性及信息客观性,但这个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对其多数派进行防备,并有所警戒。当时立宪法院使其从法律上成为正当组织。它认为,国家最能够保障公众利益服务部门的客观

性、公证性及持续性 ;然而国家即是政府 ,因此很正常地 ,多数派要强制性规定其选择。

1954年来这种原则及实践的代表人物是主席贝尔纳贝 ,此人是多次出任政府首脑的、基督教民主国家强有力的领导人阿曼托尔的密友。贝尔纳贝毫不虚伪地将多数派观点的教学法作为赋予电视的明确责任。他任命本党人士担任所有要职。

直到1960年代后期 ,这种封闭系统才被强大的对现状不满的力量提起诉讼。首先是由左派成功地引起了1962年初的轰动一时的罢工及持续数月的职员骚动。至于其他政党 ,它们越来越不能容忍基督教民主国家的控制 ,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得到它们在电视中的一席之地。两种学说明确起来并相互对立 :一方面是对私有化的辩护 ,另一方面是呼吁电视业内部改革以确保更广泛的新闻自由。

第二个派别起初似乎是占了上风 ,但不久私有化成为了必要。皮埃尔·米索、居伊·皮诺在他们的《意大利及其电视事业》一书中用斥责的语气讲述了这一过程 ,1964年1月1日的法律是以立宪法庭的一项权威性文本确立的 ,该文本提出“电视的 苑个指挥部” ,企业领导机关不应该行使行政权 ,而企业机构应保证其客观性 ,新闻节目应客观 ,文化节目应尊重思想流派的丰富及繁多 ;真正的权力应授予国会 ,以使其能够监督这种多元化 ;记者们依据职业道德坚持客观性等。在 1964—1966年这一短暂的时期内 ,意大利似乎接近于比利时及荷兰所实行的略有变动的人员及产品比例分配原则。当时实行的是意大利人称之为“政治分脏”的制度 ,换句话说 ,即把所有电视“按家宅”分配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每一个频道都属于一个政治流派 ,基督教民主国家只支配一个频道。

这种表面上的平衡非常短暂,不久,远年代便出现了另一个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地方电视台同时出现,而这些地方电视台给它们即将摧毁的制度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在愿年代初,我们进入了一种公私二元体系,我们不久便会看到随着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出场,这种体系也将显示出来。

总之,在意大利的垄断已被国家集权的反常效果所损害,当人们想要对其进行改革时,它已经非常衰弱而无法抵制迫近门口的资本家们的野心了——在时间方面这是一个太过简练的过程,法国也经历过,但节奏更为缓慢。

法国:一次长征

如果参照第一条标准,即法国电视领导人的任命标准,我们就会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愿年开始的阶段,这些领导人通常是由政府在部长会议上任命的。然而,这猿年的历史是新闻独立性增强的历史:依据一种无规则但对比强烈的进展,经常会有倒退但最终没有阻止总体上的前进的历史。

只是在戴高乐时期因利害关系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电视领导人便被替换。让·德阿尔西,缘年代受人尊重的电视经理到联合国去苦苦等待。法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德洛内·加布里埃尔也同样因要让位于戴高乐主义者而被解雇。信息部部长们安德烈·马尔罗、罗歇·弗雷、阿兰·佩尔菲特,任命他们自己的人(克里斯蒂安·沙瓦农、罗伯特·伯尔达、雅克·原贝尔纳·杜邦、让·原雅克·德·布雷松),高级官员通常来自行政法院。部长实际上是砸云(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真正老板。阿兰·佩尔菲特本人在员(原)一员(原)年任部长期间曾说过,到任时他

在他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组按钮,这些按钮使他能够按铃传唤广播及电视的负责人。辩白并不虚伪:反对者们影响着全部书面出版物,为了补偿,政府应该支配电视。为了慷慨一些,我们需要强调,电视与书面出版物不同,它是依靠公用事业收费,即依靠公款生存的一种垄断,因此它阐述和支持法国政治就是合情合理的。

这一学说得到了乔治·蓬皮杜的肯定,他在1959年11月10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宣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知道有人不相信我,电视记者与其他的记者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电视被法国人及外国人看作是法国的声音。这便强调了某种谨慎。”这是一种现今已经过时了的哲学,但它曾长期占有优势并阐明了政权影响衰退缓慢的原因。对于戴高乐将军来说,他是没有苦衷的。在其子出版的《信件、笔记、记事簿》中(这一版本科学性并不确定,但从历史角度讲非常引人入胜)我们了解到他曾给阿兰·佩尔菲特或他的总理蓬皮杜的指责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在所有政界人物头脑中存在的老生常谈——即指责媒介表现出来的只揭示国家生活消极方面的趋势。

例如:“1959年11月10日,关于佩尔菲特先生的记录。我不明白昨天法国广播电视公司是何及怎样播放一段关于无麻醉手术的十分令人生厌的节目。这不论对那些‘报纸头版五栏’中的人、那些只看到恐怖和血腥的人,某些‘我见过你’的医生,还是对电视自身内部某个放纵的集团来说,都是一种极卑劣的吹捧。因为有国家的直接监督并由国家提供资金,共和联盟似乎空前地成为了权力集团的独占空间,也空前地不受控制。”另一天,戴高乐因有人让一名敌视法国对外政策的美国记者讲话而感到气愤:“1959年11月10日。关于阿兰·佩尔菲特,负责信息的国务部部长的记录。在我们的电视上颂扬所谓的美泉宫,即在巴黎的第四

共和国残余分子所奉承的美国人的粗鲁言行,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同年 5 月,他对阿兰·佩尔菲特说:“您知道,您的那些报刊记者,您可以一直试图向他们解释一些事件,但您没做到。他们是敌人,并非常坚决地维持这些状态。那么,你至少动用一下你手中的工具——电视,但是慎重使用。不要试图劝服那些负责人,要给他们指示。报界是反对我的,电视是支持我的。”这段话被阿兰·佩尔菲特在他新出版的书中进行转述(《这便是戴高乐》,1967 年)。

这段时期热罗姆·布尔东在其书《戴高乐时期的电视事业史》中有着详尽的描绘,此书中还提及在(总务部际联络部)的存在,有人猜想,电视与政府间所有的联系是通过这一部门进行的——这种联系也许在这一机构的影响下被夸大和神化了,但这种行为对当时的情况和立场是很有说明意义的。

当然,幸运的是在这个机构中还是有规则的。固定节目比电视新闻享有更广泛的自由。尤其是持续了 5 年,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报纸头版五栏”。这个节目由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小组负责,其中包括皮埃尔·德格罗普和皮埃尔·拉扎雷夫,即《法兰西晚报》的经理,此人晚年热衷于电视业,与当局过从甚密,是蓬皮杜的密友,并得到其他人不会拥有的行动自由。这个小组的灵活性是经过考验的。正是这样,在用于事先接受政府代表检查的报道中,他们有目的地插入了使代表们生气或愤怒的镜头,知道代表们会命令取消这些镜头而余下的则被保存下来……1959 年后,安德烈·哈里斯和阿兰·德·塞杜伊在第二频道的“变焦距镜头”,由于竞争而扩大了基调方面的自由。

我们来看一下一种缓慢的自由化进程的分期。1959 年创立的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的法令表明了某种自主的意愿(事后,尤

其是在 1964 年代有时被其创始人阿兰·佩尔菲特夸大,以批判社会党政府),同年第二频道诞生。接下来是 1965 年的冲突。突然之间,在第一次总统普选期间,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被其排斥了六七年的反对派们:不只是热泪横流的马塞尔·巴尔比、像在第三共和国法庭上一样讲话的皮埃尔·马西亚西、仍在寻找其特色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还有有着一副冷酷无情的嗓音的极右派的让·原路易·蒂克西埃、原维尼扬古,最后还有让·勒卡尼埃,与一个广告员一同准备——这还是第一次!还有在中间派及欧洲人中间声名鹊起的马塞尔·邦格朗,这些人使得戴高乐在第一轮选举中处于一种无结果的投票境地。

从那时起,当局者注意到太过禁止敌人使用电视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他们通过最初的“公开辩论”而作出了一些让步。

相反的,1968 年 5 月事件导致了一种倒退。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经历的这个事件,相较于大学生运动及比任何时候都持续更长的罢工来说,是有着几年的差距的。状态恢复是残忍的,在伊夫·盖纳部长的权威下,十余名记者被解职——我们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的一次成批解雇。而后控制不再那么严格,而在 1971—1974 年蓬皮杜任总统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阻碍,几乎是进两步退一步。在具有自由思想的总理雅克·沙邦·原戴尔马的决定的影响下,创建了两个信息自主单位:第二频道的单位由雅克·琳娜·博德里耶负责,她为此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保证,包括专业上及政治上的保证(她是被 1968 年 5 月罢工者们称之为“黄包工会会员”之一的人);第一频道的单位由皮埃尔·德格罗普负责,他完全代表了独立性,并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团体。这种做法在国会多数派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人明显具有产

生自 1958 年的“恐慌选举”的右派倾向——与马提翁激烈争执的主题。不久乔治·蓬皮杜本人被激怒了,这也是他使总理倒台并于 1962 年使皮埃尔·梅斯梅尔取而代之的原因。这些在雅克·沙邦·戴尔马的名为《果敢》的回忆中有长篇的叙述。

一项新的改革:首次创立了一个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总经理之职,由 1962 年议员阿蒂尔·孔德担任,此人似乎在政治方面很可靠。在有关广播方面我曾经提到过使孔德与明显为右派的总理菲利普·马洛对峙的论战,后者动用了财政武器力图左右新任总统。而这位被任命以“收拾房间”及驱逐皮埃尔·德格罗普及其从党的总理,实际上对于他作为电视业主宰这一角色更为感兴趣,并试图摆脱政府的监控。因此他倒台了(他被马索·朗取代,此人非常受人尊敬,但他的任命重新建立了高级官员的传统)。这部分促成了 1964 年瓦莱里·德斯坦的把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分成几个小部分的决定。

第十三章 摇双重部门的功效

时间过得越久,我们把有关电视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到电视新闻方面便越是不合理。鉴于电视节目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所占地位及其在市民习惯、文化习俗、公民行为,甚至是精神面貌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扩大到节目的整体。电视节目对公民的影响是依据一种经常被专家研究的双向运动进行的:一方面是好心心的“普及”,另一方面是民族一致性得以加强。

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电视利用能够降低成本而又增强图像诱惑力的技术进步进入了千家万户。1953年美国出现了彩色电视机,在加拿大是1957年,日本和欧洲是在1960年代出现的。而后卫星直播及转播的时代开始了——直播节目可以直接被用户接收,转播节目则只能通过绕道电缆服务中心接收。在20世纪60年代有着巨大进步的磁带式录像机也对文化习俗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使观众从实时观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在想看书的时候有选择看书的可能——但同时这也倾向于增加了在电视前的时间而牺牲了其他的休闲娱乐。

听出不同

在单一的新闻领域,两个部门的一系列问题居于主导地位,即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一方面是“利益至上”——可能应该改为“利润”的商业体系(这是美国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公共垄断的方案(国家直接完全控制广播或是通过中介者控制)几乎在所有的民主制国家逐渐消失;最终,以平衡的不稳定性及多样化的丰富性为标志的两个部门共存状态勉强地在很多西欧国家确立下来,但其确立方式中对比非常明显。

我们曾经提到过,广播曾为电视充当了“范例”,因为广播领域的国有部门比电视领域的国有部门更早面临了竞争。范例,不是道德用语,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模特,而是经济学家们惯常使用的意义。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引用一段个人的记忆。在1954年12月我出任法国广播电台主席之时,法国国内广播电台正经历着一种非常困难的境遇。12个月以来它记录了非常明显的听众数量下降。我依然记得络绎不绝的博学之士,通讯专家及行为社会学家向我们解释唯一的复兴办法是模仿卢森堡广播电台(砾砾),为听众们提供大量逗人开心的人。也许是这样使得民意测试曲线稍有改善,但这只是在短期内,我们相信在长期内这是行不通的。相反的,应该坚持已提到过的明智的口号:“听出不同。”不是气喘吁吁地跟在我们的竞争者后面跑,希望采用他们取得成功的方法并比他们做得稍好些,而是要坚持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展示有别于他们的东西;从民主方面来讲,这是唯一可以使市民纳税人提供资金的合法化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自视清高、固守自我的文化优越主义的风险：它极可能按照适得其反的效果，为自己的事业辩护，它所依据的标准就是只取悦一小部分精英。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风险：就是不得不满足于一小撮同好的吹捧，他们随时准备用笔杆子来为朋友摇旗呐喊。这样的满足无疑是忧郁病态的一种表现。

出于这种分析，我委托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纯粹“国有部门”人员的广播界人士让·原加雷托准备一个新的体现这种方针的节目表。这便涉及创立不同的节目，通常要显示出与对手们不同的节目安排形式，但这就意味着要通过损害欧洲一台及卢森堡电台的利益而得到不断增长的听众。

因此，应该打破常规，取消一些在我们看来不是通俗而是粗俗的招揽性节目。最初几个月，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听众持续下降，听众们的习惯被扰乱了。而后情况慢慢有所好转，三年半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1965年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听众数量超过了欧洲一台，这正是在同年12月一次政治风险提前中断我的第二次委任之前不久。

国有身份这个特权使我们有时间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不必经过那些生来就只对短期效力十分敏感的广告客户们的同意；这种身份还使得我们有时间为潜在的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广播“产品”，而他们在事先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种节目可能存在；使得我们有时间使听众逐渐适应，从而产生对这种差异的渴望。这项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它处于所有的“自由”电台出现之时，这些“自由”电台与私有部门的外围电台联合起来向法国广播电台发起挑战。

很明显的结论：公共电视台没有理由在竞争的同时被刺激、被弄乱及被夺去其确定性的安逸——它带着一种恢复的信念努

力提供其他的东西,在不同节目范围内“牵引”总体开价向更高发展。

美国 利益至上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一个危险的极端。

在电视发展之初,20世纪50年代之时,节目“介绍人”的一些广告客户(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为“杂牌”)从一开始便依据广播的例子而支配这些节目,并通过资助某些浮夸的节目而享有盛誉。但是这一年代后半期,听众数量开始扩大,广告的筹码便变得更多,通讯社的权力增大,并且迅速建立了至今仍为美国电视业提供美好前景的节目模式,其中居主导的有老套的“系列”节目、月系列连续剧、金钱游戏、配有录音笑声的大兵闹剧。与丰富多彩的新闻节目的生命力相对,其他节目模式毫无独立精神地根据观众的平均鉴赏力而摄制,例如民意调查员们为节目编排者及广告策划者们确定的节目。当然也会有些例外出现,但为数不多。被纠缠不休的“广告短片”切断镜头的现象成了一种主要特点。

揭露性的事件出现于1959年一件丑闻爆发时,因为有人发现一个名为《2000美元问题》的节目(人们可以通过一种或全部翻本或加倍输钱的方法赢钱,直到赢到这笔数目),是弄虚作假的。罗伯特·雷德福1959年就这一事件摄制了名为《益智游戏》(《益智游戏》)的著名电影。然而朝向这种类型电视节目的势头强劲,以至于这次揭露在舆论中引起的冲击不能够使它放慢速度。如果说在新闻领域,50年代期间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节目质量增强了观众的好奇心,在另一些领域中却全然不是这样。美国

的商业电视并不扮演文化角色。与欧洲通常所经历的正相反,它与大学界及知识界是绝缘的。它的一位领导人曾讽刺地说:“这是一种娱乐性的行业,如果您需要一条信息,通过西联公司的发报机发送好了!”用于推进阅读的“省文撇”及“文化杂谈”这类节目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种缺乏面前呈现出一种意志主义的补偿性试验,其经费部分是由国家提供——但试验结果既有限又不稳定。到处都有多数派倾向于左派,情况对所谓的公众电视更为有益。在肯尼迪的继任者林顿·约翰逊的民主管理期间,在各种收效甚微的尝试之后,1967年国会同意投票通过《公共广播电视法案》以建立公共电视网,通过联邦预算的力量及一种非常适合美国传统的交汇方式把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联合起来。1969年公共广播公司诞生,用于恢复预料之中的津贴及规划草案。它于1969年创立了(国家公共电视网)。这一组织把一定数量“公共”电视台以网络形式组织起来,这些电视台曾在社会资助的支持下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中。

一切证明了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活力。公共电视网是1969年第一个全部通过卫星传播的电视网。1970年它连通了1000余家电视台。但它的不稳定性在随后几年便显示了出来。公共电视网遭受了地域影响的不平均性之苦:与我们曾提到的广播相同,例如广播古典音乐节目的便只能在一些受惠地区才能听到(东海岸、西海岸、各大城市等)。同样“文化”电视节目在全国很多地区都不能接收到——那些地区确切地说已经在文化“供给”方面处于很受阻碍的状态。有些人希望在几年来开始飞速发展的电缆可以暂时减少这种缺陷并逐渐减少这种不平等性。而电缆本身首先也发展艰难,并且其发展方式也是不平衡的。另一方

面,电缆的发展是与观众的习惯相抵触的,这些观众还不习惯于以某种形式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美国人认为由广告提供一切是很正常的(没有想到无论怎样他们即便不是作为纳税人,也是作为消费者而间接确保了其经费来源)。因此电缆直到 1940 年代中叶一直经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1939 年约有 150 万居民装备了有线电视)。在此期间,通过电磁方式传播的“公众”电视节目表露了它内在的脆弱性:在第一次政治风暴期间,政府和国会为国家津贴提起诉讼。正是这样,1952 年被选为右派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缩减了很多允诺的款项(在考虑过简单地全部取消之后):他选举的成功一部分是建立在他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突然缩减所得税之上。1953 年,联邦的预算对于整个美国只有每位居民 1.5 美元(公共资金及私人资金)。

还应提到,所有这些促使了在正确方向的提供节目变得多样化,例如 1955 年 10 月的《青年》杂志用于青年人节目方面。家庭协会在这方面产生了影响,他们顾虑到电视对孩子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孩子从两岁起便每天有将近一个小时在电视机前。一位幽默的统计学家计算出平均每个美国小孩在 1 岁之前便在电视中便目击到 10 万起谋杀案件……由此,一些著名的节目的成功,比如《芝麻街》系列节目广泛地影响了年轻人的思想。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提供的图像一直比欧洲要差(而且其色彩也不及欧洲《电视》或《电视》所提供的质量)因为在美国,在高分辨度电视出现之前,一直便保持着最初的 405 线的图像。高分辨度电视以 625 线图像运行,但它只是处于实验性应用阶段,并且这项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果不算是碰壁的话,其进展也是极为缓慢的。

英国的荣誉

与美国模式相反,欧洲提出了其精英主义教育模式,或者叫大众抱负模式。

与广播的情况相同,从英国开始是合理而实际的。所有的人能确立的质量标准,实际上都是在英国确立的水平最高。

因为这里很模糊,我们先不谈观众看电视的平均时间这一方面——英国的数字比整个欧洲大陆都要高,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电视在各方面所赢得的荣誉的巨大数目。根据热·布吕梅的研究,在蒙特勒电视节(每年为高质量的电视节目而举行)中,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英国夺得了四十二项奥斯卡奖中的三十九项。在同一时期法国却未获得任何奖项。至于意大利国际电视奖,在那几年由意大利电视业组织的奖项中,英国在十二项奖项中赢得了九项,而法国只有四项。

这种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技术的卓越性,这是依据由一批杰出的电视摄影师及音响师来操作的悠久传统,他们为长期困扰欧洲大陆电视的音质问题而忧虑,因单一的图像而心神不宁,而后,社会新闻的价值,体现在其活动的多样性中,在表面及深层问题方面。英国电视业,例如在谈及工人问题方面,它找到了一种在别处没有的准确基调,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出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在英国,文化界大体上与电视非常接近。很快,法国及其他地方成立了一些专业演员小组,垄断了电影剧本及电视影片。英国却绝无此类,我们知道在英国电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戏剧复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阿尔比或品特的戏剧便在电视上开创了它们的事业,而在法国却没有类似的情况。

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月说依然是局限于岛内。很少有对外的节目，尤其是面向欧洲的节目；由于语言的一致性，它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联系多一些，英国的新闻越是不只对英吉利共和国而是面向世界开放，它其他的节目对外开放的程度就越小。

在新闻方面，虽然经历了 愿年代的风暴，英国却依然是享有盛名的，教育节目也成了第二个值得骄傲的主题。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法国教育节目一直持续着何种发育不良的状态（至少是持续到“五频道”的诞生，即 员源年 员月产生的“知识与培训”频道），而当时“开放大学”是一个典范性机构，为那些没能够达到其预期学习层次的人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它是 员年依据皇家规章建立的，吸引了 圆万名大学生。

科学性节目也取得了很大发展空间。在 愿年代初，在法国人们担心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节目会有所衰落，让·奥杜兹即让·原克罗德·卡里埃就此作的报告只是非常缓慢地影响了公有部门的节目编排者。

第三个主题——连续剧。关于它们的主题研究、原动力及陈规，可以追溯到 员世纪在书面出版物中它们的雏形。一个无与伦比的例子是 员年出现的长期“系列节目”《加冕礼大街》，这是一个描绘曼彻斯特工人及大众的节目，它采用了一种足够合理的基调，以免触怒它所描绘的社会群体及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为什么英国电视业能取得成功呢？除了一些不可触知的原因，有一个理由是与这个中心主题联系紧密的：英国是最能运用实用主义想像能力确保国有和私有部门之间有效的平衡的国家。

起初，一份说明月说因其精英主义而令很多人生厌的报告在 员年温斯顿·丘吉尔保守派政府统治时期，促成了一项创立一

家商业电台的决议诞生(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这家**BBC**独立电视台)。不久后,出现了一些针对**BBC**的负面批评,有人指责它水准太低并且由此引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这段历史由此被突出了),即“皮尔金顿报告”。应该指出,在此期间,**ITV**由于竞争的加剧而懂得不再显得那么故作高傲,并且能够在不放弃其质量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由此“皮尔金顿报告”中提出了一种补偿措施:创立第二家国有电视台。这样**1962**年**1**月**1**日诞生了——它时而倾向左派,时而倾向右派——**1962**年成为了不列颠群岛第一个彩色频道。**1964**—**1965**年休·查尔顿·格林任**ITV**总经理期间,他懂得协调他所负责的两个频道间的互补性。**ITV**以其文化色彩日益浓厚的主题著称,人们甚至做出了例如《莎士比亚全集》搬上银幕之类的享有盛名的举动(**ITV**已经在几年前每周日播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依据高尔斯华绥著名作品改编的《福赛特传奇》及《圆顶礼帽和皮靴子》是**ITV**的其他一些产品,这里无关于狭隘的精英主义,但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其质量是很高的,并且不具煽动群众的色彩。

这样,在**1960**年代,从观众角度来讲便证实了一种平衡性,即为国有部门的**ITV**及**BBC**收视率在**1960**年分别为**50%**及**50%**,以及另一方面唯一的商业频道**ITV**——**1962**年后命名为电视三台(收视率为**50%**)之间的平衡。为使对称性更为完美,**1962**年这一体系最终由安南报告后产生的电视四台,即第四频道而补充完整。其招标细则中含有“与其平衡不如开放,与其中立不如表现”之意。第四频道在英国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享有广泛的声誉。它能明智地保持一种简便而低费用的结构,尤其是通过外部操纵运行,没有那种时常影响公共频道的过于繁重的那种创作机构。

要点十分清晰:公有部门要重新着手运用“研究的头脑”去考察其他的海岸,提出其他的形式,引起观众的兴趣以期最终推动整个国有电视系统朝着更为丰富及更为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关于新闻的幻想越是逐渐被破坏,有关其他节目的英国模式的考虑便越会延续下去……(此外,另一个高效而野心勃勃的电视台,日本电视台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其电视业节目品种繁多,包括从最通俗的节目到最具文化色彩的节目。同样是依据双重部门原则运行:一方面是 晕匀运^①,另一方面是 晕粤月^②)。

尽管这样,“粤悦月粤粤”——英国人对 月悦的俗称,依然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并且其海外观众在 员怨苑年降至 源豫,因此它近期必须对一段时间以来影响它的一种思考加以总结:在这种逐渐下降的趋势面前,它是应该继续全线出击呢还是突出就竞争而言的“差异”,并取消私有部门已大量提供的那些节目呢? 员怨缘年《广播法案》更新,并明确了 月悦的使命,规定了其运行规则,但这并没有结束这场争论。

我们现在来看三个范例,在其各自的探索中,这一系统在寻找其基础方面面临着众多困难:艰难的平衡……

德国的稳定性

我们曾提到过德国电视台的结构特点,德国电视一台(粤悦月)自下而上是由地区开始建起来的,各州极力抵制集中。阿登纳总理的失败是很说明问题的,尽管他的政治身份及个人声望都很高。他在 缘年代末期致力于建立隶属于联邦的第二个电视网,并

① 晕匀运,日本广播协会。——译注

② 晕粤月,日本民间放送联盟。——译注

使之位于亲近政府及波恩联邦政权的当局的统治之下。地方的反对十分强烈,最终他没能实现这一设想。1992年,第二个电视网即新频道德国电视二台(在云)诞生,总部设于美因茨,同样是建立在联邦原则基础上。电视一台及电视二台受命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针对民主共和国的特殊项目,这一项目在柏林墙倒塌前扩展到了整个联邦共和国国土上。(重新统一后,东德五州的视听系统没费太大周折便并入了联邦共和国系统中。)

这两家电台都涉及一种国家垄断,其中包括对广告的垄断,但广告时间有所限制(从 5 时到 10 时),数量上也有所限制(由最富裕的各州向最贫困的各州提供财政补贴),其原则是保护各州自由,同时不给节目供给能力方面制造成太大差异。教育方面的任务是由两个电视网分摊的。

从政治上来讲,人们长期认为电视一台倾向于左派,电视二台倾向于右派,但我们却不能说它们像在意大利一样直接隶属于社民党或基民盟,那样的话联邦制度在其中将会是相对峙的。

这种平衡的国家垄断系统一直恰当地运行到 1990 年代初。在 1990 年基民盟原基社盟联盟执政及赫尔穆特·科尔政府时期,右派决定允许私人电台参与竞争。执政党多数党强调指出,卫星直播不久便会用来自外国的图像充斥本国领土,本土电视台便将会停止进步。保守党人认为最好是在局势混乱前做到未雨绸缪。此外,一种最快速、最易监督的电缆发展起来,能够避免“意大利式的”电台混乱局面。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德国人的谨慎使之注重仔细地安排过渡,以至于国有部门将其行动自由让与私有部门时显得小心翼翼。

1993 年 1 月 1 日第一家私有电台诞生了:为了这一事件人们用了两年时间准备,这与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突然转变是远远不

同的。这个卫星电视一台(杂裁员)使用卫星及电缆,它起初是受限制的,因为只有死豫的家庭装备了有线电视。社民党在其支配的各州与私人电台逐步抗争。但这种抵抗逐渐让步了,尤其是由于社民党在汉堡的部长兼主席已归入“私法学者”的阵营。第二个私有电视台——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砸稿)的建立使得新的平衡状态完善起来。这家电视台 员愿年 愿月开始运行,在各州都处于一个特定组织的严密监督下,这一组织负责限制其广告及监督整体水平。这个整体在居主导地位的公有部门中,一直处于德国知识界批评的目光监控下,被适当地控制着,他们担心劣质美国电影的入侵,这些电影在美国已经贬值,又以极低的价格卖到欧洲,而德国的传统一直是拒绝限额,无论是本国限额还是欧洲限额。

意大利的挥霍

意大利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将其置于 员苑年。员缘—员年间,基督教民主共和国统治之下绝对统一性成为这一时期特点,而在 员年之时,这一特点被推翻了。意大利国会陷入了自己的罗网之中,一直在视听立法方面处于滞后状态。这与法国不同,法国是乐于制定一系列法律的(有时只是一纸空文),意大利的惯例是对法律的判例有不停的需求,而这些法律却迟迟没有诞生。因此由最高宪法法院(相当于法国宪法委员会及行政法院权力的合并)法官们所制定的审判理由便显得重要了。

员年,该法院宣布“政府最能够直接保证为总体利益服务的部门的客观性、公证性及持续性”。年代所有的法律原则都是从这一原则引出的。教学法的范例体现了贝尔纳贝的想法,博

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我们讲“一个纵向的范例,从一个中心向被原子武器摧毁的、被动的周边地区进行单向传播”。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人们经常引用一个扫盲节目《学习不言晚》为例。

在 1974—1976 年间,该法院试图构想一种垄断内部的竞争体系,但是没有成功——这两年正是法国七年的一个缩影。在这段短暂的时期内,人们忽然之间放弃了绝对统一的体系,在一种如意大利通讯部部长所说的“西部氛围”中突然改变立场。这位部长以一种简练的用语讲道:“应使电视业百花齐放。”在意大利的情况中是绝无此类的,或者说,如果我们继续追踪的话,其中一朵花自己拿出了修整剪,把大多数其他的花都剪断了。读者可能认出被称为 ~~杂志杂志~~ 或“~~杂志杂志~~”,即“游蛇”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游蛇”是第五频道,即贝卢斯科尼的主要电视台的象征——游蛇这种动物对于我们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邻人来说代表着诡计及灵巧。贝卢斯科尼龙卷风来了。

第一个阶段是无政府主义时期(1976—1978)。这段地方私人电台“激增”时期与我们曾提到的电台的混乱时期是相应而生的,管理草案的增加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第二阶段是贝卢斯科尼攀升时期,他排除了异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1979—1980)。

活动的参与者是什么人呢?一方面一群发行人(图书及报纸的发行人——我们知道意大利区域性报纸的国家影响力),他们希望扩大在电视界的影响及向这方面投资;其次是广告客户,他们希望第一时间占领对于他们来说尚未完全开发的地方市场,并廉价买下国外的节目,以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交易圈,这个交易圈便预示着一种未来的合作网。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便属于这一范畴,拥有财政投资公司非宁维斯特公司,并将创立 ~~杂志杂志~~

这即是他在电视界活动的俗权机构。

贝卢斯科尼是从米兰地区中产阶级不动产行业开始行动的，并且在其活动范围内他希望提供一个有线电视台作为对客户来说的额外诱惑。他通过这种渠道进入了这一领域，并且由此在1989年年末推动创立了第五频道。

一旦这个充满利益和激情的漩涡又弥漫烟尘，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那便是相互交错的许多斗争。

首先是1987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和私人电台之间的对抗。公有部门由于1982年12月创立了一家地区性电视台而保持了某种活力。第一个筹码：调频。在意大利这一领域的混乱与在法国广播所长期经历的混乱是同样的。1987年的新竞争对手通过“鸠占鹊巢”而剥夺了公有部门的听众们的节目收听权，1987年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第二个筹码与地方文化相关：几年之间，宪法法院与政界接受了私人地方电视台的原则(大概是由于德国模式的影响)，但并没有接受面向全国的私人电视台的原则。

在第一个斗争前线，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并最终得以在1980年代中期恢复了频率中的秩序，但相反的，在它为了保护其国家垄断所做的努力方面它却彻底失败了。贝卢斯科尼作为社会党委员会主席贝蒂诺·克拉克西的密友，非常精明地懂得在政治局势中“冲浪”(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髦的说法)。1989年，由于这位强大的靠山，他成功地使那些他实际上已经通过卫星运行的全国电视网合法化。

另一种对抗是以贝卢斯科尼及广告客户们为一方，发行集团为另一方，包括非常强大的里佐利、鲁斯科尼及蒙大多利报业集团。很快，后者便被打得一败涂地——在内容方面也受到了影响……为什么呢？首先，它们不如第五频道富有挑战性，它们在

文化领域也关注其他事情,特别是它们更守法。出于性格,出于习惯,还可能是出于惰性,或者是出于对政府部长们长期支持的珍惜,塞尔焦·贝卢斯科尼却没有相同的顾虑。

“游蛇”非常灵活地行动——例如获取了转播大型足球比赛的权力,并显示出要向全体电视观众提供这些节目的愿望,随后解释道:政府、思想狭隘的人及保守派拒绝让他在全国范围内转播,却允许他将其地方电台联网。公众舆论的压力帮贝卢斯科尼取得了成功。从1985年始,很明显地他战胜了那些发行集团并逐渐收购了它们的电视台,同时他也战胜了 **砸碎**在对 **砸碎**非常不利的这一年,他挖走了金牌明星(几个月后在法国电视五台诞生之时他又重复了这一手法)。**砸碎**在短期内笨拙地进行了反击,但它不是显示出其面向高标准的特性,反而倾向于降低其抱负,以至于人们对它的未来不抱有太大信心:这时让原德尼·布勒丹写了一篇关于法国的未来的报告,这篇建立在费边政府要求之上,把意大利电视发展的情况比作文化的垮台和一种极差的陪衬。因此而后的复兴便是一种巧合的意外。

但是在复兴之前,重申一下 **砸碎**暂时衰落的三个主要动因是很有启发性的,并可以同时检查我们是否能够在法国找到这些动因。

第一个因素是个性丧失,这是很令人不安的。在信息依然由政党(尤其是 **砸碎**在各地区服从于受地方“巨头”)控制的一段时期里,**砸碎**便不再懂得其特性的根源了。因此它在新闻以及电视节目两方面都落空了。另一方面,**砸碎**经历了一场预算危机,贝卢斯科尼的竞争使得所有“产品”的价格猛涨,其中涉及美国的系列片及电影,一些洞察敏锐的商人不久前以低价获取这些“产品”,而又以高价转卖。最后,一场反对公用事业收费的运动发展

起来，这通常对公有部门来说都是极大的灾难。马尔科·潘纳拉的意大利激进党组织了这场运动，这一政党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一直就很富有创造性。它打着一种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拒绝国家控制的旗号，却反而因此使得与私人利益紧密联系的右派势力得以增强。钱款收缴状况很差，舞弊盛行，以至于国家处于一种成本增高与收入降低的两难境地。这段灰暗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喧闹的丑闻。

在法国：从垄断……

如我们所知，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从戴高乐到蓬皮杜的某种连续。我们提到过后者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电视是法国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位加拿大记者带着某种讽刺用作了一本书名。丹尼斯·邦巴尔迪耶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揭示了美洲大陆与法国的精神状态差异之所在。在蓬皮杜任总统后期，阿蒂尔·孔特倒台后不久，马尔索·朗继承其位任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他筹备了一次沉着的改革，似乎是大有希望的（这项改革在众多加入联邦的机构中安排了一种权力的分散），但1980年10月1日蓬皮杜的逝世使得这项改革突然停止了。

1980—1981年间新闻节目总体上是受控制的，虽然存在着我们曾提到过的一些开放性，尤其是在雅克·沙邦·戴尔马任总理期间，这种情况反而促成了其他节目的一个值得称誉的时期。阿贝尔·奥列维的名字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他是马尔罗的朋友，圣约斯特的传记作者，也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并给他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种体系能够持续下来,是因为虽然有政治上的对抗,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使得技术专家、工会领导者们联合起来。

技术……我们列举出克罗德·梅西耶这一重要人物,这位要人非常持重地主持了电视业的技术进步,并在20年代末促进了亨利·德·弗朗斯的“视听系统”系统的发展,这种系统能提供一种高质量的色彩。

导演工会当时受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与戴高乐派没什么不同,他们同样属于一种雄心勃勃的大众文化的思想。马塞尔·布吕瓦尔导演的拜伦的《唐璜》,让·普拉导演的埃希勒的《波斯人》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就像是这种雄心壮志的标志,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这就是“比优特原肖蒙派”,他们通常直接表达感情及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戏剧中。然而人们并不鄙视形式上的探索。让·原克里斯朵夫·阿弗蒂的作品,最初系统地实践特技摄影的作品之一,以《绿葡萄》为代表标志了一个时代。甚至连续剧通常都是很高质量的。整整一代人都记得受人爱戴的雅尼娜蒂埃里·拉弗隆德。接下来的1959年,被1960年的总统大选分成了两个时期。共和国的新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乔治·蓬皮杜的继任者,一度曾经因听取其部分亲信及他的多数派的意见,他犹豫过是否创立一家商业电台,而最终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选择了分割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宣称这一管理局财政严重亏空,这表明这一机构不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事后,人们将发现这是一种财政假相,但为时已晚,这种做法有些不值得称道,然而却将起到它的作用。

国家的首脑决定创立七家公司。法兰西广播电台将从这种新的独立性中取得很大优势,享受一种自由及独立的预算,避免

了充当受虐待的“小妹妹”的角色,因为在其他国家中,这样的公司通常只是在公有电台中占很小的份额。电视方面有三个电视网:电视一台(裁云),电视二台(粤城广播)及电视三台(云城),在基础技术方面通常由 裁云(法国制片公司)及 裁云(法国广播电视公司)提供服务。最后,全国视听研究所(隰粤)是皮埃尔·舍费尔及诗人皮埃尔·埃马纽埃尔的创想,后者成为它的第一任主席;隰粤需保证四种功能:技术探索(不久便在综合图像制作中享有盛名),有关节目内容和社会学的思考,还有一项教学任务,培训技术人员及导演,尤其是为第三世界培训,最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就是保存视听档案,为集体记忆服务。

从 裁云年至今这段时间,在新闻方面是以连续的进步为标志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宣称将抛弃沙邦·戴尔马·德格罗普时期的思想,而后——这是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确保经理们的真正自由。马塞尔·朱利安,被任命为电视二台首脑的著名发行人,曾在很多书中叙述了他先是因这种自由而感到满足,而后便感到悲哀了。因为他看到不久后这种自由便因一些虚伪的介入而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新闻经理的选择方面。无论如何,在吉斯卡尔的时代里,电视从共和联盟及法国民主同盟这两个多数派中竞争者之间的激烈对抗中获益,尤其是在 裁云—裁云年间雷蒙·巴尔政府统治时期。

裁云年多数派出现变化及弗朗索瓦·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时,社会党人便被右派监视及挑动着去实现他们的允诺。

在短期内,很多行为是令人担忧的。一些战士对这些或那些以前电视业的象征性人物大发雷霆。新任通讯部部长乔治·菲尤公开劝诱职员们反对其经理,其中大部分经理自动离职,他们的继任者是由部长会议任命的,此间很多不久前被辞退的记者或

制片人来试探,他们曾经因政治原因或由职业能力不够而被解职……

但是,几个月之后,社会党政府坚守了其诺言。一个显著性事件是根据 1984年 7月 13日《菲尤法令》(选择这个日子是有目的的,刚好是 1981年颁布《重要法令》后 1984年)创立了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它是一个智囊团体,负责建立政府当局与广播电视之间的一道屏障,负责任命公有部门经理并担任“视听风景”的警察——正如人们开始叫的那样。它的机制是仿照了宪法委员会——成员 9人,每 3年后更换 5人——但它并没有能幸运地被写进宪法,这在 1983年政府更迭时期,即希拉克政府担起扼杀它的重责之时,对它是致命的。此间,米谢勒·科塔经历了起起落落,这在她的关于任经理期间的回忆录《丘比特的镜子》中有着出色的追述。有些任命曾被指责,他们似乎依然受着当局的影响。但另一些任命是非常大胆的。总体上,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很好地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其总结也是值得称誉的。

竞争

另一种新生事物是 1983年三个私有电台的创立。首先是加密台,1983年创立的有线电磁电视网,在艰难的创业之后,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性成功。接下来的两个私人电视台是电视五台及电视六台,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匆忙情况中决定建立的,这不免要引起各种技术上及道义上的问题。有线电视的发展相对于预言而言及与很多邻国相比是非常缓慢的,这种滞后到 1986年依然没有太大改观。

重要的是要在选举之前安置好这些电视台,因为左派已经预

见到他们的失败,而这样可以使对手不能受益于这项创举——在欧洲,电视台是普选的一部分(贝卢斯科尼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进入了法国领地)。事实上,这事弄巧成拙了。因为使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处于社会边缘,并似乎是把电视五台及电视六台交给了亲左的资本家,这样执政的左派便为 1957 年猿月选举后第一次共治时期的雅克·希拉克政府重新打乱这一系统提供了借口。

重新执政的右派用另一个机构代替了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即“悦蒙蕴”国家自由传播委员会)而同宪法委员会一样,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其构想是为了与连续的多数派相较而言,其成员的政治观点的发展变化是被放开的,而“悦蒙蕴”根据一个复杂的人员招聘系统而注定了无论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个委员会都会在政治观点方面倾向右派。以至于 1958 年密特朗连任之后力求使它也被取而代之,而此前不久他曾以一种非常著名的用语说,“悦蒙蕴”不能够唤起人们称之为“尊敬”的那种感情”。

“悦蒙蕴”的第三种变形——视听最高委员会,由于菲利普·纪尧姆被选为电视二台及电视三台重组后的首脑这一事件而经历了坎坷的开端。对这位明显右派的人物的任命,表明了最高视听委员会(悦蒙蕴)较政府而言拥有更多独立性,而任何人都没想到政府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便看到了财政武器——老相识了——使得立法权在一年多之后终于能够使他离任,此人的管理十分冒险,最后没能战胜其任命的原罪及被埃尔韦·布尔热取代的命运。

另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决定源于第一次共治时期:社会党政府创立了两个从无到有的电视网,电视五台和电视六台,希拉克政府不满意于改变资金,因此这两家电视台的领导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选择,使电视一台私有化。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任何

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作出过同样的冒险。尤其是私有电台合法化后,它们在各处平地而起,与公有部门相竞争。在任何地方公有部门从来都没有经受过如此粗暴的打击。电视一台似乎成为了国家的一种必要财产——无论是在权力顺序上还是在象征性顺序上。

应该指出,1964年代在一段更长的时期内经历了一种变化,而在1959—1962年两年间,意大利已经以一种更简练的方式经历过这种变化,即在公有部门内部扩大了竞争。这一冲击被埃尔韦·布尔热的强烈个性凸现出来,此人非常自我中心化并且很专断,1962年成为电视一台的经理。此时,因其老板皮埃尔·德格罗普的光环而享有盛名的电视二台,正为看见这位老板不久注定要离开而担忧——因为他受到了退休年龄和政府方面的压力。在1961—1963年间,从观众数目及电视台的道德方面来看,电视一台确实已经复兴,但它却以牺牲发展为代价买下了一些总体上标准不高的节目。金钱游戏的地位在不断增长,人们要求那些廉价的外国节目,节目安排比以前更为大众化,私有化之后的一种突出趋势,使关于“所谓的文化界”的博学讨论衰落,甚至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些讨论曾在收购电视一台的候选人出庭,1963年时引起了传媒界的动荡。

不久便很明显,人们对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的经验的接纳已经为时过晚,即新闻问题(一半是精神状态的发展,一半是竞争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精确性可能被提出诉讼——看看蒂米什瓦拉、海湾战争及后续——以及对待新闻的方式,但问题不再存在于政治权力任命方面了。同时,其他类型节目的质量及多样性问题比以往更突出了。

就是这时,最后这段时期揭示了最高视听委员会(1964)的作用

的一种模糊性。人们在 1940 年代广播中便已注意到这种模糊性,但麦克风相对于摄像机来说,其情感分量及象征性的分量都要更小。广播的影响是很小的。法国传播视听委员会同时负责任命法国广播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经理,并负责协助为某种公有部门的观点辩护,同时担任广播系统总体的警察——例如在私有部门之间担任频率方面问题的仲裁人。在 1950 年代末,像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一样,同一个组织同时担任整个领域的调节者并任命电视二台及电视三台的共同经理,其弊端也就愈为严重,这个组织由此被牵连到经理的成败中,并在公有部门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一种间接却沉重的责任。或许有人想到了这一点,是否应该找出另一种在双重程度上避免受到广播影响的命名制度。

无论怎样,法国很明显地处于两条可能的道路面前。第一条是从一个致命的斜坡上滑下,公有部门逐渐衰落的道路:更少的资金,更少的成功,更少的广告,更少的方法,更少的野心,这样接下来直到它因把自己局限于单一的商业不能支持的任务中而萎靡不振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一个更为幸运——是它证实了我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确定的方案,两种真正意义上的竞争逻辑的幸存得到保证:公有部门受到私有部门的竞争及高效的刺激,同时受到妥协、行会主义及怠惰趋势的保护,私有部门反过来因有一个国家级的对手使得其质量得以提高,而这个对手并不像它自身那样播出大量广告——民意测试显示这些广告是观众最没兴趣观看的。

我们要保持乐观。1954—1957 年间电视一台私有化造成的可怕打击之后,左派的 1958—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能够通过恢复公有部门的形象与色彩而重建平衡状态。其广度因为我的创举 广播而扩大。广播是法德文化性质的电视台,1959 年秋加

入由埃尔桑和阿歇特的五频道破产而被解放的加密网,重新执政的右派不敢对它曾多次嘲笑的一项决议提起诉讼,这一事件既很说明问题又十分鼓舞人心。1995年左派重掌政权,利奥内尔·若斯潘任总理后,文化部与交流部部长卡特琳娜·特劳特曼,致力于促使投票通过一项法令,通过这项法令在一家持股公司中集中公有电视台(电视二台、电视三台,以及电视五台,电视四台依然被排除在外,因为它是法德性质的),以更好地协调各组成部分及重振其雄心壮志。

砸碎碗的复兴

意大利的发展一样鼓舞人心。我们还记得让·原德尼·布勒丹在其1995年报告中宣称意大利体系是文化垮台的象征。然而,在几年间,我们目睹了某种复兴,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反的神话。有些人甚至还谈论“砸碎碗”,即“意大利电视模式”!正因如此,西班牙当时也效仿意大利,正在进行私有化,它遇到了另一些困难,并且在这个被离心力牵扯的国家中还存在强有力的地方化带来的一切问题——同时贝卢斯科尼也在觊觎它。砸碎碗的复兴是毋庸置疑的——1995年—1996年左右人们对砸碎碗还不会下贝里拉的赌注。有利于贝卢斯科尼的集中过程一结束(此人最后的收购品是1995年收购的砸碎碗),砸碎碗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找回了观众及某些声誉,因此也找回了一定的自信。

反弹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在于一种更好的系统安排。最终呈现的政治上的一致性,使1995年广播电视监管委员会得以创立,这个委员会依然以在政党间按比例分摊席位的系统为基础,但显示出了可以保证逐渐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能力,经理和总

经理都已经更换。当然,政治分赃制要求其中之一是基督教民主人士,即总经理阿涅塞,另一个是社会党人,即曼卡,但二者都是具有很高素质及公认的权威。另一方面,广告部门已被整顿,一项有关引起听众兴趣的科学方法的协议取代了那种有害的无政府状态。对于私有部门来说,它被迫同意在比例及广播持续时间方面对广告进行限制。

一种更好的平衡状态便这样建立了。私有部门组织本身在中央有贝卢斯科尼的三个非宁维斯特电视网,但还有一些勉强存在的地方电视台,最终形成了一个私人广播电视台联盟,为政府及砸穿提供了一个严肃而可信的对话者。经理曼卡在员缘年初很明确地确定了他的计划方案,“从有关传播及市场的社会需求趋势的研究开始”。他强调三个论据:从国内竞争向国际竞争过渡;从简单技术向复合型技术过渡;从一致的听众向按需求分割听众群体过渡。曼卡与阿涅塞致力于节目的多样化及三个公有部门电视网节目表间更好的互补,同时又强调不同频道的自主性。一种非常顺利的和解便在这样必要的协调及一种真正的自主之间出现了,这种自主同时包括每个频道负责人的责任感。重要的是接受贝卢斯科尼“游蛇”的挑战,他用一种非常集中的方式及一双铁手支配着他的三个电视网。

最后,砸穿的财政也被整顿。员缘年公用事业收费保证了其缘豫的预算,另源豫源于广告——相比之下,在同期广告给电视二台及电视三台带来了猿豫的收益。由于一定数量的管理机构、收购机构的合并及更为合理地应用录音录像室,砸穿进行了阶梯性储蓄。

在怨年代初,第一频道以预算可观而野心勃勃的节目为特点,同时依然保持基督民主居主导:它把它的自主及创新之处建

立在国家文化史至上,同时教育节目的质量也有所上升。第二频道质量平平。第三频道创立了人们称之为“栽培”的节目,换句话说即法国后来引入的《现实观察》,一种介于新闻和科幻之间的电视节目,致力于区域性地满足观众们更具体、更日常的需求。最终懂得比以前更好地通过欧洲广播电视联盟而利用公有电视网的国际联系。

没有什么比这一部门的未来更不确定了——尤其是被1993年夏贝卢斯科尼进入政界所扰乱,似乎从那时起全部意大利电视都集中于他的资本与政治权威之下了——直到1994年,反对这只怪异的铁拳的抗议使贝卢斯科尼丧失权力。继他之后的中间左派政府致力于恢复这一系统的平衡,成功地削弱了贝卢斯科尼。

第十四章 摇国际筹码

“在炮舰时代及商业金融时代之后 ,技术通讯网代表了第三代支配世界的力量。”吉米·卡特总统前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这句话非常有力地统领了这一章。当然 ,这句话很明显有些夸张。首先 ,因为炮舰、商业及金融并没有停止其影响 ;其次 ,因为它令很多人幻想可以像在戏剧舞台上操纵木偶那样操纵信息。但是 ,最后 ,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即信息本身已经成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

边界的末日？

现今信息的“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在新闻传播方面的进展不及在新闻全球化进程方面的速度明显 ,新闻传播在 20 世纪之初已经广泛取得成果 ,而以前揭示过的前几十年中图像与声音的区别 ,现在已经趋于消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只有广播可以自由地穿越国境 ,尤其是通过短波。而后 ,由于卫星的发展 ,电视能够(以更高的成本)在全世界传播图像——还有我们将会谈及

的互联网,不久便会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潜力。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参与者的演变,尤其是政府参与者,他们开始渐渐明白,过于简单化的新闻宣传可能会起到反作用,而且其影响往往通过精神方面的文化渗透而更有效地产生:这很好地证明了战后 源缘年的历史。

随着二战的结束我们也放弃了国际广播,而这种广播在二战期间曾扮演了卓越的角色。盟军胜利后,文字战争(当然比起导弹来没有那么危险也没有那么耗资昂贵)变成了现实战争的一种替代品,而根据荷马笔下的英雄的传统,至少是要有刀剑的战争才是现实战争。在冷战期间,活动家们经常表现出奥芬巴赫宪兵的那种有效的浮夸的消极性,宪兵们唱着“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时间紧迫……”却原地不动。语言没有成为行动的补充,有时代替了行动,甚至免除了行动,这对于那些反抗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曾相信言语的热情似乎可以允诺一种支持。

更为恶劣的冷战期间,约从 员缘苑年至 员缘苑年,大型短波广播电台经历了飞跃的发展。依据重要性对它们所做的分类在不同著作中各有变化,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把它们置于广播时间的长短之前来考虑,但我们同样应该考虑发射台的功率,所覆盖国家的数目,以及所用的波长。如果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在 圆世纪 苑年代的光荣榜上大概可以依据下列方式来安排。

榜首是苏联,它在 源年代末超过了美国。美国居于第二位,它拥有依靠联邦政府的美国之音及两家私有电台,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及自由广播电台,分别成立于 员缘年及 员缘年,基地设在慕尼黑。中国居第三,联邦德国居第四。德国有一项承袭美国 猿年代的政策,这项政策一直利用德国电波电台和德国

广播公司,它并不保卫德语,而是大量应用不同的语言。英国紧随其后,埃及接踵而来,并力图这样体现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角色。同样还应提起梵蒂冈广播电台,罗马教廷自1931年起用它来宣传宗教信仰并用百余种语言进行广播。

真相或是宣传

这样旨在政治文化方面产生国际影响的努力,以及后来在经济财政方面的努力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困难是重视他们的听众并适应听众的要求:这是比在国内市场上更为困难的事,在国内市场可以拥有很恰当的测定手段,使其能够依据更精确的标准详细地了解听众的情况:职业范围、年龄阶层、性别、地区分布等。在国外,这项任务便更为艰难了。首先因为国外调查涉及的比率很小,很难用统计方法去把握;另一方面,很多相关国家不赞同对这些节目进行民意测试,它们对这些节目的影响力感到遗憾;最后是因为这些全球性调查的成本迅速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像地质学那样操作,抽取“钻探式样”。我们同样以我们所收到的数目可观的信件为依据——但这可能是骗人的,因为通信者们(可能是由推动者们发动的)极少代表了听众们的普遍情况。

最终我们不能忘记还要论及杰出人物,因此会有一种不能简单地用数字方法去衡量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审查制度影响深重、存在一种非常强烈地收听外地信息欲望的国家,例如维希时代的法国。在东方国家确有其事,直到1956年,西方电台一直在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广播方面做着特殊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来的殖民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对象。

印度大陆的情况便是如此,它是 月说国际广播的主要目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目标是非洲,尤其是法语区非洲,也包括英语区非洲。对短波的忠实性在那里根深蒂固——尽管人们行话中所谓的“接听设备”的调频不足。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非洲的节日中进行广播时,那些在法国不为人知的推动者和记者们却声名鹊起。

所有这些电台所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对外方面除了讲它们的语言的国外听众外,还必须满足它们少数移居国外的同胞们,这些人通过各种媒介形成了权力集团。其中在法国,在国外的参议员与我们所提到的人的数目是无法相比的:他们想要的是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们已经在前面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电波之争中提到过,即限定真相与宣传之间的平衡。在冷战期间,一种明显的对立把 月说国际广播及美国的行径区分开来。月说国际广播的影响是依据一种通常来说值得称道的、公正的传统,而美国行径与它先前的原则决裂,甚至抛弃了它在 1951年开始最初的广播时冒一切风险宣布的真相原则;而后,负责人要耍弄宣传手段,不惜尽力使这种手段成为最为微妙灵活的一种。

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方面,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在 1950年代出现一种发展使之接近于英国的学说。其原因之一是凯道赛所提供的资金逐渐减少以及由公用事业收费所提供的份额的增加,但最后一段时间出现了一种倒退;公用事业收费的份额在 1953年又降至 1952年。当然,人们会因此感到惊讶:是法国的纳税人通过纳税而确保了一家电台的资金筹措,而这家电台从其定义上讲几乎与他们无关(即使在巴黎人们可以长期接收用中波传送的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并且从 1934 年起就可以用调频收听),但正是这一点相对于整个外交界为即时需要而想要使主权电台转向的趋势而言,形成了一种保障。我们的驻外外交人员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他们被派驻国的政府的这样或那样的活动的评判而感到不甚愉快。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些好意在影响力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并非是要否认一家主权电台依然是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喉舌。乔治·蓬皮杜曾说过一句著名而令人烦恼的话:“电视是法国的喉舌。”越是有人认为这句话已过时,在外国人眼中,电视就越是被自然地看作和他们势均力敌的对手一样,是对其本国观点的阐释。这样电视更负有其特殊的责任了。在某一非洲国家国内动乱爆发时,两个对立派收听电视的广播,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彼此的军事情况或心理上的情况很具有令人生畏的影响。例如,当共和国总统在一次官方旅行中到达一个非洲国家,如果他拒绝带着一种与法国广播、新闻杂志同样的客观性,来传达巴黎报纸对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强烈抨击的话,是不是令人气愤呢?或者说他是否应该忍受一点耻辱,至少是暂时忍受——来为国家利益的局势服务?无论是用理论术语还是用政治术语来说,答案都不简单,它同时要求严密性与技巧性。

在最为白热化的时期,由于在频率方面未能达成一个真正的约束性协议,所以竞争的强度更为激烈。在西方国家内部,正如我们所见,当调频私人电台的出现逐渐向最少量的组织让位时,无政府状态几乎一直存在(无论如何,在具有拉丁特色的民族是这样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最初的各

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译注

方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在使用频率尤其是短波方面的自主权。一系列的相关国际会议从二战以来便不断召开,这些会议表面上是技术性的,而实际上是完全受政治操纵的。第一次会议于 1946 年怨月在莫斯科举行。1947 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城召开的会议是很重要的,它持续了 缘个月,至少取得了一些不太明确的结果:如果说它促成了一个国际频率注册委员会的产生——此委员会负责收集数据和提供建议,各国的自主权便得到周至的保护。人们逐渐在边境范围的中波和长波频率分配方面达成了一致——乐于做不得不做的事了,但是在短波方面会谈收效甚微。由于冷战加剧,互相争斗中的电台相反的更加乐于把目光投向对手的频率以束缚其影响力。

华盛顿 原莫斯科的决斗

美国与苏联的决斗构成了这种对抗中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与主事者们通常感到的失落形成对比的是,双方用于其中的资金都不在少数,而这种失落引起了 1940 年代的战略修正。

1945—1946 年开始,即冷战之初,华盛顿决定花费大量联邦资金以进行广播宣传。官方电台,“美国之音”代表了美国政治的各个方面——“事件”及围绕这些事件所产生的争论。事实上,如章程中所述“由政治引起的争论”长期以来明显比有关目标及方法的介绍要发展缓慢。一个简单的主题从一开始便为记者及推动者建立了,即夸大渲染以下的确实性:第一,美利坚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第二,美国是无私而公正的;第三,美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美国人坚信思想及言论自由,并且在美国所有的种族,所有的派别,都愉快地生活着;第四,美国乐于支持其他民族的解放。美

国的政府和人民从未向殖民政治提供过帮助(当时是 1955 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深切地热爱和平。

福阿德·贝纳拉在他的一本论及广播战争的书中,将这一主题与苏联电台维持的一个主题进行对比,这是很值得关注的。苏联的第一个想法: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是持久和彻底的;人们不可能中立,必须在一方或者在另一方;当苏联采取一种进攻态度时,只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另一个想法: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人们热情地追随共产主义。这证明共产主义学说是有效的,同样证明对于社会进步来说,共产主义是在“正确的路线”上,苏联同样到处为那些争取解放的国家提供帮助。它顽强地为和平努力,而美国只想着战争。因为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复合军事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少数群体受到压迫,而接连的罢工、失业、通货膨胀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当然,同时还有黑人归并所引起的种族问题,这些问题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之初非常明显(尤其是 1957 年的小石城事件),苏联广播广泛论及这些问题。

美国建立了 100 多个发射台,发展了 100 兆瓦的总功率。它们确保了每周 7 种语言进行的 24 小时的广播,尤其是致力于面向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广播。很快,“美国之音”可以用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等进行广播……俄语节目从 1953 年开始便由分布在欧洲 10 多家英美发射台专门负责进行全天 24 小时的广播。我们还可以举出丹吉尔、塞萨洛基尼、希腊及罗得岛的电台,以及在远东的冲绳岛,在太平洋中的科伦坡,在越南的顺化,在非洲的蒙罗维亚等等。

不久,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及自由广播电台对“美国之音”的工作作出了补充,这两家电台一家集中面向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广

播,另一家集中面向苏联进行广播。继这二者之后,是自由欧洲委员会,它从理论上讲是在私人捐资基础上运行的,但我们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是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的兄弟,无所不能的艾伦·杜勒斯掌控)实际上确保了这些电台的预算。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它才被国际广播处所接替,这次其财源是透明的了。相对应地,苏联同样进行了有力地反击——1953 年每天有 20 多小时节目面向全世界广播。

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种矛与盾的辩证法发展起来。人们可以发送节目,但同时也可以干扰敌方节目。社会主义国家以一种特殊的活力致力于这一方面。依据皮埃尔·米克尔在他的《广播电视史》中所述,苏联采用比“美国之音”广播时所用的发射台多 10 倍的发射台去干扰“美国之音”的节目……在“自由世界”方面,人们也没有袖手旁观。一种重要的不平均性依然存在: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收听东方的节目远远多于收听西方的节目。

低潮期是由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转折于赫鲁晓夫的报告,尤其是与布达佩斯叛乱有关。直到那时,美国广播有时还充当着挑拨离间者的角色,虽然领导者的各种教育促使其谨慎行事;这些广播电台使匈牙利各处“受压迫”的人们听到,只要革命,他们便会得到西方的帮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依据两大集团瓜分世界的原则,根本没有什么援助——起义者们被自己遗弃了。事后,美国出现了大量评论斥责这些不负责任的电台。从那以后,它们在广播中更为谨慎了。

在 60 年代开始,尤其是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确立的缓和局势的氛围中,发展显现出来了。其中一个标志是双方不再那么多地干扰对方电台了。苏联拆毁了它在铁幕之后所建立的一系列干扰电台(源远座!)。在其中工作的 200 名技师转入发射台

方面工作。和通常一样,其后便出现了后退,而干扰的强度为美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温度计,体现出了二者关系的冷或热。伊里·佩里坎,1955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克的广播电台台长在其回忆录中讲道,他到任之时,用于干扰国外电台的款项足以用来建立一个捷克急需的现代化彩色电视中心。直到政治透明期间,1989年戈尔巴乔夫才决定放宽对慕尼黑短波的限制,允许收听这些节目,20世纪90年代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及自由广播电台的预算已经减少,并且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都市都建立了办事处。

南北双方

东西方对抗风云渐消后,很明显地出现了另一种对峙:南北对峙。1970—1975年间第三世界崛起时期实际上揭示了有损于穷人有利于富人的信息不平衡性。

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非常露骨的是对频率的占有:虽然人们从来没有确定一个全球性的规定,似乎最初的占有者非常有效地抵制了“侵略者”的进入,这些侵略者们企图取而代之,在繁复的短波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另一种不平等性源自发射台的功率,这种功率是随着同步卫星成本的增加而增加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消息的来源。应该时刻关注消息产生的方式以及它是依据何种分级方式被设计出来的,是暗含的或是明确的;很明显,这种进程以牺牲别国为代价而使工业国提高身价。而这对于五六十年代中诞生的新生国家来说是更为不利,在这些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广播曾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闻社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全世界共有150多家新闻社,其

中 缘个国家拥有国家性的新闻社。但这其中只有猿家在 圆世纪末享有全球传播的权利,而它们却覆盖全球 怨猿豫的人口,这便是联合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塔斯社从 圆世纪 怨园年代以来被缩小成了地区性质)。由此在 苑园年代侵占和抗议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的激烈争论,并引出了委托肖恩·麦克布赖德所做的报告。此人是备受尊敬的爱尔兰外交官(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及列宁奖的获得者),人们对这份报告期待已久。经过漫长的等待,报告终于在 员怨园年 圆月出版,但被美国斥为“缺乏实际的建议”。报告建议加强地方性新闻社,鼓励工业国的报纸给新生国家以更多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虔诚的愿望,而这个建议却根本没有被采纳。

或者说, 圆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我将会提及)的进步以及数据库的迅速发展,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这些数据库通过电传信息处理为用户提供信息,利用服务器媒介传播,服务器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并负责推动商业发展。 员怨缘年存在 员万间数据库, 员怨缘年为 圆万间, 员怨缘年为 员万间。其中 苑缘是美国的, 圆缘是欧洲的,这 圆缘里又有 员缘是法国的;只有猿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虽然没有有意识的宣传目的,这种局势也达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调状态。关注整个世界的历史,举例来说,在不远的将来,只在美国这一方面,情况就是难以忍受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所有这些数据都集中出现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历史上。缘年代法国政治观点的模糊性——在外交方面比知识界杰出人物们的立场要清晰一些——导致法国从这一时期起在对东方的

投入方面要远远少于英国,尤其是少于两大对立国家,即使是从人口及财力的比例上来看也是这样。接着,法国短波节目的衰落构成了 1940—1945 年这一时期的特点。人们对戴高乐任总统执政的几年甚有微词,如人们所知,在他以前的任期中,他曾有机会采取一切措施通过广播潜在的影响力为对外政策服务……20 年代初,爱德华·巴拉迪尔,一位年轻的法国行政法院审查官所做的有关短波的衰落的报告非常蛊惑人心,没有任何的积极效果。我曾有机会某天就此问题向这 1945 年里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提出质询,并问及他如何解释为何任由法国处于这种衰落的境遇,而且还经常把一些在别处不想要的记者打发到这些被人轻视的任务中。我没有获得任何信息。我的对话者以那种皱起眉头来的习惯性怪相,简单地回答我:“实际上,这是不可解释的。”

1953 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出任共和国总统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他很明显地更加不相信短波广播。在法国广播电视管理局分裂期间,他一下子决定取消大部分针对东欧的外语节目。在其中工作的记者们被逐至街头。以至于在 1960 年代末我们的短波跌至了一种可悲的境地,居于 1951 年,在阿尔巴尼亚和西班牙之后……

1956 年 1 月之后,左派的反抗是值得称道的,社会党最初两年的慷慨预算对短波广播是有利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根据 1956 年 12 月 13 日法令而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其经理的权限是与法国广播电台的经理相同的)。接着,在米谢勒·科塔继任之后,以及后来我接手之时,总经理埃尔韦·布尔热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不久被他的继任者福阿德·贝纳拉付诸实施。由此,语言种类逐渐增加,短波发射台的发展,尤其是在圭亚那、蒙斯尼

瑞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席卷拉丁美洲和西南非洲。

第一次共治期间,1957年出现了一个困难时期。我们看到当时组织国外法国人的委员会的影响力又重新出现(这并不是说让他们只去谴责,而不去陈述他们总体上的政治观点比国内要保守)。莱昂纳尔法令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法国广播电台相分离,这一点满足了前者的爱国心,但是威胁到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协调合作。保卫共和联盟党的第一任部长雅克·希拉克出击参战了。法国广播电台的一名老记者米歇尔·佩里卡尔,也是该党的议员,解释道他没有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是官员这一现象有何弊端。这是一种倒退。

接着,平静状态逐渐确立,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重新找回了自信。其调频中继站也增多了。我们在各地都可以网上收听。它是从1955年初开始广播,使用4种语言,管理2.5亿法郎预算(约为法国广播电台的1/5);大部分资金被国家团体用于增加其国际影响力,在资金的使用数额上是非常大胆的,因为旨在避免短期内一切选举的忧虑。根据一直有些偶然性的计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全世界有1.5亿常规听众。由此,它上升至世界的第四或第五位。加之还有法国和粤公司的影响,它尤其面向近东地区,从设立在塞浦路斯的一家功率强大的中波发射台进行发射,并且还利用设于加蓬莫亚博的另一个发射台以覆盖非洲地区。

电视节目:美国的统治及欧洲的反击

在电视方面,南北对抗并不是居于支配地位,美洲的美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抗是最为突出的。1950年代初,欧洲电视台50%—60%的节目是美国的产品,如果我们再加上“国际新闻”

这部分 数字就可能增至 苑园豫。因为知道这些统计会被某些不确定的空白所影响 ,人们注意到 员怨源年 ,依据 猿园豫(视听电信研究学会)资料 ,美国向欧洲出口了 源园多亿美元的电影及电视“产品” ,而反过来进口约 猿猿猿亿美元。此外还应该知道 怨园豫的欧洲国家的作品都没有走出国门。

回顾一下那些可以解释“美国货”在我们的屏幕上占据经济文化方面支配地位的一些资料。当然 ,这些资料是由技术的进步支持的(卫星、盒式磁带及最近的 悦悦悦与 悦悦悦)。但是其本质是源自令人头晕的高需求。这种需求归因于世界范围内广播台的不断增加以及其节目播出时间的延长 ,从那以后大多数电台都确保了全天 圆园小时节目播放。而另一方面 ,源园年代在欧洲这个一直狭小的市场上 ,制片成本却飞涨了。美国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因为它可以向国外大量销售这些电视节目。而这些节目因其国内市场的广阔 ,大部分早已经回本了。因此在适当时机可以很容易地倾销 ,甚至是一旦占领市场 ,便可以提高价格。

整个问题的模糊性在于判断通过何种方式使听众们对国产节目产生了绝对专注。法国最著名的“节目编排者”之一皮埃尔·维恩 ,在德格罗普时代曾是广播二台成功的创造者之一 ,而后是电视一台的顾问 ,继而成为最高视听委员会的成员。此人喜欢引用荷兰电视台即荷兰广播公司为例 :荷兰是欧洲有线电视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大多数荷兰人都熟知至少 猿种节目 ,其中大多数是外文节目(英语、法语或德语)。与法国相反 ,荷兰人大多数都很流利地讲这些语言。但是人们发现非荷兰语的广播节目都只达到了 圆豫—猿豫的收听率。因此 ,这一主题从某种意义上确保了听众的自我保护。

是的。但是 ,由于它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 ,译制工作发

展及改良之后,这一盾牌也就不那么有效了。

因此,有些国家认为外来的产品影响广泛,会给其民族一致性及文化活力带来压力,从而限制了它的回击战略。第一种反击武器,很自然的,就是简单的保护主义。但是这样过于简单了!其困难之一源于这种保护主义在观众中所造成的剥夺现象。封闭疆界是很复杂的事情,因此,总的来说,保护主义介入到了传播时期中来。因为根本不可能规定质量的标准(谁能决定这些呢?),人们必须依赖于限额系统。

在电影方面,存在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先例,即1937年的《布鲁姆原伯恩斯协约》。莱昂·布鲁姆当时被费里克斯·古安政府派遣与美国协商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经济财政问题法规,并筹备美国对于法国复建的援助。不过,这些协约中有一章涉及电影。莱昂·布鲁姆这代人并不倾向于理解电影这种筹码的重要性。他本人也很平静地说,他是属于那个经常光顾剧院的年龄层次的人,很难给电影赋予很大的重要性。因此他素来倾向于在这一领域进行让步。他向观众们的渴望让步,这些观众从1934年以来就被剥夺了看美国电影的权利,同时他又向那个“少校”的强大压力让步,这些“少校”即是想要在欧洲市场上推销已经回本的美国片的一些大公司。

战前,一个定额分配的制度已经开始运行,但是因为它被设计得过于宽泛,因此也没有多大的阻碍作用。《布鲁姆原伯恩斯协约》规定电影院至少1/3的节目必须保证使用法语。这个限额对于业内人来说是过于微弱的,这样便点燃了抗议的火苗,并且引起了轰动一时的明星们上街游行事件。其中西蒙·西涅莱跟在著名的“永恒回归”夫妇——让·马莱和玛德莱娜·索洛涅之后,玛德莱娜走在标语牌后面,这样游行以保卫法国的电影院。

路易·儒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言论,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政治观点去衡量的话,是很令人吃惊的:“这些协约甚至是对戏剧艺术产生怀疑。对审美观的歪曲将是无法补救的,也是致命的。如果这样对待勃艮第或波尔多的葡萄酒,我们的胃就会习惯于可口可乐。(当时的观点认为,可口可乐是美国文化最有害方面的幻象。)这正是回到完全抛弃法国品质的地步。”他正是这样突然提出了文化渗透的问题以及可能性,并将此看作一种自卫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是很有效的,因为 1938年 10月,人们又决定恢复到定额分配:每年 150部美国电影可以进入法国,这比之前的做法减少了 10% ,而定额又再度增加,这使法国电影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由于这种退缩,似乎划定这些界限是并不荒谬的。并不需要完全地闭关,应该做的是对其进行“杀菌消毒”(美国的电影广泛地影响和丰富了法国电影的内容),但是,同时,一种暂时的保护构成了一种标志,一种支持在战争中被削弱的电影的努力,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继任的政府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对等待电视这一方面,在 1950年代的 100部裁协约中都没有出现过任何丑闻。

事实上,正是这种传统,这种被我们重新采用的定额制度的传统——产品定额以及传播定额,有着一种新的双重标准,即法国的定额以及欧洲的定额——这一系统被一种有关收视高峰期以及有效期的想法所精练,这一系统使最高视听委员会非常忧虑。因为如果在早上 7点到 10点之间播放法国国产电影,那么这种计算就是空有其名的。一种困难来自我们在欧盟的合作者们极少赞成定额制度,尤其是在英国的压力之下。英国由于语言的原因,与美国有着特殊的联系,而德国人也出于原则性而作出同

样的反应。欧洲的所谓的指令是“电视无国界”。这一指令始于1988年10月,当然,它提出了一个主要源于欧洲经济联合体国家的原则,但是作出了如下的约束:“只要有可能”,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其影响力——以便不谈及这些节目过于外延性的定义。

防守与进攻

无论如何,保护主义即便不总是被排斥,也依然是有困难的,总是置身于防守,甚至某些方面是畏缩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有必要创出一种进攻性的反击。一种加强欧洲各国间积极合作的愿望便因此产生。

首先是技术合作。在戴高乐时期,有关制式以及制式的论战专栏是很著名的。这是一场有关选择彩色电视传播方法的论战。这种论战在这样一个时期是更为激烈的。论战在一段时期里非常激烈,这段时期人们认为应用“定义转换器”是过于复杂的,因为这样会产生很多困难。从那时起人们便选择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这一步进展完成的时候,由于选择的分歧所产生的不足之处就减少了,对抗局面也就不那么明显了。1989年开始投入运行的美国制式(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在技术上是有些欠缺的。在欧洲人这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把制式理解为:从未有两次颜色一致(制式)。在年代初,欧洲人提出了两种相竞争的系统。一个是源于法国的制式(记忆顺序制式),由亨利·德·弗朗斯创立,很多人认为这一系统造价更为昂贵,但它提供了一种非常清晰的图像。与之相对的,是德国的制式,由德律风根公司调整运行。

和往常一样,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技术争论和政治定见之间的混淆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从1956—1958年期间召开了大量的工程师协商会议,以努力调整这一混合的制度。似乎这一制度并不会超出力所能及的范围。即使在今天,技师们对我们讲,他们正在试图把NTSC和SECAM制式综合起来。但是1958年便是一个选择的年代,法美关系异常紧张,法国脱离北约,戴高乐将军在金边批评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戴高乐将军因此自主决定法国采用SECAM制式,并拒绝所有的技术方面的和解。此外,在这一立场方面,他还被一些谈判所鼓舞,这些谈判使得苏联及其附属国采用SECAM制式。

事后,人们的判断平衡起来。很多人坚持认为一种政治愿望使得达成一种有效的、保护性的结果成为可能。但是另外一些人反驳道,一个统一的欧洲制式会比分散的希腊城邦更强有力。这些城邦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又一次在马其顿的菲利普面前分裂了。然而在美国,人们爱用这样的解读方法解气,即把SECAM理解为:与美国对立的最大努力(SECAM是SECAM的缩写)。

现在,通过同样的方式,因为高清晰度电视的出现,这一问题平息了。所谓的尤里卡视听公司,首先由法国方面的贝尔纳·米耶,即前任广播投资公司(SECAM)的经理领导,致力于通过推行一种欧洲高清晰度制式而为“通讯欧洲”奠定一个技术基础。在1988年欧洲工业家们抛弃了中介性的“国际兼容标准”^①之后,斗争依然是不确定的。

但是无论这一战线上的未来将是如何,也同样应该为促进联合摄制而斗争,这种联合摄制同样也涉及节目本身。在法国,几

① 即数据包制彩色电视技术规范。——译注

年以来,所有的独立制片人已经体会到了这项任务的困难之处。当他们去见发行人的时候,发行人这样说:“你们应该进行联合摄制,因为我们没有资金。但是必须生产适合法国观众的产品,使之适应我国的政治倾向。”否则联合摄制的危险就会切实地达到混入那些消过毒的混合物的地步,而这些混合物似乎是远离了其根源的。确实,我们可以赋予具有双重国籍的电影一些特权,其中女主角是德国人,而男主角是法国人,二者在国境上重逢,我们可以利用莱茵河两岸的资金把吉罗杜的《西格弗里德》搬上银幕。但是这是不能长久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根据以前的一种愿望,在同一章中我们要提到德法艺术台,这个台可以覆盖——当然是有潜力覆盖——~~员四百万~~的德国有线电视观众,以及法国领土上大多数的观众,正如我们从 ~~员四百万~~年秋天开始在第五广播电视台上看到的情况一样。考虑到思想的多样性以及职业习惯,合作有时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合作逐渐地改善,并且它负有定期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扩展的使命。

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对第三国的反击,这种反击是在一个近几年逐渐被卫星广播所支配的市场上进行的。美国电视业实际上享受一种令其他国家所不能忍受的优势,在美国,除了大学界以外,观众们都坚决拒绝所有非本国产品:不接受没有字幕的电影,只看极少数的译制影片,这就迫使欧洲人在有线电视方面的边缘地带进行反击。有一段时期人们试图发展一个法语有线电视台,并委任约瑟芬·贝克的十二个孩子之一来负责此事。这是一次失败的提升,而人们发现不得不对一些专门协议进行反省,例如大学有线电视协议。我们不久即看到,在纽约或是蒙特利尔,尤其是由于 ~~裁决~~的存在,贝尔纳·皮沃的节目或是法国电视二台的报纸都是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的。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最好的对象就是东方和南半球。但是在瞄准的时候总是有一点模糊。人们是否需要赢得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以赚钱减少制造成本,或是首要的目的是否带有文化性并能在第二时间为政治经济影响服务?这一矛盾很少能够得到解决。

在国际市场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节目出口商的佼佼者中我们发现了意大利以及英国的 月说 月说广播电台应用一个活跃的子公司,即 月说公司取得不错的成绩。远在其后的是联邦德国和法国。

1964 年创立的独立公司 云云,即法国国际传媒的失败是令人惊讶的。这家公司曾负责向国外传播国有部门电视台的节目产品。这些电视台从获得自由开始就深深感觉到了肩负着对外销售的任务,虽然 云云还没有必要的生产适应国际市场的产品许可。在此例中另外一个缺陷归因于知识产权和支付给作者的专利权使用费体系,这一体系依然是陈旧过时的,和电影的情况不同,有权力的公司使得权力建立在最初的酬劳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产品的商业价值基础上,酬劳并不是不合法的,但是其成功抬高了对外售价,并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削弱。

相反的 20 世纪 70 年代经历了一个飞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证明了一种持久的生命力以及一种令人振奋的商业能力,这些已经开始违背失败主义者最初的预见:法国攀升到非英语视听节目出口商的第一位——近 20 亿法郎,而 10 年前只有不到 1 亿。

卫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初的卫星只是专为发射台传递信息图片。第二代的卫星已经能够传送能被私人或是集体的转播塔接收的节目,而且可能可以通过有线网再被转播。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网通过这种方式同时在欧洲诸多国家传送他们的节目,其成本完全可以由广告来确保,而无需直接由观众承担。

挑战在 悦 猿 (有线新闻网)电视网中体现出来。这一电视网由泰德·特纳 员 猿 年在亚特兰大创立,是一种意欲全球发展的新闻电视网的雏形,并且在美国人眼中它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有时候也是一种蒙蔽的作用——它在对于罗马尼亚革命、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全球广播中都充当了哄骗者的角色。

裁 猿 年诞生的欧洲新闻电视台,建成了 一个欧洲共和国。在法国,人们依靠世界法语区的团结。裁 猿 年的节目是从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公共电视网引入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有线电视网都转播它的节目。我们还应提及法国国际频道(悦 猿 的发展。这个电视台从 员 猿 年以来和 裁 猿 受同一经理的领导,并为需要其服务的人提供图像——对境遇最为不利的国家提供一种近于免费的服务:对“声音银行”模式来说,由 砸 猿 管理的国际法国媒介(砸 猿 是一个绝好的成熟的想法。为了保护“用户”的独立性和骄傲心理,其原则是每天通过卫星向他们传送一定数目的节目,这些节目从到达开始就被“录制”下来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再使用了。还需指出 粤 猿 图像国际办事处的存在,这个办事处依赖于 砸 猿 (海外领土广播电视),在将来将有一定的发展。

最终应举出我们的国有或私有公司在外国组织中的财政参与。如我们所知,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凭借其 员 猿 年进入了五频道而对法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保持在五频道中的席位直到阿歇特的出现而终结。他同样对西班牙电视发起进攻。以同样的方式,向比利时、西班牙、波兰、德国输出其机制的法国加密台成为了欧洲第一大收费电视台, 员 猿 年其订户约 员 猿 万。而现在通过与法国广播投资公司在非洲大陆合作,甚至在疲软的美国市场也历经波折而脱颖而出。至于电视七台, 粤 猿 台的法国支部,它与众多中欧国家签订了合作互换协议,不久便被法德集团

自身所限制了。应该祝愿这场运动保持劲势发展下去。

第十五章 互联网的闯入： 与以往完全不同？

摇摇 20世纪 70年代初，这本书构思完成以来，互联网在传媒界的介入便构成了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事件。似乎到了可能为这一事件作初次的概述，以及对其在信息界的影响做第一份总结的时候了。

一种新媒介的诞生

网络发展的主要起点是美国国防部的一项创举性服务，即 1969 年的 阿帕网（高级研究计划局）：它开始着手把各个研究信息学的大学实验室联系起来，协调这些实验室中庞大的个人计算机，以便限制重复的工作。在这种最初的目的之余，研究中心从这个“网”中得益，并很自然地称之为“阿帕网”^①。这个“网”用以即时讨论工作中的进展，交换信息，做保存工作及增加有利于革

^① 阿帕网的前身，第一个数据广域网络。——译注

新的意见交流。先是字母数据数值化原则，而后是分割成“包”的信息，这种信息每一条都拥有其终到地址，并自动发送，能够确保信息以一种迅速可靠的方式传播。

最初的资金来自于军队（1967年苏联同步卫星的发射使得美国总参谋部甚为震惊，并使其产生了极度的忧虑，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是因这一遥远的契机而产生的），人们很久以来就过高地估计了军队的作用。

实际上主要的领导者都是平民，如果不看物质方面的贡献，其精神方面的主要贡献者都是来源于“科学院”——越南战争在他们眼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两个奠基性的日子可以追溯到1959年7月，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伦纳德·克兰罗克在哈佛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包交换（*packet*）的论文；1960年1月，同样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瑟夫·利克里德尔在一系列名为“银河网”的笔记中发展了“信息互联网”概念，使得数据及程序交换成为可能。

确实，国防部在很久以前——尤其是受到兰德公司的启发，了解到了在不用完全覆盖公共电话网的情况下把世界上的主要地区联系起来的益处。政界和军界的忧虑由此消散——他们曾担心在苏联核攻击的情况下通讯系统可能会被损坏。这涉及要最终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并且要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对象。人们确保一种被敌人破坏的联系方式可以马上被另外一种方式所代替，并且不顾任何的迂回而开辟一条道路出来。由此产生了一种巷道的诱惑，这种巷道是没有中心的，并且有很多的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和很多其他的交汇点相连接。即便敌人能够破坏这个或那个环节，信息同样可以马上到达指定的目的地。

这样军方计划不久之后便为之提供资金，而后，第二步便是

毫不犹豫地促进一种由民间产生的创举,而根据一种熟悉的历史进程,这一创举的影响力继而便会直接触及传媒界。

不久这些网络便不断增加,每一个网络都有其独自の“协议”,即它们特定的信息语言。第二个时期,也是决定性的一个时期,开始于一组科学工作者组成国际网络工作组(即国际网络工作组^①)后,它最终形成了一个名为传输控制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②)的协议定义,使得计算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并且能够引导远程计算机(互联网这一定义本身也来自“国际网络工作组^③)。我们还应提到,这个由两个美国人罗伯特·卡恩和文特·塞尔夫领导的科学组中,来自英国或是法国的欧洲专家们(来自国家信息及自动化研究学院的路易·普赞和埃贝尔·齐默尔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4年,互联网便可以免费使用了。而后它由国家科学基金所支持,这一基金资助了25所美国大学以及10所欧洲大学应用网络:当时估计有5000位用户。1985年,100多个研究中心以及50万台计算机被连接起来。

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只限于在私人通讯领域中,进而扩大成专家“集会”,或者是在工商业领域,将其扩大成新的总体利润或是特殊利益。人们回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无论是本分的还是奸诈的商人,他们的“行会”确保了他们的特权,或者是不管怎样,确保了新鲜性,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为达到繁荣发达的一种工具或是一种服务。当时在我们的报纸和电话之间,互联网便是一条中间的道路。为了使互联网真正进入我们这本书所论及的

① 即国际网络工作组。——译注

② 即传输控制协议与网际协议。——译注

③ 即“互联网络”。——译注

领域,意即可被公众所接受的媒介领域,这便需要跨越一个新的时期。

这些情况中包括 1955 年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使得网上任意地点储存的档案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便是超文本的定义)。这项功绩属于两个欧洲人,英国人蒂姆·伯纳斯·原李以及比利时人罗贝尔·卡约。他们供职于日内瓦欧洲核研究中心。这样,“全球资讯网”便投入使用,这种系统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更舒适地应用网络。

同时,与其创立者的预见相反,互联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这些创立者们最初根本没有想过,除了在政府和公司应用,在私人领域,这种“家庭式的”微型信息设备也会发展起来。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键盘和显示器以其家庭用途进入了千家万户。从那时起,与互联网接轨已经被视为技术进步、成本降低以及信息流量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时只需应用可被大众接受的、日内瓦欧洲核研究中心许可的导航软件便可以了。同时,对于各种公司来说,应用网络的条件也变得宽松了。

20 世纪最后几年,网络(在法语里我们应该把这种能顺利得来的表达法归功于魁北克语言的活力)摆脱了特定的范围。从 1989 年起,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到来了。除了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电子商务,或者是与各种最为变化多端的主题相伴而生的观点的传播(例如这种传播对杀伤地雷式事件的指责给人深刻印象),互联网同时能利用“大家”先生或说是一种不确定的公众群体,保证一种即时信息的功能。正是这样,网络成为了一种利用页面方式传播的媒介形式。

在最近《网络及其后》一书中,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沃尔东曾否认互联网是媒介之一,这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他同时还矛盾

地给他的作品冠以副标题“对新媒介的理论批评”。实际上在 20 世纪末, 互联网的网页上提供的信息与媒介意义上的信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各种类型的统计、科学工作、经济社会管理文献、商业、文学、纸牌、摄影、复制画、自行车、有声记录等的网址。但是有员豫的部分与我们所谈论的话题有着直接关联, 而对报界和视听界来说这仍然是足以引起竞争的, 由于这种竞争, 三者之间注定要建立一种复杂而具有细微差别的关系, 就像视听界和报界很久以来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样。

衰落的幻觉

和每次因新技术而产生的新的集体交流模式一样, 很多迷惑的观察家(尤其是技师们, 他们是狂热的先驱者)曾预言网络的衰落和以前的支持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信息界将会发现, 在全世界范围内会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 希望使先例重现的历史学家, 抵制这种衰落的幻影。读者们还记得, 书面出版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为广播的扩张而焦虑万分, 正如在 80 年代广播曾为电视的出现而忧心忡忡。在每一种情况中, 优秀的人物都宣布了一种媒介从根本上替代了旧的媒介——之后又会强调二者相互补充及相互丰富。悲观主义者的忧虑总是会被推翻的。2000 年我们在媒介领域所看见的关于互联网的成果, 使我们想到这次它不会发展成别的样子了。

还有待发展,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已经开始在损害传统媒介的情况下为新媒介服务。一些大胆的投机商已经预见网络胜利, 也支持着新媒介。

在这方面, 2000 年 1 月 1 日所刊载的新闻, 即 2000 年美国在

线)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已经传遍全球。前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后者是第一家通讯公司。它揭示了一个势力的绝妙的替换过程。这样便诞生了一个有交易价值的集团,绝对记录是猿猴四亿。在合并之时,猿猴规模是非常小的,而时代华纳的营业额比它多六倍。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猿猴在摇篮里”,便拥有了以前两倍的规模,并且在新公司中确保了猿猴的优势。猿猴从那以后可以支配新公司四千万的用户,华纳在电影界(猿猴部电影)、在电视界(尤其是悦)以及报界(猿猴种杂志,其中包括《时代》、《人民》、《财富》,以及《生活》杂志)所拥有的全部资源。

是否同样应该考虑由于“内部信息”而势力增强的产业主们注定要定期剥夺那些负责内容的人的动力和自主权?人们一定不能再重新给那种已经陈旧不堪的猿猴形式赋予新生命了,此外它还已经被绘成了漫画,根据这幅漫画,“通灵人即信息”——也不能相信前者的主人能够按他们的方式塑造后者。在最后几年时间里,一种极度的谨慎是非有不可的了,在理论方面,信息本身的性质、逻辑、修辞都将因这种所谓能居于支配地位的新渠道的出现彻底改变。

和往常一样,编码和表达法可能会被传送技术的发展变化所影响,确实如此,但是认为公众行为的实质也绝对地依靠这一方面便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观点,因为这种行为是同时受到多种力量影响的。新生的企业家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同样要顺应消费者们的立场和愿望。

然而,最后一段时期在公众方面起到了教育作用,而数字化时代的老板们很重视公众一方(时代华纳所拥有的猿猴方面的利益,以及它对传统媒介的未来的信心,也同样代表了这一点),产

生于过去的习惯难以维持了。估算在不断地变化。1999年第一季度的一项研究证明,互联网的网虫看电视明显减少,互联网的人自从应用网络以来读报明显减少。另一份测试的数字分别降至互联网和互联网——这种差距证明了不确定的程度。当然一种衰退显现出来,并且也触及了书籍,但是人类还是不希望看到“古典”传媒消失的。

人们不久便注意到,纸质出版物依然能够与之抗衡。怎么会对此表示惊讶呢?无论屏幕如何方便,它们总是既不能达到那些可以随身携带到各处去的物品所具有的易于阅读性,也不能具有其方便性……然而谁能够最终盖住那条鱼呢(云深宰鱼,这种幽默的表达源自波士顿媒介实验室在线发行的报纸)。

我们来从我们的角度勾勒一下这个新生的网络对手。它既不存在于传播方式的变化中,也不存在于所供数据过量的情况中,这些方面只与一种旧趋势的能力有关。一方面,它存在于不确定的个体发送者数目中,这些发送者最终也变成不确定的了,更不必说限定个体接收者的数目了。人们可以这样以图表阐明,就像两个首尾相接的漏斗,或者是我们儿时的橡胶“扯铃”的形式,我们被一条系在两根棍棒的绳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归因于一种能力,即每一个接收者都具有的能够传送他所接收的邮件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信息增倍器。我借用《华盛顿邮报》经理史蒂夫·科尔的一个有关战争的比喻,这种系统令人想到一颗爆裂的炸弹,引出了众多小小的弹片,这些弹片接着又爆炸了。

不必提及互联网在日常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预想不到的影响,尤其是在商业和私生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只是论述一下那些触及媒介平衡方面的影响。其历史完全没有形成,事实上,它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其轮廓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一点上我

们更应该向比欧洲先进的美国学习。

世界范围内的资料收集？

在报纸制作之前 ,互联网没有带来任何革命。最深刻的变革是由不久前编辑们直接在计算机上浏览稿件这一现象的普及所引起的。因此 ,我们并不隐瞒这一点 ,计算机有令人眩晕的信息存储能力 ,它的分类能力 ,它的支配能力以及它对数据资料的微型化能力都扩充了可被书面出版物应用的参考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的容量至今还是不可预测的。网络由此便给报刊记者以及视听界的记者们提供了一种长期性的资料 ,这种资料可以补充他们已经拥有的资料。如果他们有时间并能通过智力方式批判地利用 ,这些资料便会分外珍贵。(类似于百科全书这样的参考书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前的平衡方面受到影响 ,至少是因为这些参考书有着繁重的“文件”形式)。

波兰新闻培训学院的院长安赫洛·阿戈斯蒂尼引用了一个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例证(引于《外交界》,1997 年 10 月)。加拿大自由记者汤姆·科赫从《纽约时报》那里获悉纽约一名一岁儿童在牙齿麻痹后死亡 ,这一死亡被法官判定为事故死亡。相关的医生说是千例中才会有一例。但是这位网上的鲁莱塔比尔听说过温哥华也有同样的一例。他发起了一次调查 ,立刻查阅科学数据和一些重要报纸的资料 ,并向不同的专业记者咨询——他是通过他所订阅的讨论区而接近这些记者的。这样他便揭示出这种类型的事故发生率比诊所负责人所说的比率要高得多。这样的成功在 1997 年前也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在时间和资金方面消耗也会相当巨大 ,而这次调查似乎只花费了我们这位人物 1 小时

工作时间和 猿园 美元。

这一例证是很具代表性的吗？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猿园 年由德尼·吕埃朗和达尼尔·蒂埃里所发起的在法国各种地区性报纸编辑部范围内的调查表明，不管怎样，人们很少求助于网络所提供的资料。《西南报》的一名撰稿人使人观察到在他眼中一份报纸是“为他人提供资料者”而它并不等待任何回应。他解释道，总之，一份地区性报纸所保留的空间，即“地方小专栏”，并不需要信息基础——此外更幸运的是，也根本不存在基础。我们也就并不奇怪为什么国家性报纸在应用网络这方面会更先进些。

另一方面，网络可以向编辑部提供一种更快捷、实效性更强的信息，尤其是可以向已上网的其他媒介提供这些信息。一直存在的这种信息体系的循环运转只能加速和突出。什么都不能彻底地改变这种运转。

时间和空间 卷土重来

在记者的工作中，效果是更为明显的。一种传统的发行线路的解体开始显现出来——它们的地理逻辑被彻底打乱了。

首先是书面出版物。猿园—猿园年间，像往常一样，即使不能说是拒绝或是怀疑性的行动，日报也是首先进行了一种防卫性的反抗。只有少数大胆的报纸开始了畏首畏尾的报纸上网实验——就像我们把脚趾伸进了冷水里那样。而后这些实验被转化了，而各处的著名负责人都开始认为此后网络版将会构成他们的报纸繁荣发展的基本元素。尤其是在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份报纸在猿园年中期雇用了 猿园 名员工负责这项工作）。在法国，猿园年年末访问量最大的 猿家

书面出版物的网站依次是 :《回声报》、《世界报》、《解放报》、《巴黎文娱》(演出节目表)、《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每周电视》,以及《论坛报》(这一排序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是非常不稳定的)的网站。但是在依附于韵^①的员^②家报刊中,只有苑^③家能维持一个有生气的网站。

令人震惊的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员^④年初,《华盛顿邮报》决定将其全部内容在网上公开,而它通过报亭和订阅而达到的发行量为 愿^⑤万份,并有 员^⑥万名爱好者在网上浏览这份报纸。在当年年末,第一个数字没有改变,而第二个数字变成了 源^⑦万名“网民”读者。这份报纸最终摆脱了那种它已然习惯的空间限制。

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这份报纸便注定要在地方扎根,这对于它来说是致命的——它所做出的创举对于它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显著的例证,即《巴斯克地区一周》的经验——这是一份巴荣纳的地方性报纸,并且与圣原塞巴斯蒂安的报纸《巴斯克日报》合作,在网上为所有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人们,提供一种法语、西班牙语、巴斯克语三种语言的信息服务。

同样,视听界由于互联网的影响也冲破了地理界限,这些地理界限曾经束缚了广播电视的发展,虽然有短波和卫星存在。这些技术仅仅能够使广播电视网能够选择避开它们辐射的自然地域,而人们却认为这些广播电视网能够聚集一个足够广大的遥远的公众群体。全球有好多地方是这些国际电台依然不能到达的。然而,现在互联网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使得所有需要它的台站为全世界所知晓。利用网络,人们可以在海参崴即时接收到法国文化

① 法国登广告报刊发行量检查所。——译注

台的节目,也可以在西雅图接收到法国新闻台的简讯,在悉尼接收到佩利哥法国广播电台,可以在克尔格伦群岛接收到法国电视二台的节目。这样通过有限数额的投资而使听众增多了,而这并不影响节目的内容(因为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在其特性中寻找的正是这一点)。

就像对于书面出版物一样,传播的世界化并不代表抹杀了它的不同之处。在这方面,依然是在美国产品的霸权周围存在一种忧虑,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是自由的,即便不是为了与之抗衡,也是为限制这种霸权。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法国对非洲的影响。某些在我国已经上网的报纸或是电台在那里都可以通过任何电话线的联系而被人们接收到。至今为止,因向非受惠法语区传送媒介产品的高成本所造成的障碍正在渐渐消失。为友邦培训记者的任务是合作中最为高尚和最为无私的形式,这一任务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一种慷慨的支持。

在由距离导致的关系变化中,如今又加入了由时间引起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正在发展之中。关于 ~~杂志~~^{竞赛} 的竞赛是非常艰苦的,也是这种行业的内在要求(~~杂志~~当时已经是伊夫林·沃夫的一本著名的小说的名字,1958年出版),一种风险依然存在,在这种竞争的作用下,劣等的新闻代替了前面的优质新闻。这种危害会加重吗?1995年11月克林顿事件中的一个情节在当时引起了震惊。当时《新闻周刊》完成了关于著名的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调查,并花时间去验证她曾经向一位朋友吐露过关于她与美国总统的隐秘关系这一事实。此间这份周刊被那些仓促地在网上传播的消息所超越。一个令人倒胃的人物麦特·德拉吉——此

① 英语 抢先刊登的独家新闻。——译注

人是那种研究知名人士花边故事的专家 ,把这条信息通过他的网站“德拉吉报道”投向信息市场 ,这迫使《新闻周刊》提前 24 小时发布它的新闻 ,后者也失去了其独家发布权。

结果是在“传统”传媒界引起了一阵恐慌 ,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趋向于降低职业预防措施 ,以全力避免自己的内容被提前刊载出来 ,这便导致了一系列的意外变动并使“假消息”繁增 ,直至在最受人尊重的报纸专栏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消息——在它们的领导人恢复清醒之前。

上文中的德拉吉从根本上无异于所有“敲诈性新闻”或是边沟里的“小道消息”爱好者 ,我们曾在一个世纪之前看到这种“小道消息”在美国令人作呕的繁荣景象。确实 ,当今的技术使谣言的发展速度变得更快。对“严肃性”报纸的严谨性和道德的要求依然十分迫切 ,以防止它受到另一类报纸的玷污(在过去这种事情也曾发生过)。但我们同样在这方面要分清其内在的创新性 ,与一直的对抗相比 ,它产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互联网所做的不过是以一种更为激烈的形式提出了社会及司法控制方面的问题。

最深刻的现世变化是属于其他方面的。实际上互联网把用户们从一种时间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这种垄断是由多种传播、录像机磁带、盒式录像机磁带 ,及后来的 阅读带来的。不久后“持卡”(付费的)查询一些著名报纸的旧文章便成为了可能 ,这些旧报纸以前曾用来引火 ,也就完全地消失掉了 ,只有一些图书馆的忠实读者还会保存。同样的一种自由已经开始给广播和电视节目带来利润了。在法国 ,第五共和国期间“知识教育台”从 1986 年前已经开始将一个节目和程序库投入运行 ,这使得其用户 ,无论属于哪种教育或培训水平 ,都能适时在多媒体微机上选择和接

收被附属文献充实过的节目了。

20世纪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曾多次置疑在短期内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不是会混淆电视银屏和电脑显示屏。20世纪年代末,专家们在这方面的预见依然存在分歧,但是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尖锐了。在工业术语方面这一问题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家庭生活来说也依然是很有趣的,但是,对于涉及内容方面或是涉及公众对所提出的新闻形式和性质的期待方面,我们最好是说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重要的影响。

首要问题依然是在应用媒介过程中每个人所获得的补充性自由。因此人们便任那些忧郁的人去惋惜著名的“社会关系”的削弱,这种“社会关系”曾经创立并延续了一两种或三种同时进行的综合性节目,这种关系的衰弱也是一种封锁形式,并且也是由特殊利益的隐藏性影响而产生的模糊趋势。我们更应该提及每位市民的一种权力,即根据喜好和期望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即时信息或是变动的信息。我们应该庆祝,人们可以由一篇文章开始,查询到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可以在一个相关服务器上为其提供深入或补充性资料。

在总体上,对于涉及形式对内容的影响方面,还需要避免自己受制于科技上的麻痹。

当然,而后便可以自行决定重新找到各种版本的传统以适应各个小时的新闻时事。人们可以想像到一份几乎是永恒变化着的日报。电子版可能被青睐吗?这似乎意味着读者们很希望这种电子版不断地出现。他们等待着广播的电子版。但是他们也在等待着报纸吗?有人又忽视了这是另一项服务——一种更为审慎的信息,因此这项服务被排开——而人们又对它有所期待,正如他们对周刊的要求那样。

确实是这样 ,另一方面 ,网上展现的方式已经发展变化。起初 ,报纸只提供标题和社论 ,可以说是一种名片性质的。而后有些报纸开始把全文放在网上。在最后一个时期他们尽可能介绍更丰富的内容 ,但是采用一种适合屏幕的形式 ,加入了补充性资料并且提供一种互动查询的开端 ,以便与编辑论战。后者有足够的时间去顺从这一点吗?这是不可能的。它有时候会觉得这有些很不明确。伯夫·梅里在负责《世界报》之时 ,每个周末都对他的秘书重复他对众多读者来信的个性化解答 :这条严格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是没有缺少的。不必怀疑报纸是否可以有效加大它的收集力度 ,根据读者们的反应和愿望而从他们那里收集信息。但这并不是无需代价的。

至于在网上提供的文章 ,居主要地位的英语词汇 ,从那以后便是 贵进(用户亲自找出他所需要的信息)和 贵深,贵深(这个单词代表了用户们对一些新闻的预定 ,即那些他们认为是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新闻。《华尔街日报》是这其中的先驱者 ,贵深年“在线”建立了一个版面 ,其中一部分(与普通的编辑框架相对应)满足了预订者们的选择 ,这些预订者提前选择了他们感兴趣的专栏或是他们想要特殊追踪的事件。贵深年 ,泰德·特纳的国际电视台 悦鼻,在它的网站上开设了这种服务。有些热情的人提起——有时候甚至致力于使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具体化(在波士顿领导麻省理工学院媒介实验室的尼古拉·内格罗朋特便是这样的人之一)——这种想法即依据一系列的选择标准使一份报纸完全个性化 ,使其组合能适合每一位读者 ,根据这种想法来确定新闻的选择分类以及不同新闻的不同发展——完全针对个体消费者的独特产品。

传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贵深年接近百岁时逝世)老年时受

不了坏消息的刺激,这对他的健康和心理平衡都很有影响,于是人们就为他个人单独印一份他所钟爱的报纸,而上面所有的不利信息都已经被有步骤地删除。然而我们担保(或是说,我们希望)在每个人心中明确或模糊地形成的一种了解别人所读之物的需要或是渴望——包括家庭中的人、社会团体中的人、职业阶层的人,以及其他普通大众——这些人都会对这个主题强加上严格的界限,避免它远离当今的专业报纸和“秘密通信”所能提供的服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情况下,比起那些可以自由选择接收的节目来说,大多数电视观众依然更喜欢固定的节目。美国奥兰多的时代华纳所引导的一次实验——或然地——提供一个内部有效的电视台代替普通的电视台,结果使它赔了很多钱。

这类证明是很明显的。1995年本书初版发行之时就更为明显了。很显然,新旧皮囊之间的使人兴奋的补充成分显现了出来。新酒四处流淌。

网上报纸:预算如何?

在上个 1995 年、上个世纪同时也是上个千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一没有公开的竞争对出版事业的影响,书面出版物方面的企业家们以及视听界的负责人表现得更为安心。他们的历史基础,他们的职业能力,他们作为评论者的优势地位,这些都是他们长期的、珍贵的王牌。他们希望能够以此为保护伞,同那些直接在网上创立的重要信息机构进行竞争。已经上网的少数电视台(例如 1995 年起在美国创立的 21 世纪福克斯,或者 1994 年前在法国创立的 悦报网)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前途未卜。

1999年 愿月 ,几年来都无法偿还债务的 哉颀通讯社在将其电视和广播客户转让给美联社后 ,宣布它将在这种属于新媒介的一“线”中展开冒险。但是这种野心是否有道理还有待证实。

报纸和电视台的负责人并没有忽视网络在他们职业以及实践变化中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依然是模糊的)。他们将根据他们的职业和实践变化 ,以使这种新生事物对他们有利。一些人禁锢在他们的旧习惯以及那些困扰他们的不安之中 :这些人的未来不可预测。但是另一些人准备在这种进步中寻找一种产生创新的刺激作用。

在“自由广播”产生之时 ,法国的报纸 ,尤其是地方性报纸曾经幻想投入这场冒险 ,但它们却在其中失去了羽毛 ,除了几个特例之外 ,都不得不放弃与外来的企业家们的竞争。这次情况却不同了。令人惊讶的是 ,在一次快速转变的光芒一闪而过之后 ,参与网上竞赛的来自综合新闻或是专业新闻的新竞争者还是寥寥无几。

应该指出 ,在 2000年伊始 ,发行网仍旧狭窄 ,而且这种类型服务也很昂贵。那些愿意每周花费几个小时在网上收集信息的人 ,他们的电话费快速达到了新高。此外 ,虽然有热情的支持者们的辩解 ,其他问题依然存在 :连接速度缓慢通常令人恼火 ,固定或是可移动的图像与电视图像相比 ,在总体上稍显欠佳。人们将一种彻底改善的希望 ,尤其是将迅速降低成本的希望寄托在电磁数字化中 ,预计在 猿-缘年内实现。

当前 ,这一行业正在思索它能指望的收益的发展及性质。人们起初认为“在线”销售信息将会很快得到收益。记者工会曾经希望编辑能从中获得额外的收入。人们肯定失望了。当然 ,这种渠道为媒介提供了很重要的优势 ,使他们避免了纸张、印刷和发

行的负担。只是,另一方面,消费者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似乎(我谈论的是大众)把这种免费当作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依然要求付费查询,而《纽约时报》已经取消这种费用。在巴黎,《世界报》对浏览其档案进行核定收费,但对于浏览当天新闻不收取费用。《回声报》考虑到其读者范围,在报纸出版的第二天便对查询其文章作出标价。大多数情况下,收入仍然不及花费多。最成功地度过这段时期的报刊提供的是经济、财政(道·琼斯公司与《财政时报》以及奈特·原莱德集团联合,以建立一种在这一领域的世界性服务)或者甚至是体育资料(棒球,例如《今日美国》)。

第二种解决办法是在广告方面寻找出路:报纸上网能否依据商业化的广播或电视台的模式,单靠这种方式来获得资金?人们注意到,即使广告在逐渐增加,它依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广告客户们哀叹没有可靠的读者。至于报纸方面,它们很担心对于各种客户范围狭窄而有针对性的产品,这些广告会从“纸质版”转到“网络版”,这样就会剥夺了它们所有的利益,甚至可能导致预算方面的消极结果。

第三种收益来源在电子商务方面显现出来,这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从启事到预订演出入场券等。1994年间,《新闻观察家》以“色情约会”^①从色情约会中赚到了很多钱。应该采取这种原则?应该扩大这种实践?报界发现,正是在这一领域它最有可能受到完全致力于网络方面的新企业的竞争。举例来说,人们注意到,从1995年第四季度至1996年第四季度,《洛杉矶时报》的招工信息广告量下降了1/3,而信息技术部分的最大下降率达到

① 法国邮政部推荐的对话式电视传真终端。——译注

了 员豫。当他们根据各种调查了解到同年启事栏的收益占美国报纸收益的 猿园豫,占英国地方性出版物的 缘豫(而全国性出版物为 员园豫)时,他们不惜采取一切冒险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报界在此期间开始意识到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很快便显现了出来:为了确保能够收回数额可观的投资,人们有可能被迫把信息归并入商业服务中,换句话说就是在后者的推动下改编前者。这种令人生畏的危险中的一例呢?《纽约时报》在它网站所提供的书评旁边做了一个与美国第一个书商报纸网庞诺书店的链接,而这份报纸在所有由这一渠道实现的购买中都要抽取费用。可能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一家刊物的专栏编辑所拥有的独立性——这家刊物可能因这种独立性赢得声誉和影响力,并由此认为编辑们的判断不会受到商业困扰的影响。但最终文学评论从那以后第一次为这份报纸带来了收益,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份报纸只在这一领域提供对 员怨年来的文章的免费咨询,同时伴有是否在庞诺书店购物的选项。这一特殊之处明显不能仅仅由对文化的顾虑来解释。

约 员怨愿之时,在美国媒介界, 哪样书报出版业者竟可以翻译成“商务新闻”的这一表达方式开始传播开来,不幸的是这种传播并不总是在不良方面。《芝加哥论坛报》的经理(加利福尼亚研究员爱瑞克·科利南博格在《美国新闻杂志》中引用了他的话)当时不是宣称“我不是一份报纸的主编,我是一家内容公司的老板”吗?正是此人注定在编辑部以一种道德和职业的异端身份出现。但愿这些编辑部没有忘记 员怨世纪和 圆园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道德偏移,是时,在编辑文本形式下隐藏的广告频繁出现而且很具污染性。而它避免在简化的斜坡上滚落:这会使民主付出很大代价,历史上对此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教训。

控制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我们便被引到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前。在互联网高居宝座的当今时代,这种挑战支配了整个传媒界。因此便要考虑到社会对新闻的控制问题:尊重作为未来创作的保证的知识产权、防止诽谤和种族主义(正如与之相同的,在这一领域之外的,与恋童癖及组织性犯罪)等等。

一场重要的理论之争——充满激情的辩论——和众多其他领域一样,两大思想派别相对峙。一方是绝对自由的支持者们,他们认为有能力独自控制好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网上的信息潮。另一方(本书作者也属于这一方)则乐于引用拉科代尔的话:“在强与弱之间,自由是受到压制的,而正是法律使之得到解放。”在这些人眼中,突出于市场之上的法则应该被固定下来,并且应有合适的机构使之得到遵守。这也同样是考虑到了媒介的利益。至少是在欧洲,很多媒介负责人希望是这样的,希望确立一种反对竞相降价的措施,这种措施可以使他们对于竞争对手不必过于谨慎。

因为服务器的非地方化,互联网使得部长们的掌权变得复杂化,这一事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缩减,作为税收的天堂以及不道德的天堂(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些自相矛盾……)是一项艰巨并且永远都不会完成的任务。世界范围内一些杰出的法学家们从 20 年代中期就开始回答这一问题,并且确定了那些非常轻易地提出的问题的界限,而他们却找不出答案。不过解决办法还是已经初露端倪。况且类似的国际斗争,反对国际商业盗贼,尤其是造假者,证明了在众多新兴国家中,当繁荣程度提高也伴随着

一种取得更多荣誉的渴望时 ,进步还是可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 ,西西弗已经开始工作 ,他每一次试探都把他的石头推得越来越高。我们甚至应该像阿尔贝·加缪一样 ,希望他幸福。

结语摇媒介的历史与民主的未来

我们所听到的是丧钟还是警钟呢？几年来，在法国，学者讨论会、专业论战、舆论调查以及杂志的特刊使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不断增加，即关于视听及电子媒介对现代社会民主运行所产生的所谓可怕影响的问题。在西方，它们的能力将会增强，以至于使民族同一性、机构运行、个人自由同时陷入危难之中——信息以损害教学法的功效和损害公民思考能力为代价而不断繁增，并具有迅速性、繁殖性以及简化性。在那些最为悲观的人们眼中，这是一种彻底地和十分有害地与先前的一切决裂。这些人很乐于援引勒内·夏尔的话：“我们把速度投向了一些不能承受它的事物身上。”

然而，正是在相同的心理结构中，历史才更有用武之地，因为它可以使人重新镇定下来。它可以通过让人们记起已经忘记的先例，从而使人们不去夸大新生事物，它还可以提供一些抵制最新事物挑战的方法。它可以同时警示我们，安慰我们，并使我们得到启发。

民族同一性

首先应该是民族的遗产。这时我们的忧虑是与一种威胁相关的，即那种由在经年的岁月中形成的特殊之处逐渐磨平所形成的威胁，正是在这些岁月中确立了一个民族的特性以及它的“整体生存与种属保存的本能”^①。

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自书面出版物诞生以来，国外报纸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的不同以及与地方性报纸相比它们的不及时效性，它们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无论在独裁政体时期暗中进行的传播，还是在自由的国家更为容易的传播都是如此。至于利用中波或短波传送的、在战争期间收听率极高的跨国性广播，在和平时期，它们是注定了会看到，至少在自由的国家成为一种不甚重要的东西。而后，在卫星、电缆、阅读，以及互联网的时代，对于电视就是另一回事了。它的影响力从一国到另一国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昨天的“裁云”以及前天的报界的目标。

尤其是因为它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信息方面。由于廉价的译制的存在，美国公司可以充斥欧洲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欧洲电视台的数量不断增加，却没有足够的预算以摄制原创节目——这种节目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成本低廉的“内景节目”。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美国今天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媒介的势力大量侵入其他国家，这是由于它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一种完全转向于单一的、美国本土系统的一种系统所具备的资本效力。

还需补充的是互联网在媒介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将英语作

① 源自叔本华哲学。——译注

② 英语 娱乐。——译注

为一种“基础性的”、基本的、常用的、一种全球性的用语,并且这样促使当地语言让步,而这种当地语言与那些民族性的、继承下来的并且有着蓬勃生命力的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

然而,面对这种欧洲的下一代人将全力抵抗的挑战,过去的知识就又一次显得非常珍贵了。首先是为了针对自我反省以及沙文主义的恼怒而使人们想起其他文明的灌输带来的好处:如果英国的征服的范例没有起到一种发动机的作用的话,在19世纪的“大陆”报刊赢得自由的进程将会是怎样。但是同样对我们来说,这些外来事物的结果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都取决于征服的影响的压力及程度。事实的吸收能力是很大的,但不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还需要公共政治的意志主义规定或者是调整市场的盛衰。

但是不仅是这些:另外一种历史的教育涉及技术和信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我们在法国是更为了解这一点的:以前,在传播所付出的努力中,戴高乐时期半失败的**莱比锡**,而后的“重型”直播卫星的失败,以及不久前,**莱比锡**和**莱比锡**曾对法国电视节目的发射做出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关于数字化传播系统注定要在新千年伊始代替类似系统的论战已经掀起,并且在“高清晰度”形式周围,也介入了工业的、财政的当然也有文化的关键部分。从美国起源的网络,在1999年年末用英语提供了**雅虎**的网址。如果今后欧洲任自己疏远科技新闻领域,如果它在规则及微处理程序的战役中输给美国及日本,或者如果它被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所提出的一种将集中各种联系所携带的数字纤维的“信息高速公路”拒之门外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一种在精神上被支配的危险,即便我们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

从中可以生发出几种简单的想法。首先,因其经济和文化效

力,欧盟在世界竞争中是必不可少的。范围的问题。其次,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与法国一样——公共部门的定位及影响,这种影响为那种一直拒绝将文字、图像、声音视为商品的政策提供了唯一的保障。最终,欧洲又重回到一种状态,即拒绝一成不变地追随英国对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的喜好,并在传媒界确保一项工业政策,其中包括网络界,必须之时,便会问心无愧地进行抵御,但是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在另一方面完善技术和文化方面发明的努力的话,任何盾牌都不是双面都有效的。

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在这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19世纪80年代“联邦主义者”和“各国欧洲”的坚持者们之间的对立已经过时了。因为接着我们明白了这个共同体只有在政权本身授予工业合同及各国家的产品合同优惠时才能够取得进步,并且其周围无一例外地在我们大陆的历史文化中深植了一种欧洲式成功的假想,这种假想避免了戴高乐将军曾嘲笑的“大杂烩”的情况:我们根据以前的经验而知道,人只有绕过民族特性才能够达到世界性和一定程度的抱负。

透明度及机密

另一个缠人的忧虑是关于民主自身的进程。民主要屈从于现代媒介的专横力量。麦克风及电影院的压力对于政治生活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这使得对人的管理成为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越来越尖刻的批评。

风险是存在的。但是共和国的法律、政府的意志、一个因其公正而被赋予物质及精神援助的法庭,这些都确切地用于回应这些风险,并且是通过抵制绝对透明性的迷惑力,通过确保共和国

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秘密来进行回应。

在陈规当中,当今时代最为缓慢的传播实际上表明在民主方面所有的秘密都将是令人生厌的,所有的决策程序透明度的进步都是公民的胜利,暗含的思想便是门帘、面纱,其不透明性通常是遮住了最卑劣可憎的东西。

这一信条的出处是简单而令人起敬的:政体的压制是在沉默中显现出来的。丑恶的内阁,幕后的诡计,暗中的权力——所有独裁的工具都完全呈现在那里了。因此,在自由的国家,第一眼就可以看出,立刻知道一切的愿望是最合理的。

一个由于技术进步而最能够了解自身的社会,就其表面上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呢?在上古时期,广场民主或是市场民主不过只能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适当地运行。在罗马,一旦占领的地界扩大,共和国便堕落为独裁统治了。广播、电视、互联网,这些不能够最终在一个国家广阔的范围内扩大零距离民主进程吗?对于新的百万富翁来说,这个梦想是很具诱惑力的。

然而我们还是要小心提防,噩梦已经不远。因为集体性很快就会连续地即刻地表现出其本身便是绝对集权的体现。

首先是在私人生活的秩序中,在这其中对私生活的侵犯是一种风险,并且由于一些新的方式的存在,这种风险已经增大了(并不只是威胁到有影响的人物,比如政治家、商人、艺人,或是……报界人物本身,而是随时随刻,针对任何一个公民)。人们已经开始担心“花边小报”的繁荣了,这些小报通过锁孔窥视夫妻间的私生活,而且它们在很多西方国家都甚为繁荣——法国似乎是尽管有最近的这样或那样的例外,仍然是对这种瘟疫进行抵制的,至少对现在来说是这样。对于可悲的 ~~1935—1936~~ 1935—1936 年间克林顿·原莱温斯基事件,欧洲内陆的那些既惊愕又带嘲弄和愤怒的反应,揭

示出了大西洋两岸之间的文化鸿沟。欧洲舆论认为,美国总统的性生活应该在其没有被判定为不法行为之时避免一切司法界或传媒界的询问。

对于与政治生活本身有关的情况,只需考虑到货币政策这一特殊情况便足够了。如果没有机密,这项政策将会怎样?人们会发现私人欲望的支配力量,以及公众利益的衰落,国家意志的混乱。西方国家中,围绕“内行人士的不法行为”的丑闻并不代表其他的事情。

或者说,这与其他领域的政治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有程度之分。应该敢于提及——这里我是依经验而谈——没有一定机密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在各种解决方案的拟订过程中,如果在正在定义中的假设被当作确定的决议对外宣传出去,而且这种假设还要在政治负责人与其同僚协商之后发生变动,而后使之与行政政策相对照,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将之从容地明确表达出来呢?机密还存在于准备的政治通告日程表中:这对于成败来说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最终,机密还存在于所有的与国际力量相关的事件中,合法地希望自己依据自身交流的战略来安排其选择的公开。

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主方面沉默与宣传之间的矛盾便会显得扰乱人心。然而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其进程和延迟的阶段的话。民主人士有权力(也有责任)要求的是事后澄清事实,也就是说从对领导人通过人民代表团所做的一项决定的起源及对其思想状况的认识开始,再也不能损坏其效力。真正公之于众的日期的推迟,依据主题可以从一小时持续到一个世纪……

是一个抽象的定义吗?不!非常的具体,就像议员、法官,以

及记者们所知的那样。这些人在自由制度下对这种推迟了的观点是负有责任的。

我没有忽视政府人员将会一直企图把这种谜团推到必需之外,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非常方便。因此新闻,无论是书面的、广播的、电视的,或者是电子的,都不懈地、依据它的公民角色——但是在尊重法律的范围内,致力于缩短这些迟延。这种紧张状态是政权与反政权之间平衡的组成部分。我谨为此辩护,以使市民们接受,政客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的抵抗是合理的,并且通讯技术的发展进步证明这样做是有利的。

此外,应该马上提及事情的另外一些方面:如果机密目前可以有助于改革(通常,而不总是这样),它一定是在很长时期内加强了墨守成规及保守主义的作风。在大多数机构中情况都是这样的。例如在军队,军队里一切都会产生影响,以使军人们保持缄默并劝止他们提出异端思想(让·饶勒斯 1894年写《1894年的新军队》时就已经为此忧虑了);或者是在警察局,其最高任务是维护治安,意即首先那些意志薄弱者有可能在没有舆论控制的情况下误入歧途,而这些舆论是以报纸为代言人的。

然而,我们在此发现了一种最为可信的准则,经过一个世纪,我们依然可用这条准则。在民主国家里区分左右两派,其信条即,市场经济及私人利益如果可以确保集体繁荣,那么金钱这个上帝,在没有任何对应的影响力的情况下,便会反对民主了。在信息领域,如果人们不控制这个“上帝”的话,不用除它本身以外的其他准绳约束它的话,它便会与我曾提出的必须性背道而驰了。

在短期内,“金钱上帝”竭尽全力以突破沉默的抵抗,把最为合理的秘密揭露出来。不正派的摄影师、窃听电话的修理工、敲诈性的报纸、形形色色的投机商,这个系统以一种不断增长的力

量运行,此外还经常利用政治参与者自身的支持,这些人非常渴望被谈及。诉讼中的利益方面,国际投机的发展,间谍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推动——令人忧虑的方向。

在相反的方面,一小时后,一天后,一个月后,一年后,当市民们有足够的理由要求知道事实的时候,金钱便自发地试图重新制造出另一个谜,当金钱影响到与民主力量竞争的事物发展进程,这个谜团用于遮掩金钱原有的角色,而这些事物是与民主力量的意志和愿望背道而驰的。当然,人们尤其会想到行贿受贿的危险。以为如果政界人士有足够理由要求人们对其私生活不予过问,所有记者以及法官关于他们金钱的来源和个人的清廉的调查都是合法的甚至是必需的。

总之,在这一领域,资金的控制者可能也是危险的,由于他的审查制度,而更多的还是由于他的鲁莽……读者们对此大为不解,我不相信,且不说别处,单是传媒界,利益的自然和谐是不可信的,我们也不相信个性冲动的结合可以单单保证它的顺利以及一个集体的精神状态平衡。一种有利的平衡要求睿智以及权力机关的严谨和公共力量对制度结构的合理干预。新闻自由是一种不可估价的遗产,并且总是因为充满激烈的斗争而显得非常不稳定,只有如上文所述,新闻自由才能够保持其恒久性。

新的论坛

有不同的损失,就有不同的忧虑:视听的万能性给政治生活强加了一种戏剧化的缩减的形式,信息的简洁性与一种日益突出的特征相结合,这种特征是为了把推理缩减到最简练的程度,并使关于知识方面的冲动得到提前的承认。

来看一个例子,人们开始抱怨一些“短句”,即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起草过的发言,市民们将其内容漫画化了。在英国有人嘲笑泽当京(泽当京译作“脱口秀”)。政界人物,尤其是托尼·布莱尔在其演讲中利用这种形式,使之被电视转播:一句平均两秒钟。然而必须要丧失一些记忆才能忽视过去曾有过多少令人叹息的简化。

想想尤利乌斯·恺撒:“灾祸中准备准备”^①或者是想想波拿巴在埃及:“在这些金字塔的顶端,几个世纪注视着你。”更近一些,我们可以想到一个著名的时刻,即1804年12月15日,埃米尔·奥列维耶,拿破仑三世的总理,向议会论坛宣布他的政府以“轻松的心情”接受对普鲁士战争的“重大责任”。当然,他马上补充上外交方面的各种动因。但是在色当之后,失败一度突如其来,所有的细微差别都已经在记忆中被抹去,而这句不断被引用的话像内萨斯制服一样伴随着他,使他永远不能重返舞台:他漫长的退隐时期一直持续到1874年他突然死去,而此间他正写着他的多卷头的回忆录——其中一卷是完全用于一种对于这条毁灭性的名言的徒劳的辩解。毫无疑问,如今在电视上,每次有人提及他,都不停地引用这句话,但当其作者已经在政治上来说算作死亡之后,这句引语也便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相似的,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关于勒内·维维亚尼的印象并没有仅限于1875年政教分开后那句著名的惊呼吗?——实际上我们今天很难毫无嘲讽地说出这个句子:“我们在天空中点燃了不复燃烧的光芒。”而1859年的保尔·雷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

^① 到,见,胜。恺撒对他的一次胜利的描述。恺撒率军进入小亚细亚,仅用15天时间便平定了庞培部下本都王子的叛乱,而后用最简洁的拉丁文写了这份捷报送元老院,即历史上著名的“猿灾”文书。——译注

会胜利,因为我们是强大。”或者是另外一句:“铁路被切断了!”至于贝当,当他在广播中运用一位著名的“黑人”,埃马纽埃尔·贝尔(正如不久后,疏于才华的“通讯顾问”对于我们当今的政治所做的那样)给他提示的一句话:“土地不说谎。”这句话没有预示出至今为止那些所谓的未知的当前实践吗?

在与那些不可避免的苦恼相同的一章中,有人一遍遍对我们谈及在欧洲各国,受英国《木偶》启发而产生的节目中对政界人物的嘲讽所引起的破坏性效果,在我国,这样的节目有电视一台的《糊涂秀》或是加密台的《玩偶剧场》。但是人们真的相信漫画的力量,例如法国的加锡耶、塞内普或是拉尔夫、苏波,在意大利的保罗·加雷托,英国的《笨拙报》或是德国的《简单》,这些在上半个世纪不是非常具有重要性吗?这还没有追溯在大革命第一阶段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大量的淫秽图画在暗地里流行。

另外一种平庸的思想传播开来:当今关于“抢先刊载的独家新闻”的顽固观念所导致的有害的结果。这些“独家新闻”使记者们犯错,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对证、检查和思考。这种危险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正是这种忧虑困扰着儒勒·凡尔纳《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中的两个记者,英国人哈里·布伦特和法国人阿尔西德·若弗里韦,当他们在西伯利亚互发电报的时候(为了保持一直使用线路,他们一直给邮局的职员们口述《圣经》节录或是贝朗热的诗选段),每个人都试图最先描述他们参加的俄罗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战争。很多参加过 1905 年著名的蒂米什瓦拉运动的特派员,或是参加过非自愿的关于一次想像的屠杀的“封闭信息”的人们都很乐于在事后解释道,这种竞争的结果,还有在当时依赖于极少数电话的信息传递形式,使得他们没有必需的时间进行深入调查,技术的模糊性时而胜出、时而失败……

认为电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将必定削弱公民论战的这一想法对很多政界人士越是有诱惑力,他们越是担心看到自己几乎是代表性的职能因这些视听的声誉而变得贬值。

确实如此,在西方世界到处都是这样,以前,各位议员从首都把最新的消息带回他们自己的区域,并且由此感到光耀,但现在不再是这样的。然而市民们不停地渴望互相倾听对方的分析和综合,图像和声音可以补充信息报纸以及论战曾给他们提供的信息。至少是在法国,选举运动中我们便看到了各种会议和集会吸引了一个全新的公众群体——不像以前那样追求演说的对抗(还有对此抱怨的必要吗?),而是更多地渴望培养其思考能力及组织其自信心。

此外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深刻的政治著作已经消失了,它们已经找不到读者了,如果说是市场有些狭窄了,报纸的种类也比 1940 年或是 1950 年前多了许多。而且对于我来说似乎是这些刊物引用了很多从前例证,以证明大众化报纸可以激起集体的热情,这离冷静的智慧之路甚为遥远,而且没有当今时代这样,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赋予公众们更好的办法,使之将时间更好地置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之内。

所以不要夸大新生事物。而后,一旦这种平衡得到保证,不要就此忘了政治沟通应该与新生媒介的特殊性相适应。

这表明,从一开始,我们再提一下,非商业动因应该从中干预以使供应多样化。书面出版物长期以来似乎便需要非常有限的资本以使私人利益的唯一动因为其提供事实真相。并且对于那些寻找易得的猎物的强盗们光明正大地代表了各种面向不同方面读者的出版物,他们水准很高,并且在必要时十分严肃;但是当今的发展,成本的提高以及网上电子版的挑战使得一种不断扩大

的财政支持越来越趋于合法化,尤其是对日报的支持,用尽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政府对于其内容的影响。政府有更足够的理由去支持要求更多资金的视听界,在各地,公共部门都不可能缺少视听传媒,为不同的进程及内容服务。

这还表明,在后一阶段,儿童及未成年人将会在新闻阅读中被培养起来(此外这点还能维护他们在互联网前的自由)并将会被教授如何使用电视,就像我们教授以前的孩子如何写字一样。

事实上,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一种根本的文化不平等把支配过过滤器以及拥有分析选择的能力的人与那些不会武装起来反对他们的人分成两类——前者正观看着那些避免了暂时的幼稚的节目。

确实如此,从未因任何自满而停止前进的“公共”电视台解释(人们可以特殊要求它开设一个“知识频道”)为何要使用煽情和劝慰的手法,要对图像、声音及其组合进行控制——因为“企业精神”经常会阻止私有部门致力于这种实践。

学校尤其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课文解释一直是我们的市民中学的一种主要考试。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我们要在电视上教授各层次的知识,因此应该培训各种不同层次的教师去做这件事。人们等待着又一个于勒·费里的出现以鼓励出现更大的公民进步。

总之,重要的是重新给这些有时被掩饰了的明证正名,并且相关民主人士应该不厌其烦地重新揭示:在每个时期,每个自由社会,媒介从未建立过这样突出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其价值、其强制的命令及其习惯的动作强加于一个消极的民族。

市民们可以抱怨、愤怒、抗议——最终,他们把媒介做成了媒介的样子。他们最后知道了这一点,并且出于警惕或是行动而接受了这一点。

后摇摇记

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研究是非常广泛的,并且不可能穷尽。我的抱负并不远大,只是要在普通顺序以及特殊顺序角度重新认识作者所欠下的债务,并为有意的读者指出一些方向,以寻找一些更深入的关于本书涉及的事件以及问题方面的信息。所列书目都是列于使用该书最多的章节之下,虽然我在其他的情况也会援引这些书目。

但是首先我还是需要向几本主要的书目表示深切的谢意,这些书在本书的创作中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首先要提起的是一位重要的却少人赞誉的历史学家乔治·魏尔的一本先驱性著作,《报纸的起源、发展以及期刊的作用》(巴黎,书籍复兴出版社,1964年)。此书1964年曾被选入亨利·贝尔的“人类的进程”丛书。我在此书中援引了大量例证,这本书对于它的时代来说是非常新的,并且分析和引用都相当丰富。

继而应该提到克罗德·贝朗热、雅克·戈德肖、皮埃尔·吉拉尔以及费尔南·泰鲁在法国方面所做的不朽的工作——《法国新闻通史》(巴黎,马格南出版社)。这书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

员缘年出版,《从起源到 员源年》,源页;第二部分,《员缘—员年》,员年出版,源页;第三部分,《员—员年》,员年出版,源页;第四部分《员—员年》,源页;第五部分,《员年至今》,员年出版,缘页。此书出版之时附有一份非常全面的参考书目。

在论及最后半世纪这段时期时,我还受惠于弗朗斯·巴勒的教材《媒介与社会》(第八版,巴黎,配林出版社出版,员年出版,源页),以及罗兰·凯罗尔的《媒介,书面出版物,广播与电视》(巴黎,员年出版,源页)。

还应列举出吕西安·斯费编撰的重要的《通讯词典》(巴黎,员出版社,员年出版,共圆册,员页)。这本书中的求知欲在历史上不算是最高的,但是他列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尤其是近一段时期的信息。此外还有达尼尔·布纽的选集《信息科学与通讯科学》(巴黎,拉鲁斯出版社,员年出版,源页)。

我同样有兴趣提到雷吉斯·德布雷,此人以哲学家的身份进行一些使历史学家感到兴奋的思考(即使后者认为这种思考受到了 泽林其列塞克的损害)。这种思考是有关他所谓的“媒介学”,植根于漫长时期中的有关“符号的力量”的研究,以及“论及在上层社会与传播技术结构之间的关系中,上层社会的功能的原则”。我推荐他的近作《媒介学演绎》(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员年出版,源页),而后可以通过《普通媒介学教程》(巴黎,伽利马出版社,“思想丛书”系列,员年,源页)深入研究——至少要翻一下哲学方面的《纯真的眼》(巴黎,瑟伊出版社,员年,员页)。

我还记得,尤其是关于最近这一时期,专业期刊给我这本书的众多益处。例如《视听手册》《广播史手册》《媒介学手册》《视听档案》《海尔梅斯》《媒介的力量》配林出版社出版,员年出版。

砸碎者当然还不能忘记英语版的《电影历史报》《广播与电视》。

最后,在法国视听界方面,请允许我提及我编撰的丛书(与阿涅斯·肖沃合编)《世纪回声》,《法国广播电视史词典》(巴黎,阿歇特原文学出版社,艺术出版社,第五版,1999年,160页)。

译摇后摇记

翻译完这本书的时候 ,南京的梅雨季节也快要来临了。从 2014 年 9 月 10 日接到书稿到今天翻译的结束 ,已经有近 1 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一年多是这本书伴随着我度过的。然而整个书稿完成的时候 ,心里却并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 ,这二十余万字是让我惴惴不安的。一本专业性强、理性思维明显且旁征博引、史料翔实、论题广泛而深刻的著作 ,对于我来说 ,无疑显得有些沉重。似乎作者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一时间都压在我的肩上 ,确实有些招架不住的感觉。但是一步步走过来 ,都是在不断地参考专业书籍、查阅有关史料、向专业人士请教 ,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这本书翻译出来之后 ,自己的所得便不是翻译一本书这样简单 ,因此对于这项翻译工作 ,我是心怀感激的。

《西方媒介史》是一本引人思考的书。评价一本历史著作的优劣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它能否给人带来一种思考 ,优秀的历史著作重在引导读者通过史料去理解分析 ,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史料灌输。媒介是我们的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当今时代离不开互联网、电视、广播、通信等等各种

各样的媒介方式。试想如果没有媒介的存在,世界的发展将会怎样。媒介是人类社会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我们的祖先用彩色石子做出第一个标记开始,媒介便伴随着人类而延续至今。媒介的历史也因此与整个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香港著名的新闻人董桥曾说过,新闻是历史的雏形。推广开来,我们通过各种媒介,使我们的文明得以传播普及,代代相传,铸成了今天的人类历史。而每一种传媒方式都有各自的历史,其中辛苦甘甜是耐人寻味的。翻译的初稿结束之时,我阅读了关于《光明日报》最初发展历程的一些文字,从一个特例而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媒介形式的作用、意义及其历史所包括的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

让·原诺埃尔·让纳内先生的这本《西方媒介史》,正是让人们通过媒介而看到媒介以外的广阔天地。与我们常见的媒介史类著作不同,本书不是单纯的史料介绍,而是作者作为媒介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几十年来的思考的总结。其内容主要是西欧的媒介史,书中线索灵活,不仅论述了各国媒介发展史,而且还理清了各种媒介的发展史以及各个时期媒介的发展过程,突出了西欧媒介的整体性,并通过横向对比来表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较之其他相关著作而言,本书的资料更为翔实细致和贴近现实,在西方媒介发展方面尤其是在法国媒介的发展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独特的资料,这也是本书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书中涉及政治、历史、军事、新闻、社会学、电子等等诸多学科,时间跨度更是从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到当今的网络时代,可以说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丰厚的专门历史著作。而作者在结论中着重论述的媒介的历史与民主的未来的关系,更使读者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是一本普通的专门史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和研究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源自于作者在巴黎政

治研究学院讲授的十五节课的讲义,而“媒介学”已经开始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下来,媒介史也就成为了“媒介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本书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曾写过《媒介安魂曲》的学者让·波德里亚抱怨过:“如今,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工具,使现实与真实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全都失去稳定性。……这一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渴求文化、交流和信息,而是因为媒介的操作颠倒真伪,摧毁意义。”关于媒介的讨论,正处于一个不断有新认识、新论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本书更侧重的是讲述历史,只有了解媒介自身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给媒介一个准确的定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和历史学家的严谨,并随时流露出幽默的笔调,使这样一本洋洋二十几万言的专业论著并不显得枯燥。作者非常重视本书的汉译工作,翻译过程中曾多次向我询问翻译进程,耐心地为我解答了很多翻译中的问题。

本书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名参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语姓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地名参照《世界地名录》、《最新世界地名录》;书中涉及相关报刊名称、组织名称、专有名词等参照《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网络新闻传播概论》(雷跃捷,辛欣主编)、《世界报刊、通讯社、电台译名手册》(辛华编)、《报纸的力量》(英,沃克著)等。参考资料有限,恳切请读者及专业人士对翻译中的错漏之处给予补充和更正。

许钧教授曾在《译学探讨与译事思考》一书中把翻译比作他的恋人。的确,翻译有如恋爱,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甘苦。有幸参加这套丛书的翻译,对于我的人生有着很重要的

影响。

最初拿到书稿的时候 ,大外的玉兰树开着疏疏朗朗的白花 ,而一年后的南大南园 ,窗外也是玉兰花素白地盛开。这本书的翻译可以算作结束了 ,而恰如花朵周而复始地开谢 ,生活也一样要踏实而坦然地继续。感谢这一年翻译过程中带给我的一切。

段慧敏

南京大学南园

圆年 源月 员日

蔡志忠先生XVIII 著：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与报刊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第四章 自由的延伸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分：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第五章 黄金时代

李：蔡志忠先生作品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专有名词对照表

粵字粵稱 阿拔斯二世

粵字說 美国广播公司

粵字播 《阿贝塞报》

粵字說 阿普杜拉·
哈密德

粵字說 阿普杜拉·
《使徒行传报》

粵字說 阿普杜拉·
《法兰西行动
报》

粵字說 阿普杜拉·
艾迪生

粵字說 阿普杜拉·
康拉德·阿登
纳

粵字說 阿普杜拉·
法新社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维尔弗莱多·阿
涅塞

粵字說 阿普杜拉·
安赫洛·阿戈斯
蒂尼

粵字說 阿普杜拉·
清晰度电视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爱德华·阿尔比

粵字說 阿普杜拉·
阿尔塞斯特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皮埃尔·阿兰

粵字說 阿普杜拉·
伍迪·艾伦

粵字說 阿普杜拉·
萨尔瓦多·阿
连德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米格尔·阿尔
莫雷德

粵字說 阿普杜拉·
埃米利安·阿莫
里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美国解放委员会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美国军队
电视网

粵字說 阿普杜拉·
《美国新
闻杂志》

粵字說 阿普杜拉·
《人民之友》

粤自音选, 阿圣编 播《国王之友》

粤西音裁, 允耘, 分译 播 摇·阿尔穆什

粤东音阶, 阿圣编 播 罗贝尔·安德烈

粤大音等, 美选, 采译, 分译, 译译, 译译, 译译 播

《政治、国民及文学年鉴》

粤东音景, 阿圣编 播 安南(报告)

粤大音, 阿圣编 播《文学年刊》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社 阿圣编 播 译译 译译

但译译, 译译, 译译, 译译 播 美国报纸编

辑协会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卫视二台

粤东音, 阿圣编 播《天线》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译译, 译译, 译译, 译译 播 圣·

安托万·德帕杜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译译, 译译 播 美国在线

《粤东音, 阿圣编 播“省文撇”栏目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译译, 译译, 译译, 译译 播 美国

公共电台

粤西音, 分译 播 摇·达尔西

粤西音, 播 德意志广播联合会

粤西音, 播 高级研究计划局

粤西音, 阿圣编 播 雷蒙·阿隆

粤西音, 播 法德合办文化台

粤东音, 阿圣编 播《朝日新闻》

粤东音, 阿圣编 播《法兰西景观》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赫伯特·亨

利·阿斯奎斯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美联社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皮埃尔·阿苏利那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灾员,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苗 播 埃马纽埃尔·德·阿斯捷·

德拉维尔热

粤东音, 播《黎明报》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摇·奥杜兰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II,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播 奥古斯丁二世, 撒克逊及波

兰选帝候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阿方斯·欧拉尔

尔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樊尚·奥里奥尔

粤东音, 阿圣编 播《震旦报》

粤东音, 阿圣编 播《机动车》

粤东音, 阿圣编 播《权威报》

粤东音,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阿圣编 播 让 原克里

斯朵夫·阿韦蒂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莱昂·巴伊比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让·西尔万·

培尔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约翰·洛吉·贝

尔德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约瑟菲娜·贝克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斯坦利·鲍德温

月粤东音, 阿圣编 播 爱德华·巴拉

迪尔

- 悦音音音《老实人》
- 悦音音音阿尔弗雷德·卡皮
- 悦音音音卡蓬 员原
- 悦音音音奥拉斯·德·卡尔布恰
- 悦音音音《漫画》
- 悦音音音卡耐基金会
- 悦音音音乔治·卡庞捷
- 悦音音音阿尔芒·卡雷尔
- 悦音音音让·原·克·德·卡里埃
- 悦音音音吉米·卡特
- 悦音音音安里科·卡鲁索
- 悦音音音乔瓦尼·卡塞利修道院院长
- 悦音音音保罗·德·卡萨尼亚克
- 悦音音音卡芬雅克将军
- 悦音音音爱德华·卡夫
- 悦音音音卡米诺·本索·加富尔伯爵
- 悦音音音罗兰·凯罗尔
- 悦音音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 悦音音音记者培训中心
- 悦音音音委员会
- 悦音音音文特·塞尔夫
- 悦音音音欧洲核研究中心
- 悦音音音尤利乌斯·恺撒
- 悦音音音法国国际频道
- 悦音音音记者培训中心
- 悦音音音雅克·沙邦·戴尔马
- 悦音音音内维尔·张伯伦
- 悦音音音电视三台
- 悦音音音电视五台
- 悦音音音电视四台
- 悦音音音罗德·沙佩
- 悦音音音勒内·夏尔
- 悦音音音《喧哗》
- 悦音音音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
- 悦音音音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
- 悦音音音查理十世
- 悦音音音雅克·沙特内
- 悦音音音克里斯蒂安·沙瓦农
- 悦音音音玛丽·原约

克·科西丘科什 原莫里泽

德烈·拉巴
 尔特

皮埃尔·拉博里

让·拉库蒂尔

拉法热(事件)

雅克·拉菲特

布里斯·拉隆德

朗格卢瓦

路易·拉扎勒斯

安德烈·洛朗

皮埃尔·拉瓦尔

博纳·劳

皮埃尔·拉扎雷
 夫

保尔·莱奥托

保尔·勒博迪

古斯塔夫·勒邦

阿尔贝·勒布伦

让·勒卡尼埃

让·原非利普·
 勒卡

拉科代尔

雷蒙·勒格朗

埃利耶特·勒穆瓦
 纳

莱奥塔尔(法律)

加斯东·勒鲁

雅克·勒苏尔
 纳

夏尔·德·雷
 塞布

欧仁·勒泰利
 耶

加泽特
 通信》

吕西安·莱维

莫尼卡·莱温
 斯基

《解放报》

《自由报》

《自由言论报》

约瑟夫·利克
 里德尔

《生活》

查理·林白

西蒙·兰盖

沃尔特·李普曼

戴维·劳
 合·乔治

约翰·洛克

埃米尔·洛雷尔

《伦敦晚报》

《伦敦公报》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皮埃尔·马塞尔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皮埃尔·马
 西亚西
 配乐作词 培 昂 作词 编曲 古列尔莫·马
 可尼
 配乐作词 肖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让娜·马雷夏
 尔
 配乐作词 肖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莫里斯·马
 雷夏尔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玛利亚纳》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让·马兰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路易·马兰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伊波列特·
 马里诺尼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保尔·马里翁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马尔波罗
 公爵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莫里斯
 ·马尔丹·德加尔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罗杰·
 马尔丹·德加尔
 配乐作词 昂 亨 作词 编曲 吉勒·马蒂内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卡尔·马克思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竞赛画报》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晨报》
 配乐作词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居伊·德·
 莫泊桑
 配乐作词 肖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弗朗索瓦·莫

里雅克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皮埃尔·莫鲁瓦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夏尔·莫拉斯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马克西米连一世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詹姆斯·
 克拉克·麦克斯韦
 配乐作词 昂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朱塞佩·马志
 尼
 配乐作词 孟 亨 作词 编曲 乔·麦卡锡
 配乐作词 昂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威廉·麦金利
 配乐作词 昂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罗贝尔·麦克
 纳马拉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摇媒介实验室
 配乐作词 昂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阿加特·梅拉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特雷武纪事》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皮埃尔·
 孟戴斯·弗朗斯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克罗德·梅西耶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塞巴斯蒂安·
 梅西耶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信使报》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法兰西信使
 报》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文雅信使》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莱茵信使》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皮埃尔·梅斯梅
 尔
 配乐作词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孟 亨 孟 亨 作词 编曲

韵译 埃米尔·奥列维
耶

韵译 开放大学

韵译 (韵译) 法国广播电
视管理局

韵译 《法兰西西部报》

韵译 托马斯·潘恩

韵译 吕当·潘勒韦

韵译 《国家报》

韵译 帕尔

韵译 迈凯尔·帕尔默

韵译 夏
尔·原约瑟夫·庞库克

韵译 马尔科·潘内拉
《全景周刊》

韵译 原埃罗尔德
·帕基

韵译 巴黎国内广播电台

韵译 《巴黎日报》

韵译 《巴黎竞赛画报》

韵译 巴黎世界广播电台

韵译 巴黎邮电电讯广播电台

韵译 《巴黎文娱》

韵译 《巴黎晚报》

韵译 《巴黎人报》

韵译 《解放了的巴黎人
报》

韵译 帕特诺特

韵译 《法兰西爱国
者》

韵译 勒内·帕约

韵译 公共电视网

韵译 伊里·佩利坎

韵译 马塞尔·佩朗

韵译 欧仁·佩尔唐

韵译 西尔维奥·佩利科

韵译 《宾夕法尼亚公
报》

韵译 《宾夕法尼亚
杂志》

韵译 《便士杂志》

韵译 《人民》

韵译 《社歌老爹报》

韵译 迈克尔·佩里
夏尔

韵译 菲利普
·贝当将军

韵译 热多姆·佩蒂翁

韵译 《小日报》

韵译 《小巴黎人报》

韵译 《小共和国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阿兰·佩尔菲
特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芬尼杂志》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查理·菲利蓬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哲学议
事录》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帕斯卡·皮亚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彼得大帝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皮尔金顿报
告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安托万·比内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哈罗德·品特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威廉姆·皮特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马尔索·皮韦尔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让·普朗谢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雷蒙·普恩
加莱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观点杂志》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赫秋里·白罗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莱奥·波尔代斯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乔治·蓬皮杜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西
蒙·蓬波纳侯爵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迪
泰拉耶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杰里米·波普金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人民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费拉迪米尔·
波尔谢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埃莱娜·德·
波尔特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巴黎广播站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路易·普赞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让·普拉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新闻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现代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报刊控
诉委员会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新闻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莫里斯·普里瓦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宣传部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皮埃尔
原约瑟夫·普鲁东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让·普鲁沃斯特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公益广告》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公共广播
法案》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公开报》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约瑟夫·普利策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笨拙》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
摇贡萨诺·凯波·德·利亚诺将
军

孕再唯云隹云,粤裁摇亨利·克耶

砸者粤粤瑶《广播法案》
 砸者粤粤粤瑶阿尔及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阿利戈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阿洛埃特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安道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蓝色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布拉柴维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布拉斯劳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加洛林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城市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古典音乐台
 砸者粤粤粤瑶黑水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埃马纽埃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蓝线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法国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参见 砸毁
 砸者粤粤粤瑶克罗兹法国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卢瓦尔海洋法国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佩里戈尔法国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广播新闻
 砸者粤粤粤瑶法国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自由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卢纳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卢森堡广播电台(参见 砸毁)
 砸者粤粤粤瑶马耶纳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默伦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米兰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米兰国际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蒙特卡罗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慕尼黑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一号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巴黎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帕尔马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
 砸者粤粤粤瑶赛维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索邦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艾菲尔铁塔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梵蒂冈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贝罗尼卡广播电台
 砸者粤粤粤瑶费斯内姆广

附() 瑞士广播电视公司
 云, 云, 云 约瑟夫·斯大林
 云, 云 《新闻报》
 云 《明星报》
 云, 云 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
 云, 云 理查德·斯梯尔
 云, 云 罗杰·施特凡娜
 云 《明星画刊》
 云, 云 让·施特策尔
 云, 云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
 云, 云 乔治·苏亚雷斯
 云 《西南报》
 云, 云 欧仁·苏
 云, 云 埃弗利娜·叙勒罗
 云 《星期日快报》
 云, 云 乔纳森·斯维夫特
 云 () 赛克斯委员会
 云, 云 巴黎报业工会
 云, 云 书业工会
 云, 云 唐朝

云, 云 安德烈·塔尔迪厄
 云, 云 让·塔尔迪厄
 云, 云 居伊·塔尔热
 云 () 塔斯社
 云 《闲谈者》
 云, 云, 云 塞尔热·查霍蒂纳
 云, 云 传输控制协议与网际协议
 云 () 云, 云, 云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
 云, 云 法国广播电视第一公司
 云, 云 法国广播电视第二公司
 云, 云, 云 皮埃尔·原亨利·泰让
 云, 云 德律风根公司
 云, 云 《每周电视》
 云, 云 《电视、广播和电影》
 云, 云 《时报》
 云, 云 《巴黎时报》
 云, 云 弗兰克·泰诺
 云, 云 古斯塔夫·泰里
 云, 云 法国电视一台
 云, 云, 云 玛格丽特·撒切尔
 云, 云, 云 达尼尔·蒂埃里
 云, 云, 云 阿道夫·梯也尔
 云, 云, 云 汤普森勋爵

裁首 裁首 裁首 图 韦隆

裁定 裁定 裁定 《时代》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时代杂志》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时代华纳公司

裁定 裁定 裁定 《泰晤士报》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时代先驱报》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裁定》

摇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裁原 裁原 丁丁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摇 让 原路易·蒂克西埃 原维尼扬古

《裁原 裁原 裁原 《今晚》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斯·德·托克维尔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论坛报》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特劳普曼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报》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摇 《德雷福斯论坛报》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摇 特罗普曼时

间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裁原

尔·维扬松 原逢德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粤生 灾祸 摇英国
 维多利亚女王
 灾祸的灾难, 原逢德 摇皮埃尔·维耶诺
 灾祸的, 原逢德 摇让·维果
 灾祸的灾难, 原逢德 摇让·德·
 维尔梅桑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菲利普·德
 ·维利耶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勒内·维维亚尼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美国之音广播电
 台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小偷》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云 灾祸的厄运
 悦的厄运, 原逢德 摇伏尔内, 即
 康斯坦丁·弗朗索瓦·德·沙斯
 伯夫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伏尔泰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克里斯蒂安·沃斯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看》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华尔街日报》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罗伯特·沃波
 尔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约翰·沃尔特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约翰·沃尔特二
 世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华盛顿邮报》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水门事件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伊夫林·沃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乔治·魏尔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奥森·威尔斯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世界报》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弗朗索瓦·
 德·旺代尔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西方电气公司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皮埃尔·维恩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威尔克斯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哈罗德·威尔逊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伍德罗·威尔
 逊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沃尔夫社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贝尔纳·沃尔夫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吴士里元帅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多米尼克·
 沃尔东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威廉·伍德
 福尔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罗伯特·伍
 德沃德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万维网
 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沃尔姆斯银行
 再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黄孩子》
 再灾祸的厄运, 原逢德 摇《读卖新闻》

默尔曼

在法国德国电视二台

在波兰, 鮑里斯·左拉

在波兰和俄罗斯, 戈德弗雷德·埃贝尔·齐